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俞吾金/主 编

陈学明 吴晓明/副主编

女性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

秦美珠 / 著

Research On Feminist Marxism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Research On Feminist Marxism

ISBN 978-7-5366-9402-6



9 787536 694026 >

定价：42.00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04JZD002）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俞吾金 / 主 编

陈学明 吴晓明 / 副主编

女性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

秦美珠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秦美珠著;俞吾金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66-9402-6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I. 女… II. ①秦…②俞… III. 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研究 IV. 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275 号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NV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秦美珠 著

俞吾金 主编

陈学明 吴晓明 副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 勇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王 娅 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40 千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 000 册

ISBN 978-7-5366-9402-6

定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总序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中法空刊》主恩克(俄國)注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滥觞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经过 20 多年来的发展,今天我们完全有把握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几乎可以说,在马克思以后,国际上出现的任何重大的社会思潮,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贷思想资源,甚至直接地或间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命名相关的思潮或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次,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尚未经历过的事情,许多国家已经经历过了。它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经验教训蕴涵着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解上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早已引起国内理论研究者的深切关注和巨大兴趣。再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当然应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致力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以便确保我国的精神生活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高点上。

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长期的耕耘者,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研究领域近 20 多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复旦大学哲学系于 1985 年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1999 年升格为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0 年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中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小基地”),2004 年,在小基地之外,建立了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级创新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中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大基地”);2005 年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设博士点。2006 年全国又建立了 21 个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设 5 个二级学科,其中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从马哲史或外哲史的一个研究方向上升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而小基地和大基地的相继建立也

表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受到高度的重视。

我们之所以要策划并出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其直接的起因是:通过投标和竞标,我们获得了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和基本理论研究》。这个课题促使我们凝聚大、小基地的全部学术力量,及博士后和博士生中的佼佼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做出全方位的、有穿透力的研究。这套丛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系统性。本丛书试图通过三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即“区域研究”、“流派研究”和“问题研究”来构建这种系统性。“区域研究”重点探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状;“流派研究”主要探索国外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等;“问题研究”侧重于反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市场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等。通过这三条不同的研究进路,这套丛书将全面而又有重点地勾勒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

其二,前沿性。本丛书对“前沿性”的理解是,把研究的焦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上。也就是说,重点考察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态势是什么?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哪些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述?他们正在思考哪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当然,为了把前沿问题叙述清楚,也需要做一些历史的铺垫,但探讨的重心始终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最前沿的问题上。

其三,思想性。纳入本丛书出版规划的著作,除译著外,都充分体现出对思想性的倚重。也就是说,这些著作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反思性的”、“研究性的”。它们不仅要弄清新的现象和资料,而且要深入地反省,这些新的现象和资料可能给传统的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造成怎样的挑战?如何在挑战与应战的互动中丰富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总之,它们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思想的贯通。这也正是这套

丛书不同于其他丛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套丛书在策划的过程中就得到了重庆出版社总编辑陈兴芜编审和该社重点图书编辑室主任吴立平编审的热情支持。本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 2004 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与基本理论研究》(课题批准号为 04JZD002)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俞吾金 陈学明 吴晓明

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孙承叔

秦美珠副教授的专著《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终于出版了,这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问题研究的第一本系统性专著,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三个时间段,分别介绍、论述了20世纪60至9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7位著名女性主义思想家的17部最有影响的代表性论著,每一论著,择其精要,细细梳理,不仅呈现给读者一个完整丰富的思想发展脉络,而且为下一部分的理论分析奠定基础。由于许多出自第一手外文资料,并且是在浩如烟海的外文论著中所作的精选,因而不仅使你感到资料的详实、可靠,而且使你感到作者所下功夫之深,这是本书最鲜明特色之一,也是作者对学界的重要贡献。

第二部分是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进行总体上的研究,作者把它放在现代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女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女性与经济、女性与政治、女性与文化、女性与传统、女性与家庭、女性与性解放、女性与人类解放等重大问题作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述。这些分析和评论是真诚的、非教条的、大视野的,是作者对学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女性问题是人类生存、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因为女性是人类的母亲。然而自阶级对立产生以来,女性的地位就江河日下,不

仅受到经济剥削,而且受到政治压迫和文化奴役,阶级的、宗教的、家庭的、种族的、民族的、性别的,各种压迫纵横交错,就绝大多数女性而言,不仅失去就业权、财产继承权,而且失去受教育权、选举权,被排挤在社会体制之外,成为家奴和性奴,成为整个社会最异化的一族。即使到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妇女依然处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1]。因而妇女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妇女问题的解决也成为衡量人类文明的指示器。正像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引证傅立叶的话时所指出的:“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因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

然而在“左”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下,我们往往只从阶级斗争角度理解女性问题,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还不等于女性的解放。正是在这一维度,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别开生面且富有深度的理论探索,秦美珠的理论开掘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为了节约版面,下面我仅以语录形式展现书中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是秦美珠加以论述的。

双重压迫: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关于妇女的历史地位,恩格斯曾有过深刻的论述:“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3],因此阶级的压迫与性压迫是同时发生的。“母权制的被推翻,是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4]。“男子在婚姻上的支配权只是他的经济支配的简单的后果,它本身将随着后者的

消灭而消灭。”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1878年)一著中也强调了“妇女解放最终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观点。

对于马恩的这些基本观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总体上是接受的。如沃格尔所说:“马克思的经济范畴确实为理解家务劳动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妇女作用指明了方向”^[5]。贾格尔也认为女性问题的解决“要求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6]。但他们认为当今妇女的异化是全面的,“必须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进行修改,因为在当今社会,妇女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被异化了,这种异化采取了特殊的性别形式……当代社会中的妇女经历是异化的最好例证”^[7]。“妇女作为妇女是处于历史之外”(米切尔)的。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妇女解放的充分条件”,妇女解放还应包含有性的解放。“传统马克思主义范畴忽视了妇女处于市场外的劳动,忽略了市场中妇女工作的性别特征,从而掩盖了男性对妇女的系统统治……妇女生活条件不仅由统治阶级而且还是由男性决定的,所有阶级的男性通过不同途径直接从妇女劳动中获益”^[8]。

因此,妇女受压迫是双重的,既是阶级压迫,也是性压迫。正如琳达·菲尔普斯(Linda Phelps)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构成妇女受压迫的两种不同制度;哈丁也认为研究父权制和资本的真正物质基础不应局限于经济关系,必须考虑除经济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在经济关系以外的所有其他关系中,探寻构成父权制和资本的物质基础。

因此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女权主义者要求揭示这样一个真相,即资本主义的父权社会在不动摇其自身的情况下无法兑现它的‘自由主义’平等诺言,甚至不能给予妇女平等的权利”^[9]。另一方面,必须反对男性统治。米切尔认为,倍倍尔的观点没有超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两性平等的理论范畴,是不全面的。卢宾在她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性别制度,它与经济制度不同,它是不隶属于经济制度,但又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并具有自身动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源于人类自身生产,比经济制度更重要。她批评恩格斯,认为恩格斯试图从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去探究妇女的从属原

因,他抛弃了人类自身生产中的社会性别制度。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惯例中,甚至在恩格斯的书里,“物质生活的第二个方面”的概念总是趋向于在幕后消失,或是被合并到惯常的“物质生活”概念里^[10]。“如果不同时向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两种制度提出挑战,就不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两种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就不可能产生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的理论”^[11],因此妇女问题必须全面研究。

关于父权制,米利特在《性的政治》(1970)中认为,整个历史是父权制的历史,“我们的社会是父权制的,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调性的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中”^[12]。马尔科姆·沃特斯则认为,男性制度“阻碍了工人阶级中男人和妇女的革命联合,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支配权”^[13]。艾里斯·扬据此得出结论:“把妇女推向边缘,从而使她们起次要劳动力的作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性”^[14]。费尔斯通则进一步提出了性阶级斗争的概念,认为“人类历史是性阶级斗争的历史;基于生育关系的性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只有通过生物学的技术革命才能把妇女从生物性的生育压迫中解放出来”。在现代核心家庭,男人通过无偿占有性——情感生产来剥削妇女,妇女构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特有阶级。

因此,本斯顿认为:家庭之外的就业平等,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人带来平等;只要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产物和妇女的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15]。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父权制的物质基础不仅建立在家庭要养育孩子这件事上,而且建立在能够使男性控制女性劳动的所有结构上”^[16]。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性解放的斗争:第一,必须把妇女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第二,必须反对整个男性统治。

家庭

质基础不在经济方面,而在生物学中,“性别间自然的生育差异直接导致了作为阶级根源的第一次劳动分工,同时造成了等级制的典范”^[17],因此家庭这一生育组织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

家庭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由于妇女被排除在生产和社会之外,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妇女是工资奴隶的奴隶,对主妇的奴役保证了对她丈夫的奴役”^[18]。从这个意义讲,妇女的被奴役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在当代家庭中,妇女的角色和工作活动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再生产做出了贡献”^[19]。“妇女在家庭中的母职角色和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母爱品质与行为是资本主义每日与每代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妇女的母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组织、社会的性别再生产和性别不平等的核心特征,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以及支撑它的意识形态至关重要”^[21]。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家庭是一个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工厂,妇女是劳动力这一最重要商品的生产者。“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内的从属性,在家里的从属性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22];“于是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因此有人主张,反对性压迫的斗争应该从反对家庭做起。而另一些人认为,“现在的家庭事实上同妇女或性别平等是冰炭不相容的。取消家庭并不会带来平等”^[23]。帕森斯认为家庭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稳定和消除紧张,妻子和母亲给丈夫和父亲以安慰和稳定,起社会情感作用,这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起心理支持作用。从真正人性的意义上讲,“家庭是人类尚能得到一些爱、安全和舒适的唯一处所,是人类还可以基于别的而不是金钱要素来做决定的唯一地方”^[24]。巴雷特主张重新分配育儿工作:“我认为,得出以下结论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妇女解放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新分配儿童照管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工资劳动领域性别分工的削弱没有带来结束妇女受压迫的原因”^[25]。

不少学者还对家庭劳动的性质作了新的探索,认为“家务劳动不仅创造了使用价值,根本上就是剩余价值生产”^[26]。长期以来,妇女的劳动不被当作劳动是十分错误的,她的劳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生产了

人——未来的劳动者,最主要的生产力。“正是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妇女才被连接到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剩余价值关系中。还可以进一步说,由于不对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为资本家实现最大的剩余价值作出了贡献”^[27]。这些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母职

妇女对人类最大的作用就是养育后代,也就是母职。乔多萝指出,妇女的母职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特征,是一种历史与跨文化的现象^[28]。

“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以及她们作为母亲的作用之所以遭到轻视,是因为她们身处金钱交易领域之外,因此她们的劳作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尽管爱是可贵的,但它只有在一个人遭人轻视的、无权的范围中才能受到珍视”^[29]。

“只要性行为是由男性界定的,只要妇女不能决定是否生孩子,那么妇女就不可能自由;只要妇女被迫从事大量不相称的孩子照料、维持生活及养育等工作,妇女就不可能与男性平等;如果只聚焦于参与选择政府或只聚焦于那些工人,控制着生产资料以满足人类的衣食住需要,那么关于民主的理想就不合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断定需要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新概念,包括生育中的民主或……叫再生产民主”^[30]。

除了人类自身再生产民主,他们还提出了再生产自由。再生产自由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1)改变现有的性行为与生育安排,给妇女以生育自由与性自由,这两个方面密切相联,对性自由的控制也是对生育的控制,没有生育自由,就不可能有性自由;没有性自由也不可能有生育自由。(2)废除公共世界中的男性统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的再生产自由与维持资本主义和男性统治是矛盾的”^[31]。

全面解放

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32]。因此主张人性的全面解放,“旨在推翻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必须与旨在消灭社会的性别制度的具体的女性主义革命相结合”^[33]。

哈特曼认为:“女权革命不同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式,但其性质却同样是革命的。妇女解放必须以两种革命为前提,如果放弃对女性主义的研究与实践,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斗争就不可能成功;如果忽略父权制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潜在支持,只以资本主义压迫为目标的斗争就会失败”^[34]。贾格尔也认为,“妇女问题的特殊争论不可能独立地解决,而只有在对社会和政治哲学基本问题进行思考得出的理论构架内才能解决”^[35]。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家胡克斯认为,“既然所有这些压迫都是联结在一起,不可能单独消除哪一种压迫形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偏见,即便在理论上可以分开,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的。这些压迫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提前被铲除,不可能在与之相连的其他压迫形式被消灭之前寿终正寝”^[36]。因此,妇女运动必须与全世界一切正义的运动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讲,女性解放过程本质上是产生新人的过程。

呼唤精神解放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桑德拉·巴特基(Sandra Bartky)认为:“妇女性异化采取的形式导致了妇女与她们的精神智力相异化,这也许比性行为的异化危害更大”^[37]。因此,与其他一切解放相比,他们更强调人的精神解放。

他们认为:“妇女是第一个受剥削的阶级。从那以后,人类历史上的每一种文化或父权制或价值观都把压迫妇女作为基本要求”^[38]。“由于父权制已经建构了男人和女人的精神,妇女……除非她们和男人一样,都能在精神上解放出来,摆脱‘妇女不能与男人平等’的思维约束”^[39];否则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柯林斯把黑人妇女所受的多重压迫阐述为妇女在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相互依存的三个方面所受的压迫,并且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比经济与政治方面更强大、更持久。



约翰·麦克因斯在《男性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终结作为意识形态的男性气质问题,他认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这种观点。“女性主义要推翻男性建立在其性别优势基础上的生命观、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必须在女性的身体原则上重建世界观、生命观、政治秩序和价值观”^[40]。

女性立场

秦美珠在书中还研究了女性立场,认为这是理解妇女问题的关键。因为“从妇女立场再现现实比从男性立场再现现实更加客观、更少偏见”^[41]。西美尔作为西方有影响的思想家,也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接近存在。从人的纯粹性而言,女人比男人更是人,女人生活在存在与女人存在最深刻的同一性中,生活于自在地规定的性别特性的绝对性中。女性性别特性的绝对性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绝对不仅仅意味着女性,而是仿佛在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前,以实质的、静止的完整性承担着人的类特性的统一体”^[42]。实际上是因为妇女承受着人世间一切最深重的苦难,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她们。

秦美珠认为性别或女性视角是当代女性主义的共识。女人在最本原的意义上是存在于一种未被分裂的统一体中,因此女性原则超出了相对性原则;对于女人而言,男人和孩子都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她企求和谐,反对对立,对事物具有一种原始的宽容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女人在自己的存在中比男人更坚定、更完整、更协调;女人在处理与事物的关系时,并没有抛弃女性借助一种与事物更直接、更本能、某种程度上也更天真的接触,并没有抛弃与事物的统一性相联系的存在。事物的产生、活动和彼此对立造成的不安以及生活本身的不安,较少触及女性存在的实质性基础,较少波及女人自身。女性的绝对性在于其完整性、统一性,源于女性的母性特征。秦美珠赞成西美尔的观点:“人沉入自己的存在越深,就越能让这种存在以明确的方式体现在自己身上,离生命、离世界统一体也就越近,就越能将其完整地表现在自身身上”^[43]。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美尔认为女性文化运动对我们

的将来或许比工人问题本身产生更深刻的影响^[44]。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也认为“资本主义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是男性的,即有利可图的生产率,过分的自信、效率和竞争”;而“女性的品质是容纳性、敏感、反对暴力、温和等,这些特性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品质的对立物,是统治和剥削的对立面。在心理的底层,它们从属于爱神的领地,它们表达的是生命的本能力量,是对死亡本能和毁灭源的反抗。”^[45]

吉尔曼认为女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狩猎者、思想者、教育者、管理者、立法者,她们具有关怀、爱、保护这一类的特征,因此,“我们为女性文化自豪,它包含着情感、直觉、爱情、人际关系等”,“只有维护长期以来受到压抑和嘲笑的女性原则,真正人性化的社会才会出现”;“我们同所有种族、阶级乃至全世界的妇女一样,女性文化就是第四世界”^[46]。女性主义者认为“一个以男性的自私、竞争和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必将被一个以女性的集体主义及为所有人的利益的协调合作的社会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所取代”^[47]。

哲学革命

波伏娃的《第二性》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名著,她在序言中曾批判了男人世界:“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对男人来说,女人所表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一个性感的动物,她就是‘性’,其他什么也不是……男人是主要的,女人只是附属品而已。”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是这种男人世界观是我们要反对的。霍克海默曾对西方哲学史作如下概括:“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坚持认为妇女不是完全成熟和有责任感的存在……男人是完美的存在,女人则是受挫的男人,低劣的男人”^[48]。正是这种偏见导致了西方世界的理性主义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因此,真正的妇女解放必然呼唤哲学革命。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理性主义是非常片面的,“当理性



人被颂扬时,哲学家们不是在谈论人类的理想化的东西,而是在谈论男人们的理想”^[49]。美国学者安乐哲认为:“要根本解决性别歧视,必须改变二元统治结构。不改变二元统治结构,最好的无性别歧视社会将是简化主义的,即促进女性加入荣誉男性行列,自律、独立、自决的同时,牺牲人性的差异”。这种渗透在“传统中的二元论为基础的性别歧视牢固地扎根在我们西方的文化土壤中,要想从根本上实质性解决这一问题,没有激进的哲学革命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社会、政治、宗教事业仍然提倡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无性别歧视社会不可能出现”^[50]。因此,从最深层的意义而言,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企盼一种和谐哲学,一场真正意义的哲学革命。

以上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全都是秦美珠从浩如烟海的原著中精选整理出来的。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论点都正确,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学者对女性问题的深入思考,这是一种只有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才能真正体察和领悟的思考。秦美珠把它们总结、归纳出来,既反映了秦美珠独特的视角和对问题的深度领会,也反映了秦美珠诚实、严谨的治学风格,相信这一著作的出版,必将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化、对我国女性问题的解决产生积极影响。

秦美珠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这一著作是在她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女性解放思想——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就我个人有限的视野而言,我认为这是近期我国较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一部专著。作为她的导师,我从内心感到高兴。谨以此为序,希望她和她关心的女性事业取得更大的进步。

注释:

[1] 据 1995 年联合国人口报告和人类发展报告,妇女服务于家务劳动照料儿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隐性贡献每年高达 11 万亿美元,总共完成男性 2/3 的工作时间,但只得到 1/10 的收入和拥有不到 1% 的财产。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586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55、63 页。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 [5]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69.
- [6]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124-125.
- [7]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308.
- [8]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137.
- [9]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 [10]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第30页。
- [11]哈特曼、马克森:“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女权主义者的评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0年。
- [12][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8-39页。
- [13][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
- [14]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第92页。
- [15]Margaret Benston:“*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21.
- [16][美]詹妮特·A. 克莱尼编著:《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李燕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7页。
- [17]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 [18]沃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年第5期。
- [19]Nancy Chodorow:“*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95.
- [20]Nancy Chodorow:“*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

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100.

[21]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95.

[22] 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61 页。

[23] 沃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 年第 5 期。

[24]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165 页。

[25] Michele Barrett: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226.

[26]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47.

[27] 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27 页。

[28]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87.

[29]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89.

[30]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48.

[31]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24.

[32]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41 页。

[33] [美]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71 页。

[34]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217.

[35] 贾格尔：“妇女解放的政治哲学”，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第282页。

[36]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

[37]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16.

[38]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

[39] [美]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40] [德] E. M. 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俊译，三联书店1995年，序言。

[41]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84.

[42]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96-197页。

[43]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

[44]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53、141页。

[45]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46]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0-201、198页。

[47]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48] 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239页。

[49] 费多益：“理性与女性——劳埃德思想述评”，《哲学动态》，2001年第11期。

[50] 转引自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MULU

目 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总序 1

序 1

导论 1

第一部分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史 19

第一章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文献(上) 21

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 23

本斯顿:“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1969) 32

科斯塔与詹姆斯:《妇女与社区的颠覆》(1972) 36

第二章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文献(下) 49

哈特曼:“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79) 51

爱森斯坦主编:《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状况》

(1979) 61

乔多萝:“母职、男性统治和资本主义”(1979) 70

第三章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献(上) 83

巴雷特:《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1980) 85

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 101

萨金特主编:《妇女与革命——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不幸婚姻的讨论》(1981) 108

哈丁:“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真正的物质基础是什么?”(1981) 111

埃尔利希:“能否拯救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

(1981) 116

第四章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献(下) 129

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妇女所受的压迫——走向一个联合的理论》(1983) 131

贾格尔:《女性主义政治学与人性》(1983) 144

第五章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献 165

亨尼西:《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话语的政治学》(1993) 167

兰德里与麦克林:《唯物主义女性主义》(1993) 182

第二部分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 207

第六章 两种生产、分工与女性问题 209

- 一、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探讨 211
- 二、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 217
- 三、两种生产的不平衡与女性问题的产生 223
- 四、分工与性别分工 226

第七章 资本、异化与意识形态 239

- 一、资本统治与妇女地位的边缘化 241
- 二、异化对于妇女的影响 248
- 三、理性意识形态 255

第八章 女性解放 269

- 一、女性解放历程 271
- 二、政治解放：女性解放的前提和界限 280
- 三、女性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 287

结语 315

参考文献 323

进一步研究文献 335

后记 351

导 论

当今,女性问题备受关注。海德格尔曾经说过,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某个问题;那么,当今社会,对于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之一^[1]。性别差异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男性占统治地位的问题。布尔迪厄指出,“自从有男人和女人以来,男性统治就固定不变了,男性秩序通过男性统治世代代延续下去”^[2]。直到近代,男女不平等才成为人们关注的领域。当今,女性问题研究已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都以此为研究对象,因为它与现代性问题、民族问题、生态问题等,都是当代人类历史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这一问题不仅是妇女运动关注的问题,而且是人类和谐协调发展的问题;不仅涉及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权利问题,而且事关人类生存境况的解决。

从历史上看,女性问题研究大致是按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是占主流地位的女性主义理论,它起源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和约翰·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强调妇女受压迫的性别根源,提倡从女性的和社会的角度争取男女平等,在确认人人应该平等的基础上追求男女平等;一是起源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经过马克思和恩格

斯到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不从与男人的对比关系中看女性的地位,而是从被压迫阶级和弱势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女性的生存状态。循着这两条线索发展起来的妇女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命运:基于第一条线索上的妇女研究,由于它强调妇女特殊利益的立场和妇女团结的政治纲领,先天地奠定了对“妇女”进行抽象的理论基础,直至今日影响还很大;而基于第二条思想线索上的妇女研究,在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中止了它,将其纳入了阶级斗争学说^[3]。20世纪60、70年代,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出现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试图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其研究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追问两者结合的辩证法^[4]。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称,有时被称为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学界的研究中对此并没有统一的界定。陈学明先生把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苏东剧变后在西方学术界日趋活跃的一股社会思潮^[5];张一兵先生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与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后马克思的思潮^[6];美国学者贝特尔·奥尔曼把它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而且是作为后一意义上的十个流派之一^[7];段忠桥先生认为英美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在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妇女解放再次成为左翼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的背景下发展起来^[8]。这里主要是指产生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以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为其理论框架的理论流派,在实际的指称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不同名称,这些名称表明它们不同的强调重点;它们使用了不同的概念,但所有这些概念都表明女性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9]。如果要作具体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探寻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受压迫地位的原因;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对妇女受压迫地位进行探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则从唯物主义角度探寻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它不是一个独立于马克思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流派,

2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后现

代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一个阶段^[10]。在具体的理论探讨中,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完全是指引经据典地研究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女性解放的观点,经常用来泛指任何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影响女性的理论的学派,还可能包括对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妇女思想的批判^[11]。

一、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每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都与其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20 世纪 60 年代女性主义之所以会转向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理论资源,出现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大概有以下原因:

(一) 比较自由、开放的社会政治氛围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西方黑人民权运动以追求自由、民主与平等为理想,向歧视、剥削、压迫黑人的种族歧视、种族压迫提出挑战,这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在具体的斗争方式与斗争策略方面都给西方女权运动以很大的启示。尽管妇女和黑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在受压迫这一点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被白人男性统治,被分配做低人一等的工作、获低人一等的报酬;两者都被白人男性统治的社会告知,别想改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两者都因一定的社会偏见、歧视而无法享受平等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从两者的政治哲学来看,两者都主张不要因生理特性(肤色和性别)不同而受到不同对待。这些相似之处使她们在介入黑人民权运动时也想到自己的处境,激发起她们消灭性别歧视、为自由和民主权利而斗争的愿望。

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爆发了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等大规模群体性活动,这些寻求社会变革、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运动,既为妇女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2]。但女权积极分子并不赞成新左派的分享民主制的立场与理想;因为新左派的这一立场与理想不仅不能代表妇女的利益,甚至还代表了父权制的权力



关系。“新左派不关心妇女问题,他们提出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理想,注重改善人际关系,强调个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它却只字未提美国社会中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不仅如此,新左派忽视妇女和妇女的利益,实质代表了父权制的权力关系”;“一个宣称反对旧文化传统,主张人人享有民主的组织,却继续奉行传统的妇女观和大男子主义,这显然是矛盾”^[13]。

(二) 妇女运动的结果

在这场被称为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14]中,人们对于如何认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以及妇女解放的策略存在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因而主张采取直接对抗行动,如抗议游行、静坐示威和集会声讨等政治行动,与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最终目标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有通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妇女才可能从被压迫中解放出来”^[15]。一部分人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男性统治的社会权力机制即父权制,由于长期受这种父权制的影响,妇女变得麻木不仁;为使妇女获得自由和解放,她们提倡通过建立提高觉悟小组的形式,让广大妇女意识到自己的境地,从而激发她们起来争取妇女权利的欲望,具体做法是让一小群妇女坐在一起^[16],从女性的角度来交谈在这个男性统治的社会里的经历和感受,通过叙述使其看清她们本人所经受的性压迫、性歧视和性奴役并不是个人经历,而是妇女群体的经历,是男性统治文化的结果^[17]。

这场女权运动促成与推动了妇女研究的产生与发展,因对妇女受压迫原因及妇女解放策略、途径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尽管他们之间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但他们也有共同的目标和原则,那就是相信男女两性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情况是应当加以改变的,即消灭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用两性间的平等关系取代等级和不平等;对既存两性关系的改造将对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两性关系是政治性的;反对划分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认为政治权力既运作于个人层面,又运作于社会层面,即“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公

民的社会权利源于存在本身,而非源于社会地位,即“我存在,因此我有权利”^[18]。

(三)理论发展的需要

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人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其《女权辩护》(1792年),这是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中提出,妇女应在教育、工作与政治上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机会;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年)中提出,女性必须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其《女性的奥秘》(1963)一书中提出女性必须进入公共领域。近代以来,女性相继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很多领域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在很多方面女性仍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尽管全世界妇女的生存状况有着极大的差别——地域的差别、贫富的差别、文化风俗的差别、阶级的差别、种族的差别、民族的差别等——她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点:相对于男性,她们处于较低的地位^[19]。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追求的与男性平等的目标与理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观点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20]:第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承认非性别形式的其他种类的压迫,尤其不承认阶级压迫的存在。第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未能在工作和政治领域争得两性平等,甚至在法律方面的平等也没有完全争得。第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的简单扩张,没有对它做什么修正。而自由主义原则本身就有问题,其对国家作用的理解是错误的,以为多元政治真是所有利益集团都有同等机会接近政治权力的一种机制,其实不然。第四,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两性平等要求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忽略了两性的生理区别。第五,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坚持忽视性别式的立法,而这种立法忽视了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对这个性别社会的现实视而不见。第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人性观视个人基本是理性的、独立的、竞争的和自治的存在,忽视了人类社会的抚育、合作和相互支持的性质。第七,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仍旧以男人的规范为标准,要求女人变得和男人一样,忽略了女性所有的



价值。第八,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解放要靠每个人的个人努力,忽略了女性群体所处的不利地位,忽略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性。第九,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向权力的分工挑战,但未向权力的性别概念挑战,客观上维护了既存的权力机制。第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性观念仍然是男性观念,所谓客观性和普遍性只是有限的男性实践的结果。由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不触动整个制度、基本的传统及父权制的前提下追求与男性平等,它便留下了一系列未加深入探讨的问题:女性是否愿意完全像男人一样?女性存在的价值是否就是像男人一样?像男人一样是否幸福?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根源于父权制,即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尽管对于父权制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普遍的共识是:第一,从历史上看,妇女是最早受到压迫的群体;第二,妇女受压迫是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存在于一切已知的社会之中;第三,妇女所受压迫最深,这种压迫形式又最难根除,依靠消灭阶级社会之类的社会变革也不能将其除掉;第四,妇女所受压迫对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痛苦,虽然这种痛苦由于压迫者和受害者都有性别偏见而往往未被认识到。虽然不同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对妇女受压迫的基本性质的强调侧面有所不同,但她们至少在上述的前三点上意见一致^[21]。在男性群体如何对妇女群体施加压迫的问题上,激进女性主义者作出了一些有益的理论尝试,强调妇女之间因其具有共同的经验能够建立跨越阶级、种族界线的姐妹情谊;性别压迫成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形式;把家庭而不是国家权力作为权力结构的中心,重点强调在家庭中男性对性与生育的控制;不看重妇女所受的经济压迫,强调妇女的再生产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现象。她们的这些理论尝试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与指责,把妇女所受的压迫看作是普遍存在的、非历史的现象是一种对历史的盲视,只是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忽视了其他阶级的妇女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忽略了妇女所受的包括阶级、种族压迫在内的其他压迫,不能为结束父权制权力提供可行性战略,等等。

会平等作为其目标,而且深入到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与当今社会制度的认识与批判中,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盟恰恰体现了变化了的理论需要。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结盟,源于两者在许多重要方面具有相似之处,巴巴拉·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认为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2]:首先,一个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一个女性主义者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批判性的,两者不是根据静态平衡而是根据对抗寻求对世界的理解;其次,两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系统的不平等特征,只不过马克思主义设法解决阶级不平等,女性主义设法解决性别不平等;最后,两者都主张通过社会变革来改变不平等的状况。总之,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层面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相互作用层面来探讨妇女问题与妇女解放,这是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与主张。

二、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第二波女权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挑战相伴随:一方面女性主义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妇女受剥削与压迫的社会结构分析,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提出了挑战,形成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早期和20世纪7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女性主义者的工作与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密切相关:一方面,女性主义理论框架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随着美国民权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的开展,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伴随着这些社会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得以流行。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理论也受到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尖锐攻击的影响,但他们对新左派提出的分享民主制的解决方案不满,认为那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这时期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作为根本任务,以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通过性/性别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探讨来解释资本主义与



父权制如何对妇女施加压迫,以及如何改变妇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受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她们重新思考了生产、再生产、价值、阶级、意识、劳动等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概念。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发生转向,开始从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向文化女性主义的方向发展^[23]。在亨尼西看来,文化女性主义具有如下特点:其目标是颠覆男性享有对女性特权的父权制价值体系;聚焦于父权制压迫的文化特征以及文化领域的改革;拒绝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强调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尽管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文化女性主义不同,但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的阶段看,文化女性主义是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

20世纪80、90年代主流女性主义在许多方面受到批判,包括有色人种、同性恋、工人阶级、第三阶级妇女在内的非主流妇女迫使女性主义质疑普遍适用的“妇女”概念和以性别为中心的女性主义探索,迫使女性主义质疑普遍的“妇女”范畴、普遍化的“妇女经验”。与此同时,当发达国家的女性主义者忽略马克思主义或拒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过时的、与妇女解放不相关的、妇女解放的障碍时,世界三分之二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社会革命的理论^[24],形成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主张从历史唯物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角度理解后现代主义危机,不仅把它看作文化危机,是对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等领域中的经验主义、本质主义的挑战;而且注意到后现代主义与资本的劳动分工、新帝国主义安排的密切关系,作为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深深根植于跨国资本依赖的父权制结构^[25]。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按时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利用马克思的阶级、生产、价值等概念范畴。本斯顿在其“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1969)、科斯特、詹姆斯在其《妇女与社区的颠覆》(1972)中,围绕着家务劳动展开了对妇女受压迫原因及妇女解放途径的探讨。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探索结合的途径。代表人物与著作有:米切尔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26],哈特曼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79),爱森斯坦主编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状况》(1979),乔多梦的“母职、男性统治和资本主义”(1979),巴雷特的《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1980),扬的“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萨金特主编的《妇女与革命——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不幸婚姻的讨论》(1981),沃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和妇女所受的压迫——走向一个联合的理论》(1983),贾格尔的《女性主义政治学与人性》(1983)等。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融合,形成了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与著作有:兰德里、麦克林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1993),亨尼西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话语的政治学》(1993)。

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

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按研究内容可大致划分为三条研究线索:

第一,着重从物质、经济层面探讨妇女所受的压迫以及妇女解放。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源于资本主义把妇女限于私人领域即家务劳动中,她们力图解决家务劳动问题。这些探讨着力于资本主义制度对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影响,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结束对妇女的压迫。

第二,致力于理解由资本主义父权制派生的权力体系,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妇女受压迫的状况,但在这二重因素如何作用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作用于不同的领域,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分离,以米切尔、哈特曼等人为代表;二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父权制,并提出种种概念说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统一,以扬、沃格尔、贾格尔等为代表。

第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后现代向度。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意义和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心理分析理论等几种话语的结合^[27]。根据亨尼西与英格汉姆的论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探索以下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身份再表现一直在变化?为什么他们没有采用与20世纪甚至50年代前同样的形式?为什么身份的变化与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命生产的历史转变相联系?

当然这三条线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对于第一与第二条线索,罗斯玛丽·帕特南·童指出,前者倾向于认为妇女受压迫的终极原因是阶级歧视,而不是性别歧视;后者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既不是“阶级歧视”,也不是“性别歧视”,而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差异远没有她们之间的共同信念重要,那就是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动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28]。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是在第一条与第二条线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区别部分是因为它包含了后现代的语言与主体性,与文化女性主义相比,它不把文化看作社会生活的整体,而看作社会生产的一个领域,因此也是女性主义斗争的一个领域;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同,它强调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以及为社会变革而进行的斗争。

四、本课题的研究现状、意义与思路

本课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包括米切尔、哈特曼、扬、巴雷特、沃格尔、贾格尔、亨尼西等人的论文陆续被翻译成中文^[29];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出版多部译文集与译著,包括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97)^[30],王政等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1998)^[31],王逢振等编译的《性别政治》(2001),罗斯玛丽·帕特南·童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2002),温迪·林恩·李的《马克思》(2002);J. K. 吉布森—格雷汉姆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2002),詹妮特·A. 克莱妮编著的《女权主义哲

学:问题,理论与应用》(2006)^[32];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般介绍与专题研究,这包括三个方面:(1)作为西方社会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受到重视与研究,比如俞可平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章(1998)^[33]、王维、庞君景主编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女性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一章(1999)^[34]作了较全面的介绍;(2)以戴雪红、沃野、杜洁等为代表的学者就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本观点的介绍;(3)本世纪初以来,以王宏维、王宁、戴雪红、柏棣等为代表的学者就异化、再生产理论、立场论、后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主义的影响等专题进行的研究。

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视,但通常是一般介绍为主,专题研究较少;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的翻译与系统研究相对较少^[35],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作为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理论与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理论对立起来,对西方女性主义持批判与拒斥的态度。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研究采取抽象肯定的态度,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片面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强调,采用了空疏的辞令与语录化的语言,正如吴晓明教授指证马克思哲学的情形,“实际情形是: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那种高度肯定,往往只是以最抽象和最空疏的辞令表现出来,它在哲学的基础方面根本没有成为内在巩固的东西,结果,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被遮蔽起来了”^[36]。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停留在抽象原则与口号层面,缺乏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第三,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翻译介绍的增多,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以其丰富的内容、全新的性别视角与鲜明的性别立场为中国妇女研究界所接受甚至推崇,但在被推介的女性主义理论中,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当今研究女性问题离不开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因为相比较原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条件下的性别盲现象,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无疑是一种进步,正如戴锦华教授指出的,“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开启

了中国女性文化的一个新的时段,为女性作为一个社会性别群体的自觉及其文化反抗,提供了有力而有效的资源与武库”^[37]。同样,女性问题研究也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福柯曾在他的《知识/权力:访谈录和其他作品录》中明确指出:“写历史而不使用与马克思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整套概念,不把自己置于被马克思所定义和描述的思想层面,这在当今是不可能的”^[38]。从当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看,女性问题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课题:一方面,女性解放涉及人的本质、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解放等重大哲学问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予以研究与探讨;另一方面,包括女性问题在内的全球化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都是有关当代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探讨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课题^[39]。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思想的地位?如何解释中国妇女的复杂现状?这些是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的问题。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实践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围绕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作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探索,产生了许多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借鉴这些成果,对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研究无疑是有益的,本课题只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抛砖引玉。

本课题研究范围的确定着实有些困难^[40]:第一,女性主义著作、论文浩如烟海,观点繁杂,有时难以确定是否是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二,即使是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由于其对具体问题的关注,没有形成权威的理论体系,不是几大著作和几个代表人物所能涵盖的,选择可能不典型,可能会形成重要的代表人物与著作没有介绍,而介绍了的又可能是不太重要的;第三,由于占有资料、学识能力以及时间的限制,选择可能不全面,更多重要人物及其著作可能没有加以介绍^[41]。

本课题选择的15部(篇)论著主要依据以下原则:第一,考虑时间

不同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第三,考虑代表人物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女性主义著作,尽管有的仅是一篇论文,但不妨碍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第四,在编排上按原作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呈现给读者一份历史发展的资料。选入文章最早发表于1966年,最近的写于1993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跨越二十多年的历史文献,从中了解不同时期的关注点以及主要理论的演变。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过程作一系统的梳理,使读者对它的发展脉络有一个较全面丰富的了解;第二部分是主要理论观点的剖析,提供给读者深入了解、评析的理论基础,将对读者起到引导、启发的作用。

注释:

[1]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72页。

[2][法]法皮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3]李小江:“妇女研究的缘起、发展与现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4]大卫·麦克莱伦:“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今昔”,载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5]陈学明:“西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特批判”,《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6]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载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8页。

[7]贝特尔·奥尔曼:“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十个新流派”,<http://www.culstudied.com>

[8]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9]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ed):*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4.

[10]要把这三者区分开来并不很容易,马克思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方法论方面都信奉马克思主义,有人将海蒂·哈特曼称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者”,也有人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沃格尔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但她自称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与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也非泾渭分明,有人将齐拉·爱森斯坦称为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也有人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方法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采用了精神分析派和激进派的一些术语或方法(如米切尔)。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也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英、法女性主义者更喜欢“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词。

[11] 鲍晓兰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5 页。

[12] 转引自王恩铭:《20 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253 页。

[13]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第 87、88 页。

[14] 人们通常把女权运动分为三个阶段或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以争取选举权运动(平等的政治权利)为中心。第二次浪潮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强调妇女解放,即从男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在一切领域(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争取男女平等。第三次浪潮强调差异和多样性:一是性别之间的差异,作为区别于男性的群体,女性可以联合起来;一是女性内部由于种族、阶级、族裔和性倾向等因素导致的不一致性,强调性别研究。

[15] 转引自王恩铭:《20 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264 页。

[16] 她们还有很多主张和做法,比如主张女性终身不嫁、终身不生孩子,以摆脱婚姻和家庭对妇女的束缚;有的提倡不用化妆品,也不追随服装时尚,不做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俘虏;也有的号召女性之间建立友谊,对男性开展“性战”,通过改变个人领域的生活方式向社会领域的性别歧视观念和实践挑战。

[17] 转引自王恩铭:《20 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265 页。

[18] 转引自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年,第 145 页。

[19]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年,第 13 页。

[20]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年,第 152~154 页。

[21] 贾格尔等:“女性主义理论概览”,《国外社会科学》,1989 年第 1 期。

[22] 可参见 Barbara Ehrenreich:“What Is Socialist Feminism?”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65 - 70.

[23] 代表人物有库恩、沃尔佩、巴雷特、德尔菲等人, Annkte Kuhn and Ann Marie Wolpe,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1978); Michele Barrett: "Ideology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Gender" (1980); Christine Delphy: "For a Materialist Feminism" (1975), 收录于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24]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4.

[25]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8.

[26] 尽管米切尔的这篇文章发表于 20 世纪 60 年代, 但由于她并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原因而是从综合原因来探讨妇女受压迫以及妇女解放问题, 而且她在以后的两部著作《妇女的等级》(1971) 与《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1974) 中继续了她关于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女性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主张, 所以按其主张把她归入 20 世纪 70 年代。

[27]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7.

[28]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艾晓明等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141 页。

[29] (1) 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三联书店 1997 年, 第 8 - 45 页。

(2) 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和性别分工”(1979), 载于《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三联书店 1997 年, 第 46 - 75 页。

(3) 哈特曼:“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81), [美] 詹妮特·A. 克莱妮编著的《女权主义哲学:问题, 理论与应用》, 东方出版社 2006 年, 第 573 - 584 页。

(4) 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 载于《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三联书店 1997 年, 第 76 - 105 页。

(5) 巴雷特:“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理论概念的分析”(1982), 《国外社会科学》, 1983 年第 3 期。

(6) 沃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理论”(1983),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87 年第 5 期。

(7) 贾格尔等:“女权主义理论概览”, 《国外社会科学》, 1989 年第 1 期。

(8) 罗斯玛丽·海纳西(Rosemary Hennessy 的另译):“概念的设定”(2000),载于钟雪萍等主编的《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57页。

[30] 包括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和性别分工”(1979),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非哲学的社会批判——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1988),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1988),布赖森:“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引论”(1992)和贾格尔:“妇女解放的政治哲学”(1994)等相关论文。

[31] 包括凯琳·萨克斯:“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1974),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1975),贾格尔:“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1990)和安·弗格森:“女权主义哲学及其未来”(1996)等相关论文。

[32] 其中包括伊夫林·里德(Evelyn Reed):“女性:等级,阶级还是被压迫的性别?”(1970),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Y. Davis):“种族歧视、生育控制和再生产权利”(1981),哈特曼:“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81),芭芭拉·R. 柏格曼(Babara R. Bergmann):“家庭主妇的工作”(1986)等重要翻译文章。

[33] 从家务劳动、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家庭与意识形态、异化与社会再生产等方面概括了20世纪70、80年代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两方面概括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新发展。

[34] 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妇女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三方面的介绍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主义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经济的不平等会导致和强化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经济地位的性别差异来自于劳动的性别分工,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改善妇女的经济状况必须打破性别劳动分工。

[35] 据笔者所见,有两部重要翻译著作:(1)[美]J. K. 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之一;(2)[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恩》,陈文庆译,中华书局2002年,《世界思想家译丛》之一。

[36] 吴晓明:“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载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

[37] 戴锦华:“阶级、性别与文化表演”,载于《差异与平等——香港妇女运动的新挑战》,陈锦华等编,新妇女协进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政策研

究中心 2001 年版,第 280 页。

[38] 全华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94 页。

[39] 何萍:“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何萍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 年第 5 期。

[40] 王政在其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前言中指出,由于女权主义学术不是由一个或几个权威人士创立的,而是成千上万背景相异的学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问题进行研究产生的成果,所以它不仅卷帙浩繁,内容广泛,理论、观点、方法变化频繁,而且各种立场观点之间常常矛盾冲突,争论尖锐。由于女权主义者和理论家们与以往的理论家们不同,她们不是追求去建立权威的“真理”理论体系,而是关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解决……所以将近三十年的理论学术发展中没有出现一家独尊的局面,而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这种状况使翻译介绍的难度极大。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序第 3 页。

[41] 包括扎拉斯基的《资本主义、家庭与个人生活》(1976) (Eli Zaretsky,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London: Pluto), 哈特索克的《金钱、性与权力:走向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1985) (Nancy Hartsodk: *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Longman, Repr.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德尔菲的《主要的敌人:妇女受压迫的唯物主义分析》(Christine Delphy, *The Main Enemy: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Women's Research and Resources Publication, London, 1977) 以及 21 世纪的相关文献,没有找到相关的外文资料,因而没有介绍,诸如此类未加介绍的著作还有很多。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第一部分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史

这部分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 14 部(篇)论著按年代顺序进行详尽的介绍与评述,希望呈现给读者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过程与发展脉络。

THE MILITARY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第一章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文献（上）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1900年6月 第1卷第1期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英国女性主义者最先倡导。1966 年,英国的米切尔在其“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一文中最早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尝试用新的方法解释妇女状况;1969 年北美女权运动达到顶点,加拿大本斯顿教授发表了“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1969)一文,对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与妇女解放的途径进行了探讨;科斯特、詹姆斯在其《妇女与社区的颠覆》(1972)中继续了本斯顿妇女与工作的讨论,提出了不同于本斯顿的观点。

米切尔: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1]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1940—),英国剑桥基督学院心理分析与性别研究教授,剑桥性别研究召集人,伦敦心理分析专家,《社会实践》、《新左派评论》与《辩证法——女权思想杂志》的编辑,英国和国际心理分析学会正式会员,英国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家,研究领域为妇女学与心理分析。主要著作与论文包括:“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妇女的等级》(1971)、《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1974)、《妇女与平等》(1975)、与奥克莱合编《妇女的权利与罪过》(1979)、《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论女性主义、文学与心理分析》(1984)、《什么是女性主义》(1986)、“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与政治学:关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一次对话”(1994)、《孪生兄弟关系:性与暴力》(2003)、《性别与性差异的不同:关于性行为、性别与心理分析的对话》(2004)。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是女性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纲领性文件。妇女作为人类的一半必不可少,但是她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却被忽视,她们的劳动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男性劳动的附属品;她们被赋予的世界是家庭,这就是妇女的普遍境况。如何认识并改变这一境况?米切尔的探讨以傅立叶、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波伏娃等人关于妇女问题与妇女解放的理论为基础。

傅立叶(1808 年)指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2]。这里包含为我们熟知的两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一是“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二是“妇女解放标志着文明意义上的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在米切尔看来,傅立叶充分肯定了妇女解放对于人类解放的意义,但是傅立叶的观点停留在乌托邦伦理学的范畴之内。

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1878 年),通过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妇女生活状况的展示,揭示了妇女受压迫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妇女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密切相关,妇女解放最终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出了生育功能是妇女受压迫的因素;还探讨了包括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传统女性服饰禁锢人的作用等非经济因素对妇女的压迫。尽管如此,米切尔认为倍倍尔的观点没有超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两性平等的理论范畴,对未来的描述与对现实的描述相脱节,对妇女解放盲目乐观,是一种空洞的幻想。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1949 年)试图从心理、经济与生育方面来解释妇女的从属地位,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妇女是怎样变得与男人不同的?妇女是怎样从男人中分离出来、又是怎样进而演变成比男人低劣的性别以及妇女又该怎样超越他者性^[3]?在米切尔看来,波伏娃的《第二性》是迄今为止专门论述这一主题的最伟大著作,但波伏娃在展开其理论观点时过分理想主义,其对妇女解放的展望与历史发展是脱节的^[4]。

此外,米切尔还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批评意见(该书第二部分还要作详细讨论,在此不作展开);认为马克思在肯定妇女作为全体社会进步的标志时,只在抽象层面上强调了其重要性,抽掉了其具体内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体力弱小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的看法过于简单。

总之,米切尔认为,所有这些关于妇女状况的古典文献突出强调了经济因素,而妇女状况不能仅从经济状况或社会状况来认识,而必须根据不同结构来理解。

一、四大结构决定了妇女地位

米切尔认为,妇女状况是由妇女在生产、生育、性关系与儿童的社会化中的地位决定的。

(一) 生产

在米切尔看来,妇女体力弱小、无法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造成妇女的从属地位的解释过于简单。从对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基于生理能力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压迫相互作用,“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5]。因为如果体力弱的原因使得妇女处于从属地位,那么当不再依赖繁重的体力支出的先进的机械技术出现的时候,就应该确保妇女的解放。的确,工业化和自动化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前提,但只是前提而已。随着工业经济的增长,女性大量涌入就业市场^[6],然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工业化的出现都没有使妇女获得解放,不仅如此,每当就业市场饱和的时候,妇女最容易失业。所以米切尔指出,“妇女作为劳动大军中的崭新的、最不稳定的成员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最易被牺牲的成员,在一段短短的插曲之后就被排除于生产之外。技术要与社会总结构结合起来,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关系的要素”^[7]。也就是说,仅仅有技术的改进,没有社会结构的改变,妇女状况的改变、妇女地位的提高是有限的。

(二) 生育

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源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而生育与性关系使得妇女在家庭中起着独特的作用。无论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在生育、性和教育后代中的作用都没有变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成为女性的天职,结果妇女的从属地位就被视为生物-历史事实而不可避免,形成了妇女受压迫的因素锁链,即母性、家庭→不参与生产和公共生活→两性不平等。尽管生产模式发生了变化,但生育模式没有什么变化。米切尔提出,只要妇女的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8]。妇女在性关系中的地位也是影响妇女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米切尔探讨了不同社会性的自由开放程度与妇女地位和尊严程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性压迫与性自由的关系。尽管法律上的平等和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既用于婚约又用于劳动契约,在这两种情况中,名义上的平等掩饰了真正的剥削和不平等。尽管在整个历史中,一夫一妻制婚姻没有实现一对一的平等,但形式上的平等本身无疑是一个进步,它有助于产生更大的进步。

(三) 性关系

在性压迫与性自由的关系中,米切尔提出,当今的性解放浪潮在当前可能导致妇女更大、更普遍的自由,同样,它可能预示着新的压迫形式,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与性自由运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主张向传统性关系挑战的性革命与性自由以满足性欲为目标,任意和妇女建立临时的性关系,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一些妇女认为这种性自由打破了双重性道德,大多数妇女体验到的不是解放,而是压迫。正如著名女权主义者罗宾·摩根在1970年的表达:“再见吧,嬉皮文化!再见吧,所谓的性革命!它们对妇女自由的作用就像重建时期对前黑奴的作用一样……以另一个名称重建压迫”^[9]。

(四) 儿童的社会化

按照帕森斯的理论,双亲在孩子社会化过程中承担着不同角色、起

着不同作用:一个是从事家务的人、起情感的作用;一个是外出工作的人、起工具的作用。由生理结构特征和哺乳的结构差异决定了男女角色的不同区分,妇女自然而然地留置在家里从事家务,主要起情感作用。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假设由于女性与抚育性有着自然的联系,女性愿意抚养孩子,“我们设想因为母亲抚养孩子很方便,所以这是被进化过程慷慨赋予的一个特征;也设想,因为男人狩猎,这是一项需要进取心、勇敢和主动精神的活动,他们赋予这些有用的才能作为其性别气质的一部分”^[10]。妇女所承担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使得她们离不开具有工具性质的男人的差遣,这一切阻止了妇女外出工作,这种现象并没有随着家庭规模的变小、生育时间变少而改变多少。有学者统计,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一位母亲要花 15 年时间用于怀孕和哺乳,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平均只要 4 年。但是孩子的社会化越来越重要,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证明生物学上的和社会学上的母亲相一致,但事实是母亲承担的教养作用在不断加强。

二、必须改变四大结构的紧密结合

只有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产、生育、性关系及儿童的社会化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11]。妇女在生产、生育、性关系及儿童的社会化四大方面的现状如何呢?米切尔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她指出,在今天的西方国家,生产、生育和儿童的社会化这三个结构都处于静止不变的状况,三十年来几乎毫无变化,而且,妇女自身也没有要求改变这些结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效地阻碍了妇女的批评意识^[12]。

在生育方面,米切尔指出,如今很容易得到安全、有效和便宜的控制生育技术,女人却不使用或拒绝使用它们。此外,现在妇女生育率降低,她们的子女远比 19 世纪至 20 世纪之交时妇女所有的少得多,但她们用于子女社会化上的时间却并没有减少^[13]。在生产方面,妇女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妇女在生产中的作用实质上是固定不变的。以英国劳

动力中妇女的比例为例,1911年占30%,20世纪60年代占34%。女性就业人数普遍低于男性,另一方面,女工的工资比男性低得多:在发达工业国家,1981年,各发达国家以男子工资为100的女性工资数如下:澳大利亚94,法国88,瑞典87,意大利86,丹麦85,荷兰77,奥地利74,联邦德国73,比利时72,英国70,瑞士68,美国65,卢森堡64,日本53。1910年3月5日《商务官报》刊登美国绢业协会对各国织造女工的日劳动时间和日工资同男工作了对比,结果表明,女工的工资大约只相当于男工的三分之二^[14]。尽管妇女在身体和心理方面都有资格担任高工资和条件优越的工作,但实际上妇女从事的职业地位较低,可参见美国1900—1990年在8种被选择的职业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15]。针对这种性别隔离现象,帕森斯指出,在职业组织内部,女性相当于她们在家庭扮演的妻子—母亲角色^[16]。教育是造成妇女从事相对于男性地位较低、工资较少的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教育可能是目前能促进经济的关键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17]。

米切尔描述的妇女在生产、生育、性关系与儿童的社会化等方面所受的综合性压迫,在女性主义者布伦娜和拉马斯看来,要远远高于19世纪,其中包括以下主要力量:(1)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控制不断加强,国家通过其机构、学校和福利部门,贯彻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减轻了妇女养育子女的责任;(2)在生物再生产领域中的技术发展(避孕、流产等),使得妇女免除了接二连三生孩子的负担,但却愈益将对生物再生产的控制权交到了国家机关、医院和开业医生手中;(3)对妇女劳动力的剥削就此释放到取代其自身家庭事务的商品生产和负责再生产的国家机构;(4)虽然将对这些过程的控制权转移给了国家,但通过使妇女承担起生物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责任,继续了她们的从属地位,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妇女职业生涯的特点就是得因生育孩子而中断,以及从事零散性的雇佣工作^[18]。

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

化中的综合地位,她批评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过于狭窄,过分依赖于简单的经济解释,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将其他三个因素全都缩减为经济因素,因此,在号召妇女进入生产领域的同时,提出‘废除家庭’这个全然抽象的口号。经济要求现在仍然是首要因素(生育、性关系及儿童的社会化);在某些特定关头,这些政策可以替代经济条件这个首要因素而产生直接作用”^[19]。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只有考虑这四大结构,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与策略。对于传统的社会运动废除家庭的要求,米切尔提出战略上应该关注的是两性平等,而不是废除家庭。“现在的家庭事实上同妇女或性别平等是冰炭不相容的。取消家庭并不会带来平等,平等来自历史地区分家庭的诸功能。由于这些功能被死死地缠成一团,应该为解放这些功能提出革命性的要求”^[20]。“社会主义不应意味着废除家庭,而是将社会中已知的各种关系多样化——目前这些关系被强制地压缩为一种关系。这意味着一种多元父权制——家庭只是其中之一,因而废除家庭是无意义的”。同时,妇女解放运动应集中于经济因素,不能让妇女被局限于家庭中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必须让其完全进入公共产业部门;但经济因素必须与其他三个因素相一致才能发挥作用,“最基本的要求不是工作权利或同工同酬——这是改革者的两大要求——而是同等工作权利本身”。

米切尔分析妇女受压迫的四大结构涵盖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21]内,她试图把对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阐述与对父权制的非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阐述结合起来,认为要改变妇女受压迫的状况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旨在推翻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必须与旨在消灭性/社会性别制度的具体的女性主义革命相结合”^[22]。米切尔尤其强调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作用,父权制在家庭中起作用的方式就是家庭意识形态,家庭是女性意识形态被归化或驯化的根源,家庭意识形态在女性意识形态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米切尔看来,在对妇女社会地位所负责任的因素中,父权制意识形态不亚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领域或公共领域的物质层面的父权制随着资本主义的消亡而消亡,但意识形态、父权文化等精神层面的父权制则在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



中、资本主义后普遍存在,“由于父权制已经建构了男人和女人的精神,妇女仍将处于屈从男人的地位;除非她们和男人一样,都能在精神上解放出来,摆脱‘妇女不能与男人平等’的思维约束”^[23]。

米切尔强调妇女受压迫的精神原因,认为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还必须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了历史和经济状况,而精神分析学说与用辩证唯物主义所获得的意识形态概念相结合,是理解思想意识形态和两性关系的手段”^[24]。因此,她既反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通过社会变革获得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只能使女性达到与男性的平等,不能彻底改变女性的地位;她也反对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通过生育革命来解放妇女,这种纯生物学的办法无法解决妇女心理方面的问题;她也反对强调通过经济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

米切尔得出结论说,只要妇女和男人的心理依然在阳具象征的支配下,对待妇女的态度绝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变。因此,为了使社会真正充满人性,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25]。

米切尔是最早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结合的欧洲女性主义者,在妇女运动中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与影响,推动与促进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受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影响,米切尔强调妇女受压迫是由生产、生育、性活动与儿童的社会化的综合结构决定的,这四大结构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她不仅把妇女受压迫的讨论置于妇女与生产的关系中,而且她还强调家庭及家庭意识形态在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中的重要影响。沃格尔充分评价了米切尔的贡献^[26]:第一,米切尔把妇女生活内容分成若干组成部分,这有助于妇女解放者明确表达自己的经验并据此行动;第二,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妇女问题论述的评论,为对抗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提供了依据;第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坚持社会现象的重要意义,预示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第四,米切尔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承认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性,也承认决定妇女地位的其他

方面不仅有重要意义,还在某些场合起到关键作用。

然而,米切爾的分析也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米切爾在四大結構中作了人為區分。儘管米切爾強調四種結構及其構成因素的相互作用,但仍然在資本主義與父權制、社會與家庭、經濟鬥爭與意識鬥爭等方面,進行了人為的區分。在布賴森看來,米切爾的四大結構分析會導致一種危險,那就是在經濟鬥爭與意識形態鬥爭之間的人為區分,將馬克思主義作為階級鬥爭理論,將心理分析作為分析父權制的理論^[27]。第二,米切爾的有些論斷還過於武斷。正如沃格爾指出的,米切爾斷言西方社會近三四十年在生產、生育和兒童的社會化方面沒有多少變化,這一論斷歪曲了歷史和 20 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米切爾認為自階級社會以來,婦女一直被排除在生產結構之外,由性、再生產和社會化功能三者相連的婦女世界包含在由生產構成的男人世界中;沃格爾認為,這是米切爾又一次誤讀了歷史,實際上,在很多階級社會中,婦女都參與到生產中。而且米切爾貶低了婦女的家务勞動,沒有給家务勞動一個明確的理論地位。米切爾關於婦女與生產關係方面的觀點引起嚴重的公開的批評;米切爾關於家庭的分析,否定了家庭範疇的理論存在,認為家庭通過構成婦女世界的再生產、社會化和性行為在內的三重結構發揮任用;對米切爾建立的分析婦女受壓迫狀況的結構框架與方法需要進行批判性的考察^[28]。第三,米切爾把父權制看作是一種普遍有效的意識形態結構,“從閹割情緒和俄狄浦斯情結里產生的婦女心理,在父權制社會里、目前唯一的人類社會,這種心理本質上是持續不變的。一個婦人無論是貧還是富、是黑人還是白人、長得美還是丑,就其與‘父親律法的关系’而言,她與其他任何人所有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差不多的”^[29]。這段話類似於米切爾的論斷“婦女作為婦女是處於歷史之外”。揚認為這一論斷不僅荒謬——婦女不僅參與社會生產關係,大多數婦女還參與到其他關係中,在性別關係方面是隨著社會和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而且把男性對女性的統治普遍化有可能產生某些實際危險:(1)關於婦女之間有可能產生共同意識方面產生一種虛假的樂觀主義,而且把父權制說成是整個歷史上具有同樣基礎結構的一般制度可能導致嚴重的文化、種族和階級偏見;(2)強調父權制系統的不



变性还可能麻痹女性主义行动;(3)强调父权制是非历史的、具有同样结构的制度,可能会淡化妇女受压迫的严重程度和复杂性;(4)由于没有给父权制任何物质的影响力,而把说明妇女状况的基本任务转让给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双系统理论自己也完结了^[30]。

本斯顿:

“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1969)^[31]

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化学、计算机科学与妇女研究教授,温哥华妇女研究协会与妇女小组的创始人,温哥华和加拿大社会公正话题的著名积极分子,令人尊敬的女性主义者与社区积极分子。为了纪念她对大学的贡献,西门菲沙大学以她的名字成立了玛格本斯顿中心(The Maggie Benston Centre)。她的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撰有多篇论文,包括:“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1969)、“计算机读写能力的奥秘”(1985)、“妇女的声音/男人的声音:作为语言的技术”(1988)、“女性主义与系统设计:控制问题”(1989)、“女性主义与科学方法的批评”(1989)等。

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始于北美,然后迅速向英国和欧洲等地扩展。1969年加拿大女权主义理论家玛格丽特·本斯顿发表了重要论文“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物质或经济根源。本斯顿与莫顿^[32]等人的讨论引发了一场家务劳动的争论,这场争论涉及三大问题^[33]:家

庭内无偿家务劳动生产什么? 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 或两者都不是? 工资是什么, 工资换取的又是什么? 总之, 争论的主要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商品是怎样产生的, 分歧在于如何精确地解释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妇女构成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把阶级划分为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和为工资而出卖劳动力的人。不管是工人阶级妇女还是中产阶级妇女, 她们与生产资料之间都具有特定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同于男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妇女地位普遍低于男性。本斯顿认为, 妇女处于屈从地位在于物质或经济根源, 必须从妇女未付酬的家务劳动中去寻找。

在家务劳动与工资性劳动之间具有截然不同的男女分工, 妇女从事缝补、育儿、炊事等在内的家务劳动, 是与家庭相关的活动。尽管妇女没有被排除在商品生产之外, 她们也参与工资劳动, 但她们不对工资劳动领域负责, 即使参与也被认为是暂时的; 男性对商品生产、工资劳动负责, 不对家务劳动领域承担任何责任。

妇女负担的家务劳动工作停留在前市场阶段, 处于货币经济之外, 没有进入市场就直接被消费掉了。按照商品生产的逻辑, 妇女所做的工作只具有使用价值, 不具有交换价值, 通常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 因而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工作。在一个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里, 妇女是一个处于金钱经济之外的群体^[34]。妇女工作处于商品生产之外, 处于交换和市场之外, 不具有交换价值, 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 不被看重。正是妇女对家务劳动的责任成为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 并使资本主义经济把她们看作雇佣劳动军成为可能: 当劳动力短缺时, 妇女成为重要的劳动力; 当不需要劳动力时, 妇女就成为剩余劳动力。工业化的早期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35]。

“妇女”是指这样一群人, 从事家务劳动, “在与家庭相关的活动中, 负责生产简单的使用价值”^[36], 而且不被看重。在这层意义上, 本



斯顿认为妇女构成一个阶级。

二、妇女解放策略

如何解放妇女阶级,本斯顿认为必须先解决她们繁重的家务劳动,反对在没有解决家务劳动的情况下,提倡妇女介入公共事业,否则参加工作只会是对解放的背离。“家务历来都是女人的责任,即使她们出外工作,她们也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务(或负责监督替代她操持家务的人)。女人,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女人,她们在家庭外工作,完全是做两份工作:只有当她们能够继续完成她们在家庭内的首要任务时,她们才被允许加入劳动力队伍。这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尤其明显,妇女有了更多的机会加入劳动大军,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获得相应更大的自由。家庭之外的就业平等,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人带来平等;只要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产物和妇女的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37]。

在本斯顿看来,妇女解放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家庭外获得职业机会的平等;第二,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两方面密不可分,不从家务劳动中获得自由,职业机会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妇女不离开家庭外出工作,家务劳动的工业化也是不可能的^[38]。基于此,本斯顿提出的妇女解放策略,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先于妇女介入公共事业。家务劳动社会化即是把原来在家中大部分由妇女承担的属于私人劳动的工作转到公共经济中来,由社会共同承担,比如对孩子的责任不再单独由各自的父母来承担,而是由社会来承担,吃饭由公共食堂提供。即使这是些简单的转变,对于妇女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家务劳动社会化创造的工作机会将满足妇女作为正常的雇佣劳动力的需要。也许原来由于家庭中由妇女承担的工作,现在由社会化机构承担,实际还是由妇女来承担这些工作;但即使如此,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必然把妇女从这一工作中解脱出来,而在于:第一,它能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家务劳动的社会必要性。有一项研究推测,

能收入的一半左右^[39]。前苏联经济学家算过一笔账:若以其他方式取代母亲和家庭妇女,全社会要付出的代价约相当于每年雇佣 1 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 1500 亿卢布(当时约合人民币 5000 亿元)。中国经济学家也做了类似的测算,若把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约为 420 亿元人民币;第二,能够给予妇女应得的尊重。只有每个人都意识到家务劳动的困难及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人们才可能重视妇女,妇女才有可能不被看做是受人供养的人。总之,对本斯顿来说,料理私人家务和照料儿童等工作的社会化是唯一要素,这样才能结束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所受的压迫,并给予每位妇女所应得到的尊重^[40]。

这一切对于妇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当妇女在家庭中的私人生产转变为公共工作时,妇女获得了经济独立,妇女受歧视的物质基础将会消失;第二,当妇女地位具备了一定物质基础的时候,妇女相应可获得一定的自由;第三,尽管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妇女解放取得进展还是可以期望的,比如,从家庭食堂到公共食堂的转变,就是一个进步,它可以改变长时期以来形成的按性别分工;第四,这些转变需要一场革命,这种革命变革将结束妇女受压迫的状况。

有学者^[41]认为人们对于本斯顿提出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义认识还不充分:首先,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解除妇女的双重负担,从事社会工作的妇女不再需要将很大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家务劳动上,她们的生活会因此而变得轻松。由于更加专注于职业工作,她们的工作必然会出色得多,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自信心都会得到显著的提高,她们不再需要以极端矛盾的心情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分配自己的精力,因此,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有极大的改善;其次,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将妇女从家里的小厨房搬进公共的大厨房。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家务劳动社会化以后,大多数妇女仍会从事她们以前在家中从事的工作。事实表明,一方面妇女能够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工作并取得成功;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男子愿意并能够从事社会化的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但为妇女而且为男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带来了更多的自由。



科斯塔与詹姆斯：

《妇女与社区的颠覆》(1972)^[42]

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帕多瓦大学政治科学学院政治社会学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她围绕家庭劳动、再生产等主题撰写的著作与论文包括:与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的合著《妇女与社区的颠覆》(1972)^[43]、“资本主义与再生产”(1995)、“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意大利的家务劳动和女性主义运动”(1998)、与他人合编《支付价格:妇女与国际经济策略的政治学》(1995年)、《妇女、发展与再生产劳动:斗争与运动议题》(1999)等。詹姆斯(Selma James)(1930—)的主要著作包括《性、种族与阶级》(1975)、《陌生人与姐妹们:妇女、种族与移民》(1986)等。

科斯塔和詹姆斯在《妇女与社区的颠覆》中继续了本斯顿关于妇女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在于妇女未付酬的家务劳动的探讨,推进了本斯顿引发的家务劳动讨论。这些讨论关注妇女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因为每个女性都要做家务劳动,包括工作的妇女也要做家务劳动;关注工人阶级家庭主妇,这并不是说只有工人阶级妇女才受剥削,而是因为工人阶级家庭主妇与资本主义生产密不可分。

一、把妇女界定为“生产性工人”

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妇女的家务劳动处于家庭之中,处于社会生产之外,提供使用价值,处于次要地位。科斯塔、詹姆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尽管根据工资劳动的定义,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不是生产性的,但是妇女在家庭中提供的、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包括给现在或未来的工人提供衣物、食品,给予他们情感慰藉和家庭的温暖,还要给予教育等,这一切应该由资本主义组织提供的服务却由妇女提供了,保证资本能够对男性进行充分的剥削。正如盖尔·卢宾(Gayle Rubin)指出的,妇女的家务劳动对于创造剩余价值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取决于食品、衣服、房屋、燃料这些维持工人健康、生命和力量的必需品,这些商品必须经过附加劳动才能被消耗掉,“食物要烧、衣服要洗、被要叠、柴要劈等。所以在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者的再生产过程中,家务劳动是个关键环节。由于通常总是女人做家务,所以人们认为正是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妇女才被连接到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剩余价值关系中。还可以进一步说,由于不对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为资本家实现最大的剩余价值作出了贡献”^[44]。

家务劳动不仅生产使用价值,还生产特殊商品——劳动力。她们把家庭比作社会工厂,在其中,生产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它不同于所有其他商品,对资本主义是独一无二的,是另外的、隐藏的剩余价值的源泉。由于妇女的家务劳动为其他一切劳动创造了条件,妇女的家务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不仅生产使用价值,还创造剩余价值,“家务劳动不仅创造了使用价值,根本上就是生产剩余价值”^[45]。资本家通过向工人阶级丈夫支付工资来占有这种剩余价值,因而后者便成了剥削妇女的工具,“妇女是工资奴隶的奴隶,对主妇的奴役保证了对她丈夫的奴役。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妇女反抗自身家庭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46]。



二、家务计酬策略及其可行性

既然妇女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妇女不必再进入生产性的工作场所。不同于恩格斯提出的妇女解放必须先进入社会公共劳动的主张,也不同于本斯顿提出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主张,她们提出家务劳动工资化的主张,即应该给妇女的家务劳动支付工资,由国家(政府和雇主)而不是个人(丈夫、父亲和男朋友)支付,因为资本最终是靠剥削妇女赢利的。这样可以:第一,增加人们对于家务劳动本质的了解,加强人们对于家务劳动重要性的认识;第二,承认妇女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因而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切使得妇女政治活动合法化。

基于家务计酬策略,她们提出了两个重大的行动策略:第一,拒绝工作。因为当妇女参与到雇佣劳动中,妇女势必承担着双重工作,为资本提供了家务劳动服务和作为工资劳动者的服务。必须驳斥通过劳动获得解放的神话,在现有社会结构中通过社会劳动获得经济独立只是一种假改良;第二,在公共问题、无偿家务劳动、性别歧视、与外界隔绝等问题上动员工人阶级妇女,以便使家务劳动斗争社会化。

家务计酬策略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在其《经济学:女性的崛起》(1986)中列举了家务劳动的三种评估方法^[47]:第一种方法是相当于一位全日制工人的工资。这种评估方法不能使家庭主妇及其拥护者们喜欢,因为这违背了把家务劳动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就是为了提高家庭主妇的地位和尊严的初衷;第二种方法是根据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所对应的职业进行计算。家务劳动中所包含的职业有:厨师、洗碗工、司机、清洁工、室内设计、保姆、饮食学家和洗衣工。以相应专家的工资级别来衡量家庭主妇在每种活动上所花的时间。因为家庭主妇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因此这种方法很容易造成高估的现象,把家庭主妇的工资估计成比男性的平均工资还要高,或者与一位从事全日制工作的女性工资的两倍到三倍那么高。蔡斯曼哈顿银行在1772年利用这种方法发表了一篇评估结果,共计一周100小时的工作价值是257.53美元。在那一年,从事全日制工作的白

人男性的平均工资是 172 美元,而白人女性的平均工资是 108 美元;第三种方法是相当于家庭主妇从事一份全日制工作所挣的工资。这种方法给予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与高中毕业生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以不同的价值,尽管实际上她们可能会做相同的家务劳动。

以上三种估价家务劳动的方法都不可行。如果可以采取哪种方法来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那这笔钱来自哪里?芭芭拉·伯格曼认为应该由政府给家务劳动付工资。那政府的这笔资金来自哪里呢?一种可能性是加大家庭主妇丈夫的特殊税,同时适当地减少行政消费,把这些钱集中起来由政府收到服务部门,再把这些钱送到家庭主妇那里。就家庭收入来讲没有实际的增加,只是表明家庭主妇地位的改善。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从政府的一般收入中支出。政府为了筹措这笔资金也一定会向包括家庭主妇、单身贵族及在职夫妇在内的每个人增税。最终的结果是购买力从单身贵族和双职工家庭的口袋里转移到了家庭主妇的口袋里,后两者不会从增税中获益,而且从生活状况来说这两类家庭在生活水平上不如丈夫工作妻子持家的家庭,像这样的方案会鼓励那些女性成为并继续当家庭主妇。

在女性主义内部,家务计酬也遭到了反对,姑且不论如何付酬的困难,它还会造成以下影响:第一,剥夺了妇女职业选择的自由。无论家庭主妇有怎样的兴趣与特长,她们的职业选择只有一种,除了日益增加的繁重家务外,她们很少有机会做其他事情,她们至多只能换一个雇主(丈夫),而永远不能换一个职业,这不仅没有给妇女带来自由,甚至还剥夺了妇女的自由;第二,将助长资本主义把一切包括夫妻关系和母子关系商品化的倾向;第三,妇女将失去到家庭之外工作的动力,结果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表面看来有所改善,事实上却被强化。女人也不再有力去家庭外面做男人的工作,男人再不会觉得有压力应该干女人的活儿,有利于男性把妻子继续留在家中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将会削弱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将女人重新整合到社会生产中^[48];第五,哈特曼认为,家务计酬的观点聚集于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与重要性以及家务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不是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妇女斗争是革命的,因为它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



争。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在于使男性统治永久化,家务劳动对于父权制的维持至关重要。

纵观这场家务劳动讨论^[49],包括本斯顿、莫顿、科斯塔与詹姆斯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关于妇女问题与妇女解放的论述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她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第一,从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出发,对包括妇女在家庭中生孩子、照看儿童、做家务劳动等物质活动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第二,重点放在妇女作为家庭主妇的地位、家务劳动对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贡献上;第三,在妇女受压迫与阶级剥削、革命斗争的联系中寻找妇女解放的策略;第四,从她们运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与非生产、工资与劳动力生产等范畴看,表明她们的分析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框架^[50]。正如沃格尔总结的,她们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术语分析妇女在家庭中未付酬家务劳动的性质及其与现存社会矛盾的关系以及变革的可能性^[51]。她们在讨论中存在的分歧在于:是否应把妇女的家务劳动看作是处于金钱之外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不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交换价值生产^[52]?妇女的家务劳动起了怎样的作用?妇女主要是作为妻子受压迫还是作为母亲受压迫?总之这些问题涉及到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具有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谁从家务劳动中得益以及如何解决家务劳动的问题的争论。

她们力图把妇女受压迫现象的探讨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但她们的愿望并没有达到。在沃格尔看来,家务劳动讨论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要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几乎没有例外地集中于工人阶级妇女所受的压迫;第三,她们通常把分析限制在经济水平上;第四,她们把家务劳动看作家务劳动与孩子养育,忽视了生孩子的地位^[53]。克服理论的局限性必须通过实践的不断进展与理论的不断深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女权运动的深入以及女性主义对其他许多问题的关注,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家务劳动是不是所有阶级都相同?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务劳动的理论地位如何?家务劳动为什么最后落到妇女身上?当代妇女受压迫的特征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妇女受压迫有何关系?社会主义社会能否使妇女获得解放?如果不能,障碍在哪里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她们集中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家务劳动中的孩子生养问题、妇女受压迫的物质根源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妇女受压迫的意识形态或心理学方面的问题,等等。

注释:

[1]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8-45 页。

[2]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11 页。

[3]他者性是波伏娃对妇女状况的总体描述,他者性是指:“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年,序第 11 页。

[4]西方对波伏娃《第二性》的总体评价可参见西斯蒙和本杰明对波伏娃的专访:“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妇女受压迫原因的分析引起许多批评。有人批评该书理想主义,认为作者只是专注于分析神话和妇女形象,而没有为妇女实践提供可行的策略;还有人批评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波伏娃有把欧洲资产阶级妇女的经验普遍化的倾向,她把这些经验看成所有妇女的经验,而这又导致她刻意强调妇女在历史上的无所作为。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还从来没有一种理论资源像这本书这样范围广阔,它激励我们在如此之多的领域——文学、宗教、政治、工作、教育、母亲身份和性——分析我们作为妇女的处境,无情地质疑这一处境。《第二性》提出了很多问题,当代理论家继续着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女性主义的对话都伴随着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对话,和波伏娃的对话可以成为一种方式,它使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自己在女性主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位置。”转引自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255 页。

[5]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



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18 页。

[6] 可参见各类数据：以英国为例，1839 年，英国工厂工人共有 419560 人，其中女工就有 242296 人，占工厂工人总数的 57.75%，自那以后到 20 世纪中叶的 100 年间，英国女工的比例一直保持在工人总数的 30%—32%，经过 70 年代以后，妇女占整个劳动力的 40% 左右；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衰退和失业人数激增，妇女就业比例略有下降。各国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例是：苏联为 48%，北美为 38%，西欧 34%，亚洲为 34%，大洋洲为 33%，非洲为 32%，拉丁美洲为 24%。转引自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年，第 33 页。

[7] 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19 页。

[8] 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20—21 页。

[9] 转引自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第 96 页。

[10] 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27—28 页。

[11] 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31 页。

[12] 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35 页。

[13] 转引自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72 页。

[14] 可参见各国男女织工工资比较：

国别	日工时(小时)	男工日工资(元)	女工日工资(元)
美国	8—10	1.50—3.00	1.00—2.50
法国 / 瑞士	9—12	0.75—1.50	0.50—0.90
意大利	9—12	0.50—0.80	0.30—0.60
日本	10—14	0.15—0.20	0.10—0.12
中国	10—14	0.10—0.12	0.06—0.09

[15]

职业	1990	1980	1970	1960	1950	1940	1930	1920	1910	1900
医生	21.0	13.4	9.3	6.8	6.5	4.7	4.4	5.0	6.0	5.6
律师和法官	24.4	12.8	4.9	3.5	3.5	2.5	2.1	1.4	0.5	0.8
神职人员	10.4	5.8	2.9	2.3	4.1	2.7	2.2	1.4	0.5	3.1
教授	40.5	36.6	28.6	21.9	23.3	26.5	32.5	30.2	18.9	6.3
社会工作者	69.0	64.9	62.8	62.7	69.1	64.3	78.7			
护士	94.3	95.9	96.1	97.5	97.6	97.8	98.1	96.3	92.9	93.6
图书馆管理员	81.3	82.5	82.0	85.5	88.5	89.5	91.3	88.2	78.5	74.7
教师	74.7	70.8	69.5	72.5	78.8	75.3	81.8	84.5	80.1	74.5
经理	42.2	30.5	18.5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从 20 世纪初到现在,职业已经出现性别隔离现象,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有威望的职业仍然由于男性统治着,护士、社会工作者、除学院或大学以外的教师等职业成为女性统治的领域。参见(美)詹妮特·A. 克莱尼编著:《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与应用》,李燕译,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第 256 页。

[16] 转引自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33 页。

[17] 1990 年男性文盲占男性人口的 19.9%,女性文盲占女性人口的 33.5%。全世界的文盲中约 60% 是妇女,而且女性文盲的数量预计将比男性文盲数量增长得快。据联合国 1985 年资料统计,按地区分析,15 岁妇女的文盲率如下:非洲 64.5%,太平洋群岛 64.5%,亚洲 47.4%,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 19.2%,大洋洲 10.2%。转引自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年,第 55 页。

[18]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第 288 页。

[19]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72 页。

[20] 沃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 年第 5 期。

[21] 关于 patriarchy 有多种译法,如“父权社会”、“父权制”、“家长制”、“男权制”等,周丽玲认为应译为男权制,是指在父权统治下,男人对女人普遍实施男性优势统治的权威和控制,这种统治在个人的社会关系上和日常生活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并在社会结构上具体地制度化,不但在家庭中,而且在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和宗教中实施出来。在男权社会里,以男人为中心,占据优势领导的地位;而女人被视为他者(other),占有边缘的地位。社会规范和行为则以男人为标准,造成

男人比女人势力强大,获得个人和集体的权利和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之利益。周颜玲:“男权制的概念和理论之批判与初步探索”,载于金一虹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巴雷特认为,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夫权制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妇女受压迫的特点,对夫权概念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1)认为夫权概念主要基于生物学上的再生产。这种解释的目的在于从生物学的差别中进行阶级起源的分析,把性差别作为基本动力从理论上说明阶级形成的历史。但这种观点带有宿命论的色彩,而且把夫权概念局限在生物学方面。(2)认为夫权概念主要基于社会关系。这种观点认为,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并不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存在于夫权的生产关系中。于是夫权概念就超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人们就不能系统地探讨这二者之间的关系。(3)认为夫权在资本主义之前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只是利用了夫权为其服务。夫权是一个社会结构,这个结构体现在由于性差别而导致的劳动分工方面,在这个分工中具有交换价值的生产资料为男子所占有。这种家庭关系和财产关系使丈夫能把妻子的劳动成果攫为己有。夫权概念虽能说明社会组织的某些形式,在这些形式中体现着夫权的经济和社会统治,但并不能充分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可参阅M.巴雷特:“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理论概念的分析”,《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22][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

[23][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24]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99页。

[25]转引自[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26]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5 - 16.

[27]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2, 249.

[28]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5 - 16.

[29]转引自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73 页。

[30] Iris Young, "Socialist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Dual Systems Theory" (1980),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99;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79-80 页。

[31] 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17-32.

[32] 在引起家务劳动的争论中,另一位学者是加拿大妇女佩吉·莫顿(Peggy Morton),她于 1970 年发表了“妇女的工作从没有完成”(A woman's Work is Never done)的论文,认为本斯顿的家务劳动讨论提出了诸如妇女是否构成一个阶级、只根据妇女的家务劳动把妇女组织起来等问题,她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家庭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工人阶级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与在工作场所的角色之间的矛盾,关注的是妇女在家庭中未付酬的工作及其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提出家务劳动应被当作一个单位,其职能在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

[33] 沃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 年第 5 期。

[34] 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19.

[35] 有资料表明,美国在决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媒体和公众舆论,以相当规模的宣传攻势与宣传策略吸引妇女参与到劳动大军中来。先是爱国主义高调向美国妇女宣传为国效力的重要性,指出危难时刻妇女也有责任为国家作出贡献;接着又由媒体宣传机器产生女英雄形象,以树立女性可效仿的榜样;再后来由公司制作取悦于女性的招工言行,向女性们展示身穿漂亮宽松服装的俊俏姑娘轻松自如的工作情景。在 1920 年到 1940 年的 20 年时间里,美国妇女在劳动大军中的人数只增加了 1%,即从 24% 上升到 25%;而在美国战后的 5 年时间里,女性在美国劳动大军中的比例由 25% 上升到 36%。参与到劳动大军的妇女具有年龄比以前大、多是已婚妇女的特点。以 1944 年为例,新加入到劳动大军的妇女中有 72% 的人是已婚妇女。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妇女进入劳动大军的人数出现了急剧上升趋势,从战争之初的 120 万到战争结束时的 180 万。二战结束后,媒体、舆论迅速改变调子,强调妇女们战后放弃工作的重要性,有的从做一个好妻子的角度进行劝说,不要因坚持经济自立而伤了在前线出生入死的军

人的自尊心,要做一个男人喜欢、依赖型的温柔的妻子,“要让男人感到,你不再想单个人支撑家庭了,要由他养家糊口”,因为胜利归来的男人大多喜欢具有温柔、顺从等女性品质的妻子。有的从做一个好母亲的角度进行攻心战,把二战期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归于母亲没有尽到责任,这些妇女被指责为为了经济独立而丧失母亲的责任感。甚至有一种观点说,女性忙于外部世界的活动,成了起破坏作用的母亲,由此建议,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妇女不应在外工作,而应该在家抚养教育孩子。二战结束以后,很多就业妇女纷纷面临放弃工作或下岗的威胁。引自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0-142、164-165页。

[36] 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19.

[37] 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21.

[38] 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22.

[39] [英] 约翰·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黄菡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0页。

[40]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7页。

[41] 王维等著:《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42] 可参照 Selma James, “Introduction to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33-53.

[43] 科斯塔与詹姆斯的合著为《妇女与社区的颠覆》一书,因未能找到该书,所以本部分的论述以科斯塔的论文“妇女与社区的颠覆”为蓝本,又因这篇文章集中表达了科斯塔与詹姆斯两人的共同观点,所以作为两人的共同成果介绍。

[44] 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王政等主编:《社

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27 页。

[45]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47.

[46]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50.

[47] [美] 詹妮特·A. 克莱尼编著:《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李燕译,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第 278-279、282 页。

[48]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59-160 页。

[49] 家务劳动讨论的文章较多集中在英国《新左派评论》和《激进美国》杂志中,除了前面提及的几篇文章外,其他文章包括:

(1) Ira Gerstein: "Domestic Work and Capitalism" (1973).

(2) Lise Vogel: "The Earthly Family" (1973).

(3) Wally Secombe: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

(4) B. Magas, Margaret Coulson, h. Wainwright: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a Critique" (1975).

(5) Jean Gardiner: "Women's Domestic Labour" (1975).

参见 Zilla .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36;

(6) Maxine Molyneux: "Beyond the Domestic Labour Debate" (1979);

(7) S. Himmelweit and S. Mohun, "Domestic Labour and Capital" (1977).

参见 Michele Barrett, *Women's Oppression Today—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73 注 25.

[50] 童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论述仍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第一,仍继续遵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基本教导。在不同程度上,她们仍然鼓励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她们也仍然致力于促使家务劳动和儿童保育的全面社会化;第二,她们一直深为这一设想所吸引,这个设想的目的是摧毁作为经济单位——资本主义制度支撑结构——的家庭;第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仍把妇女的经济福利和独立性放在首位,集中关注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64 页。

[51] 转引自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7.

[52] 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2, 238.

[53]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24.

第二章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文献（下）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在继承与发展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把妇女问题与妇女解放的探讨推向深入。哈特曼在其“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79)等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简单结合表示不满,并根据性别分工提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双重原因;爱森斯坦在其《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状况》(1979)中就妇女受压迫问题提出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概念与理论框架;乔多萝在其“母职、男性统治和资本主义”(1979)一文中探讨了母职对于男性统治、资本主义所起的作用。

哈特曼: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 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79)

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1945—),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曾在拉特斯特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从事妇女经济地位等课程的教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妇女与少数民族群体就业歧视、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理论等。曾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下属的妇女就业与社会问题委员会主任及技术与妇女就业委员会主任、行为与社会科学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职业分层及分析委员会研究助理,1987年组建华盛顿妇女政策研究所,任所长,还任国家妇女组织委员会副主席,曾在美国民权委员会工作。她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



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资本主义、家长制和性别分工”的论文引发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间的不幸婚姻问题,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大讨论^[1]。多年来她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群体中的妇女解放运动。

本节依据哈特曼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79)、“资本主义、家长制和性别分工”(1979)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女权主义者的评论”(1980)^[2]三篇论文对哈特曼的观点作一介绍。

一、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必须结合

哈特曼不满意于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的看法,也不满意于激进女性主义关于妇女受压迫原因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通常是在女性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中而不是在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中讨论妇女问题,在具体的讨论中采取了以下三种主要形式^[3]: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妇女问题与生产相联系。妇女受压迫根源于资本和私有财产,就好像资本是工人受剥削的原因,妇女解放首先要求妇女像男性一样成为工资劳动者,加入到男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围绕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进行的讨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看作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在这一体系中,所有人包括妇女都是工人,至于男女经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何区别的问题,他们没有涉及。第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家务劳动的讨论,聚集于家务劳动及其与资本的关系,甚至有人提出家务劳动者直接为资本主义服务、创造剩余价值的论断。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根源于父权制。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其《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一书中指出,父权制植根于两性生育角色的不平等,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育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最初的阶级划分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进行的,历

史发展的动力就是男性追求权力、统治女性的性别辩证法。费尔斯通模仿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描述,阐释了女性主义的历史发展动力论,“历史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看待历史过程的概念,它在性的辩证法中寻找所有的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这个性的辩证法,即社会为了繁殖生育而分化为两种不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阶级;在这些阶级彼此的斗争、在由这些斗争所创造出来的婚姻、生育和育儿模式的变化里,在与其他基于身体因素而划分的阶级(种姓)相互关联的发展中,在根据性别——它已经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的阶级制度——所进行的第一次劳动分工中,历史唯物主义寻找所有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4]。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在其《性的政治》一书中,进一步把父权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的全方位的统治,“我们的社会是父权制的,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调性的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中”^[5],包括父权制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充斥于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

在哈特曼看来,以上这些分析各有利弊。马克思主义分析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与阶级关系的理解,把阶级压迫放在第一位,把性别压迫放在第二位,不能用来形成女性主义的策略。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明显控制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结构、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等问题的分析,没有解释为什么特定人群占据特定地位,也没有提供为什么家庭内外都是女人屈从于男人、而不是男人屈从于女人的任何线索。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就像资本本身,都是没有社会性别视角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并不能告诉我们,前来填充空白位置的将是什么人^[6]。哈特曼认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提供了关于历史和经济规律的根本视角,但它不能理解性别歧视的动态;认为阶级斗争比女性主义重要,女性主义斗争被吸纳进阶级斗争中,认为女性主义是对工人阶级的分裂。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分析视角,尤其是关于资本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范畴是性别盲。

而激进女性主义只关注心理问题,倾向于把父权制看成一种单纯



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而不是看作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具有物质基础的制度;倾向于把父权制看作是基本不变的制度,把男性和女性在当前表现出来的一些性别特征投放到所有历史阶段上了。女性主义能够揭示男女关系的系统特征,但女性主义本身又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对历史是盲视的,或者不是充分的唯物主义者,女性主义是历史盲。

仅有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仅有女性主义是不充分的,女性主义是历史盲。这就使得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简单结合并不令人满意,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婚姻,就像对英国法律中关于丈夫和妻子之间婚姻的描述,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是一方,马克思主义是另一方。女性主义者并不满意于把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因为这种结合把女性主义斗争纳入到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哈特曼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或者需要一个更健康的婚姻,或者需要一次离婚”^[7]。要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困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与女性主义关于父权制的社会历史结构分析结合起来,以这种结合为基础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新方向,在理论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女性主义目标,从唯物主义角度分析父权制,不仅涉及心理方面,而且把它看作社会和经济的结构,在实践中不仅要提高对阶级和性别关系的认识,还要求有一个新左派政治的平等实践。

二、按性别分工是妇女屈从地位的根源

为什么是女性屈从于男性,而不是男性屈从于女性?在哈特曼看来,按性别劳动分工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较为平等的性别分工是怎样变得不平等的?等级分工是如何扩展到现代雇佣劳动中的?哈特曼从以下几个方面回答了这些问题:

第一,按性别分工是等级组织与控制的技巧。按性别分工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男性通过父权制的权力实施个人之间的控制,通过家庭中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学会了进行等级组织和控制的技巧。这种组织与控制的技巧在现代社会得以延续,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随着国家机关和基于更广泛的交换和更大生产单位之上的经济体制的出现而造成的公私分离的出现,维持对妇女劳动力的控制成了男人的专利。换句话说,直接的个人控制系统转变为间接的通过社会机构进行的非个人控制系统”^[8],而且这种控制在现代社会更隐蔽、更有效。

第二,按性别分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15—16 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削弱了男性对妇女的统治,因为按纯资本主义的理论倾向,应该是消灭劳动地位的一切差别,使所有劳动者在市场上一律平等。既然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趋向于均质化,缩小基于性别、民族、种族根源等因素的差异,那为什么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甘居男人之下呢?哈特曼认为男人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男人支配女人因阶级、种族等会有程度不同,但是男人从对妇女的压迫中获益是肯定的:(1)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给所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提供了平等的市场地位与机会,但事实是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的不平等的地位,男工人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男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维护性别划分方面起过并且还在起的决定性作用”。(2)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表现为低工资,“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9],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低薪迫使妇女结婚,女人似乎可以把自己无力买到的东西和达到的生活方式,通过嫁人、通过从属于男人而实现。(3)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即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4)妇女的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合法存在使妇女只有从事半日制工作或不工作,这又加剧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

第三,性别等级分工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家庭工业被资本主义工业所取代,使得工作场所与家庭分离,男性进入工作场所,妇女被限制在家庭中。男性可从两个方面获得支配地位:(1)迫使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即使参与劳动力市场中,妇女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少、报酬低的工作;(2)男性主动



在劳动力市场上排挤妇女。一方面,男性担心妇女作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与男性展开竞争,给妇女低工资会形成对男性的威胁;另一方面,男性对家庭和儿童教育的担心等,如果你腐蚀男人,这很不好,但如果你腐蚀女人,那你就毒化了源泉本身的生命之水^[10]。而且男性对女性的排挤得到工会的支持。哈特曼列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工会如何通过保护立法实施对女工的排挤的:其一,通过限制劳动时间的立法。1879年烟草国际工会主席阿道夫·斯特拉瑟说,“我们不能把女性从行业中赶出去,但我们可以通过工厂法来限制她们每天的劳动份额。18岁以下的女子每天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禁止过分劳累”。其二,把妇女要求的同工同酬作为对付妇女的手段。1917年埃莉诺·拉思伯恩指出,男工工会领导人支持把同工同酬作为“排挤以男女平等斗士出现的妇女的有效方法”,因为正如米莉森特·福西特指出的,不让妇女获得同样的技能,同工同酬对妇女是一种欺骗。

正是性别劳动分工使得女性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工厂中都处于劣势,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加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内的从属性,在家里的从属性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11];“于是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哈特曼得出结论:按性别分工是妇女处境艰难的重要根源,必须消灭性别分工。“性别分工和男性的支配地位这样长久地存在至今,是很难根除的。而如果男性支配地位还存在,要想消灭性别分工也是不可能的。这两者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为了结束男性的支配地位,就必须消灭性别分工本身。为了解放妇女,要求各级社会和文化出现基本的变化”^[12]。

三、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伙伴关系:家庭工资、意识形态

在哈特曼看来,父权制是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一套男性间的社会关系,它有自己的物质基础,同时尽管是等级制的,它

性”^[13]。第一,父权制是指男人之间用来统治女人的一整套的社会关系,使得男人之间相互依赖及团结一致,当然统治程度因阶级、种族、民族甚至婚姻状况和性取向、年龄等有所不同,较高层次的女性可以向较低层次的男性行使阶级、种族和民族权利,甚至是父权制权力;第二,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在于对女性劳动力的控制,表现在男性不让女性占有重要的生产资源和限制她们的性生活,“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婚姻看来是新近一种允许男性控制这两个领域的有效方式”,这种控制不仅发生在家庭中,还发生在家庭之外,包括女性工人或学生受到男性老板或教授的纠缠,包括被任用为秘书去处理他们的私人事务、倒咖啡或提供“性感”环境。男子对于妇女劳动力的控制因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而不同,过去的妇女被直接控制,而现代的妇女是被间接控制,主要通过一夫一妻制婚姻、女性负责生育和抚育孩子、女性承担家务劳动、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子等社会体制来实施这种控制。“父权制的物质基础不仅建立在家庭要养育孩子这件事上,而且建立在能够使男性控制女性劳动的所有结构上”^[14],这些结构包括国家和大量建立在男性间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组织如教堂、学校、运动会、俱乐部、协会、军队、工厂、办公室、健康中心、媒体等。

哈特曼通过对家庭工资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考察,探讨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伙伴关系如何使妇女处于了屈从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间有着强烈的和健康的伙伴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不可避免的^[15]。哈特曼从家庭工资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两方面进行了探讨:

1. 采用家庭工资形式

资本家与男人在使用妇女劳动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态度,“自从出现了雇佣劳动以来,男性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如何使用妇女劳动力的问题上,一直是有争执的”,妇女的剩余时间如果直接用于为丈夫的利益服务,资本家就不可能用雇佣方式对她们进行直接剥削。

资本家为扩大剩余价值,总希望把可用的劳动力纳入到雇佣关系中来,总希望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工资劳动力市场上去,这样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1)增加市场上雇佣劳动力的数量,扩大剩余价值;(2)降低

工资标准,因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使得男性工人的工资下降;(3)由于妇女和孩子比男性的反抗能力差,使得男性工人的反抗也降低。然而资本家想使用妇女劳动力,一般会遭到男性工人的反对,因为(1)绝大多数男性希望女性留在家里为他们提供私人服务;(2)女性成为雇佣劳动力对工人阶级家庭来说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3)女性成为男性的廉价的竞争者。

正是在对待女性劳动的矛盾中,资本家经常能够利用按性别进行职业分工为自己谋利益:如果他们能用更廉价的妇女取代有经验的男子,那就更好了;如果他们能以威胁要这样做来压低劳动力的价格,那也不错;如果他们失败(指男工会限制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也能利用这种地位的差别给男人以补偿,收买他们对资本主义及家长制利益的忠心,那也很好^[16]。通过家庭工资的形式即资本家通过付给男性工人足以保证让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的工资,使得资本家与男性工人在对待女性的交易方面获得成功:首先,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好的工作,并且比女性工资高。低收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接受的是男性强于女性的物质优势,以及要她选择尽妇道作为职业的鼓励;其次,女性做家务,照顾孩子,以及完成其他家庭服务,待在家里的妻子比工作的妻子更能创造幸福的家庭氛围,使得男性的生产能力增加。女性的职责反过来加强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地位。在现代社会女性大量介入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性别工资差异成为父权制的前提,不仅资本家从妇女对劳动力市场的奉献中获利,而且,那些身为丈夫和父亲的男人,他们在家庭中也得到了私人性质的服务。哈特曼得出结论,男人控制女人的欲望至少与资本家控制工人的欲望一样强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结成伙伴,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互适应,资本主义使父权制适应于家庭工资体系,而父权制也适应于资本主义。

2.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通过意识形态加深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激进女性主义者费尔斯通看来,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对应于女性/女性特征/审美/艺术模式与男性/男性特征/科学/技术模式两种不同的文化。与这两组相对应的术语还有:主观的、直觉的、渴望的、梦想或幻想、与潜意识(本我)相关联、情感化甚至神经质

(歇斯底里的);客观的、逻辑性、外向的、现实的、与意识(自我)相关联、理性的、机械的、脚踏实地的以及稳重的^[17]。哈特曼认为,费尔斯通所描述的男性价值接近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形成:(1)男性作为工资劳动者,被吸收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相应的竞争体系中,从而吸取了相应的价值观念;(2)即使男性和女性在实际行动中并不像性别观念所表现的那样,男性也会宣称自己具有这些被主导意识形态高度评价的性格特征。

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伙伴关系借助于意识形态,强化了男性价值、贬低女性价值:一方面,美化男性性格特征/资本主义价值和诋毁女性性格特征/社会需要;另一方面通过赋予交换价值相对于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王国即妇女的领域,及与此相关的特性,如情感、母性等)的优先权,只要这样的思想意识占据统治地位,那么,“资本赋予交换价值的优先权和他们对使用价值之间的需求的对抗将是可以避免的”^[18]。

四、女权革命必须同时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作斗争

“如果不同时向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两种制度提出挑战,就不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两种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就不可能产生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的理论”^[19]。因为父权制在两个领域中起作用:一个是家庭,家庭是父权制剥削的主要场所;一个是不同于商品生产的人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所以消灭父权制的斗争不同于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在策略上不同于工会或政党斗争。

从战略上讲,女性不能相信社会主义革命会自动解放她们,女性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权力基础。因为女性长期参与资本主义性别劳动分工实践,也使妇女组织积累了经验与基础,当男性长期为反对资本而斗争的时候,女性也从中了解了斗争是为了什么。从策略上讲,妇女应在多个战场战斗,因为工厂是工人体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主要场所,但不是唯一的场所;同样,家庭是妇女体验父权制社会关系的主要的场所,但也不是唯一的场所。

第一,以家庭为主要战场。每个妇女要一对一地和掌握父权的男

子斗争,每个妇女都要提出同样的要求,都去阻止丈夫维护他们的父权,对此,有学者曾形象地指出,革命应在全国的每间卧室里进行。第二,以国家和资本主义工厂为辅助战场。在工厂斗争中,妇女要求同工同酬、结束对妇女的行业性歧视、改变工作进程以适应妇女的特点。正因为妇女在工厂中的低工资和低职业使得妇女局限于家庭、依赖于婚姻,即使在工厂里的斗争也是主要针对父权制的,而不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必须向控制再生产的父权挑战,这种斗争在各个层次进行:在家庭范围里,妇女不顾丈夫的意愿,要求有流产和节育的权利;在邻里范围内,她们动用邻里保健所和父权控制的医疗制度作斗争;在国家范围内,她们争取国家为流产和儿童保育提供福利基金;在工厂范围内,她们争取产假和产期前后灵活的工作时间。

女权革命不同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式,但其性质却同样是革命的。妇女解放必须以两种革命为前提,如果放弃对女性主义的研究与实践,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斗争就不可能成功;如果忽略父权制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潜在支持,只以资本主义压迫为目标的斗争就会失败^[20]。

哈特曼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必须将分析妇女受压迫置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两个系统中,并从性别等级分工、家庭工资、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相互适应、相互利用,资本家与男性从妇女受压迫中共同受益。哈特曼不仅强调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在于男性控制了妇女的劳动力,这种控制从家庭延伸到家庭以外的工厂等其他场所;而且强调父权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历史的变化。父权制作为一种与生产关系截然不同的制度,与资本主义一起构成对妇女的压迫。对此,扬评论道,哈特曼的论述让人们认识到在现代社会妇女所受压迫的综合性与普遍性,通过对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和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的结构与变化的全面叙述,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这篇著作发表以后,再没有人敢声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受压迫的情况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一种附带现象,或者正在消失了^[21]。

何区分? 如果认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具有同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那它们两者的区分就是不可能的了, 它们就属于一种而不是两种制度了。这就与认为妇女同时受两种制度的压迫的初衷相矛盾, “承认家长制和资本主义明显处于同一社会和经济结构, 它们就属于一种, 而不是两种制度了”^[22]。而且哈特曼主张等级制的性别分工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相互作用的结果, 但她更强调男工人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也就是说父权制是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仅仅是利用了妇女低下的地位来获利。男工人凭什么能对女性进行统治? 性别分工是如何产生与维持的? 资本主义平等的表面下, 其实质又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 哈特曼并没有给予深入的探讨, 尽管如此, 哈特曼的观点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讨论^[23],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爱森斯坦主编:

《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的状况》(1979) ^[24]

齐拉·爱森斯坦(Zilla R. Eisenstein), 1972 年以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与杜尔凯姆的类存在概念: 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含义”从马萨诸萨(Massachusetts)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现在纽约伊萨卡学院的政治学系教授“女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论资本主义、父权制与奴隶贸易”、“权力: 经济阶级、性与种族”等课程。研究领域



包括:阶级、性与种族的政治学,政治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建构。主要著作包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激进未来》(1981)、《女性主义和性平等:自由美国的危机》(1984)、《女性身体与法律》(1988)、《性别的肤色,重思民主》(1994)、《憎恨,21 世纪的种族化与性别化的冲突》(1996)、《全球化的污秽文字、父权制、资本主义与网络幻想的诱惑》(1998)、《反帝国》(2004)与《性诱惑》(2007)等著作^[25]。她还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妇女运动。

由爱森斯坦主编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状况》一书是美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论文集,全书由“序言”、“母性、再生产和男性统治”、“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分析”、“资本主义父权制和女性工作”、“变革社会中的父权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美国”等六部分组成^[26],全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27]:第一,方法论上把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女性主义分析相结合;第二,阐述作为母亲和工人、生产者和再生产者的妇女角色所产生的问题;第三,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是决定当今妇女受压迫状况的核心关系;第四,理解并揭示源自阶级生产关系和性别等级关系的权力动力学。

这里仅根据爱森斯坦的两篇论文“发展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父权制关系的若干说明”^[28]对爱森斯坦的观点进行简要介绍。

一、资本主义父权制(capitalist patriarchy)

社会主义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区分在于前者致力于理解并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后者致力于理解由资本主义父权制派生的权力制度。爱森斯坦试图把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分析结合起来,“我选择‘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个词来强调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性等级之间辩证的、互相作用的关系。理解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相互依存,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分析至关重要。尽管父权制(即大男子主义)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并在资本主义后的社会里得到延续,但如果要改变这个压迫结构,我们必须弄明白它们的现存关系。在

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超越了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孤立的激进女性主义理论”^[29]。

(一)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的二分法

在爱森斯坦看来,马克思主义分析对于研究妇女所受的压迫具有双重意义^[30]:第一,它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研究权力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它提供了一种辩证的历史分析方法。包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关系的理解、剥削与异化理论、权力理论以及家庭、再生产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女性主义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方法通常被用于研究阶级和阶级冲突,也可用于分析妇女受压迫的父权制关系。

激进女性主义主张从性别阶级体制角度分析权力关系,因为:第一,整个历史是父权制(性/性别的权力体制)的历史,整个社会是一个男性统治、男性拥有优势权力和经济特权的社会。米利特在其《性的政治》(1970)中提出性是政治的主张,男女关系是所有权力关系的范式,“社会等级制度取代了所有其他不平等——种族、政治或经济不平等的形式,除非最终抛弃这种积习,不再把男性最高权威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权力;否则,所有的压迫制度都还将继续发挥作用,这仅仅是由于在最初人类处境中它们得到的逻辑上的和情感上的规定”^[31]。第二,父权制源于生物学,基于男女的生理差别产生了性别劳动分工、性别角色的区分。费尔斯通在其《性的辩证法》(1970)中指出,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不在经济方面,而在生物学中,妇女的再生产功能、家庭是她受压迫的主要原因,权力之间的性别不平等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性别间自然的生育差异直接导致了作为阶级根源的第一次劳动分工,同时造成了等级制的典范”^[32]。第三,妇女的地位不是由经济阶级结构决定而是由父权制的社会组织决定的,所有的斗争都是基于性别之间的斗争。

爱森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者分别根据经济阶级地位与性、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再生产关系、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经济与家庭、物质条件与意识

形态、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与性别劳动分工的二分法对妇女受压迫状况进行分析。不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还是激进女性主义的分析都执著于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如此分析难以理解妇女受压迫的复杂状况。把激进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综合起来,第一步必须形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整体的政治理论,这不仅仅是两种权力理论的相加,而是把它们看作通过性别劳动分工形成的相互联系^[33]。

(二) 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概念框架

爱森斯坦选择使用“资本主义父权制”说明妇女所受的压迫,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

1. 出于探讨妇女为什么受压迫以及妇女怎样受压迫的问题的需要

爱森斯坦在详细区分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上指出:一方面,妇女同时受到剥削与压迫:剥削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经济阶级关系的事实,针对的是处于劳动中的男女工人;压迫是指处于父权制关系、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之中的妇女和少数人。妇女作为工资劳动者受剥削,作为母亲、家务劳动者和消费者,处于父权制的性别等级关系中遭受着压迫。另一方面,妇女处于无权力的地位,权力是压迫的对立面,来自于性、种族与阶级,体现在父权制、种族歧视与资本主义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层面。

爱森斯坦之所以着力探讨妇女受压迫问题,是因为压迫是一个能够反映复杂现实的概念,它反映了劳动、社会的性别与种族分工这一等级制关系^[34]。妇女受压迫理论包括两大问题:妇女所受的压迫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直到现在妇女还受压迫?这两大问题就是为什么和怎样的问题。在爱森斯坦看来,以前的女性主义并没有把为什么受压迫和妇女怎样受压迫这两方面联系起来考虑。激进女性主义回答了妇女为什么受压迫的问题。费尔斯通从生物学角度提出妇女的受压迫源于她的再生产功能,妇女作为再生产者、作为一个性阶级受压迫;但她很少说明妇女怎样受压迫的问题。阿特金森提出性阶级是一个政治构成,“事实是养育孩子不是妇女的功能,养育孩子的功能是男性压迫女性的功能”^[35]。社会通过人类异性恋、家庭和婚姻制度、通过法律和文

化制度,构成了妇女受压迫的基础,对妇女的压迫是阶级体制的开端,妇女是第一个受压迫的阶级。从那以后,人类历史上的每一种文化或父权制或价值观都把压迫妇女作为基本要求^[36]。激进女性主义在解释妇女为什么受压迫的时候,把历史看作是父权制的历史,探讨生物学分类如何变成了政治学分类,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文化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妇女受压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1)男人和女人都处于被剥削地位,都受资本主义的剥削;(2)家务奴隶制与工资奴隶制在特性与本质上是相同的,工作的妇女作为工人而受剥削,不工作的妇女作为未付工资的奴隶受剥削。总之,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激进女性主义者,都没有形成一个关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概念来界定妇女受压迫的问题。

2. 从资本主义父权制关系出发能够理解妇女所受压迫的复杂性

第一,把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结合起来,根据阶级起源与父权制根源来分析权力关系。在这样的分析中,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不是自主的体系,也不是同一的体系,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体系;第二,考察阶级与父权制的历史,包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不同时期父权制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大男子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37];第三,打破阶级与性、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家务劳动与工资劳动、家庭与经济、个人和政治、意识形态和物质条件之间的二分法;第四,把妇女受压迫置于阶级地位、父权制结构或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研究。

这样的理解将使得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把对阶级结构与父权制关系、社会性别等级制秩序的运行联系起来理解,在阶级结构中理解父权制关系、社会性别等级制秩序的运行,在父权制关系、社会性别等级制秩序的运行中理解阶级结构;第二,消除物质存在包括经济的或性的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分,因为性别劳动分工和性社会分工奠定了父权制的基础,它既具有物质的形式,又具有意识形态的现实。妇女存在是由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决定的,那么就不能只通过资本主义或父权制来理解妇女受压迫的问题^[38]。总之,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的妇女存在,必须把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考察。



二、等级制的性别劳动分工

爱森斯坦认为,在资本主义父权制条件下,性别劳动分工是等级制的,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依据人们的生物学性别界定人们的活动、目的、目标、愿望和梦想;第二,使得家庭与经济成为两个分离的领域;第三,性别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成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基础,它把男人与女人限定在他们各自的角色等级中,使他们承担各自在家庭与经济领域中的相关责任。这一切使得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父权制的改变是为了资本的需要,资本的改变也是为了父权制的需要^[39]:

第一,资本主义需要父权制:(1)性别等级体制的父权制控制系统给资本主义提供必要的秩序与控制,对于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平稳运行不可缺少;(2)源于男性至上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控制体系对于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3)对利润的关心与对社会控制的关心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父权制是为了资本的需要:(1)父权制为社会政治控制提供了性别等级制的秩序,而且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不能被削减为经济结构;(2)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阶级体制,以追逐利润为目标,依靠父权制秩序;(3)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特殊融合形成了社会的政治经济;(4)把妇女界定为母亲或非工人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美国约有45%约3860万的妇女参与到工作中,然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把妇女界定为工人,所以妇女劳动得不到工资或所得工资少于男性。这种把妇女界定为母亲和低下的性别地位,既可以让妇女从事未付酬的家务劳动,又能够以低工资雇佣她们。即使妇女已经处于付酬经济中,性别劳动分工和性别社会分工依然完好无缺,意识形态通过把妇女界定为工作中的母亲适应了这种状况^[40]。

父权制和资本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过程,一方不能代替另一方,一方的因素为另一方所需要。资本主义父权制通过性别分工与社会劳动分工加强了资本与父权制之间的互相依赖、互相支持,从中获

取包括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甚至文化方面的最大利润:

第一,妇女在家庭中承担家务工作的所有过程都有助于现存社会的永久化:(1)妇女通过完成家庭中的家庭主妇、母亲的角色使得父权制结构得以稳定;(2)妇女为未付酬与付酬劳动力再生产新工人,她们照顾社会的男人与孩子;(3)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工资较少,如在付酬劳动力中,1970 年 7% 的美国妇女挣工资多于 10000 美元,与此对比男性比例为 40%;93% 的美国妇女所挣工资低于 10000 美元;(4)她们的角色使得她们作为消费者使社会保持稳定,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关系类似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这一切表明,妇女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她所做的这一切绝对是经济包括消费所必不可少的。

第二,让妇女承担家庭内的家务劳动与家庭外的工资工作的社会安排,使得整个社会、资本家以及男性工人从中受益:(1)它通过家庭使社会得以稳定。妇女在家庭中承担着家庭主妇、母亲的角色,同时又成为不付酬的家庭主妇或获得有限的工资报酬,即使她们作为付酬工人,仍被限定作为一名妇女或家务工作者,这一切都是社会为了利润,进行等级制的性别分工的直接反映。(2)资本家阶级从这一基本安排中获利。统治阶级对保留家庭的愿望反映了它要使用劳动分工来保证它的最大利益,使其社会文化及政治方面具有等级制的秩序,最终通过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权力实施社会组织 and 政治组织的安排。(3)所有个体男性也从中得到好处。男性不管属于哪个阶级,都作为父权制社会的特权群体获益。正是这种等级制度保护了性别劳动与社会分工以及在阶级体制中创造的虚假需求,如果一个社会不把等级制的意识形态和结构看作是最基本的需要,特殊权利制度就不可能被组织起来^[41]。

三、妇女与阶级

如何确定妇女的阶级?马克思主义分析依据的是妇女的经济地位,激进女性主义依据的是生物学的性。要回答妇女属于哪个阶级的问题,必须回答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的问题,是根据她丈夫所属的阶级?因为她丈夫是中产阶级她就被称作中产阶级?如果她属于中产阶

级,她能像她丈夫一样拥有对生活的自由、自主和控制吗?一个同资本家离了婚的女人该如何确定她的阶级?一个中产阶级妇女与中产阶级男性地位截然不同,却比工人阶级妇女舒适些?一个中产阶级妇女与从事低收入工作的单身妇女的地位如何比较?爱森斯坦指出,“我问这些问题并不是说阶级标签是没有意义的,不是说妇女中间并不存在阶级特权,也不是说家庭主妇构成了一个阶级;我是想说,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妇女的相似之处,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真实的阶级差异在哪里。我建议我们必须发展一个词汇和概念工具,根据她们与男性、与阶级结构、生产与再生产、家庭劳动与工资劳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处理妇女之间具有不同权利的问题”^[42]。

爱森斯坦不仅强调妇女之间的相似,还强调妇女间的差异,提出因此必须根据社会性别等级体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基本关系探讨妇女的阶级问题:一方面,必须重新界定阶级范畴。目前的阶级范畴主要是由男性界定的,妇女所属阶级依赖于她丈夫所属的阶级,妇女不是作为一个自主的存在;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妇女处于复杂的现实与意识中,必须考虑妇女之间存在的差异,例如:同样在家外工作的妇女有职业与非职业妇女之分;同是家庭主妇,也有专门做家庭主妇和兼职从事工作之分,还有福利妇女、未雇佣妇女和连在自己家里也不工作的有钱妇女。妇女的复杂性体现在再生产、生养孩子、家庭维持、性行为和消费等活动中,妇女经验具有相似与差异之处。下表反映了妇女阶级生活的复杂性^[43],根据社会的性别等级制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关系,从再生产、生养孩子、家庭维持、性行为与消费方面确定妇女的阶级差异。

	再生产	生养孩子	家庭维持	性行为	消费
未雇佣妇女					
福利妇女					
家庭主妇					
在家外工作的非职业妇女					
在家外工作的职业妇女					
连在自己家里也不工作的有钱妇女					

强调妇女之间存在的阶级差异,也许会涉及到一个政治性问题:能否把妇女跨阶级组织起来?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妇女不能被组织起来,因为她们被孤立在家中,从属于她们丈夫所属的阶级,妇女之间不仅存在阶级冲突,还存在经济阶级差别,所以要在所有问题上把妇女跨阶级组织起来是不可能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妇女间跨阶级组织还是可能的,因为:第一,就妇女每天的生活而言具有相似之处。妇女每天的生活处于父权制的控制下,承担着特定的角色,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策略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是从妇女在每日生产、再生产和消费的斗争中生长起来的^[44],妇女这方面的共性为妇女间跨阶级的组织提供了基础。第二,妇女受到排挤,无论在家里还是在职场上妇女所得甚少,这成为妇女意识发展的基础,以此为基础可以发展妇女的政治意识。第三,有可能在堕胎、保健、强奸、儿童照看等方面把妇女跨阶级组织起来。

爱森斯坦在理论上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分析与激进女性主义分析综合起来,试图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解释妇女受压迫问题,并通过等级制的性别劳动分工揭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实践中,爱森斯坦作为妇女运动的成员积极参与妇女运动,为推动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乔多萝：

“母职、男性统治和资本主义”

(1979) ^[45]

南茜·乔多萝(Nancy Chodorow)(1944—),哲学博士,美国心理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心理分析、母职以及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要著作包括:《重建母职:精神分析与性别社会学》(1978)、《女性主义与心理分析理论》(1989年)、《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与性行为:弗洛伊德与超越》(1994)、《情感的力量:心理分析、性与文化中的个人意义》(1999)。

乔多萝在其“母职、男性统治和资本主义”一文中,探讨了母职对于资本主义、男性统治的影响,这方面很少有人加以分析,在乔多萝看来,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妇女哺乳与养育孩子的能力与由她们照料孩子之间具有自然而然的联系,由妇女承担母职是理所当然的。她从母职对于家庭结构、两性关系、妇女的思想意识、家庭内外的性别劳动分工与性别不平等的意义方面,论证了母职对于男性统治、资本主义所起的作用:妇女承担母职,她们不仅生育孩子,还负责照料婴儿,维持着与婴儿的情感联系;母职不仅决定了妇女活动,还再生产着新一代的孩子与母亲;母职不仅是孩子的再生产,还是社会的再生产;母职是男性统治的实施,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结构特征。通过母职这一制度,社会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所必须的男性至上关系和等级制关系^[46]。

一、母职是性/性别制度的核心特征

乔多萝认为,人类学家盖尔·卢宾^[47]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于她提出了两种制度理论:卢宾以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础,提出一个社会是由两种制度构成的。一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二是以亲属与家庭组织为核心的性/性别制度。这两种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一方面,这两种制度的区分和公共领域与家庭领域、经济与家庭、男人世界与妇女世界的区分密切相关。随着物质生产逐渐从家庭中分离出去,家庭不再作为生产性的经济单位,男性和女性被分隔于家庭外与家庭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妇女的主要位置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中,男性的主要位置则在家庭外的公共领域中。这种家庭结构与性别劳动分工使得丈夫拥有家庭内的权力,拥有控制妻子的权力;不仅如此,家庭内的男性统治还延伸到家庭以外的领域中,表现为妇女工作所得少于男性,妇女从事的职业范围较小、职业层次相对较低等。另一方面,这两种制度又密切相连。把两者分开来讨论,只是出于分析的需要。这两种制度的紧密相连通过很多途径,性/性别制度包括性别的社会组织、关于妇女的思想意识和性别不平等的心理动力,具体包括生理性别如何变成社会性别、性别的劳动分工、性别生产与性别组织的社会关系、性客体选择的原则与规则等。具体还通过性别的社会组织、针对妇女的意识形态与性别不平等的心理动力等多种途径密切相连,其中妇女的母职是性/性别制度重要的结构特征^[48]。

二、妇女的母职与社会性别组织

母职与社会性别组织、生产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决定了妇女的地位,妇女的母职是我们社会也是所有其他社会的性别组织最重要的结构特征。工业革命以来,尽管妇女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婚姻和生育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是妇女作为母亲在照料孩子。乔多萝指出,



妇女的母职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特征,是一种历史与跨文化的现象^[49]。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早期,家庭户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单位,丈夫、妻子、孩子组成了合作生产单位,妇女在生产与再生产中既承担照料孩子的责任,也参与生产性工作。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曾经是一体的家庭和工作场所发生分离,家庭不再是工作场所,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并逐渐形成家庭属于妇女的领域,公共领域属于男性的领域。生产组织的这种变化以及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社会生产与家庭再生产、个人生活之间的分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对家庭、对妇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庭丧失了它在生产、教育、宗教和政治等领域的功能,这使得当代核心家庭成为社会的个人领域,家庭成为人们休憩的场所,成为养育孩子的场所;妇女丧失了她们在社会生产与家庭生产中的经济作用。

第二,加深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性别分工。男性不再以家庭为中心,不再是家庭生活的参与者,而妇女却以在家庭中承担母职为其中心任务。

第三,导致了日益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由于不再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妇女丧失了她们在家庭与公共领域中的权利,“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以及她们作为母亲的作用之所以遭到轻视,是因为她们身处金钱交易领域之外,因此她们的劳作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尽管爱是可贵的,但它只有在一个遭人轻视的、无权的范围中才能受到珍视”^[50]。

三、关于母职的意识形态

“随着养育与照料孩子在生理和生物上的必要性的减少,妇女的母职角色对于心理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在增加,并逐渐支配着妇女家庭内外的生活”^[51]。妇女母职的意识形态通过多种途径发挥作用:

第一,关于自然的差异。一方面,根据自然差异和自然原因来解释社会的性别组织,包括家庭内外的性别劳动分工,认为性别劳动分工是

生理差异的结果,把家庭看作自然的而非文化的创造,不认为社会的性别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另一方面,这种关于自然的意识形态,主张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比男性与自然的联系更紧密,“而且,在我们社会,关于自然的特定意识形态从一般方面界定了社会的性别组织,从特殊方面界定了妇女的生活,尤其以妇女母职功能和再生产器官的解释与扩充为基础”^[52]。

第二,关于妇女的工作。尽管妇女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已是既成事实,但人们并不认为妇女做着生产性工作或有收入的工作,而是认为妇女工作只是对丈夫收入的补充,因而对妇女的歧视、少付酬、解雇、较高的不就业率等被认为是正当的;尽管事实上女性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 40%,三分之二的工作妇女是结过婚的、40% 的工作妇女有 18 岁以下的小孩,人们仍然假设成为母亲和妻子的妇女是不工作的,工作的妇女都是单身或没有孩子的;妇女大多从事职员、服务人员、教师、护士、售货员工作类型,这些工作是妻子-母亲角色的延伸,并强化了妇女作为妻子-母亲角色的刻板形象^[53]。

第三,关于孩子的社会化过程。母职的作用不仅对孩子发展,而且对再生产男性统治作出了贡献。随着生育率下降,大量妇女参与到社会生产中,但妇女在照料孩子方面并没有变化,生物母亲对照料孩子承担了全部责任;正如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所表明的,妇女负责照料孩子和孩子社会化的过程,是男孩挣脱与母亲的联系、使自身自由成为有男子气的男人的过程。在所有这些过程中,男性拒绝、贬低甚至嘲笑妇女和女性化的事物,“妇女的母职创造了意识形态模式和心理模式,这一模式通过个体男性再生产男性统治的观念与结构,并通过男性气质的定义维持着男性的优越”^[54]。

四、妇女的母职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意义

当代社会再生产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所需要的持续不断的劳动力的扩充;第二,通过意识形态和制度(国家、学校、传媒、家庭)合理化有益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第三,工人的再生产不



仅体现在生育方面,还体现在必需的能力、情感取向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在当代家庭中,妇女的角色和工作活动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再生产做出了贡献”^[55]。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作与家庭生活分离;虽然家庭外工作增多,妇女却仍然承担着主要的家庭责任,负责每日的劳动力再生产,这些责任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还体现在心理、情感方面。在家庭里,妇女使工人从物质和情感上得以恢复,妇女所从事的不付酬家务劳动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在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力的过程中,妇女培养孩子使他具有资本主义工人和消费者必需的心理能力和心理品质,“妇女在家庭中的母职角色和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母爱品质与行为,是资本主义每日与每代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56],妇女母职是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可缺少的,“妇女的母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组织、社会的性别再生产和性别不平等的核心特征,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以及支撑它的意识形态至关重要”^[57]。

第一,妇女的母职就是工作。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帕森斯聚焦于妇女的情感功能,而忽视了妇女的其他角色。妇女的母职本身就是工作,她们不仅在家庭中承担重要的家务劳动,而且按照科斯塔的观点,家庭是一个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工厂,妇女是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者。

第二,社会情感作用。帕森斯主张家庭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稳定和消除紧张;妻子和母亲给丈夫和父亲以安慰和稳定,起社会情感作用,对资本主义起心理支持作用。根据帕森斯的理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提出由于男性在家外世界中工作,处于异化的、没有感情甚至是不可容忍的世界中,需要得到妇女的支持,妇女在转移男性对工作的不满并使其稳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造就适应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劳动者。多诺万根据马克思·霍克海默的“专制的人格”——经过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工人——有益于资本主义劳动世界的运行,得出了育儿就是用恰当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劳动者的结论^[58]。育儿提供了家庭结构和男性统治的基础,“抑制和否定情感和爱,拒绝女人的世界和女性化的事物,重视男人的世界,认同理想化的缺席的父亲——这一切都是妇女教育子女的结果——造就了社会性别制度中的男子气和男性的统治地位,同时也造就了资本

主义劳动世界的参与者——男人”^[59]。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家和帕森斯学派,用心理分析来说明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如何产生男性从心理上献身于资本主义统治:使对权威的屈从内在化;发展心理能力以参与到异化的工作世界,获得成就取向^[60]。

第四,再生产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征,使得母职再生产得以有效地实施。乔多萝指出,“女人母职……创造了女孩和男孩成长过程不对称的关系体验,这就是女性人格和男性人格有着决定性差异的原因”^[61]。后期资本主义需要官僚、中层管理者、技术员、服务人员和白领工人具有特别的人格特征和人际能力与之相适应,“在日益增多的孤立的核心理家庭中,妇女的母职满足了具有这种人格特征和能力的孩子的再生产的需要,适合于上述这些形式的工作和经济上的控制”^[62]。

总之,妇女的母职对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社会的性别组织与资本主义作出了贡献,妇女的母职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63]。

资本主义深化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使得社会化生产和家庭彻底分离,妇女被划归私人领域;在性别劳动分工中,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以及作为母亲的作用遭到轻视;妇女的母职角色与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母亲作为劳动力参与向社会生产之间产生深刻的矛盾,如何以及是否能够解决这一矛盾,取决于能否给照料孩子作另一种安排,取决于把养育组织的重新安排作为政治的主要目标,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男人和女人共同承担育儿的基本职责。乔多萝认为这样的双亲抚育制度具有以下优势^[64]:第一,如果子女由父母双方抚育,男孩和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就能有同样的相融和独立的能力,就能同样重视与别人的关系并为自己的独立自主而自豪;第二,平等地由父母双方来抚育的男孩和女孩,他们会认识到,男人和妇女都需要对照他人的自我利益来平衡自己的自我利益;第三,双亲抚育的子女不会再把家庭看作妇女的领域,把公共世界看成男人的领域。相反,他们在成长中思考,所有的人都应该将一些时间用于工作世界,而其余时间则用于家庭,以和亲人、朋友相处。

乔多萝关于双亲抚育的主张引起了众多的批评^[65],不仅如此,乔多萝关于母职是妇女受压迫的分析也是有问题的,贾格尔认为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乔多萝把养育孩子的组织及其心理上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发展看作是普遍的非历史的,具有心理分析的特征;第二,聚焦于普遍的生育组织对孩子的影响,忽略了其对父母尤其是对妇女的影响;第三,她并没有为作为她理论起点的生育中的性别劳动分工提供唯物主义的解释。总之,贾格尔认为,乔多萝的解释作为妇女屈从地位的理论是不完整的^[66]。

尽管如此,乔多萝与米切尔、塞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卢宾等人关注妇女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通过母职对妇女活动的界定以及母职制度的再生产的探讨,研究了母职对于男性统治与资本主义的意义,这样的研究对于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全方位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1]由哈特曼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引发的讨论,可参见萨金特所编:《妇女与革命——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间不幸婚姻的讨论》,后文将作详细讨论。

[2]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和性别分工”,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第46-75页;哈特曼、马克森:“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女权主义者的评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0);“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载于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Kyung Kim(ed): *Feminist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2006-221(还可参考(美)詹妮特·A. 克莱尼编著:《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李燕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3-584页)。

[3]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Kyung Kim(ed): *Feminist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207.

[4]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5][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38-39 页。

[6]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 - Kyung Kim (ed): *Feminist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210.

[7]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 - Kyung Kim (ed): *Feminist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206.

[8] 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48 页。

[9] 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47、48、49 页。

[10] 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62 页。

[11] 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61 页。

[12] 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74 页。

[13] [美] 詹妮特·A. 克莱尼编著:《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李燕译,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第 576 页;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 - Kyung Kim (ed): *Feminist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215.

[14] [美] 詹妮特·A. 克莱尼编著:《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李燕译,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第 577 页。

[15]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 - Kyung Kim (ed): *Feminist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215.

[16]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72 页。

[17]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207 页。

[18]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 - Kyung Kim (ed): *Feminist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年, 217.

[19] 哈特曼、马克森:“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女权主义者的评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0 年。

[20]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217.

[21]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91 页。

[22]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81 页。

[23] 萨金特在其所编《妇女与革命——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不幸婚姻的讨论》中收录了 13 篇相关论文,并对哈特曼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观点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意见,详情参见后面一章。

[24]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Global Obscenities, Patriarchy, Capitalism, and the Lure of Cyberfantas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25] Zilla R. Eisenstein, 1. *The Radical Future of Liberal Feminis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1; 2. *Feminism and Sexual Eq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3. *The Female Body and the La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4. *The Color of Gender, Reimagining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5. *Hatreds, Racialized and Sexualized Conflict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6. *Global Obscenities, Patriarchy, Capitalism, and the Lure of Cyberfantas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Against Empire*, ZED press, London, July 2004; and PALGRAVE Press, U. S. in August, 2004. 8. *Sexual Decoys*, Zed Books, London; Palgrave, New York, forthcoming, January, 2007.

[26] 论文集包含以下论文:

(1) Z. Eisenstein: "Develop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5 - 40.

(2) Z. Eisenstein: "Some Notes on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41 - 55

(3) Nancy Hartsock: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Strategy", 56 - 77.

(4)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79 - 106.

(5) Linda Gordon: "The Struggle for Reproduction Freedom: Three Stages of Feminism", 107 - 135.

(6) Ellen DuBois: "The Nineteenth - Century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and the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137 - 150.

(7) Mary P. Ryan: "Femininity and Capitalism in Antebellum America", 151 - 171.

(8) Jean Gardiner: "Women's Domestic Labor", 173 - 189.

(9) Batya Weinbaum and Amy Bridges: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ycheck: Monopoly Capital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sumption", 190 - 205.

(10) Heidi Hartmann: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206 - 247.

(11) Margery Davies: "Woman's Place Is at the Typewriter: The Feminization of the Clerical Labor Force", 248 - 266.

(12) Carollee Bengelsdorf and Alice Hageman: "Emerging from Underdevelopment: Women and Work in Cuba", 271 - 295.

(13) Margaret Randall: "Introducing the Family Code". 296 - 298.

(14) Judith Stacey: "When Patriarchy Kowtow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Family, Revolution for Feminist Theory". 299 - 347.

(15) "The Berkeley - Oakland Women's Union Statement", 355 - 361.

(16)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 362 - 372.

(17) "Rosalind Petchesky: Dissolving the Hyphen: A Report on Marxist - Feminist Group", 1 - 5, 373 - 389.

[27]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序言.

[28]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5 - 55.

[29]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5.

[30]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6.

[31]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72 页。

[32]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204 页。

[33]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6.

[34]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23.

[35]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44.

[36]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209 页。

[37]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45.

[38]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24.

[39]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27 - 28.

[40]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29.

[41]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31.

[42]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32.

[43]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33.

[44]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34.

[45]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83 - 106.

[46]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79.

[47] 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可参见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21 - 81 页。

[48]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86.

[49]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87.

[50]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89.

[51]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90.

[52]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91.

[53]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91.

[54]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95.

[55]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95.

[56]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100.

[57]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95.

[58]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118 页。

[59]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120.

[60]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97 - 98.

[61]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62]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101.

[63]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102.

[64] 转引自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1-212页。

[65] 关于双亲抚育的主张引起的多种批评,参见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2-216页。

[66]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41.

第三章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献（上）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巴雷特在其《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中，从历史和经验出发，通过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相互关系的探讨，论及当今妇女为什么受压迫、怎样受压迫以及妇女解放的可能性等问题；扬在其“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一文中，对哈特曼等人持有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双系统理论表示不满，通过对分工和性别分工的分析说明资本主义就是父权制的；萨金特所编《妇女与革命——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不幸婚姻的讨论》的论文集，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关于阶级与父权制理论，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探讨了当代社会性别歧视状况与妇女解放的可能方向。

巴雷特：

《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1980）

米切莉·巴雷特(Michele Barrett)，英国伦敦城市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从事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学，研究专长为意识形态、美学、性别与后结构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主要著作有：《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1980)、《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的相遇》(1988;1980 年再版)、《意识形态：一个概念的政治》(1989)、《反社会的家庭》(1991，与他人合著)、《真理的政治学：从马克思到福柯》

(1992)、《不稳定的理论:当代女性主义争论》(1992,与他人合著)、《理论中的想象:论文化与写作》(1998)、《理论中的想象:文化、写作、词与事物》(1999)、《星旅:人类的边界》(2000)等等。

当今,妇女受压迫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何分析妇女受压迫却具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概念不能用于解释性别关系,而女性主义只强调男性对女性压迫的性别关系,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根据性别关系和生产与再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关系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关系探讨妇女所受的压迫。《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就是一本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相结合的著作,巴雷特所有的论述以两个假设为前提:一是妇女受压迫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一是妇女受压迫问题不能单独从理论层面加以解决。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相关?能否把妇女受压迫只看作发生在意识形态中?围绕着这些问题,巴雷特的考察达到以下目标:第一,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妇女解放的充分条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会取得某些重要改变;第二,把妇女受压迫的经济过程与意识形态过程之间联系起来考察;第三,提供随着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妇女地位变化的历史资料^[1]。

全书由序言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一些概念问题”、“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和性实践”、“意识形态和性别的文化生产”、“教育体制:性别和阶级”、“性别和劳动分工”、“妇女所受的压迫和家庭”、“女性主义与国家政治学”与“资本主义和妇女解放”等八章构成。

一、父权制、再生产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三个概念

父权制(patriarchy)、再生产(reproduction)与意识形态(ideology)

86 这三个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马克思

主义女性主义的讨论中,父权制和再生产概念主要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妇女受压迫的特点;意识形态概念提出了妇女受压迫是否归根于意识领域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2]。巴雷特对这三个概念的总结与概括,勾勒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乃至整个女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争论、看法。

(一)父权制

在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中,父权制^[3]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甚至有学者提出父权制是任何一个自称女权主义者的理论实践都必须加以论证的问题^[4]。女性主义者对父权制的广泛使用基于他们对父权制的各种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生物学再生产出发。费尔斯通从生物学的性别分工出发进行阶级起源的分析,提出用性阶级的概念代替经济阶级的概念,并把它作为理论分析的中心概念。基于这种解释,费尔斯通得出了以下结论:人类历史是性阶级斗争的历史;基于生育关系的性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只有通过生物学的技术革命才能把妇女从生物性的生育压迫中解放出来。在巴雷特看来,费尔斯通的观点可能会导致以下问题:第一,既然父权制是普遍的、跨历史的男性统治范畴,几乎没有改变的希望,容易导致宿命论;第二,把父权制置于生物学再生产的基础上,强调男性统治在于男性对女性生育的控制,而没有考虑男性为什么能够控制女性?男性又是怎样控制女性的?第三,尽管生物差异对于分析男女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但是过分强调生物学基础会陷入生物还原论,还会导致一些倒退。

2. 从父权制与家庭的关系出发。(1)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对妇女受压迫状况进行了唯物主义的 analysis,她把生产方式区分为工业生产方式与家庭生产方式,前者是资本主义剥削的范畴,后者是妇女劳动力被男性剥削的范畴。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在于家庭生产方式和父权制的剥削方式中,在于男性占有家庭中妻子的无酬劳动,所以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而在于父权制生产关系中。巴雷特认为:这种把父权制看作是一种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统治制度的观点会产生以下问题:第一,不能系统地考虑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第二,会导致把妇女所受的压迫看作普遍的、跨历史的现象。(2)库亨在其“家庭中的父权制与资本的结构”^[5]一文中指出,家庭中的心理和经济机制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父权制整合了家庭中的心理和经济关系。库亨试图把关于性别化主体构成的心理分析与对家庭经济机制的说明结合起来。在巴雷特看来,这样的分析:第一,父权制是男性(对妇女)的统治还是父亲的统治之间有些混淆;第二,并不能解释妇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受的压迫;第三,难以把妇女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

3. 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关系出发。爱森斯坦在其《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状况》中探讨了妇女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把资本主义父权制作为她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父权制在资本主义之前就产生了,资本主义通过性别分工、核心家庭使父权制制度化从而为其服务,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互支持、相互需要。在巴雷特看来,爱森斯坦的分析存在以下问题:资本主义利用父权制、父权制是为了资本的需要的论断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父权制,并没有解决把父权制从资本主义中独立出来加以分析的问题;爱森斯坦的分析在以下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父权制是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男性统治制度,父权制关系的组织是资本的功能。

(二)再生产

什么是再生产?为什么要使用再生产概念?巴雷特把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概括如下:

1. 把再生产与不同社会的生产组织相联系。这类分析的困难在于把生物学再生产和必要的社会条件再生产这两个不同过程混为一谈。

2. 把再生产区分为社会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生物再生产三个方面。这种区分尽管很有用,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理论问题,而且这类分析:第一,有可能堕入功能主义的危险中;第二,它不能进一步说明再生产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3. 家庭妇女的劳动再生产。在家务劳动的争论中,有学者提出,尽

管家务劳动有别于工资劳动,但也是劳动的一种形式,这种在家中进行的不付酬的家务劳动的目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经济方面再生产着每日的劳动力和新一代的劳动力,在意识形态方面再生产着对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这种分析把家庭妇女看作工资劳动者,但没有说明家庭主妇与女工这两个工作领域之间的矛盾。还有学者提出妇女所受的压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功能与产物,由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劳动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劳动私人化,处于社会生产之外,所以“反对资本的斗争就是反对家务劳动,反对家务劳动的斗争就是反对资本”^[6]。巴雷特认为这类分析:第一,把性别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积累不同阶段的资本需求混为一谈;第二,无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仍然存在着妇女压迫;第三,不仅妇女受剥削,工人阶级和妇女都受资本家的剥削;第四,妇女低廉的工资和不重要的工作使得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因此妇女的利益与工人阶级利益完全一致。

4. 妇女低廉的工资劳动。有学者提出,妇女的工资劳动以家庭存在为前提,因其廉价和富有弹性而对资本有利,对资本的好处就是使妇女工资不仅低于其劳动力价值,还低于男性,使得整个工资水平降低。这种分析试图把妇女作为工资工人,把妇女的这一角色与家庭的历史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但这样的分析包含着以下的问题:第一,资本付给妇女工资,为什么又需要付给她们的丈夫更多的工资使他们能够养活他们的妻子?第二,为什么是妇女作为工资工人处于不利地位?

在巴雷特看来,以上关于再生产的分析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把妇女在生物再生产中的角色与她们在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和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再生产中的角色混为一谈;第二,没有解释妇女为什么和怎样被派往去承担这些角色的?第三,试图把社会再生产和父权制再生产结合起来分析,但对社会再生产与男性统治的分析是相矛盾的。



(三) 意识形态

“近年来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摆脱上述僵局的途径”^[7]。巴雷特重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研究,强调意识形态对于父权制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作用,她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概括如下:

1. 把意识形态看作生活经验。反对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统治阶级对现实的歪曲和操纵,也反对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经济基础的机械反映,主张意识形态相对独立于经济,是个人的生活经验,代表个人与他们真实的生活条件之间关系的一种想象。

2. 家庭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应该关注妇女的家务劳动、妇女低微的收入和毫无保障的生活环境,还要关注对妇女受压迫产生一定作用的家庭意识形态。瓦丽·塞科姆(Wally Secombe)在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家庭主妇女与她的劳动”(1973)一文中提出,妇女的家务劳动满足了两个根本需要:一是劳动力代际更替的经济需要,另一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

3. 探讨意识形态对于构建性别化主体的作用:一方面,着重探讨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对文化生产中性别差异的再表现进行分析。

4. 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再表现的实践。以罗斯·科沃德和约翰·艾利斯(Rosalind Coward and John Ellis)合著的《语言与唯物主义》为代表,主张意识形态参与了个人的构造,使个人把权力关系当作自然的东西加以接受;主张把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三种实践结合起来;既反对强烈的经济决定论形式(经济决定论意味着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作用比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作用更重要),也反对经济 and 意识形态之间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认为必须研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

巴雷特认为父权制、再生产与意识形态三个概念对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具有以下的重要作用:第一,有利于解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关心的问题;第二,这些概念反映了争论中的几个主要问

题,尤其是父权制和再生产的概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矛盾,尽管努力加以协调,也不容易解决;第三,对于说明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讨论在两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是性/阶级二分法的起源;其次,通过发展意识形态理论加以超越^[8]。基于这三个概念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关系的探讨,巴雷特全面地探讨了妇女受压迫的问题:一方面,她探讨了家庭户的经济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意识形态、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教育体制与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她也探讨了妇女与男性被表达为不同性别文化过程,包括性行为与性别认同、性行为与生物再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意识形态对于性别建构

(一)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是被社会建构的

“个人的是政治的”、“性政治”这些在妇女运动中提出的口号,表明性关系是政治的、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巴雷特通过对性(sex)与性别(gender)、性别与性行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被建构的形式、性实践的形式及其与资本主义社会组成之间的区分,论证如何把性建构成性别的。

第一,性行为与性别认同的区分。性别研究通常是社会化研究的领域与课题,对于性别社会化,有人把它看作是一个人在童年性格形成时期,在家庭养育和学校教育等方面形成的重要社会经历,有人把它看作是青少年和成年时期产生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过程。巴雷特认为,这些研究的不足在于很少研究性行为及其与社会性别认同的关系。有异性装扮癖的人和男性性受虐狂的存在以及性学专家金赛关于同性恋的调查报告,都对性行为导致性别认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在性行为与性别认同的关系中,性行为并不导致性别认同。

第二,性别认同与性实践的区分。反对把男性性别、女性性别与异性恋性征的自然倾向直接联系起来,反对把社会建构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认同与他们想象的性行为的结果直接联系起来。毫无疑问,在男子气与女子气确立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家庭和意识形态的过程决



定了性爱的恰当形式的倾向^[9]。

第三,性行为与生育的区分。认为性行为是为了生物学再生产,反映了通过社会建立起来的对男性与女性性实践的不同要求。历史中非生育的性行为曾经因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被禁止,双重标准(如对于女性与男性的通奸,前者受的处罚大或只有前者会受到处罚)的确立以及强调性行为与生育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了关于性行为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女性比男性施加过多的要求。

尽管男性与女性在人类再生产过程中的角色构成了他们之间决定性的区别,但基于生物学的性别区分无法提供把性别认同、性实践与生育分开的理由。尽管生育的异性性行为为所有性行为提供了特定的自然基础,但随着生育技术的发展,妇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妇女对养育孩子的责任等方面,生物学的差异越来越小。强调妇女与生育的联系,是要使妇女承担对孩子的养育责任,并把她们从性愉悦中分离出来。

(二)性别意识形态的生产

巴雷特认为,在使用意识形态作为分析概念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0]:首先,必须对意识形态进行界定,包括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relative autonomy)问题,包括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其次,把意识形态限定在精神现象(如意识、动机、情感)而不是物质现象中,意识形态过程与意识、动机与情感等有关,巴雷特认为属于意义(meaning)范畴;再次,意识形态与生产关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巴雷特通过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探讨,说明性别意识形态与劳动分工、生产关系的密不可分:一方面,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形成与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性别劳动分工以及随之产生的意识形态又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中;一方面,意识形态在生产关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生产关系这一术语不仅指阶级关系,还包括性别与种族分工等,在生产关系中,性别意识形态具有重大的作用。巴雷特认为,把工资劳动关系、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这一观点是性别盲的和脱离性别的^[11]。

巴雷特以文学生产方式为例,试图说明作为文化生产的性别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按照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观点,性别意识形态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一般生产方式;(2)文学生产方式;(3)一般意识形态;(4)作者的意识形态;(5)审美的意识形态;(6)文本^[12]。任何文本的产生都受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物质条件、特定的文学表现的限制,文学生产关系也是由生产力和分配、交换与消费的生产关系构成的。

在巴雷特看来,沃尔夫(Virginia Woolf)的小说《只有一个人的房间》的论据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但她的唯物主义观点忽视了唯物主义美学的价值问题^[13]。按照沃尔夫的观点,写作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这些物质条件决定了作者的视角、对社会的看法,还影响了作者写作的风格、格调与体裁等;男女两性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女性的文学生产手段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比如女性相对贫穷、缺乏训练、容易被打扰、社会贬低妇女作品的文学批评态度,这一切对女性文学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不仅迫使妇女作者采用男性化名以使她们的著作得以出版和获得中肯的评价,还产生了妇女作品中过分的攻击或防御风格。在巴雷特看来,沃尔夫没有从性别意识形态的角度说明文本消费与接受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到对妇女文学成就的不同评价态度:一是妇女取得的成就没有男性那么大,是因为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她们的工作受到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是妇女在美学价值方面取得的成就的确与男性平分秋色,妇女的成就之所以被贬低,主要是因为具有男性性别歧视的批判学术机构的扭曲和有偏见的反映^[14]。

作品中的性别表现并不与男女性别差异具有同等的联系,性别想象在其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品表现的问题涉及到对它的解释问题,作品之间的区别不仅取决于其文本的不同,还在于人们对它们的不同解释。所以,第一,我们不能假定文本具有特定的意义,而取决于人们怎么去读它;第二,关于作者意图的问题,女性作者倾向于提出性别和妇女受压迫问题,男性作者认为女性提出的性别歧视一定是她们自己的问题^[15]。巴雷特还借助于刻板印象(stereotyping)、补偿(compensation)、幻觉(collusion)与恢复(recuperation)等途径分析性别意识形态

的再生产过程:刻板印象充斥于广告和孩子的读物中,在其中,妇女角色几乎都是与家庭联系在一起,表现了比实际存在的性别差异更加刻板的性别劳动分工;补偿的范畴涉及到想象与观念的再现,从而来提升女性气质的道德价值,历史上表现为将妇女浪漫化的倾向;幻象表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妇女同意他人对她们统治与人格物化,一是妇女自愿接受她们被压迫的地位;恢复的途径涉及意识形态的效果,不再能够挑战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义。

巴雷特通过性别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途径的探讨,进一步探讨了文化生产的潜在政治意义,也就是文化革命是否可行的问题:第一,由于意识形态离不开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条件,所以不能指望单独由文化来解放妇女;第二,由于作者的目的与被接受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女性主义艺术家不能预料和控制其工作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尽管如此,可以在文化方面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问题,包括两性之间的差异、分工、压迫、不平等、妇女地位普遍低下;二是提高意识、转变我们的主观观念。总之在这些方面,文化实践将起决定性的作用^[16]。

三、教育体制:性别意识形态的生产途径

教育在性别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现有的关于教育体制的分析只集中于阶级问题,把性别问题排除在外,更没有分析性别与阶级的关系问题。

(一)关于性别与阶级的关系

巴雷特把性别与阶级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概括为以下几种:

第一,性别不是阶级关系的独立因素,而是完全融合在阶级关系中。其主要观点是: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作阶级构成的基本单位,具有社会分层的特征,把家庭所有成员纳入到阶级结构分析的实体中,家庭所有成员的阶级地位取决于家庭中的家长(通常是男性)。这样的分析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没有考虑家庭内部的利益冲突、妇女自身的职业

地位、妇女就业与家庭工作之间的关系程度等问题。

第二,性别分工成为独立于阶级分工的压迫体制。这类论述通常包含在对父权制概念的分析中:(1)主张性别分工先于阶级分工的分析方法,如费尔斯通关于男女之间的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2)父权制是被看成独立于阶级结构,但又通过类似阶级结构的机制起作用,这种观点有各种表现形式:主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两个独立的结构,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时存在;主张具有自身剥削机制的家内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存在;主张妇女事实上构成了可辨认的社会阶级。

第三,关于男女之间职业、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妇女工资所得低于男性,妇女处于职业等级的低层:(1)这种状况不仅是性别差距的问题,而且是与阶级不平等密切相关的问题,性别与阶级是职业不平等中日积月累的因素^[17],性别不平等与阶级不平等相互加强;(2)性别与阶级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对职业与收入不平等的经验数据统计的量化得以解决,因为量化的经验数据统计没有提供理论上分析性别、阶级与种族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第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试图从理论上把性别分工与阶级结构的论述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1)妇女所受的压迫因阶级不同具有很大差异,不能笼统地说不同阶级妇女所受的压迫都是资本的功能,不能仅从资本的角度来理解妇女的屈从地位;(2)资本家和男性在压迫妇女问题上利益一致这一论断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资本家阶级中包括男性和女性;(3)妇女所受的压迫在于妇女作为工资劳动者与家务劳动者的双重角色之间的矛盾;(4)必须区分妇女与工资劳动的直接关系与妇女依赖于男性工资之间的间接关系。

通过以上关于性别与阶级关系观点的回顾,巴雷特提出,必须从历史角度分析性别与阶级问题:一方面,必须考虑资本主义对性别劳动分工产生的重大影响,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使得妇女过多承担家务劳动的责任,经济上依赖男性,这双重关系决定了妇女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性别分工并不全是资本主义的现象,它的一些因素先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存在。

(二) 妇女与阶级结构具有双重关系

妇女对男性的依赖、对家务劳动与养育孩子的责任,使妇女工资劳动与阶级结构关系受到重要影响。不同阶级妇女所受影响及程度不同。对于工人阶级妇女来说,作为工资劳动力受资本的直接剥削,作为对男性工资的依赖而受间接剥削;对于资产阶级妇女来说,占有资本却缺少对资本的控制^[18]。妇女的这种双重特征体现在对劳动力进行阶级和性别划分的教育和培训过程中,在巴雷特看来,这些过程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校园文化对于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界定和建构。比如教材中关于性别刻板模式的想象;在实际教育中,通常要求女孩为男孩做如卫生清洁等家务服务工作,鼓励女孩比男孩更加顺从;校园文化使孩子们意识到性别关系的重要性,使他们习得成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通过教育体制的这些过程实现了普遍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灌输。

第二,性别是教育体制中最主要的一个组织范畴。学校里的各类职务、工资收入与科目都是按性别划分的。通常男性在学校中占有较高位置,中学校长通常是由男性担任,男性工资普遍高于女性,教师所教科目的性别刻板印象影响了男孩与女孩的科目选择。总之,性别刻板模式成为学校的明显标志。由于学生必须每天面对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划分,学生逐渐地表现出性别差异。教育体制的结构与组织具有的性别劳动分工特征类似于家庭中的性别劳动分工。

第三,教育体制通过一定的机制把学生纳入到性别劳动分工过程中:(1)性别化的课程设置。规定女孩选择如刺绣、烹饪等与她将来承担的家务角色相关的课程,男孩应该选择如木工活、金属加工等课程。(2)职业选择。课程选择在男生与女生从事的职业及职业提升中起了很大作用。(3)职业培训。有统计数据表明,男性接受培训比女性普遍、时间比女性长,只是接受成人教育的培训女性多于男性,因为女性在其早期阶段丧失了一些机会。

第四,“合法知识”的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知识并不是中立的、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建构起来的观点,女性主义对合法知识从多角

度进行了批评:知识不是独立产生的,而是产生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环境中;性别劳动分工包含在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中,并公开包含性别歧视;把理性、知识等同于男性气质,把逻辑的、科学的、理性的、技术的、数学计算与男性气相连,把文学的、感性的、洞察等与女子气相连,意识形态之间的截然对立依稀可见;在对知识的界定中,断定知识是相对的相对主义是妇女研究领域扩展过程的重要因素。巴雷特也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所有分析或知识都应该考虑性别,但认为通过探寻妇女研究的新领域却有危险,因为妇女研究通常具有不重要的、描述的作用,(现有的)全部课程不会因此而被怀疑^[19]。

巴雷特通过性别劳动力再生产与教育体制关系的梳理,探讨了教育体制对于性别分工与阶级分工的作用,这种探讨集中于妇女与阶级结构之间的双重关系,这种双重性在于妇女作为工资劳动者受资本直接剥削,妇女依赖于挣钱养家的男性而受到间接剥削。

四、性别与劳动分工、家庭

工作中的男女分工、家庭中的男女分工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构成了性别劳动分工的重要因素。巴雷特认为,工资工作中的男女分工是性别劳动分工的关键因素,家庭中的分工是妇女受压迫的核心因素。巴雷特主要通过与生产相联系的劳动分工以及家庭分工(包括家庭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探讨了性别劳动分工对妇女产生的影响。

(一) 妇女工资劳动的特征

男女在工资领域的分工构成了性别劳动分工的主要因素。在工资劳动中,男女工人受到了区别对待,无论在劳动的纵向分工,还是劳动的横向分工中,女性在工资、工作条件及工作类型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女性工资所得少于男性,大量统计数据都表明了这点,比如英国 1978 年的工资情况是:妇女的小时工资是男性的 73.9%,周工资是男性的 64.8%,1974 年妇女失业率是男性的 3 倍;工作类型相对地位较低,妇女所从事的工作范畴大多是护理或服务性的女子气的工作,是家

务工作的延伸;由于妇女承担照料孩子的责任,妇女卷入了受严重剥削的兼职工作范围中,对其工资与安全保障不利;工作不稳定,由于妇女被认为充当雇佣劳动军,在经济衰退期极易被解雇^[20]。由家庭男户主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这一家庭构成形式,阻碍了妇女对平等工资和平等工作权利的要求。这一切通过教育和培训得以不断强化,教育和培训不仅再生产着男女在工资劳动方面的劳动分工,还反映和加强了男女在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大众媒介每日生产和再生产性别分工的刻板定义。

尽管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是由资本积聚的经济需要产生的,但它采取的形式包含了意识形态分工,男女之间的分工是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分工^[21]。性别劳动分工是由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逻辑决定的,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的两个原则的基础上:一是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产生了大规模的工资劳动制度;一是资本家对劳动力进行划分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两个原则不仅是资本积聚的必要前提,还对妇女工人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按技术将劳动力区分对妇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它本身并不决定妇女的工资水平。巴雷特的分析集中在关于技术问题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组织与工人阶级分工的联系上:第一,技术知识经常用于提供对个人合法的控制与权威,通过培训或专业等形式来实现,培训其实与效率、生产率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为了表现对其他工人的优越性,具有医学专业的医生可以合法地控制妇女是否应该堕胎,这一切通过技术使控制合法化了;第二,因为获得技术在工资谈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发展了许多做法来保护特殊群体的有利地位,比如通过高度控制培训与招募使得技术难以得到,使得某些特殊群体拥有特权,包括妇女在内的一些群体被排除在技术工作之外;第三,技术意识形态维度涉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脑力劳动者通常被认为更有技术,而大量的职员工作是由妇女承担的。总之,技术问题是理解如何把性别合并到劳动分工中的核心^[22]。

(二) 家庭意识形态

家庭经济组织与家庭意识形态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巴雷特从家庭组织的结构、家庭与经济生产体制的关系以及家庭意识形态等方面继续探讨妇女所受的压迫:

1. 关于家庭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家庭意识形态通过性别社会化的过程得以形成,这些过程包括:性别认同的内化与性别意识的精心组织;把妇女与家庭生活、怀孕,男性与挣钱养家、责任联系在一起;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建构;鼓励异性恋倾向。正是通过家庭意识形态的过程,再生产着性别认同及其意义^[23]。

2. 把家庭作为一种物质制度。妇女主要承担与家务劳动、孩子相关的任务,即使在家外工作时也是如此,家庭中的这类工作被认为是妇女的工作。这种关于工作及责任的区分使得妇女经济上依赖男性,这种依赖程度因阶级不同而不同。总之家庭内的劳动分工以及妇女对男性的依赖源于家庭内部的物质利益冲突^[24]。

3. “家户-家庭”系统对妇女的影响。家户结构与家庭意识形态构成了一种被称为“家户-家庭”系统,对妇女所受压迫、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产生重大影响^[25]: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家户-家庭”系统不仅构成了妇女受压迫的中心场所,而且构成了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原则;第二,“家户-家庭”系统不仅构成了性别差异和妇女受压迫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且构成了男女参与工资劳动和阶级结构的物质关系;第三,“家户-家庭”系统为劳动力再生产、个人生活维持的连续性提供了唯一有效的机制。沃特斯把“家户-家庭”系统对于资本主义所起的作用概括为:妇女和孩子必须依赖男性的工资,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中的男人会减少从事抗议或从事反叛行动的可能性;它为那些终日承受着雇佣劳动所带来的疲惫的男人,提供了一个表面上的温馨港湾;它通过产生新的工人,并对他们实行社会化,从而再生产了男性劳动力;面对社会剧变,它提供了连续性;它为尽最大可能扩充商品消费提供了一个场所。总之,“家户-家庭”系统有助于维持再生产,保障政治稳定,扩充经济需求,以及促进由意识形态所诱发的顺从,从而阻碍了工人阶级中男人和妇女的革命联合,有助于维持资本

主义及资产阶级支配^[26]。

“如果当代资本主义的家户－家庭系统对妇女是一种压迫并引起工人阶级的分裂,那么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谁从中得益了、它如何维持以及为什么得以维持”^[27]。巴雷特认为,谁从家户－家庭制度中得益的问题是一个难以回答、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家户－家庭系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得以维持的有很多原因,包括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工资劳动制度以及随之产生的把家庭看作满足自然情感与物质需要的自然场所的意识形态。巴雷特认为由妇女承担儿童照管的工作与责任是一个关键原因,“我认为,得出以下结论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妇女解放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重新分配儿童照管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工资劳动领域性别分工的削弱没有结束妇女受压迫的原因”^[28]。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儿童照管分配作为性别劳动分工的一部分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组织也是围绕这点而精心安排的,所以当今改变儿童照管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成功。

巴雷特借助于父权制、再生产与意识形态等概念框架,通过具体的教育体制、性别劳动分工、家庭以及国家对于妇女受压迫影响的探讨,强调了意识形态在妇女受压迫的建构与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她并不认为妇女受压迫只发生在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而且也认为不能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关系分开来讨论。对于妇女解放是否可能的问题,巴雷特分别比较了女性解放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确为妇女地位的改善提供了条件,如近代以来妇女相继获得了投票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但还不够,妇女解放还要求:重新分配劳动与儿童照管的责任,废除女性对男性工资的依赖,转变性别意识形态,这一切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在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也是比较难以实现的;但就像我们无法想象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妇女解放,我们也无法想象其平等、自由和尊严的原则因为性别不公正而削弱的社会主义^[29]。

扬:

“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

艾里斯·扬(Iris Marion Young, 1949—2006), 自 2000 年以来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在此之前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与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工学院工作, 研究领域包括: 公正理论、民主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等。主要著作有:《公正与差异政治》(1990)、《相交的声音: 性别、政治哲学与政策的困境》(1997)、《包容与民主》(2000)、《论女性身体的经验》(2004)。

如何解释妇女所受的压迫? 扬不满意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也不满意于激进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也不满意于米切尔和哈特曼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结合的二元制理论(又叫双系统理论)。扬在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二元制理论的局限”(1980 年)和“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 年)^[30]中表达了她的单系统理论的观点。

一、对二元制理论(dual systems theory)的批判

扬把认为妇女受压迫源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理论称作双系统理论或叫二元制理论, 这些理论家分别从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经济制

度和性/社会性别制度、物质商品生产和性/情感生产等方面阐释妇女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概念框架。琳达·菲尔普斯(Linda Phelps)指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构成妇女受压迫的两种不同制度,父权制是指一种男性拥有对女性权威的社会关系制度,用来描述男性具有对女性权威关系的体系;资本主义是指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制度。这两种不同制度构成了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爱森斯坦认为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制度。盖尔·卢宾不满意于用父权制和再生产方式来说明男性统治的体系,提出了性/社会性别体系的概念,性/社会性别体系是一套不同于经济制度,而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动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在弗格森那里,性/情感生产是与物质商品生产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另一种特殊类型的生产。在现代核心家庭,男人通过无偿占有性/情感生产来剥削妇女,妇女构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特有阶级。

二元制理论尽管从不同的概念与构架出发解释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它们却具有以下共同之处:第一,建构了独立领域模型。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看作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罗萨林德·佩特切斯基(Rosalind Petchesky)认为,这种模型采用使家庭脱离经济的形式,并且将父权制关系限于家庭内部,这样,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分别作用于家庭内与家庭外、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中。第二,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分别作用于不同的系统。男性统治、性别压迫作用于父权制系统中,阶级压迫、妇女工作的异化等作用于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中。第三,从心理或物质角度探讨父权制的起源与结构。二元制理论家形成了关于父权制的不同观点:一是强调父权制的意识和心理结构方面的影响,以米切尔的观点为代表;一是强调父权制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与社会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物质关系制度,以哈特曼的观点为代表。

尽管如此,二元制理论强调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作为两个独立的压迫模式而起作用,这在把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结合起来的努力中是关键性的理论发展,在理论、分析、实践方面推进了“如何解决妇女问题”、“如何复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研究;但是由于只是把马克

思主义理论嫁接在性别关系理论中,在理论视野与实践策略方面却倒退了:第一,强调父权制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忽视了妇女在家庭以外所受的压迫,无法说明妇女在当今工作场所受到的特殊压迫;第二,强调父权制的特点与起作用的方式,是为了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倾向于把妇女受压迫问题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的一种单纯的补充”;第三,当不偏不倚地强调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两重因素的时候,导致的是把性别关系和性别压迫的理论让位给马克思主义,“通过把说明妇女状况的基本任务转让给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二元制理论自己也完结了,这种家长制理论提供了妇女受压迫的形式,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变化的内容、特征、区别的动力。因此,二元制理论不能削弱传统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把对历史上物质社会关系的理论统治权统统让给了这种马克思主义”^[31]。

对二元制理论家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简单结合,扬表示不满,“只要女权主义者还愿意把劳动活动中产生的物质社会关系理论让位给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婚姻就不可能是幸福的”。扬认为,妇女状况并不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具有独特的结构、运动和历史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女权主义应当接收马克思主义并把它改造成这样一种理论,而不是嫁给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当发展一种把特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物质社会关系看成一种制度的有机的分析构架:在这种制度下,性别差异是一种基本属性”^[32];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女性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合成,而是彻底的女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必须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一种总体的社会理论,不只是关于妇女状况的理论。把性别差异作为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和中心;在说明社会构成时,不仅要把性别平等、性别等级和统治、性别关系中的文化和性别意识形态作为主要方面进行考虑,而且还要把这些与社会构成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虑;探寻阶级统治与父权统治之间相联系的假设,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以及有着怎样的联系。

第二,一种真正的唯物主义理论。这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社会现象缩减为经济现象,褊狭地理解商品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一方面要关注

“意识”现象如知识生产、社会态度和信仰、文化神话、符号等；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们缩减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也不能把它们看作是没有自身逻辑的。必须用一种核心理论来探讨社会性别关系与其他关系的相互作用。

第三，必须是历史的。这种理论必须重视和清楚地说明关于性别关系的现状、结构和经历，以及其在不同时代和地区或同一时期存在着哪些差异。

二、性别劳动分工：女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扬提出，作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范畴的阶级是一个性别盲的概念，不能揭示妇女状况，无法用来分析性别与性别等级，无助于分析妇女所受的特殊压迫。而与阶级范畴相比，分工范畴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分工是一个比阶级范畴更具体、范围更大的范畴。阶级分析的目标在于把生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聚集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分配方式；劳动分工描绘社会成员之间根据他们在劳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所进行的结构分配，并且评估这些分配在经济和统治关系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起作用的情况下的结果，关注的是社会中从事生产的个人。

第二，分工能比阶级更好地分析统治关系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明显存在。阶级分析只需要对资产者和无产者各自的角色做一般的讨论，而劳动分工分析则要求详细讨论：谁发出命令、谁执行命令；谁工作有刺激性、谁工作繁重乏味；谁的轮班如意、谁的轮班不如意；谁的报酬多、谁的报酬少。因此与阶级分析相比，劳动分工分析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妇女通常服从命令、从事乏味的工作并得到较低的收入，而男子则通常发布命令、从事有刺激性的工作并得到较高的报酬^[33]。

第三，关于分工的分析既不是从阶级分析中引申出来的，也不会变成阶级分析。

在社会分工中，性别分工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性别分工范畴的使用为分析整个社会劳动活动中沿性别轴线产生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方

法”。为此必须分析有关性别分工的以下问题:特定社会形态中性别分工的主要方式是什么?所指定的性别的工作任务的自然和社会意义是什么?性别分工是如何支撑经济组织其他方面的?它又是如何支撑社会的权力和统治,包括性别等级关系的?性别分工同两性关系与亲属关系组织是怎样联系起来的?特定结构的性别分工产生和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性别分工的变化如何导致男女关系、其他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34]

与二元制理论相比,性别分工具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第一,它使性关系和妇女地位处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中心;

第二,提供了一种把性关系看作生产关系的主要方面的方法;

第三,对性别分工的分析也可以说明妇女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从属地位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性别分工有助于说明男女对劳动资料的这种不同的接近和控制,因而也有助于说明男人统治机构是怎样产生、维持和变化的”^[35];

第四,对性别分工的分析允许特别对性别方面的社会劳动关系进行有形的分析;

第五,不仅能够考虑妇女状况的特殊变化,而且能更好地说明这种变化。

总之,通过性别分工这一范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可以看到阶级、统治、生产和分配关系,另一方面又能看到同一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妇女受压迫的现象,有利于说明妇女的整体地位,包括妇女在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地位、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角色以及在生产中的角色。

三、资本主义就是父权制

在扬看来,哈特曼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所受的压迫是综合性的解释毋庸置疑,但问题是如何解释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受的特殊压迫。哈特曼认为妇女受压迫存在于父权制结构和动因的独立形态中;艾伦瑞奇和英格丽希(English)认为男人统治和妇女的特殊处境是



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在这些理论家那里,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成为妇女受压迫的两种独立的制度。

父权制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就已经存在,但并不能证明男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地位根源于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关的社会关系结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不可分离,我们必须要有—种理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来解释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究其本质,它从根本上来说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是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就是依赖性别原则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的处境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和动因起作用的结果。

第一,妇女的边缘化。“我的论点是这样,资本主义最重要和基本的特征就是妇女的边缘化。这个现象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妇女沦为次要劳动力”。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首次把妇女推向经济活动的边缘:妇女不是完全被逐出社会化的经济,而是把妇女作为次要劳动力:(1)维持低工资,使工人易于管理;(2)作为廉价劳动储备之用,如马克思所称的劳动后备军的作用。当新工厂出现时,她们可以被吸收到新的生产领域;当经济萧条时期,她们可以被用来使所有工人的工资和斗争性保持低水平。艾里斯·扬得出结论:“把妇女推向边缘,从而使她们起次要劳动力的作用,是资本主义本质和基本的特性”^[36]。

没有出现相反的例子可以说明妇女劳动边缘化是资本主义结构的外在性质,扬引证经济学家埃斯特·鲍塞罗普(Ester Boserup)《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70)作说明。鲍塞罗普指出,妇女在经济、社会进步中作出了贡献,但以工业发展为导向的发展政策忽视了妇女作为生产者的角色,女性在社会发展中依然处于边缘的或辅助的地位。许多发展不仅忽视了妇女,而且实际上剥夺了她们参与经济领域的机会与能力^[37]。

第二,男性主要、女性次要的性别等级关系。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文化把婚姻看作“经济伙伴关系”,法律允许保留她们自己的财产,妇女不仅参与家庭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还从事工业和商贸活动,在许多工业行会中妇女与男性是平等的,甚至还支配某些男人。资本主义的到来使得夫妻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解体,使得工作场所与家庭分离,

男人作为主要劳动力出现在工作场所,女性被作为次要劳动力被限制在家庭中,“即使有最初的性别差异和以前存在的性别歧视思想,妇女作为二等劳动力在其中起作用的等级制资本主义也是唯一的历史可能性”;“资本主义并不是利用父权制来产生等级关系,而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规定男性主要、女性次要的性别等级关系之上”。

第三,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宣扬妇女的天职就是母亲,妇女根本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妇女的适当活动是养育孩子,给家庭创造安静和舒适的气氛,“规定妇女不工作的妇女思想意识成了妇女边缘化过程的后果和这一过程已经开始的证明”^[38]。

扬试图克服包括哈特曼在内的二元制理论家的缺陷,把性别劳动分工作为她的核心分析范畴,提出资本主义就是父权制的,推进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讨论。但在哈特曼看来,扬的观点可能存在以下问题^[39]:第一,当扬把劳动分工作为分析妇女状况的核心范畴时,如果不能理解劳动分工是怎样发生和为什么会发生,那这一概念就只是一个静止的、描述性的范畴。第二,扬的观点表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父权制的,所以女性主义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也必然反对父权制,两种斗争合而为一。扬的理论框架的政治意义由此产生以下的问题:所有的斗争本身既是反资本主义的、又是反父权制的,这是不真实的,如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与父权制关系战斗,女性主义运动并不对资本主义关系提出挑战。第三,共同的敌人被缩减为白人男性资本家,妇女反对男性,黑人反对白人,但妇女和少数种族男性并不必然反对白人男性。

萨金特主编：

《妇女与革命——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 之间不幸婚姻的讨论》（1981）^[40]

琳达·萨金特 (Lydia Sargent, 1942—, 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 作家、演员) 所编《妇女与革命——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不幸婚姻的讨论》是一本论文集, 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不幸婚姻的讨论与反思。这场讨论源于哈特曼“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 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的论文, 全书由“导言”、“领先的论文”、“争论”、“父权制的扩展”、“重新聚集讨论”、“反驳”等六部分、15 篇论文组成^[41]。

这些论文从理论上聚焦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二, 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关于阶级和父权制的重要观点, 关于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 第三, 论述性别歧视作为一个革命性论题的重要性。它们在实践上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问题: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左派运动中, 激进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性恋、无政府主义、黑人女性主义能否使妇女获得平等? 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组织起来的未来社会中, 妇女能否获得解放?^[42] 具体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动态紧张的根源是什么? 父权制的形式变了, 父权制为什么还会存在? 建立一种怎样的理论与实践来处理种族歧视? 在父权制资本主义

中同性恋的作用是什么?怎样才能理解心理构成及其在使种族歧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永久化中的作用?我们如何对付等级制?男人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些论文的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经历与观点出发,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当下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解释和扩展,加深了人们对当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性别关系的理解。

1.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单系统理论与二元制理论

二元制理论认为,社会是由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制度构成的,这种制度相互分离又紧密相连,每一种制度都有自己的物质基础与动力,两者共同运作形成了妇女状况。扬认为包括哈特曼在内的二元制理论家就是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制度来理解妇女状况,尽管哈特曼也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和女性主义关于性别关系的理论结合起来,但在她的理论框架中,仍然是前者起支配地位。

针对哈特曼的二元制理论,包括扬在内的理论家从不同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出发提出了单系统理论,扬在其“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中提出了性别劳动分工的概念,并指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父权制的;沃格尔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不幸婚姻,尝试分离还是其他?”中提出了社会再生产概念;艾米丽·黑克斯(Emily Hicks)在“文化马克思主义:非同步发展和女性主义实践”^[43]中提出文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同时研究种族、文化和阶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阿兹扎·阿尔希布利(Azizah Al-Hibri)的“资本主义是父权制的一个高级阶级: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女性主义”^[44]指出,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统一起来的理论基础就是男性通过生产与再生产工具对永恒的追求;哈丁的“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真正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提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孪生兄弟的观点,两者都具有统治的特点,并通过育儿实践施加了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

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框架

针对哈特曼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不幸婚姻的问题,克里斯蒂纳·里迪欧夫(Christine Ridiough)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男/女同性恋解放”、格罗丽亚·朱瑟夫(Gloria Joseph)在“不相配的三方: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埃尔利希在“能否拯救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不幸结合”、凯蒂·斯图尔特(Katie Stewart)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结合:在美国文化中男性情谊的意义和男性的排名”、安·弗格森和南希·福尔博瑞(Ann Ferguson and Nancy Folbre)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不幸婚姻”^[45]中提出了不同于哈特曼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的理论框架,把不幸婚姻问题扩展为“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权利”、“父权制、资本主义与种族歧视”、“女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如何经历等级制以及如何理解等级制”、“马克思主义与性/情感生产”^[46]的问题与理论分析框架。

3.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

(1)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女性主义提出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来分析父权制。(2)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为前提,补充意识形态、心理学或文化方面的思考,使它们受到与物质基础同等的对待,或者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的一部分,提出父权制不仅在于控制了妇女的劳动力,而且也体现在心理、人格结构等方面。(3)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对阶级压迫、性别压迫和种族压迫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阶级、性别、种族、心理学、意识形态、文化等所有这些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以发现社会的新动力。

由于篇幅关系,以下仅就哈丁和埃尔利希的观点作一介绍。

哈丁: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真正的物质基础 是什么?” (1981) ^[47]

哈丁(Sandra Harding, 1935—)在美国特拉华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哲学与女性主义理论,性别与科学理论家,研究领域为科学与女性主义。主要著作有:《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1986)、《性与科学调查》(1987,与他人合著)、《谁的科学? 谁的知识》(1991),与他人合编多部著作:《发现现实:女性主义关于知识论、形而上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观点》(1983)、《科学是多文化的? 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与知识论》(1998)等。

哈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性别盲的,而且还是性别歧视的。她批评哈特曼并没有给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哈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了她的论述:第一,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不仅根源于家庭中的性别劳动分工组织,而且根源于一个社会人的生物与心理的诞生;第二,既然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像孪生兄弟关系,妇女就不能期望男性解放她们。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间的不幸婚姻问题,哈丁提出了激进的解决办法。

(一) 两种生产、两种关系

构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是什么? 在哈丁看来,马克思

主义的解释框架是性别盲的,没有提供家庭内部、与资本主义具有偶然联系的劳动分工的经济方面;而且它是还是性别歧视的,诸如阶级和物质基础等经济范畴甚至不是理解家庭生活的主要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的合适范畴,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范畴不仅是性别歧视的,而且是阶级歧视的,这些范畴只对阶级压迫的部分物质基础感兴趣^[48]。早期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家庭内部的经济关系;哈特曼关注家庭内部、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并提出家庭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维持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于家庭性别劳动分工的经济方面,在于男性通过各种途径控制妇女的家务劳动,资本与男性都从妇女的家务劳动中受益。哈特曼的观点建立在她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扩展与改造上,她把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扩展为包括男性在家庭中通过经济和思想意识控制妇女的劳动,从关注家庭内部的经济关系转向家庭内部与工作场所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和哈特曼等人都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哈丁对此都不满意。她指出研究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真正物质基础不应局限于经济关系,必须考虑除经济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在经济关系以外的所有其他关系中,探寻构成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哈丁分析了两类生产:一类是在工作场所进行的物质产品生产,包括衣、食、住、行等在内的物质生存资料的生产,其产品的本质决定于其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一类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人种的生产,在这类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家庭中性别分工的社会关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那这类产品(即社会成人, the social person)的本质是什么?

哈丁注意到物质生存资料的生产与种的生产之间在关键方面是不同的,生存资料的生产对其自身生产过程不负责任,也不会对生产过程产生意识与否的问题,不必去理解自身的产生,也不必去经历它们;而种的生产的产物是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必然经历从婴儿成长为社会成人的过程,他们对他们的生产过程、对他们最终应该成为什么产品都有一个了解,事实上,他们对他们自身生产的经历有助于他们形成他们

将要成为的人的类型^[49]。这两类生产具有如此重要的区别,可事实上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人们总是容易忽略或轻视事物与人之间的不同;第二,在个人的记忆和我们对社会生活的叙述中,总是压制了婴幼儿的经历或婴幼儿对性别劳动分工的看法;第三,性别劳动分工的主要方面似乎较少历史和跨文化的变化,从中产生的性别体制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由于妇女照料婴儿、妇女价值通常被低估的现象,似乎也成为自然而然的現象而不是文化现象。

在哈丁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霍克海默专门探讨了家庭在生产满足专制的社会制度人格中的作用^[50],但他们主要关注男孩与其父亲的关系,很少关注婴儿与其照料者母亲的关系^[51],正是在这一方面哈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二)以育儿模式为基础的性别劳动分工

哈丁认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不仅根植于家庭中性别劳动分工的经济方面,它还根植于社会成人的生物成长和心理成长过程。根据乔多萝(Nancy Chodorow)和简·弗莱克斯(Jane Flax)的观点,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物成长,是人生中的一个短暂事件,相对不受社会变化的影响;一是心理成长,受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婴儿经历了从生物婴儿向社会成人转化的过程,这一转化过程及其产生的社会关系对婴儿成为怎样的人有着重大的影响。婴儿向社会成人转变的过程,也是性别化的社会个人(gendered social individuals)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说,婴儿照料这一社会结构产生了性别化的社会动物,它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52]:

第一,从过去直到现在所有的劳动组织都把妇女作为婴儿的最初照料者。新生婴儿没有性别之分,他们不能把自己与他们的照料者相区分,慢慢地才了解到他们是有愿望和需要的社会个体,从而与他们的照料者相分离甚至相冲突。当他们进入到理性年龄时,与其母亲照料者相分离后,不易受到伤害和不再无助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明确的性别区分:妇女唯一的工作就是婴儿的最初照料者,男性是作为他们世界中有重大意义的人出现的。



第二,性别价值并不中立,妇女价值比男性价值低得多。因为男婴与女婴的区别照料,以及男孩发现他们会成为男人、女孩发现她们会成为女人的成长经历,形成妇女的低下地位,表现为妇女的自我贬低和被他人贬低两方面。男孩与女孩在成长为成人的过程中受性别体制的深刻影响,使得她们形成不同的性别角色以及刻板的男性性格与女性性格。在思想和身体、文化和自然、高价值的自我和被贬低的他人的区分中,男性代表了前者,女性代表了后者。通过家庭中的心理成长以及性别劳动分工,男婴儿成长为理性的男人,不仅需要控制他人,而且还需要控制自身的感情、自身的身体、他人的身体,总之要控制自然^[53]。

哈丁注重对以性别为基础的性格理论所产生的物质历史条件,包括真实的性别劳动分工、婴儿与它的环境所产生的身体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考察,并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性别性格理论为基础,可以构建一种更强有力的理论来说明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说明种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物质条件对生存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物质条件的限制方面起了怎样重要的作用。之所以需要维持刻板的、两性化的男性性格特征与女性性格特征,一是出于资本家和男性经济利益的需要,一是婴儿经历的性别劳动分工及这种劳动的产品使男性产生了统治他人的心理需要,并使得这种统治显得自然而然。

(三)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孪生兄弟关系

哈丁继承了哈特曼的关于男性性别特征与资本主义主导价值一致的观点,并通过婴儿期经历的性别分工来分析这种一致。如果基于性别的性格区别源于我们前理性的婴儿期经历,这些性格区别既再生产和维持着性别歧视,又再生产和维持着阶级歧视;那么,正是婴儿期的性别分工经历,产生着激进女性主义描述的男性特征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54]。

在社会这个统一体中,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伙伴关系,而是孪生兄弟关系,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基因、拥有相同的心理利益来维持对其他人的统治。哈丁认为这种关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主张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解决了刻板的男性性格特征和资本主义期望的性格特征之间为什么会有奇怪一致的难题。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心理学理论强调心理发展如何随着历史的、物质的、社会的性别劳动分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而这些关系本身又受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这种观点避免了非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心理学理论,避免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对把社会生活的原因归于婴儿期经历(也叫弗洛伊德理论^[55])的批评。

第三,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婴儿期经历的性别劳动分工发生了哪些变化? 婴儿与其 3 岁以后所处的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不同人格形成的? 不同性别性格表达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四,引导我们重视创造和参与新型的政治实践。引起人们对新的政治实践重要性的关注,只有废除了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精心组织起来的等级关系,性别劳动分工才会结束。

哈丁提出了女性主义运动必须处理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即男人在政治革命中具有怎样的作用? 既然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是孪生兄弟关系,它们必然会采取各种方式使妇女受压迫关系永恒化。只要在现有的性别劳动分工下,刻板的男性性格和女性性格就会被生产和再生产着,妇女就不可能期望男性会把她们从阶级和性别压迫中解放出来。所以,妇女既要领导反对父权制的斗争,也要领导反对所有其他压迫形式的斗争。

埃尔利希：

“能否拯救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 不幸婚姻？” (1981) ^[56]

卡罗尔·埃尔利希(Carol Ehrlich)著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女性主义》(1979),与他人合编《重新发现无政府: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思考什么——当代无政府主义者著作选集》。

埃尔利希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婚姻中,如果两者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了要把阶级、种族、性别、年龄、性倾向等各种因素整合起来加以解释,女性主义者必须把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hip)看作是所有制度化不平等的根源,把权力关系固有的强制与等级制特征看作是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关键,从而打破各种形式的集权等级制组织。埃尔利希主张必须把社会无政府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结合起来,采纳无政府主义立场,形成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

(一)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几种可能的结合

在埃尔利希看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中发展一种女性主义分析。她们通过对父权制的考察发现,父权制存在于从过去直到现在的不同社会。社会主义国

家在经济与社会平等方面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着对妇女的压迫。如何解释以下现象:“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很少有妇女能对重大事项作出重大决策?是谁在做家务活儿?为什么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会遭到镇压?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社会化成长还依照性别角色模式吗?在所有职业中妇女能否得到平等的待遇?她们的工资能和男人的相比吗?妇女在性和生育方面有多大的自由选择权……这一切又是由谁来决定——是妇女还是主要由男性领导者决定……总之,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父权制社会,那么,原因何在?”^[57]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答案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以下困境:要么马克思主义者对妇女问题的分析是错误的,要么是不完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只关注妇女受资本的剥削,没有考虑妇女受男性的压迫;而女性主义理论本质上是非历史的,只关注妇女状况的心理方面而不是物质方面。哈特曼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都是不完整的理论,他们通过扩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整合在一起,试图建立一种综合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妇女状况。

埃尔利希认为,自哈特曼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出现了以下几种结合模式^[58]:第一,女性主义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结合,实际上,她甚至都怀疑结合曾经发生过;第二,两者经过双方同意结合了,但由于怀着不同的期望和政治设想,不久就发现他们并不相配;第三,马克思主义甚至都不知道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存在着严重问题,认为女性主义嫁给他这么一个强大的伙伴应该是幸福的;第四,哈特曼提出,两者的确出于双方自愿结合了,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意识到对女性主义的支配地位而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哈特曼在平等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婚姻的努力,主要朝向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女性主义。在埃尔利希看来,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模式都不成功。埃尔利希认为可以探索一种成功的结合模式,因为她认为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有着幸福婚姻的重要物质利益基础,两者互相需要,只有两者的平等结合才能达到最大利益。

(二) 无政府主义和女性主义^[59]

在埃尔利希看来,无论女性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不能说明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复杂性。妇女作为妇女,属于不同的阶级、种族、民族,具有不同的年龄与性倾向,生活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及文化中,妇女之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别,与男性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区别。为了解释妇女状况的复杂性,也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缺陷,埃尔利希提出了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它是社会无政府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的综合,吸收了各自的优点,克服了各自的缺点。

无政府主义观点包括以下主张:

第一,社会无政府主义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期望铲除由少数人拥有的财富与资源,变为由所有人平等享有,通过最佳途径达到没有阶级、人人自由的目标。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手段和目的必须一致。为了自由与平等的基本目标,必须建构庞大的社会制度,还必须建构多种形式的组织。

第二,国家社会主义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尽管国家社会主义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国家的存在以等级制为必要条件,是以它所统治的人继续处于屈从地位为前提。当然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会消灭国家,在目前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消灭的迹象。

第三,社会无政府主义更加依赖人民当下的行动,以创造一个无论物质角度还是心理角度都没有权力关系的社会。

第四,无政府主义者把物质与心理看成相互关联不可分离的,物质条件有助于建立特殊的性格建构,而性格建构又有助于重建特殊的物质条件^[60]。

无政府主义的局限在于忽略了父权制是作为权力关系的一种形式,但是其基本范畴不是性别盲的,所以它与女性主义的结合比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更相配^[61]。

激进女性主义的优点也成了它的缺点^[62]：

第一，主要聚焦于男性群体支配妇女群体的权力，而没有聚焦于权力的各种其他表现；聚焦于父权制作为压迫的基本形式，因而不能充分地说明妇女所遭受的各种其他压迫。

第二，过分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忽视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第三，主张通过建立觉悟小组等形式展开实践，以结束权力关系，形成了对权力关系的狭隘看法。

第四，没有把国家本身看作是压迫的，实际上，由男性发展和统治的父权制国家才是问题的关键。

埃尔利希认为，尽管社会无政府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与分歧，但它们的结合基础在于关于权力关系的共同认识：第一，权力关系是指一个人拥有的强迫另一个人服从或控制另一个人行动的能力，它内在地具有强制、竞争和反平等的特征，许多制度化的不平等源于这种权力关系；第二，把内在于权力关系中的强迫和等级制特征看作是分析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关键；第三，最终要结束这种不平等的权力。

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是在克服社会无政府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各自缺陷的基础上的综合，具有以下优势：第一，能够解释妇女的阶级、种族、性、国家、年龄和性取向，能够把上述各种因素统一起来，而不是从中抽出单一的因素，能够解释妇女处于不同时间、空间和文化中的生活环境，从而既能考虑男女之间的区别，又能注意到妇女之间的区别；第二，把权力关系看作所有制度化不平等的基础；第三，不只把权力定位在心理领域，而是把权力置放在物质和心理领域；第四，主张权力的起源与传播是通过有组织进行的，通过一些组织形式确立了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力，并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拒绝选择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给这种权力关系以充分的支持；第五，主张结束父权制，争取结束所有形式的不平等。

（三）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解释及实践策略

埃尔利希对现有的关于父权制的解释并不满意，激进女性主义者 119



米利特对父权制的解释^[63]太宽泛,以至于无法说明不同社会中父权制的差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哈特曼对父权制的解释^[64]是不完整的,因为强调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在于男性控制了妇女的劳动力,把复杂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因素归结为物质因素。

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者综合了现有的关于父权制的解释,提出了父权制分析必须包括八个因素^[65]:

第一,重申哈特曼的观点,父权制包含男性对妇女劳动力的控制。

第二,阻止妇女接近必要的经济生产资源,使得她们经济上依赖男性或男性控制体系。

第三,对妇女性行为的控制。哈特曼认为妇女的性行为被控制在再生产以及吸引与服务男性上,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没有解释以下的问题:为什么是男性决定着妇女性行为的选择?为什么如此多的妇女接受了这些限制?也没有回答如为什么通过惩罚性和矛盾的方法如限制性教育的获得、生育控制、堕胎等来控制贫穷妇女的性行为。

第四,男性对资源的控制和作出决策。

第五,对同性恋者的憎恨。

第六,不同性别的社会化与性别不平等密切相连。

第七,相信男性优越于妇女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包括男性有权力控制妇女的生活环境。

第八,通过针对妇女的各种暴力尤其是性暴力,使得父权制权力得以表达、维持和加强。

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融合了激进女性主义与社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提出了消除国家和所有其他各种集权化的、等级制和强制组织的目标:第一,建立诸如“无领袖”小组的组织形式;第二,在理论和实践的所有阶段把个人与政治联系起来;发展合作与相互帮助;共享经济、政治、知识和技术等重要资源;在平等、自由和个人自主的价值中使成人和孩子重新社会化;结束性别社会化;结束关于财产关系的观点与事实;使手段与目的相一致;建立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文化^[66]。

注释:

[1]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39 – 40.

[2]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0.

[3] 巴雷特认为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家庭户组织这一特殊形式的描述就使用了父权制的术语,因为韦伯认为通过家庭户组织,父亲支配扩大的亲属网络中的成员、控制家庭户的经济生产。韦伯的这一思想引起了女性主义者的共鸣,包括米利特、费尔斯通等激进女性主义者以此为基础发展了父权制理论。

[4]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0.

[5] Annette Kuhn and Ann Marie Wolpe, eds.,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Women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45 – 65.

[6]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22.

[7]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29.

[8]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38 – 39.

[9]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67.

[10]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97 – 98.

[11]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99.

[12]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02.

[13]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05.

[14]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05.

[15]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06.

[16]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12 – 113.

[17]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28.

[18]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39.

[19]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48 – 150.

[20] 有学者提出已婚妇女是蓄水池,成为工业雇佣军的源泉,从而对资本有利。针对雇佣劳动军模式,巴雷特提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一模式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工作的一般特点;第二,没有说明为什么妇女必然具有特定地位;第三,这一模式与妇女作为廉价劳动力,可以替代男性劳动力的假设相矛盾。

[21]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62 – 163.

[22]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169.

[23]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206.

[24]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209 – 213.

[25]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210 – 213.

[26] [澳]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第 294 页。

[27]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212.

[28]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226.

[29] Michele Barrett :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259.

[30] 参见 1. Iris Young: “Socialist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Dual Systems

Theroy”载于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95 – 109; 2.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roy,” 载于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43 – 69. 译文“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 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三联书店 1997 年, 第 76 – 105 页。

[31] 扬: “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 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三联书店 1997 年, 第 80 页。

[32] 扬: “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 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三联书店 1997 年, 第 83 – 84 页。

[33] [美]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艾晓明等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174 页。

[34] 扬: “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 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三联书店 1997 年, 第 86 – 87 页。

[35] 扬: “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 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三联书店 1997 年, 第 88 页。

[36] 扬: “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 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三联书店 1997 年, 第 92 页。

[37] Ester Boserup,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0.

[38] 扬: “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 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三联书店 1997 年, 第 95 页。

[39] Heidi Hartmann: “Summary and Response: Continuing the Discussion”,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363 – 373.

[40]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41] 本论文集包含如下论文:

(1) Lydia Sargent: “New Left Women and Men: The Honeymoon is Over”.

(2)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1 – 42.

(3) Iris Young: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 43 – 69.

(4) Riddiough: “Socialism, Feminism, and Gay/Lesbian Liberation”. 71 – 89.

(5) Joseph: “The Incompatible Menage A Trois: Marxism, Feminism, And Racism”. 91 – 107.

(6) Ehrlich: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an It Be Saved?” 109 – 133.

(7) Sandra Harding: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135 – 163.

(8) Al – Hibri: “Capitalism is Advanced Stage of Patriarchy; But Marxism is Not Feminism”, 165 – 193.

(9) Lise Vogel: “Marxism and Feminism: Unhappy Marriage, Trail Separation or Something Else?” 195 – 217.

(10) Emily Hicks: “Cultural Marxism: Nonsynchrony and Feminist Practice”, 219 – 237.

(11) Carol Brown: “Mothers, Fathers, and ? Children: From Private to Public Patriarchy”, 239 – 267.

(12) Katie Stewart: “The Marriage of Capitalist and Patriarchal Ideologies: Meanings of Male Bonding and Male Ranking in U. S. Culture”, 269 – 311.

(13) Ann Ferguson and Nancy Folbre,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313 – 338.

(14) Zillah Eisenstein: “Reform and /of Revolution: Towards a United Women’s Movement”, 338 – 362.

(15) Heidi Hartmann: “Summary and Response: Continuing the Discussion”, 363 – 373.

[42]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序言。

[43] 黑克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会导致对妇女压迫的形成和社会动力的狭义的理解, 试图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来提供一种统一的观点: 第一, 可以同时研究种族压迫、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在文化背景中的相互作用; 第二, 可以让不具有相同政治观点或政治需要的人包括进社会主义运动中, 这些人包括女性主义者、黑人、同性恋者等; 第三, 可以理解人的各种需要, 如家庭的、仪式的、宗教的、性的、娱乐的等需要; 第四, 策略上可以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为更大的进步而斗争。提出一个“非同步发展”的概念, 意指个人或群体在与经济、政治体制的关系

中并不具有相似的意识或需要,比如尽管工人阶级妇女、黑人对资本主义强烈不满,但并不必然涌现出对激进选择的支持,一些妇女在养育孩子、生育控制、平等工资等方面提出激进要求,却又对妇女运动感到强烈的敌视,并宣称她们并不是女性解放者。详细论述可参看黑克斯的论文。

[44]阿尔希布利提出资本主义是父权制的一个高级阶段的观点,第一,她从激进女性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出发,在男性对永恒的强烈需求这一理论基础上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第二,男性为了永恒,借助于生产和再生产的工具,对妇女进行控制;第三,父权制就是统治,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统治的高级形式,社会动力来自于男性寻求新的控制方式、来自于妇女的反抗;第四,历史的推动力是男性的心态;第五,从策略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改善,它使一些男人从其他男人的剥削中解放出来;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女性主义,它没有解放妇女。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种族歧视、帝国主义和所有其他的压迫必须以对各种压迫的父权制特性的理解为基础。

对于上述观点,哈特曼作出了评论:第一,这种历史观不能令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满意。它的确具有内在一致的特征,并提供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清楚明确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直没有发现的。但它纯粹是思想的;第二,激进女性主义观点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另一个理论问题:父权制社会关系动力的源泉是什么?但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也遗留了没有回答的问题,如关于男性权力欲望的起源,参见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366 - 367.

[45]弗格森的其他著作包括:(1) Ann Ferguson, *Blood at the Loot: Motherhood, Sexuality and Male Domiance*, London: Pandora, 1989; (2) *Sexul Democracy: Women Oppression and Revolu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1; (3) *Feminist Communities and Moral Revolution*, eds. Marilyn Friedman and Penny Weiss, *Feminism and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6]弗格森与福尔博瑞注意到妇女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们把妇女的作用归于妇女的性/情感生产,具体包括养育孩子、提供情感、家庭支持、性满足等,与其他劳动形式相比,性/情感生产并不是不重要。基于对性/情感生产作用的分析,她们在策略上提出了必须在了解妇女价值与政治的基础上建立妇女自治组织、建立革命的妇女文化,进行文化抵制,“需要建立一种自我界定的革命的女性主义者的妇女文化,它将从思想意识和物质两方面支持妇女‘远离父权制’。反霸权文化和有物质支撑的网络组织能为妇女提供与她们一致的、替代

父权制的,从而使妇女增加对她们的身体、劳动时间以及自我感觉的控制”。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330.

[47] Sandra Harding :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35 - 163.

[48] Sandra Harding :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44.

[49] Sandra Harding :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45 - 146.

[50] 此探讨见于霍克海默 1936 年撰写的《权威与家庭》一书中。

[51] Sandra Harding :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46.

[52] Sandra Harding :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51 - 152.

[53] Sandra Harding :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52.

[54] Sandra Harding :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56.

[55] 哈丁把针对弗洛伊德理论批评的五个方面或问题概括为:第一,把 19 世纪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和孩子具有的某种特征说成是任何时代的所有妇女与孩子的特征;第二,主张男人、女人和孩子应该像弗洛伊德所表述的理想;第三,对生理生活的关注给受压迫者以策略支持,使产生人类苦难的经济根源神秘化,消除了革命变革的动力;第四,把社会疾病限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而不是经济公共领域中,这为被压迫者提供的策略就是避免处理人类苦难的真正原因;第五,聚焦于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具有阶级和种族偏见,参见 Sandra Harding :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

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56 - 157.

[56] Carol Ehrlich: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an It Be Saved?"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09 - 131.

[57] Carol Ehrlich: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an It Be Saved?"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10 - 111.

[58] Carol Ehrlich: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an It Be Saved?"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12 - 113.

[59] 关于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可参考:

(1) Ehrlich: "Socialism, Anarchism and Feminism";

(2) Wieck, David Thoreau: "The Negativity of Anarchism";

(3) Benello, C. George: "Anarchism and Marxism: A Confrontation of Traditions, in Reinventing Anarchy: What are Anarchists Thinking?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Anarchist Writings."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31 - 132.

[60] Carol Ehrlich: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an It Be Saved?"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15.

[61] Carol Ehrlich: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an It Be Saved?"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18.

[62] Carol Ehrlich: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an It Be Saved?" Ehrlich: *Socialism, Anarchism and Feminism*,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14.

[63] 凯特·米利特指出:“因为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的任何文明一样,是男权制社会。只要我们稍稍回顾一番下述事实,事情马上就变得十分明朗: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的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里”。[美]凯特·米利

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8-39页。

[64]哈特曼:“我们把父权制定义为一套有物质基础的社会关系,其中男性之间存在的阶层制关系和他们中间的团结能够使他们实现对女性的统治。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劳动权的控制。这种控制通过使女性不可能占有某些必要的经济生产领域(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低生活工资)和限制她们的性得以维持。男性行使他们的控制权,接受女性的私人服务,不必去做家务活和养育孩子,为性而占有女性的身体,感觉着权力并拥有权力。正如我们最近所体会到的,父权制的关键因素是:异性恋婚姻(以及它所带来的对同性恋的憎恨),女性养育孩子和做家务,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这是由劳动力市场的合约强行决定的),国家和大量建立在男性间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组织——俱乐部、运动会、协会、职业、大学、教堂、公司和军队”。[美]詹妮特·A. 克莱尼编著:《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与应用》,李燕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7页。

[65]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20 - 129.

[66]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31.

第四章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献（下）



Nú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沃格尔是美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的努力,她并不满意,提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根据社会再生产理论框架分析妇女受压迫状况与妇女解放问题,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问题分析的有效性;贾格尔认为人性理论是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通过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四种妇女解放理论比较,得出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最合适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结论。她反对抽象的人性,主张妇女是被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改变妇女状况必须改变这些社会关系,其中生育与生产是妇女异化产生的两个关键方面,而妇女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经历成为妇女立场的基础,为妇女政治、妇女解放提供了新的视角。

沃格尔:

《马克思主义与妇女所受的压迫 ——走向一个联合的理论》(1983)

莉莎·沃格尔(Lise Vogel),美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里德大学社会学教授,一直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运动与左派活动。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与妇女所受的压迫——走向一个联合的理论》(1983)、《职业母亲:美国工厂中的母亲政策》(1993)、《妇女问题:一个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论文集》(1995)以及多篇论文^[1]。

沃格尔审视了现有的关于女性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种

关系:一种是简单地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解释妇女问题;一种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激进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发展一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一种是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彻底变革,拒斥马克思主义。沃格尔主张必须超越内在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综合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二元论,重新审视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传统,通过复兴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综合,为妇女解放斗争提供最好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和妇女所受的压迫——走向一个联合的理论》是她理论探讨的成果之一,全书试图发展一种分析妇女问题的理论框架,把对妇女受压迫的论述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女性问题分析的有效性。全书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批判地考察与评估马克思、恩格斯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关于妇女受压迫和妇女解放的思想,指出其贡献与局限所在;第三部分考察社会主义运动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与解决;第四部分探讨妇女问题和妇女解放合适的理论框架,那就是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框架。本节主要阐述第四部分内容。

一、双系统观点及其局限

社会主义对妇女状况的阐释,依其理论分析起点的不同分为双系统观点和社会再生产观点。双系统观点认为妇女受压迫源于她们在性别劳动分工体制和男性统治中的状况,社会再生产观点认为妇女受压迫源于妇女在总的社会再生产中的不同地位^[2]。因为性别劳动分工使得妇女处于与男性的依赖与斗争的关系中,导致了她们受压迫的地位,双系统观点关注性别劳动分工和妇女受压迫的起源、发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关系、阶级斗争与性别斗争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

在沃格尔看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过分依赖双系统观点:第一,双系统观点贯穿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书。恩格斯把通过形成性别劳动分工的家庭范畴当作既成

事实,把性别劳动分工看作基于生物学的、历史地不变的,并赋予其对于家庭的核心作用,妇女受压迫源于性别劳动分工。总之,恩格斯一方面强调性别劳动分工,一方面把家庭看作重要现象,并认为这些与总的社会再生产无关。第二,《起源》认为单个家庭具有社会经济单位的特征,而现代社会又是由这些单个家庭组成的。恩格斯对家庭的讨论脱离了社会再生产,而且认为家庭具有支配地位。第三,把家庭作为性别斗争的场所。尽管恩格斯也强调性别斗争与阶级斗争同时出现、平衡发展,但他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无财产地位导致性别冲突和妇女的屈从地位。尽管恩格斯的《起源》没有完全否定社会再生产观点,但在双系统观点与社会再生产观点之间进行了矛盾的融合。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包括妇女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家务劳动转变成公共事务、单个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但是,为什么参加公共生产提供了社会平等的前提?废除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家庭作为经济单位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与要求家务劳动转化为公共事务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恩格斯并没有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必要的理论基础,因此恩格斯的观点不能给社会主义者提供考察妇女问题的理论基础。

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完全符合双系统观点:第一,把“妇女”范畴作为其理论分析的起点;第二,他断定解决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完全一致,但又把妇女受压迫的现象与社会发展状况分开来讨论;第三,提出妇女受压迫源于阶级社会的妇女个体上依赖于男子,没能把这种依赖置于总的社会再生产中。总之倍倍尔提出了性别劳动分工、男女之间的依赖关系,并把它们看作是经验自明的和非历史的假设,置于妇女受压迫问题的核心^[3]。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期望社会主义理论传统能够提供解释妇女问题的理论出发点。事实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发现社会主义理论传统不仅不能为妇女问题提供合适的答案,而且还面临着一系列需要处理的难题,集中在三个相关方面^[4]: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压迫的不只是工人阶级妇女,而是全体妇女。而且在所有阶级社会里,妇女都处于从属地位;有些人甚至论证,任何社会的妇女(包括在社会主义社

会)都是从属的。那么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从理论上理解这种跨阶级、跨时代的特征?第二,妇女养育儿童的生物能力,以每个特定社会中不同性别劳动分工形式得到了不同的社会表达方式。但总的来讲,在每个社会中,性别劳动分工是妇女充分参与社会的巨大障碍。那么,妇女获得真正平等有多大可能?为了妇女解放是否应该超越平等这一概念?第三,妇女受压迫与从属阶级受剥削以及种族和民族压迫极为相似。类似的性别、种族和阶级压迫是否具有相同的本质,是否要求相同的组织形式?在理论上还有其它方法可理解这一现象吗?对于这些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试图作出比社会主义传统更好的回答,主张用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来扩充甚至整个地改造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发展一种能够说明妇女问题的理论框架,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女性问题中的有用性。

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第二波女权运动才面临以下问题:如何评价实践过程以及如何解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如何看待妇女问题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如何确立妇女解放的目标,如何进行妇女解放斗争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女性主义运动内部形成了不同的看法与策略。尽管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一场独特的政治活动,这些活动指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目的在于消除性别歧视、阶级冲突和种族冲突”^[5],而且在诸多方面也有共识:妇女意识到自身受压迫,妇女加入到革命斗争中对于革命成功至关重要;必须将反对性别压迫、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的斗争协调起来;妇女解放运动必须由工人妇女、家庭主妇、女同性恋者、各色人种妇女构成,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私人领域和家庭领域进行;必须吸收新左派社会主义转型的总体观,强调革命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运动不仅结合了社会主义的观点,还结合了女性主义的“姐妹情谊是强大的、个人的是政治的”的视野^[6]。

当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是在激进女性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激进女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分析相结合,这是形成严谨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理论不可省略的第一步”^[7]。但其理论构架再现了双系统观点的主要特征:第一,不管有着怎样的目的,社会主义女性主

义理论家倾向于把性别劳动分工及其影响与社会再生产分开来讨论;第二,她们没有从理论上把妇女受压迫置于生产方式和阶级之中去考察;第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没有为社会主义斗争的策略重点提供理论基础。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再生产了双系统观点的缺陷,尽管如此,他们的工作促进了对妇女受压迫问题的理解,重申和加深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8]。

二、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理论框架

(一)生产与再生产的统一

沃格尔没有把家庭或妇女问题作为她的理论起点,而是从劳动力概念出发,开始了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探讨:

1. 劳动力价值的确定

劳动力指什么?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9]劳动力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潜在能力;这个潜力的实现就是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被使用(消费掉),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家务劳动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家务劳动把由工资购得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工人的劳动力,是支付给男性工人的工资,用于支撑整个家庭的消费,取决于劳动力价值。

劳动力价值包括两部分:一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生活资料的价值,一是维持工人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价值如何确定,在马克思看来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另一个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生理要素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而这种界限是有弹性的,“身体弱和寿命短的工人一代一代迅速地更替,也可以像身体强和寿命长的工人那样,使劳动市场得到保证”。“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10],也就是说,在决定劳动力价值时,除了生理因素之外,还有历史与道德的因素,“一个



工人所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生,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与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11]。

从劳动力价值的确定中可以看出,劳动过程是生产与再生产的统一,每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再生产过程。

2. 个人消费与生产消费

为了生产必须消费,马克思强调了社会劳动过程中的个人消费与生产消费之间的区别,“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12]。广义的生产消费,包括生产手段如原材料,工具或机器及辅助材料和物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者,其结果是新产品;个人消费是生产者消费生存手段如食物、住房、衣服等,结果维持自身。一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这是生产消费;一是通过消费把付给他的劳动力工资转化为生存手段,这是他的个人消费。

马克思在个人消费的表面现象下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思想,正是劳动者本身使得生产与再生产不可分离。个人消费不应只涉及已经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生产者的维持,还应该包括:现有工人的代际更替,没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如生病的人、老年人、那些不赚工资的家庭主妇;个人消费还必须涉及劳动力的再生产,正是在一代一代工人的新老更替的现象中,产生了性别问题^[13]。因此,考察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必须:第一,生物学差异构成了性别(gender),差异的物质前提是一个社会具有不同性别地位的直接的物质因素;第二,对性(sex)差异的考察不能与社会制度、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分开来进行。

(二) 劳动力再生产: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

考察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必须区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是生产者在每日工作中获得他自身再生产的部分,通常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生产者的直接个人消费。未经加工的生存资料并不能保证劳动力的维持,食物要烧、衣服要洗、被要叠、柴要劈,这一切需要一定量的补充劳动;第二,为被剥削阶级中暂时不是直接生产者的老人、病人和妻子提供维持生存的手段;第三,与劳动力的代际替代相关的屈从阶级的孩子养育。在这三个部分中,至少在第三部分中存在着性别劳动分工,属于屈从阶级的妇女在劳动力的代际更替中起着特殊作用,她们也许是直接的生产者,但正因为妇女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不同作用成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14]。

妇女在工人替代中所起的作用与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相矛盾,表现在:一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从利润最大化角度出发,需要妇女进入雇佣劳动力市场,可劳动力再生产又需要妇女在家庭内担当社会再生产角色,这一矛盾体现为养育孩子与剩余劳动占有之间的矛盾。怀孕和哺乳期的几个月时间降低了妇女的工作能力,减少了妇女作为直接生产者和作为必要劳动参与者的贡献;二是统治阶级立即占有妇女的剩余劳动的需要与长远来说又需要这样的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统治阶级一方面采用如减少必要劳动,确保劳动力再生产的具体策略;一方面,利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基于性别歧视和亲属关系的男女之间的关系进行统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依赖于妇女受压迫的地位。

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家庭与工作的分离和劳动工资制度,这一切加强和形式化了家务劳动与工资劳动之间的区分以及妇女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在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生产劳动与家务劳动、家庭内与家庭外的区分中,男性与女性分别承担着各自的责任。妇女对必要劳动负较大责任,特别是为孩子相关的工作负责;男性负责提供物质生存资料,对剩余劳动负责。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劳动领域和家庭领域是明确区分的^[15]。劳动工资制度使得男性获得多于他们自身消费需要的生存资料,提供给妇女使得她们经济上依赖男性。妇女对家务劳动负责,男性对剩余价值生产负责。所有这一切使男性对女性的

统治制度化了,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固定并强化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和男性统治。

沃格尔认为,被剥削阶级妇女地位的形成不仅由妇女与生育孩子的过程和劳动力的更替关系决定,而且也由妇女参与到剩余劳动中的程度和特征决定,这使得工人阶级妇女遭受着特殊的压迫,既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又受工人阶级男性的压迫。

(三)劳动力再生产:家务劳动与工资劳动

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区分中,必要劳动概括起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必要劳动的社会组成部分,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劳动密不可分;一是必要劳动的家务组成部分或家务劳动,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领域。这两部分对于劳动力再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工资购得的商品必须投入额外的劳动即家务劳动才能被消费,整个劳动过程离不开劳动力的代际更替。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工资支付使得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社会组成部分之间的划分变得模糊;一是必要劳动的家务组成部分与工资劳动没有关系,在工资劳动场所,剩余劳动在起作用^[16]。

资本积累加剧了家务劳动与工资劳动的对立。家务劳动的责任过多依赖于妇女,参与工资劳动、提供商品的责任过多依赖于男性。这种把男性、女性与剩余劳动、必要劳动相联的安排,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男性至上的父权制,起源于早期阶级社会劳动分工的历史遗产^[17]。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剩余价值,促使了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分离,这种分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男性至上加强了现有的社会劳动分工,家务劳动渐渐局限在家庭中,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与工资劳动相分离。所有这些状况使得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务劳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家务劳动加深了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之间的敌对情绪。家务劳动与工资劳动相分离,随之产生的还有私人与公共、家务与社会、家庭与工作、妇女与男性之间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男性至上

加强了这种分离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难以超越的力量。

第二,资本积累趋向于减少家务劳动。资本不断积累的欲望导致家务必要劳动的数量和特点的变化。资本积累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增加,对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资本积累的需要面临家务劳动与工资劳动之间的矛盾。减少这一矛盾可以通过让家务劳动参与到工资劳动中创造剩余价值,因此资本积累的一个趋势就是减少家务劳动的数量,这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是增加工资劳动者的数量,让更多的家庭成员加入到工资劳动中;一是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包括自动洗衣店、卖成品衣的商店以及快餐连锁店等,把原来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工作移到还可能为资本家提供新机会的利润制造部门,这是减少家务劳动的一个主要途径,减少家务劳动可以潜在地创造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18]。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务必要劳动不可能完全社会化,因为会遇到多方面的障碍:(1)主要是经济障碍,生孩子和维持家庭等领域的费用太高;(2)政治和意识形态障碍,家务劳动社会化会使人们体验到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冲击,可能导致传统家庭价值的衰落;(3)生物学障碍,通过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使得家务劳动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生孩子的生理过程仍将是妇女承担的,无法通过社会化得到解决。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务劳动减少不再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来说,一方面,家务劳动成为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着,它就需要劳动力,只要需要劳动力,就需要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家务劳动又是对劳动力的限制,阻碍了资本对利润的追求。

总之,在家务劳动问题上,资产阶级寻求以较低的费用和家务劳动的最少化使劳动力再生产保持稳定,而工人阶级力争获得自我更新(包括家务劳动的特殊标准和类型)的最好条件。



三、妇女解放:社会主义变革

(一)妇女在家务劳动与平等权利方面的特殊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具有特殊的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19]:

第一,与其他所有阶级社会一样,妇女与男性在社会再生产中有不同的地位。当然妇女与男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因阶级不同而不同。工人阶级妇女对家务必要劳动承担劳动力的维持与替代等任务,对家务劳动负责;工人阶级男性对社会必要劳动负责,提供生存资料,唯一的责任就是进入工资劳动中。在资本家阶级中,妇女对阶级成员的代际替代负责,男性对保持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负责,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某些妇女即工人阶级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其任务是保持和更新被剥削的劳动力。

第二,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许多群体一样,妇女缺乏充分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承诺给所有人平等,但与其他没有获得平等权利的群体一样,妇女群体也缺乏平等。为了获得平等权利,妇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斗争,早期的妇女运动争取法律中的选举权、财产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平等权利,现代妇女运动为私人领域中的平等而战,如争取家庭中的平等、性选择的自由、生不生孩子的权利以及在付酬领域争取同工同酬、同等工作同等价值等。妇女群体普遍缺乏平等构成了妇女运动把妇女团结起来的基础,出于对平等的不同理解,妇女运动呈现出不同的趋向,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把追求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男女平等作为目标,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看出了资产阶级平等和真正的社会平等之间的差距。

妇女在家务劳动和平等权利方面的双重地位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的特殊特征:一方面,妇女被隔离在家庭中的情况日益减少,妇女参与工资劳动逐渐增加,在这一过程中,妇女的特殊地位使妇女容易遭受性别歧视,表现在妇女从事的职业层次与工资都较低;一方面,妇女缺乏权利与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断扩大平等范围的趋势相矛盾。

从家务劳动和平等权利角度分析妇女所受的压迫,既不能像传统

社会主义强调经济决定论,也不能像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的地位定位为妇女作为家务劳动者和工资劳动者的双重地位。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对于主要由妇女进行的再生产及由此产生的男性统治体系来说,家务劳动就是必需的^[20]。而家务劳动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和工人阶级家庭中,因此有必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背景中来界定工人阶级家庭:

第一,工人阶级家庭是一个基于亲属关系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是与工资劳动相分离的领域。在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家庭承担着维持和更新劳动力的主要责任。

第二,工人阶级家庭包括支持与冲突的因素: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生活通常具有男性统治、妇女受压迫的特征;另一方面,在工人阶级团体中,家庭又为其家庭成员提供意义与温暖的支持系统,家庭潜在地提供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企图强化、扩大它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的基础^[21]。

第三,工人阶级家庭成为妇女受压迫的制度化场所。家务必要劳动构成了工人家庭的物质支柱,这一任务主要由妇女来承担,具有男性至上的特征。妇女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为男性提供不付酬的服务上,这一事实产生两性间的敌对关系;妇女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以及为改变这种不平等而进行的斗争,成为两性冲突的潜在源泉。

第四,在私人家庭户中,妇女所受的压迫会表现出只受男性的压迫,这主要源于敌对的性别劳动分工和家庭。但是正是妇女需要承担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家务劳动,而不是性别劳动分工或家庭,才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压迫和不平等永久化的物质基础。

(二)社会主义变革对于男女平等的必要性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统治地位,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对立必将存在。即使为平等权利斗争会把家务必要劳动中的性别差异减至最小程度,也仍然会把过多的责任分派给妇女,让她们担当孩子养育者和为男性至上体制提供潜在的物质

基础。不管民主扩大到多大的范围,都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剥削,也不可能解放妇女^[22]。妇女解放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变革,而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家务劳动在社会主义变革期间仍将存在。必要劳动的两个组成部分,社会的、公共的与其他家务的、私人的之间的对立将继续存在,生产不可能立即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家务劳动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政治上必须进行民主变革。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受到极大限制,只有有产阶级的男性享有资产阶级社会允诺给每个个人的权利。为了获得真正的社会平等,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消除把民主限于少部分人的状况。

第三,减少家务劳动。对妇女来说,首先要有平等的权利,但只有法律权利是不充分的,必须逐步减少妇女身上过重的家务劳动负担:(1)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来减少家务劳动;(2)可让妇女、男性和孩子合理分担家务劳动。因为家务劳动不能大面积减少,也不能被消除,社会主义社会采取这两条途径是为了保证妇女获得真正的社会平等。^[23]

第四,实现男女真正平等会遇到以下障碍:(1)如何对待男女在生育方面的区别。马克思说过:“对于不平等的劳动来说,社会主义社会中平等的权利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同等劳动同等报酬对于人们之间的差异就会产生不平等的结果。妇女真正的平等要求并不是与男性相同,而是要求区别对待,首先能够充分参与社会生活领域,这必须以发展生产、政治、文化、个人关系等多方面的物质条件为前提;(2)既然不能废除家庭,也不能消除性别劳动分工,那就必须逐步削弱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受压迫的基础。

总之,为使妇女获得真正的社会平等,必须扩大民主,把妇女吸收入公共生产,逐步变革家务劳动,从而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家庭和两性之间关系的更高形式。

沃格尔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从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包括社会再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出发,揭示无产阶级家庭和性别分工怎样通过劳动力再生产满足资本主

义的需要,家庭形式和性别压迫根源于物质条件中。“马克思的经济范畴确实为理解家务劳动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妇女作用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提供了把妇女与家庭问题放在社会一般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方式的关系中进行讨论的理论基础。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对家庭的未来和两性间的关系作出了评论。资本主义发展为更高形式的家庭和两性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24]。沃格尔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对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的探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布赖森认为沃格尔的分析中包含以下问题^[25]:第一,她没有用有关人类学证据或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来证实她的观点;关于只有在阶级社会,性别劳动分工才成为压迫性的整个论述只是作为理论演绎,容易受到经验的挑战。第二,她使用的社会再生产是一个无用的、狭窄的概念,并因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受限制,没有包括避孕知识或再生产技术中的性别特征与变化。妇女承担的社会再生产责任是不变的,但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和所依据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从历史中消失不见了,沃格尔没有考虑新的再生产技术会强烈地改变养育孩子的作用。第三,社会主义不可能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处理家务劳动与妇女屈从的问题,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家务劳动将被社会化或与男性共同分担的论断,忽视了男性反对的所有可能性。第四,她漠视男性的既得利益,由激进女性主义认识到的妇女受压迫的整个领域消失不见了,而且她没有提出男性暴力、性别剥削、语言和控制等。而在兰德里看来,沃格尔的缺陷在于她没有关注当代女性主义关注的包括心理、意识形态等主题,把意识形态与文化问题搁置一边。



贾格尔:

《女性主义政治学与人性》(1983)^[26]

阿利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 1943—)是一位重要的女性主义哲学家,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哲学与妇女研究教授。她的主要著作有《女性主义政治学与人性》(1983)、《性别/身体/知识》(1989)、《道德与社会公正》(1994,与他人合著)、《生活在矛盾中:女性主义的社会伦理学对话》(1994)、《堕胎:三种观点》(2007,与他人合著),与他人合编《女性主义框架:关于女性与男性之间关系的另一种理论说明》(1990)、《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学》(1998)等著作。现在正从事着“重新思考性平等”、“性、真理与权力:女性主义者的道德人理论”等项目。

当代女性主义者关于妇女所受的压迫与妇女解放持有多种多样的理论,将这些理论进行归类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理论本身在变,社会现实在变,妇女状况也在变,还存在到底以怎样的标准进行归类的问题。贾格尔依据对人性的不同理解,把现有理论划分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四种系统的政治理论。这四种理论框架基于对人性及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形成了对妇女问题的不同理解,对妇女解放的不同策略。在贾格尔看来,妇女问题研究必须以对一些基本哲学问题的思考为基础,压迫与解放的概念与人们熟悉的自由、公正与平等哲学概念相联系^[27]。她

看出几种独特的思想方式,但大家都认为,公正原则要求给妇女以自由和平等,但她们却在诸如自由和平等的适当价值、国家的功能、什么构成人类特别是女性和自然的观念等基本哲学问题上意见不一……关于妇女问题的特殊争论不可能独立地解决,而只有在对社会和政治哲学基本问题进行思考得出的理论构架内才能解决”^[28]。贾格尔围绕政治哲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如何扩充政治哲学的领域;政治哲学与人性理论之间的联系;政治哲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政治哲学的理论合适性问题。

全书由前言、四部分十一章组成。第一部分阐述女性主义与政治哲学,把人性理论看作政治哲学和生命哲学的核心;第二部分阐述女性主义的人性理论,对人性的理解是当代四种主要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第三部分阐述女性主义的政治学,指出每种人性理论与女性主义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变革的建议密切相关,借助于库恩的范式(paradigm),指出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范式或全面理解现实的方法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反映了特定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第四部分女性主义关于政治知识的理论,得出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到目前为止形成的最合适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结论^[29]。本节仅就贾格尔关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人性理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与知识论的观点进行介绍。

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人性理论(human nature)

妇女为什么受压迫?如何结束妇女所受的压迫?对于这两个问题,女性主义政治理论都作出了回答,出于对问题的不同认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如何认识妇女的共性?又如何认识妇女之间的差异?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强调同一阶级妇女的共性、不同阶级妇女的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工人阶级妇女与男性之间具有共同利益、没有冲突;激进女性主义强调妇女的共性,强调所有妇女具有共同经验,在推翻男性统治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综合激进女性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试图发展出一种政治理论与实践以避免两者结合带

来的问题。在贾格尔看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它至少利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试图通过理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回答激进女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30]。

贾格尔认为,妇女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离开了这些关系,妇女只是抽象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把人类看作是抽象的、无性别的(无年龄、无肤色)的个体,不认为妇女本质上是与男性无法分辨的,也不把妇女看作是与男性截然不同的,相反把妇女看作是由她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31];妇女解放就是要改变这些关系,充分解放人类(当然包括妇女)的创造潜能。当然男女之间、妇女之间也因年龄、性别、阶级、国籍、种族与民族不同而产生差异,如何看待这些差异?自由政治理论有否认或减少这些差异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倾向于只承认阶级差异,激进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倾向于只承认年龄与性别差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承认这些差异,并把它们当作当代人性的组成部分,寻求一种理解这些差异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寻求一种关于男女之间差异的更加合理的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从生理与心理两方面对男女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解释,主张人类的生理与心理都是社会建构起来的;把对人类生理与心理的说明联系起来,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心理形成与性别劳动分工联系起来;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理解人性。贾格尔认为女性主义理论与社会理论密不可分,“社会地建构男性与女性的方法不仅包括关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主张,而且包括关于社会构成的主张以及组织社会生活的方法”^[32]。

性别斗争与阶级斗争哪个优先?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争论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斗争服从于阶级斗争;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妇女解放斗争优先于所有其他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主张,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密不可分的,“资本主义、男性统治、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相互连接、不可分离,废除任何一种统治制度必须以结束所有这一切为前提。对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来说,要充分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认识男性统治建构的途径;相反,充分理解当代的男性统治也需要认识资本主义组织劳动分工的方式。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相信,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合适

的说明要求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33]。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基础,建立一种关于妇女压迫的政治经济理论。在贾格尔看来,现存政治经济理论不能用来说明妇女所受的压迫,必须发展一种新的政治与经济范畴,包括通过历史的方法而不是生物学的方法,重新形成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借此提供关于性行为、生孩子、养育孩子、个人生活维持等人类活动的理解与概念。

性别劳动分工的最明显表现,是关于人类生活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工,这种分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普遍认为性行为、生育属于自然的、非公共领域、妇女的领域,属于私人领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接受了激进女性主义关于性活动、怀孕与孩子养育是体现权力关系的社会实践,是政治分析的合适话题,但否认激进女性主义提出的这些实践是基本不变的假定。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聚焦于性行为、生育等领域,但认为这些实践与范畴都是历史地变化的。人类的两类需要包括衣食住与性、生殖、养育孩子,在贾格尔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前者看作是历史地变化的,而把后者看作是自然的、生物的,较少历史的变化,因而给予后者在形成人性和人类社会中第二位的作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主张后者是社会地决定的,伴随着生育实践的变化而历史地发展的,因此,把性与生育实践作为政治分析的主题,并系统地反映这些实践变化如何改变着人性^[34]。

二、生育:社会的经济基础

(一)生育与生产中的性别分工

在贾格尔看来,社会的统治群体与被统治群体之间是一种阶级关系。统治群体控制被统治群体的劳动,强迫后者为他们从事性、生育与情感劳动,并从中获益。统治群体几乎毫无例外地由男性组成,被统治群体几乎毫无例外地由妇女组成,通过男女之间如此系统的差异,男性控制了妇女的性、生育与情感劳动,“这种控制或许不是为了从妇女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获取利润,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仍然是一种

剥削形式……因此,只要男性群体控制并从妇女群体的劳动中获益,那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就把男性看作是剥削妇女群体(或阶级)的群体(或阶级)”^[35]。贾格尔认为,男女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社会生产资源包括妇女的再生产能力,控制社会生产资源的斗争必然包括控制妇女再生产能力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发生在不同阶级的男性之间,而且发生于男女之间。“因此,如果不涉及这种持续不断的斗争,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社会现象与历史变化的方向。这是一场关于男女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尽管不一定是作为个人;这是一场关于男性对女性始终如一的统治的斗争,尽管妇女们有时也在对她们自身的再生产能力或其他生产资源的控制中获得有限的好处”^[36]。

贾格尔认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必须从性别劳动分工来探寻妇女所受的压迫、特定的经济制度以及关于怀孕与养育、性行为与情感生活的特定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它的概念框架代表了男性世界观。传统马克思主义范畴忽视了妇女处于市场外的劳动,忽略了市场中妇女工作的性别特征,从而掩盖了男性对妇女的系统统治。不管传统上对经济制度是如何界定的,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生活条件不仅由统治阶级而且还是由男性决定的,所有阶级的男性通过不同途径直接从妇女劳动中获益”^[37]。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状况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了解释生产方式如何决定男性统治以及生产方式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激进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提出了关于生产活动的新概念。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关于生产活动的概念,承认人的生产与其他商品的生产具有同样的特征,那就是历史地决定的、变化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当代社会的分析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定义,包括了处于金钱交易之外的活动。因此,根据生产活动的这一概念,它包括了由妇女在家中从事的生育与性工作。

尽管妇女从事的性与生育劳动因阶级、民族与种族不同而具有不同特点,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是由妇女来承担。性别分工的形成似乎是妇女自由选择的结果,实际是一种强迫,这种强迫就是限制妇女进入工资劳动,并且通过婚姻与母职的意识形态模糊了这种强迫性。

与激进女性主义者一样,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十分关注性行为与生育领域,提出解释男性统治的现象不可能不涉及生育,但又不能只涉及生育,“要充分地理解妇女受的压迫,必须考察生育中的性别劳动分工以及生产中的性别劳动分工,而且必须考察关于妇女经历的无穷变化与单调的相似性,包括其他社会中的妇女经验,特别是当代工业社会中不同阶级、种族与民族的妇女经验”^[38]。

贾格尔认为,激进女性主义关于“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口号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打开了关于理解诸如性行为与生育领域的新途径。盖尔·卢宾从性/性别体制出发考察了社会对性行为与生育制度的组织;乔多萝以生育组织为基础探讨了母职的作用;弗格森和福尔博瑞通过经济、生育与男性统治之间关系的探讨,发展了性/情感生产(包括养育孩子,提供爱、养育与性满足)的概念^[39]。在贾格尔看来,性活动与生育活动是劳动,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两者具有相互决定的辩证关系。生育组织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主张,尽管它与一定的经验事实相关,因为,第一,这种主张的前提是愿意把生育与性实践概念化为人类劳动的形式,是历史地变化的、不是由生物决定的;第二,接受这一主张依赖于政治上评价妇女屈从的意义,并准备把它作为对妇女屈从的合理解释来接受^[40]。

(二) 必须改变传统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把生育看作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会引起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传统区分的改变。根据自由主义传统,自由经济理论与自由政治理论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分为市场的经济领域与非市场的家庭领域,政府调节、干预的领域与政府免于调节的领域,男性的世界与妇女的世界;传统马克思主义集中研究政治经济问题,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对于理解妇女所受的压迫特别重要。尽管没有把私人领域完全界定为处于政治领域之外,但认为公共领域比私人领域重要。贾格尔指出,“令人关注的是,尽管在自由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景中,私人与公共的术语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但是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都把性和家庭关系分派给私人领域”^[41]。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把生育看作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思想,运用了激进女性主义对传统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区分的挑战……它发展了激进女性主义对现有政治与经济理论明确的批判,特别是对自由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42]。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扩展了政治统治的领域和现有公共领域的范围,把经济扩展为包括妇女在私人领域中从事的性与生育劳动。贾格尔认为,这一扩展不仅是分析的需要,也是为了展示全面理想的需要,因为原有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的理想是不充分的,“只要性行为是由男性界定的,只要妇女不能决定是否生孩子,那么妇女就不可能自由;只要妇女被迫从事大量不相称的孩子照料、维持生活及养育等工作,妇女就不可能与男性平等。如果只聚焦于参与选择政府或只聚焦于工人掌控生产资料来满足人类衣食住的需要,那么关于民主的理想就不合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断定需要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新概念,包括生育中的民主或……叫再生产民主”^[43]。废除男性统治不是变革哪一方面,而是变革一切,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全面变革。

三、异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概念框架

在贾格尔看来,异化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足以容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激进女性主义的甚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刻见解。“当代女性主义者团结一致反对压迫妇女,但是,她们不仅在怎样去反抗压迫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一样;而且,在什么构成当代社会妇女所受压迫这个问题上,彼此采用的概念也不一样。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是因为迄今为止她们受到不公正的歧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妇女所受压迫在于她们被排除在公共劳动之外;激进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女人所受的压迫主要在于男人对妇女的性和生育能力的普遍控制;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则通过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来描述女人受压迫的特点”^[44]。当然,贾格尔的异化概念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异化概念的修改、扩充与延伸。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状况。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因为直接参与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异化状况,工人被异化,是因为他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妇女只有作为工作者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才会被异化,当妇女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妇女就没有被异化。在贾格尔看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分析妇女在当代社会中所受压迫时只是偶然提到异化,而异化概念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当代妇女受压迫进行系统化的批判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45]。当然,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异化概念,必须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进行修改,因为在当今社会,妇女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被异化了,这种异化采取了特殊的性别形式,当代社会中的妇女经历是异化的最好例证^[46]。她扩大了异化的范围,涉及妇女作为性客体、作为母亲、作为妻子的异化,甚至认为女性气质也是一种异化:

1. 作为性客体的异化

妇女作为性客体的异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当代社会强制的异性性行为;妇女容易成为性攻击、性骚扰的对象;女性不惜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在打扮、美容、减肥等方面,以取悦于男人、吸引男人。总之,“是男性而不是妇女控制了妇女表达性行为,妇女发展性行为是为了取悦男性而不是为了自己。在这方面,妇女的性状况类似于工资工人的状况,他们与他们的劳动过程与产品相异化”。男性对女性性行为的控制使得妇女与她们自己相异化。当今社会,妇女没有被看作具有各种欲望、兴趣与能力的完整的人,而是被看作性客体,社会主要根据其身体特征及其表现来评价她们,“性崇拜和强化身体的某些部位是分裂妇女的极端形式”。妇女也逐渐接受了主流男性文化,把她们自身看作她们的身体;结果导致妇女与其他妇女之间的异化——作为性客体,妇女为了取悦于男性相互之间形成竞争,从而导致“妇女之间的性竞争通常使她们不能认识到她们之间具有根本的共同利益,就像工资工人通常不能认识到他们与其同事具有共同利益一样”^[47]。

2. 作为母亲的异化

妇女与她生育劳动的结果相疏离,应该生几个孩子不是由她们而是由别人来决定。在社会需要劳动力时,妇女被迫生育孩子,以满足劳动力的需要;而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视儿童为经济负担,妇女又不允许

生自己想要的孩子,只能堕胎或绝育。妇女不仅不能决定她们生育的产品,也不能决定她们的生育过程,妇产科学的发展使得母亲对生育过程的控制逐渐减少,最终使整个生产过程完全由妇产科医生控制,妇女与她们的生育过程分离。

3. 育儿也是一种异化

贾格尔论及 20 世纪科学育儿方法的出现以及家庭小型化给育儿带来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里,育儿必须按照父权制的标准来做,具体表现为妇女接受专家的指导进行育儿,而不是按自己的方式去抚养自己的子女,而这些专家大多数都是男性。“发展起来的育儿科学是一种男子气科学,它的制订就是一个与妇女、孩子本身日渐远离的过程。它是一门科学,越来越依赖专家的判断与研究,越少依赖妇女的经验,结果,一方面,母亲被看作对于孩子发展具有主要作用的人,另一方面,母亲又被看作孩子发展的主要障碍”^[48]。

育儿使母亲异化,疏远与她们孩子的关系,“母亲与孩子间极度的相互依赖,鼓励母亲在界定孩子的意义时首先考虑到她自己对生活意义、爱和社会认可的需要。她把孩子视为她的作品,以为这作品能改善她的生活,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孩子是无价之宝,社会却对之不屑一顾。当代母职的社会关系使她不可能把孩子看作一个完整的人,而是看作母子双方所属的更大社区的一部分”^[49]。20 世纪孩子与母亲相异化日益加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现代青少年亚文化的发现把他们的父母排除在外;二是随着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家庭走向外部世界;三是日益加快的技术与社会变革形成了代沟,母亲们无法了解家庭外面的世界。

4. 文化生产(精神智力)的异化

妇女与文化生产相异化。妇女被允许有限地参与文化生产,妇女自我形象降低、自我尊严受损;妇女异化于科学与学术使得她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由于男性把持着学术界,妇女在其中总觉得惴惴不安,当思想和话语的条款是由男人设定时,女人们永远也不会轻松自如。

作的性别化与性骚扰也是妇女异化的性别形式。贾格尔认为,所有异化形式相互联系,正如桑德拉·巴特基(Sandra Bartky)指出的,“妇女性异化采取的形式导致了妇女与她们的精神智力相异化,这也许比性行为的异化危害更大”^[50]。

5. 女性气质本身就是异化

安·福尔曼提出女性气质本身就是异化,她主张,当代社会的妇女与自己劳动的所有方面相异化,与其他妇女和孩子相异化,她们关于女性气质的定义使她们与男性、她们自身相异化。主流男性文化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界定为具有主动/被动、智力/直觉、非情感/情感、强壮/虚弱、主动/屈从等截然相反的特点,当两性遵循着这样的界定时,两性都过分发展了一种能力,牺牲了另一种能力,结果使两性不能充分地实现他们的生产能力,两性的分裂扭曲了人类的可能性,男女两性都与他们的人性相异化了^[51]。

四、再生产自由(reproductive freedom):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

在贾格尔看来,妇女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源于商品拜物教、实证科学的兴起,由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感性与理性、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分裂等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决定的。贾格尔利用异化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受压迫的状况,异化为理解当代妇女受压迫的多种特征提供了统一的概念框架,而且还可能为决定如何消灭这种压迫提供指导^[52]。如何改变妇女的异化状况?贾格尔提出必须在妇女的生育自由、工资和组织独立性等方面进行社会变革,必须在日常生活中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价值观来看待平等、自由、合作与政治责任等。

基于把性行为、孩子的生产方式与商品、服务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社会基础的观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主张废除阶级与性别,提出了再生产自由的概念。在贾格尔看来,再生产具有多重含义:第一种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是指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第二种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三种是指性行为、生育等养育孩子的活动。贾格尔所说的再生产自



由是从第三种意义上说的,包括妇女是否以及在什么环境下生养孩子的问题,包括性行为、生育自由等。贾格尔认为妇女的再生产自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53]:

第一,妇女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许多强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强制在于经济与法律上不允许妇女避孕与流产,妇女被迫成为母亲,除了成为母亲,妇女没有自我实现的机会;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社会,贫穷妇女因为强制绝育和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而被剥夺了成为母亲的机会;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强制的异性恋使妇女被迫成为母亲,剥夺了许多同性恋母亲对孩子的监护权。贾格尔指出,只要这些强制存在,妇女就不可能有再生产自由^[54]。

第二,必须让妇女获得再生产自由。佩特切斯基(Rosalind Petchesky)认为有两个理由:一是生物事实,是妇女怀孕、生孩子;一是社会事实,当今社会的性别劳动分工把照看婴儿与孩子幸福的工作与责任分派给妇女。所以,贾格尔提出,“再生产自由应该属于妇女而不是属于男性,因为当今生育关系把大部分生育工作和责任分派给了妇女”^[55]。

第三,妇女的再生产自由不只是再生产权利,而是生育方式的变革。如果要求的是再生产权利,那么养育孩子的责任必然由妇女来承担,所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趣不在于如何赋权给妇女以保护她们,而在于转变生育方式。妇女再生产自由不只是获得自由选择避孕与流产的权利,而在于变革现存社会状况,“日益明显的是再生产自由不仅与男性统治社会所具有的强制异性恋和强制母亲的特征相矛盾,也与资本主义具有的经济不平等的特征相矛盾。在现有社会秩序中,不可能取得再生产自由,再生产自由事实上是一种革命要求”^[56]。

第四,再生产自由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1)改变现有的性行为与生育安排,给妇女以生育自由与性自由,这两个方面密切相连,对性自由的控制也是对生育的控制,没有生育自由,就不可能有性自由;没有性自由也不可能有生育自由。(2)废除公共世界中的男性统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的再生产自由与维持资本主义和男性统治是矛盾的”^[57],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的男性统治,使妇女获得经济独

立、废除强制异性恋。“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发现,我们曾经在思想与实践方面,在性与阶级、家庭与社会、再生产与生产,甚至妇女与男性之间作出的区分,似乎与我们正在准备的社会不相符。对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通过再生产自由的探索,很好地说明了妇女再生产自由要求变革传统生产方式,如果没有妇女的再生产自由或变革生育方式,女性主义者不可能取得生产方式的变革。既然一个不可能先于另一个发生,既然两者是辩证地联系的,那么两者必须同时发生。狭义说来,生育与生产只是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资本主义与男性统治方式的整合”^[58]。

五、妇女立场(the standpoint of women):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知识论

贾格尔认为女性主义的人性理论、政治理论与知识论密切相关,女性主义不同的人性理论与政治理论源于不同的知识论。如何认识这个社会、对人性持有怎样的看法、如何确定认识的真假,通过对各种女性主义理论比较,贾格尔提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衡量理论合适性的最好标准,是最有用的妇女解放理论。

在贾格尔看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首次试图从妇女立场出发解释现实,但是由于其保持着传统自由理论的概念框架,维持着思想与身体、理性与情感、事实与价值、公共与私人之间的二元区分,尽管这些二元区分是性别中立的,却论证了使妇女屈从于男性的社会制度的永恒化^[59]。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存在一种中立的、不代表任何社会利益与价值、不带感情的观察者立场,把客观性作为其追求目标,并认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普遍有效的,体现了普遍的人类价值。对此,贾格尔指出,事实上不存在纯粹客观、中立的立场,因为任何一种知识都是代表了一种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或被统治阶级的立场。强调知识的中立性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主张知识是客观的,不受阶级利益及意识形态神话的影响,如此主张事实上经过主流世界观模糊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科学中立性的神话误导了被压迫者关于现存知识的阶级偏见,并鼓励他们相信神话代表了普遍真理”^[60]。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存在客观、中立的认识论立场,所有概念体系都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利益与价值。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其利益,通过特定方式、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解释现实,由统治阶级制造的知识与科学掩盖了它对被统治、被剥削阶级的统治与剥削。在贾格尔看来,尽管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但是如此立场实质上是有性别偏见的,因为它只代表了成年男性无产阶级的立场(很可能是白人无产阶级)^[61]。传统马克思主义范畴看起来是性别中立的,实际不是性别中立的,它促进了男性化的利益。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包括养育孩子、家务劳动、性活动等排除在政治经济的领域之外,既无视妇女这方面的重要经历,又系统地把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排除在外,因而它不可能全面。

激进女性主义者主张,妇女拥有与生俱来的感觉与情感,妇女对现实的认知完全不同于男性,甚至优于男性,但长期以来一直被男性统治的文化压制着。如何对抗强大的男性统治及父权制文化,激进女性主义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一是揭露传统政治理论的概念框架及其二元区分中掩藏着的、使妇女的屈从地位永恒化的男性偏见;一是提倡“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将妇女领域纳入政治领域;一是主张妇女文化。贾格尔对其评价道:激进女性主义是清楚地认识到需要从妇女立场出发将现实重新进行总体概念化的第一种理论^[62]。尽管如此,贾格尔认为激进女性主义也具有以下缺陷:具有生物主义、理想主义和把妇女经验普遍化的倾向,不重视种族歧视、帝国主义对妇女生活的影响,过分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代表了少数特权妇女的利益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当今社会的妇女遭受了特殊的剥削与压迫,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地位为妇女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认识论立场。贾格尔提出,正确地了解现实必须从妇女立场出发……由于妇女对现实的看法受到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和每日生活中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的歪曲,因此不能通过调查妇女现有的信仰与态度来发现妇女立场,尽管这样的调查也许能找到某些共性,这些共性包括在从妇女观点出发的对世界的系统表现中。相反,发现妇女立场必须通过政治与科学斗争的集体过程,妇女独特的社会经历形成的看法与男性对现实

的解释相矛盾,这些看法为从妇女立场出发解释现实提供了线索^[63]。贾格尔提出,妇女立场代表了那样一种看法,它揭示了妇女真正的利益,只有通过科学与政治斗争才能达到^[64]。具体说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妇女立场观包括:

第一,从妇女经验出发,代表妇女利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妇女立场以各种不同的妇女经验为基础,妇女之间具有不同经验、对现实具有不同的看法,但并不妨碍妇女具有独特的认识论立场,并以此建构知识、再现现实。在哈丁看来,妇女之间的差异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科学与政治资源,正如史密斯(Dorothy Smith)指出的,“从妇女观点开始并不意味着妇女具有共同看法,我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于社会关系组织将我们排除在外。”^[65]由于当下的所有知识都是对特定社会群体利益及价值的反映,而妇女立场反映了妇女的利益,因为妇女的从属地位使得她们不需要把现实神秘化,从而能够发展一种对世界的清晰可靠的理解,“从妇女立场再现现实比从男性立场再现现实更加客观、更少偏见”^[66]。所以,正如贾格尔指出的,只有完全认识彼此之间多种多样的差异,妇女才能发展出“对现实的系统再现,这个再现是没有受到歪曲的,它不需要通过把男人利益凌驾于妇女利益之上来歪曲现实”^[67]。

第二,创立一种不同于现有的对世界解释的系统理论。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涉及现实的方方面面,使得她们更加全面地再现现实,这种对现实的再现是一种全面的再现,表现为对当下权力关系的变革,重建的世界不再是妇女利益服从于男性利益,“只有妇女不受统治,她们才可能获得必要的资源从妇女立场出发创立系统、全面的世界观”^[68]。

第三,通过政治斗争与科学斗争的途径。妇女立场不可能只通过创立不同于主流男性的意识形态系统理论而自动达到,必须通过长期的政治和科学斗争,只有通过这样的斗争才能揭示系统、复杂的男性统治的现实^[69]。因为从妇女立场出发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要让男性理解与接受比较困难,必须通过政治与理论上的斗争才能达到;从妇女立场出发再现世界必然要求推翻物质上的男性统治,正如唐娜·哈拉威(Donna Harraway)指出的,“在确立不同生活与世界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必须发展出一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科学,只有物质斗争才能结束逻辑上的统治……这是一个斗争问题,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的生活结构使统治最小化,生活科学会是怎样的,但我知道生物学的历史使我们认识到那种基本知识将反映和再生产新世界,就像它已参与维持旧世界一样”^[70]。

综上所述,贾格尔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我认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从妇女立场出发的最有用的对现实的表现,其确定的理想与范畴直接以妇女生活与劳动经验为基础,可以克服当前理论的狭隘性与男性偏见。同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也是不完整的,留下了许多没有回答的问题;即使如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社会的视角,它建立在构成人类活动的更加全面更少偏见的概念基础上”^[71]。

贾格尔所描绘的女性生活中的种种异化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只是对妇女地位和状况的描述,并没有分析为什么妇女被排斥在劳动市场的边缘,并没有分析隐藏在女性异化背后的深刻根源。

注释:

[1]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年版。可参见 Lise Vogel 的其他文章: (1) “Questions on the Woman Question” (1979); (2) “Marxism and Feminism: Unhappy Marriage, Trial Separation of Something Else” 载于 Lydia Sargeng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3) “Marxism and Socialist Feminist Theory: A Decade of Debate,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1981): 209 – 301; (4) “From the Woman Question to Women’s Liberation”,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140 – 146.

[2]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28.

[3]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32.

[4]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7.

[5]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年版, 序言第 1 页。

[6]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6.

[7] 沃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 年第 5 期。

[8]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34 - 135.

[9] 马克思:《资本论》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5, 第 190 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93 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5, 第 194 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5, 第 208 页。

[13]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41.

[14]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45.

[15]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46.

[16]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52 - 153.

[17]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53.

[18]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55.

[19]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66.

[20]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70.

[21]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70 - 171.

[22]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72.

[23]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173.

[24]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69.

[25] 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2, 246.

[26]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还可参考贾格尔:“妇女解放的政治哲学”,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281—300 页;贾格尔:“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载于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191—214 页。

[27]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6.

[28] 贾格尔:“妇女解放的政治哲学”,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282 页。

[29]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9.

[30]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24—125.

[31]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30.

[32]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年版, 127.

[33]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24—125.

[34]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29.

[35]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36.

[36]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36.

[37]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37.

[38]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39.

[39] 参见 Ann Ferguson and Nancy Folbre: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313 - 338.

[40]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42 - 143.

[41]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46.

[42]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43.

[43]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148.

[44]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53.

[45]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07.

[46]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08.

[47]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10.

[48]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12.

[49]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15.

[50]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16.

[51]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16.

[52]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17.

[53]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18.

[54]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18.

[55]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20.

[56]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19.

[57]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24.

[58]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24.

[59]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88.

[60]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78.

[61]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79.

[62]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88.

[63]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71.

[64]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84.

[65]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86.

[66]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84.

[67][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68]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87.

[69]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84.

[70]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84.

[71]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89.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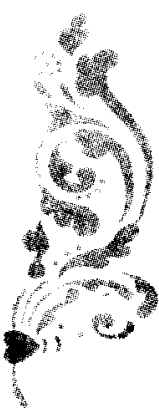


第五章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献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献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亨尼西在其《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话语的政治学》一书中,通过对社会、话语与物质性之间关系的探讨,阐述了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话语理论的形成;兰德里、麦克林在其《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一书中,通过对“政治”、“话语”与“唯物主义”之间关系的探讨,阐述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得出了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结论。

亨尼西: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话语的政治学》(1993)^[1]

罗丝玛丽·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英语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后现代批评与文化理论、性行为与同性恋研究。主要著作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话语的政治学》(1993)、《社会后现代主义:超越身份政治学》(1995)、《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关于阶级、差异和妇女生活的读物》(1997)(与他人合编)、《利润与愉悦:后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性认同》(2000)。

20 世纪 90 年代,一方面,西方女性主义面临着知识危机的挑战,“妇女”范畴、女性主义为了谁的问题都受到了质疑,妇女身份面临着被取消、女性主义被解体的境地^[2];另一方面,针对妇女的暴力、贬低女性气质和妇女工作、对妇女性行为 and 再生产能力的控制又需要持续



不断的女权运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一直处于努力接受这场挑战的最前列^[3],它是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思考。构成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对于女性主义政治目标的重要性如何?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各种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唯物主义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在对这些问题回答的过程中,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形成了自身的特点^[4]:第一,坚持社会总体分析,如关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分析,因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渗透在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融合了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等几种话语理论;第三,通过对以福柯、克里斯蒂娃、拉康、墨菲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话语理论和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考察,提出了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把话语理解为意识形态,并把意识形态同物质基础相联系。

全书由序言和“后现代研究中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朝向一种全球社会分析”、“话语的物质性:女性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立场、话语和权威:从妇女的生活到意识形态批判”和“新妇女,新历史”等四章组成,本节结合亨尼西、英格汉姆主编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关于阶级、差异和妇女生活的读物》(1997)^[5]一书序言对亨尼西的观点进行介绍。

一、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亨尼西和英格汉姆(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在其所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关于阶级、差异和妇女生活的读物》(1997)一书中阐述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产生的背景与发展过程,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成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指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一) 20 世纪 60、70 年代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早期和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在女性主义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女性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密切相关,发展了一种关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妇女地位理论:一方面,女性主义理论框架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随着美国民权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的开展,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伴随着这些社会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得以流行;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理论也受到新左派的影响。新左派尖锐地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但又提出资本主义只需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改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分享民主制。反映新左派政治立场和观点的《波特·赫伦宣言》指出,我们将以植根于热爱、思考、理性和创造中的权力取代植根于占有、特权和机会中的权力;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我们寻求建立一个人人参与分享的民主制;这个分享民主制允许人民参与决定影响他们生活的政治经济问题,开辟广泛的途径,使普通老百姓掌握权力和知识,以便他们控制自己的环境和命运^[6]。但在激进女性主义看来,新左派不关心妇女问题,他们提出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理想,注重改善人际关系,强调个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它却只字未提美国社会中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不仅如此,新左派忽视妇女和妇女利益,实质代表了父权制的权力关系,“一个宣称反对旧文化传统,主张人人享有民主的组织,却继续奉行传统的妇女观和大男子主义,这显然是矛盾”^[7]。但激进女性主义并没有全盘否定新左派,而是对新左派关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及个人是政治的主张进行了重新阐释和修改。

20 世纪 70 年代初,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政治分析,以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通过性/性别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探讨来解释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怎样对妇女施加压迫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面临着如何利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和改变妇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受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是性别盲的、忽视了妇女对社会生产的贡献;女性主义分析过分关注两性



关系,是非历史的和非充分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以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为根本任务,她们重新思考了生产、再生产、阶级、意识、劳动等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概念。

(二)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文化女性主义的转向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女性主义发生转向,开始从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向文化女性主义的方向发展^[8]。在亨尼西看来,文化女性主义具有如下特点:其目标是颠覆男性享有对女性特权的父权制价值体系;聚焦于父权制压迫的文化特征以及文化领域的改革;拒绝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强调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对于文化女性主义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意义,迈阿斯(Maria Mies)作了如下概括:“把教育、文化行动、甚至文化革命看作社会变革的动力,这一信念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关于妇女解放,以以下的假设为基础:妇女所受的压迫与基本的物质生产关系没有一点关系……这种假设可在西方女性主义,尤其是美国女性主义者中间找到,她们通常不把资本主义当作谈论的中心。对许多西方女性主义来说,妇女所受的压迫根源于父权制组织的文化中,对他们来说,女性主义大体是文化运动、新的意识形态或新的意识”^[9]。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在内,不把文化看作社会的整体,而是把文化看作社会生产的一个领域,把文化看作女性主义斗争的一个领域,尽管如此,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的阶段看,文化女性主义是其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

(三)20 世纪 80、90 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20 世纪 80、90 年代主流女性主义在许多方面受到批判,包括有色人种、同性恋、工人阶级、第三阶级妇女在内的非主流妇女,迫使女性主义质疑普遍适用的“妇女”概念和以性别为中心的女性主义探索,迫使女性主义质疑普遍的“妇女”范畴、普遍化的“妇女经验”。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强调差异中的主体,妇女因种族、阶级、性别、性行为不同而

存在巨大的差别,普遍适用的妇女范畴不再存在。这种源自于后现代话语中的主体与差异问题成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主题之一。

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主张根据偶然性、当下的权力关系或话语来分析、理解社会生活,不再考虑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起过关键作用的社会结构、生产、父权制、阶级等概念,几乎全部聚焦于意识形态、国家与文化实践、身体的意义及快乐等;主张对社会生活的当下的、偶然性的解释,拒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观点,贬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关于社会变革的主张,社会变革的视野消失不见了。在亨尼西看来,当许多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的分析是唯物主义的,甚至在她们自称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实质上是文化唯物主义,反对系统的、反资本主义的分析,把文化的历史和意义产生与资本主义的阶级体制相联系;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对概念的选择中,把知识的生产、身份的形成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球体制相联系,在这层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正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10]。

(四)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解放的重要知识

在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挑战相伴随:一方面女性主义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妇女受剥削与压迫的社会结构分析;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提出挑战,形成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不同名称。这些名称表明它们不同的强调重点或使用了不同的概念,但所有这些概念都表明女性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11]。如果说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其他几个概念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前者包括了关于语言、主观性、主体等后现代概念分析,也就是说,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具有后现代特征。

20 世纪 80、90 年代,当发达国家的女性主义者忽略马克思主义或拒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过时的、与妇女解放不相关的甚至是妇女解放的障碍时,世界三分之二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仍把历史唯



物主义当作社会革命的理论^[12]。在亨尼西等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引起女性主义者的兴趣,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解放的重要知识^[13]:第一,关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理解与改变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系统途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变世界,正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的,理论与实践、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第二,人类生命的生产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把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作为其解放理论的出发点,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生存,首先是生活资料的生产,生命生产的系统过程包括各种活动,这些活动采取劳动分工、生产关系、国家组织、意识或文化组织等形式;第三,解放以总体变革为前提。社会变革的目标是消除社会中系统的剥削和压迫,实现这一目标不可能只通过改变社会生活中经济、国家或文化内部某一领域的不平等,真正的解放是社会总体的变革;第四,文化领域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安排必须通过“知识制造”为其提供意识形态基础,为其在劳动、权力与资源等方面的分工提供合法的理论依据,因此文化领域也是阶级斗争的场所。

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与发展来讲,它是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受文化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

1. 从其起源来讲,直接起源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的努力

在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争论中达成的普遍共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有着各自的缺陷,必须加以结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因其阶级偏见、其关注于资本主义生产,很少能够分析父权制权力体系,必须加以改变才能用来说明性别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理论因其本质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妇女”概念也成问题。

2. 从其发展来讲授文化女性主义的深刻影响

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相比,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具有后现代的特征。“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相区别部分,是因为它包含了后现代的语言与主体性(subjectivity)”^[14]。

与文化女性主义相比,它不把文化看作社会生活的整体,而看作社会生产的一个领域,因此也是女性主义斗争的一个领域。

3. 与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伴而生

在亨尼西看来,要充分理解女性主义关于如何理解妇女生活物质性的争论,必须关注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因为它是当今西方学院派女性主义的主流话语。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变:(1)向文化唯物主义的转变。尽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不同的特点,但自然而然转向文化唯物主义、远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已经成为一个跨国的普遍趋势^[15]。(2)从聚集在唯物主义旗帜下到放弃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转变。按照沃格尔的解释,唯物主义是一面旗帜,用来标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一个左翼的流派^[16]。对当时大学里的许多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尽管她们也对大学的作用提出批评、对大学的权威进行挑战,但她们也面临着如何在这种制度中维持生计而不放弃激进政治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矛盾状况,有些人选择成为处于大学边缘的反对派知识分子,而许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不仅融入了职业中产阶级中,而且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17]。(3)如何理解后现代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后现代主义危机,不仅应把它看作文化危机,是对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等领域中的经验主义、本质主义的挑战,而且应注意到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新帝国主义安排的密切关系,作为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深深根植于跨国资本依赖的父权制结构^[18]。

总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意义和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心理分析理论等几种话语的结合^[19]。正是在对这多种理论的结合中,亨尼西与英格汉姆确定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目标:“在后现代理论看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拒绝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维度,是一种对于社会有局限性的和有偏颇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用词句反对词句的努力。解构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背景,把社会看作主要是文本的,把意义看作是语言不稳定的结果。许多文化唯

物主义者批评或远离解构的文本分析,但他们也利用把社会生活还原为再表现的理论框架,尽管有充足的根据把语言理解为话语。相反地,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目标就是要明确以下问题:为什么身份再表现一直在变化?为什么他们没有采用与上世纪甚至50年前同样的形式?为什么身份的变化与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命生产的历史转变相联系?”^[20]

二、全球社会分析理论

亨尼西不赞同后现代主义拒绝对社会进行总体的、系统分析的观点,主张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必须既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体进行批判,又强调考察妇女之间的差异。她批判地继承了福柯、拉康和墨菲等后现代理论家的思想,认为他们关于社会批判逻辑的论述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概念,每个概念框架都构成了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的基础。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就是在对后现代思想的批判考察中形成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要维持其激进的力量,需要一种分析,能够详细说明如社会(the social)、物质、话语、妇女与历史等关键概念^[21]。

(一)把社会范畴理解为意识形态

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建构方式,社会范畴是通过文化文本生产与再生产的,可被理解为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安排的关系中,前者帮助后者产生,也是由后者产生的;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作为意识形态实践,并通过这些实践进行意义建构;在文化叙述中,“什么才算是社会”和资源与权力的分配、价值范畴、包含的术语、排除的术语相互影响,作为文化叙述中的社会逻辑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因为社会逻辑构成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主观性,使得流行的生产关系永久化。在亨尼西看来,这种社会范畴理论不同于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实用主义者认为社会只是一种广为传播的多元实践、只能根据特定的技术和政策来理解的主张,也不是把任何社会理论作为元

话语,而是指社会作为一种知识范畴历史地成为物质生活产生的原因^[22]。

亨尼西提出阅读是一种阅读实践,是理解文本的意识形态实践。话语文本并不是已经写好的文件,而是在建构意义的实践过程中,发生于文化话语与阅读方式中,为了资源与权力的斗争。在社会的话语建构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种阅读方式,不以科学真理为基础,而以解释的权力和解放的社会变革为基础。亨尼西之所以主张这样的阅读方式与阅读实践,是因为她认为兼收并蓄的主流阅读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把它的解释框架与它建立的前提相联系;主张多元逻辑,以新的、后现代的叙述为基础,使用诸如话语、主体、位置性(positionality)等术语,却没有理解这些概念建立的前提;把知识看作是不证自明的,而不是把它置于一系列历史坐标中;没有处理话语的物质性;对于文化差异持多元论的观点。

(二) 全球社会分析理论

亨尼西把全球化区分为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与系统阅读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渗透过程。由经济安排、政治安排与意识形态过程构成的社会总体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必须对这种社会总体进行解释与分析。全球社会分析理论不把社会看作某个固定的结构,而是把文化、经济与政治实践当作系统,对系统中各种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全球化是一种关系思考^[23]。

第一,全球社会分析理论包括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社会构造(social formation)、连接分析(conjuncture analysis)等方面的分析。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事物的生产与生活的生产;社会构造用于处理与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特殊联系,如在从帝国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持续利用父权制的家庭/户的问题;连接分析涉及对于特殊历史时刻下的特定社会构造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具体的制度机制产生的影响^[24]。在构成社会总体的所有方面中,社会生产领域与其他领域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劳动分工、

剩余分配与生产、消费模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方面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关系中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受前者的影响。

第二,全球社会分析理论把权力理解为剥削。这种对权力与剥削关系的说明为揭示妇女受剥削的实质提供了理论基础。拥有社会资源的阶级依赖于另一个阶级并占有其剩余价值,这一剥削的过程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群体依赖于对其他群体的剥夺、拥有控制社会资源的权力,这种权力不仅体现在经济过程中,还延伸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中。这种关于权力等级特性与系统性的概念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父权制和种族歧视的压迫是如何深深地参与到社会财富的不平等的控制与分配中的^[25]。

第三,全球社会分析理论提出意识形态是生产的决定和被决定领域,这为理解种族的、性别化的、阶级主观性的产生提供了途径。每个主体处于种族、阶级、性别、性行为、民族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坐标中,处于由这些因素构成的综合地位中,因此主体具有多种多样的甚至是矛盾的地位,这为改革政治同盟和集体干预提供了基础。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使这种联盟中的主体性产生分离,使得无论在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层面上都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潜在危机的场所,有可能形成相反的意识形态立场。亨尼西提出,从意识形态方面详细阐述相反立场产生的过程,需要更加发达的唯物主义话语理论^[26]。

这种全球社会分析对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具有以下意义:第一,可以看到工作场所与家庭、郊外与贫民区、殖民地与大城市作为特定的及相关的剥削场所。第二,全球分析逻辑使得“妇女”差异范畴的探讨成为可能。尽管第一世界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都处于生产与消费的剥削关系中,受父权制压迫,但妇女之间又因阶级、种族、性别歧视、性行为而不同。第三,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市场和消费实践的建立如何与消费、生产互惠互利地联系在一起,又如何依赖于妇女、少数种族、第三世界人口并把他们作为扩充资本的主要场所。第四,社会彻底的改变不可能发生在单个制度或社会组织中,必须彻底改变现有的权力关系,对权力的局部批评会掩盖剥削发生在多种多样的社会空间中,事实上会有助于维持全球体系^[27]。

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话语理论

亨尼西指出,要形成唯物主义话语理论,必须批判地阅读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福柯(Michel Foucault)、拉克劳(Ernesto Laclau)、墨菲(Chantal Mouffe)的唯物主义话语理论,尽管他们的话语理论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都关注话语理论与物质性概念的关系、话语与非话语的关系、理解文化的方式、身体概念等多方面的问题。

亨尼西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具有重大影响,为发展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打开了富有成效的途径;事实上,作为一种截然不同的话语,美国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主义利用福柯思想的结果^[28]。福柯的话语理论包括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话语与其他一切、话语与权力、权力与知识、权力与身体等。福柯关于话语的物质性的论述包括:第一,话语实践,即把话语界定为实践。福柯认为话语实践处于与其他实践的特定关系中,从实践方面突出了思想与其背景之间的关系;第二,话语实践的前提是一种物质存在,话语不可能离开由其组织和构成的物质关系的制度体系;第三,当话语实践与其他实践相联系时,物质性是话语实践本身固有的;第四,话语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决定其他社会力量,又是由其他社会力量形成的。福柯实践概念的物质性实际上是以唯物主义的、处于思想和话语之外的“现实”为基础,尽管福柯没有解释现实与话语之间的联系,但他从特定的物质或制度背景中描述了对话语的利用,代替了普遍化的解释^[29]。

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在其《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1985)一书中,表达了当代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传统的同时,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力图解构和超越马克思主义:第一,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把复杂的历史归结为或还原为生产力、经济机制,具有经济决定论、本质论与还原论的性质,主张拒斥与解构历史唯物主义;第二,批判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主体、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及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思想;第三,他们主张社会偶然性逻辑,认为社会历史是一种非决定论的随机建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社会历史只是任意的关联、随机发生的事件与各种偶然性事件的聚焦体;第四,主张权力是一种政治安排,一种压迫与对抗的关系,这一理论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所关注,权力充斥于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安排中;第五,主张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中包含了社会主义的维度,为了实现这种社会主义必须结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30],但他们的多元民主理论实际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的结合。

在亨尼西看来,福柯与拉克劳、墨菲的两种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关于社会分析的方式,对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阐释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关于主体和语言理解的立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两者克服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困境,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社会机构概念如阶级主体,提供了理解主观性话语生产的途径,拓展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复杂努力^[31]。总之,他们关于主体、主体差异、女性主义与其他社会解放运动的关系的论述,有助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话语理论也存在不足:第一,不能解释阻碍我们理解主体性产生方式中的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关系;第二,没有解释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物质关系;第三,有碍于理解话语与非话语的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

亨尼西认为,在话语问题上,必须根据种族、阶级、性别、性行为等各种差异来理解妇女的话语构成,要求解释差异的话语构成与剥削的社会安排之间的联系;打破西方知识与剥削再生产的共谋;必须面对理论话语的物质结果。亨尼西通过立场论继续讨论了话语物质性。

在唯物主义者对西方认识论的批判中,女性主义立场论^[32]占有重要地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为了对女性主义的目标(女性主义为了谁)进行更加合乎逻辑的解释,一开始就从马克思、恩格斯、卢卡奇和其他人的一些观点出发发展了立场概念。立场涉及到在社会中的一种地位,是通过认识方式、权力结构、资源分配形成的,这两者之间也相互形成。女性主义立场论提出女性主义的这种地位是从有利于妇女生活

(包括她们的活动、利益和价值)的观点使现实概念化的方法^[33],涉及以下复杂问题:第一,如何理解批判的话语立场与相应的妇女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二,女性主义立场是社会建构起来的理解世界的方法,如何理解妇女生活和经验先于女性主义;第三,女性主义话语的物质性与妇女生活的经验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如何;第四,如何判断女性主义的特殊性以及它的政治目标与其他解放观点之间的交叉关系^[34]。

从认识论方面来说,围绕着把妇女生活还是把妇女经验作为知识的基础,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经验主义,一是主体理论。女性主义立场论批评经验主义把妇女经验作为知识的基础,使得妇女范畴均质化为普遍、明确的范畴,强调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一切归化为性别,界定妇女的其他社会范畴都消失不见了。后现代语言中的主体理论为女性主义立场论提供了有用框架,使妇女概念化为具有差异的话语构成。话语理论把妇女生活作为知识的基础,尽管这不同于从妇女经验出发的分析,但是在亨尼西看来,用妇女生活代替妇女经验本身并没有解释生活与理解方式之间的关系^[35],而且如果把主体理论化为话语观点的聚集,那么如何理解妇女生活的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立场论为解释知识、权力与主观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批判框架,但是它面临着被建构的话语主体与经验自我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一矛盾,使得立场论没有解释话语(女性主义批判)与非话语(妇女生活)之间的物质关系^[36]。

在亨尼西看来,摆脱这种困境的途径就在于把话语理解为意识形态。通过理解资源分配、劳动分工、权力形成等机制之间的多重关系,意识形态理论能够理解社会现实形成的复杂途径;能够认识到通过相互联系的物质实践,像父权制与种族歧视这样的社会总体的系统运作;这些总体又界定了社会构成的许多领域如劳动分工、国家干预、民事权利、生产、消费场所的流动、殖民占领的重新想象与想象的殖民化等^[37]。“把话语理论化为意识形态,表明女性主义立场是一种批判的话语实践,一种阅读行为,介入和重新安排到由其支持的意义建构和社会安排中”^[38]:第一,阅读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包括所有意义的建构实践,是对经验主义把阅读看作破译过程的挑战。在亨尼西看来,女性主

义立场在于用一种发达的唯物主义去解释这种阅读与女性主义作为批判实践之间的关系,这是根本的社会变革的需要。第二,阅读实践是批判。它与作为女性主义批判实践的提高意识^[39]有着历史的相似之处,但它不同于女性主义者持有的把主体看作是不证自明的经验自我的经验主义立场,它主张意识是由意识形态产生的,把意识置于话语与历史中,把它与危机、意识形态相联系。主流意识形态会继续掩盖社会想象中的裂缝,这是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社会安排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它会继续参与危机处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批判从这些裂缝中提出问题,并使它们历史化,把它们看作其他叙述的基础^[40]。第三,作为反领导权的话语(counterhegemonic discourse),不仅从危机中产生,而且还会引起意识形态叙事危机,这一过程通常包括以下步骤:(1)通过阅读指出文本逻辑中的自我矛盾;(2)通过把它们读作意识形态而不是历史的矛盾力量来解释文本中的危机;(3)通过另一种叙述发现文本中大量的问题。从这方面来说,为了社会变革,批判挑起和利用了意识形态危机。亨尼西指出,批判并不是要愈合危机,而是要证明,文本中的内部矛盾是更大社会构造的产物,同时又有助于危机的产生,这种矛盾不可能在当下体制中得到解决,所以有学者称这种批判是一种“危机诊断”(crisis diagnosis),是使未来的社会变革成为可能^[41]。

在亨尼西看来,作为对普遍知识干预的策略,意识形态批判为重新把女性主义立场思考作为一种批判实践提供了途径,然而这一工作必然面临着后现代唯物主义主体与作为女性主义知识基础的妇女群体身份之间的不一致^[42],一旦主体成为话语的集合,那就不会有身份来再表现或解放主体,因而在身份政治上会面临双重压力:一是来自后现代对主体的批评,这是意识形态干预的结果;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使得巨大的无产阶级主体变得不合适。亨尼西通过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概念考察了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反认同(counter-identification)和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三种身份观点。亨尼西主张不认同的身份观点。不认同为把女性主义立场重新想象为意识形态批判的集体主体提供了有效途径,这种不认同立场具有:第一,这种集体主体不必以科学或真理为根据,不是知识论的,而是政治的,

以把知识理解为意识形态为根据;第二,不主张任何一种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作为它的基础,而是代表了一种反领导权的集体主体;第三,批判立场的依据不是经验,而是处于历史过程与产生于那种体制之外的主体的“地位的接合系统”(articulated system of positions),是产生于批判话语或批判分析的产物,通过展示重建差异系统的历史性取代了个人或群体身份;第四,这种集体主体的立场并不是要消除差异,而是确保这些差异不会成为支持等级制的社会关系与象征秩序的根据;第五,这种主张把重点放在从关注妇女生活还是妇女经验作为知识的根据到关注知识(作为理解世界的途径)产生的影响。

意识形态批判立场成为亨尼西所主张的新妇女新历史的基础,把话语概念化为意识形态为女性主义理解权力/知识关系的物质性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为推进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提供了框架^[43]。正如斯各特指出的,“这种新历史将为重新思考当前的女性主义政治策略和乌托邦的未来打开可能性,因为它提出必须在与政治与社会平等视野的连接中重新界定和建构性别,它不仅包括性,还包括阶级和种族”^[44]。在亨尼西看来,新妇女新历史具有以下内容:第一,妇女的历史,并不是要用妇女主体的编年史代替男性主体的编年史,而是把冲突、歧义、悲剧恢复为历史过程的中心,把“妇女”作为新领导秩序中的关键人物;第二,女性主义理论的关注点从“性别”转向差异,女性主义历史把差异当作历史过程的中心;第三,把历史阅读为意识形态,历史作为一种文化叙述总是对现实的干预;第四,女性主义历史与女性主义理论、身份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女性主义如何将“妇女”理论化?这决定了女性主义为谁说话的问题。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阅读新妇女历史,涉及到女性主义如何理解她们的利益以及对妇女的重新叙述。

主张意识形态批判话语与女性主义立场的集体主体,借助于平等分配社会资源与权力、结束剥削、废除父权制系统分析的目标,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立场能够与其他反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政治话语结盟,提供新的变革与乌托邦的潜力。

兰德里与麦克林：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1993）^[45]

兰德里（Donna Landry），英国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英语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英国文学与文化史，还研究东西方关系，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劳工阶级与妇女。麦克林（Gerald MacLean），英国约克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其研究领域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文化理论、教育理论等。两人合著《唯物主义女性主义》（1993），合编《加·查·斯皮瓦克读物：斯皮瓦克著作选》（1996）与《重提国家与城市：1550—1850年的英国与文化政治》（1999）等。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一部关于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该书考察了20世纪60、70和80年代英美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并透过这些争论追踪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起源；该书还考察了20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主题向20世纪80—90年代建构唯物主义文化分析主题的转向，并透过女性主义对反种族歧视、后结构主义、性行为史、殖民话语批评和后殖民性以及绿色生态运动的关注与讨论，探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

兰德里、麦克林认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种对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人工产品（包括文本、档案文件和理论著作）的批判研究或批判阅读，一种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不断地复述大实话成为潜在的政治斗争场所^[46]。批判地阅读复杂的文本、批判地阅读社会与文化实践，对于

女性主义政治、对于政治活动理论化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德尔菲指出的,通过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我们必须意识到每天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的要求,这是一种与社会制度的斗争或在社会制度中的斗争,是一种知识革命。“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种学术观点,它的产生对社会运动、女权运动和知识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观点不会也不能限于一类人、不限于妇女所受的唯一压迫,它不会不改变现实、知识、世界。女权运动以变革社会现实为目标,女性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必须以变革知识为目标”^[47]。他们还考察了学术运动或学术研究的政治学,其中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解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观点的发展,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政治上不可抗拒的”^[48]。

他们还通过女性主义、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对比考察,指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区别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坚持以阶级矛盾和阶级分析为中心,并尝试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展开对性别压迫的分析;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除了阶级矛盾、性别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性别化的社会实践具有物质基础与影响之外,也应当把其他矛盾看作物质的,这些矛盾也有历史,也在意识形态中活动,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且产生物质影响。我们认为,那些自称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社会分析和文学分析,应该承认物质的重要性。这些范畴至少包括种族、性行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它们的全新批评^[49]。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必须研究这些范畴,因为诸如反种族歧视、反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社会运动是对这些压迫意识形态的批评。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当然这并不是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而是依主题不同的三个不同阶段:一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相遇;二是美国大学女性主义研究的制度化;三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巴雷特在 1988 年以《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的相遇》^[50]为题的再版序言中表达了这一转变。她指出,包括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在内的任何理论思考

的基础,必须以福柯、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引起西方哲学史的根本转向为背景,必须接受其带来的挑战,并根据这些知识转向来准备,“后现代主义不是你能赞成或反对的什么东西:重述旧知识不会使它消失,因为它是一种文化气候,也是一种知识立场;是一种政治现实,也是一种学术时尚。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论据已经表达了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工作在未来要解决的关键立场”^[51]。

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发生了怎样的转向?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身份政治如何可能?兰德里和麦克林通过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在文学及文学批评中的应用作出了回答。全书由三部分、十章组成,第一部分追踪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遇的历史,概述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二部分聚焦于女性主义理论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的应用;第三部分得出了朝向一种绿色文化批评的结论。因为兰德里与麦克林在追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概括,同时也对自80、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所以本节介绍的重点放在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我们可以借助兰德里与麦克林的总结,对本书前面几章的介绍有一个融通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弥补遗缺的内容;透过兰德里与麦克林对女性主义向何处去的回答,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或部分答案。

一、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相遇

为了追踪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起源,兰德里和麦克林主要考察了英国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论争的过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开始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关于性别分析与阶级分析的政治目标的讨论”^[52]。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如米切尔、哈特曼、扬等,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相遇问题。兰德里、麦克林对英国相关情况的考察以米切尔与巴雷

特为代表^[53],对美国相关情况的考察以爱森斯坦与沃格尔为代表^[54]。

米切尔在 1966 年发表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试图解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遇到的棘手问题,试图提出女性主义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回答。米切尔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根据家庭提出妇女问题,妇女问题的讨论淹没在家庭分析中;主张妇女受压迫源于生产、再生产、生育与性行为综合结构中的地位,妇女解放必须改变结合在一起的这四大结构;另一方面,米切尔曾尝试把马克思的社会分析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相结合,但《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1974)的出版,表明米切尔完全转向了精神分析方面。纵观米切尔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一方面她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解答女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一方面又强调精神分析的重要性。

巴雷特的《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1980)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争论中的关键文本,标志着美国式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确立。该书通过把阶级分析与性别分析结合起来的努力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相遇。巴雷特的著作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此书有无视种族、民族中心主义、具有白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特征等局限,但它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内部提供了对正在制订的女性主义政治问题的最好分析,巴雷特的整个工作代表了最好的英国白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55]。巴雷特的主张与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早期出现的文化女性主义密切相关,强调意识形态分析对于妇女受压迫问题的重要性:“女性主义要向前发展,必须理解社会中的精神方面,应对包括福柯话语理论在内的各种知识的挑战,不仅包括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直接联系,而且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与阶级分析的转变”^[56];同时受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拉康等后现代理论的较大影响,巴雷特在 1988 年以《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的相遇》为新标题再版的序言中,吸收了自 1980 年那本著作出版以后 10 年间发生的一些重要理论转变,并强调这些重要理论转变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争论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以调和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社会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计划据说被搁置

了,它是被放弃了而不是被解决了”。在《真理的政治学:从马克思到福柯》(1991)一书中,巴雷特提出福柯话语理论,为摆脱女性主义试图利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所形成的绝境提供了途径^[57]。

爱森斯坦在其《女性主义与性平等——自由美国的危机》(1984)一书中明确提出妇女构成性阶级的论断,“我使用的阶级术语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妇女不是阶级意义上的经济阶级,她们是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性阶级……这些经济阶级划分是根据妇女在家庭结构和种族歧视秩序中的地位来界定的。妇女间的经济阶级分工并没有推翻性阶级的概念,她们要求承认性阶级内部的经济阶级差异”^[58]。爱森斯坦既主张妇女构成性阶级,又强调妇女之间存在的经济、种族差异。妇女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性阶级?爱森斯坦认为,当妇女意识到自身是妇女,就自动构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也就是说,妇女构成一个阶级,是通过她们作为妇女的意识。在兰德里等看来,爱森斯坦关于妇女构成了性阶级的思想难以在理论上提高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它只是简单地重复了她以前通过相对静止和非历史方式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讨论^[59]。

沃格尔牢牢地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她自称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但她有别于许多美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她不满意于简单地扩展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妇女问题,主张只有复兴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建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综合,才能给妇女问题与妇女解放以理论指导。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和19世纪其他社会主义者关于妇女问题与家庭的著作考察为基础,以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分析为前提,把对妇女受压迫的探讨建立在社会再生产尤其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上,她认为妇女受压迫源于她在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家务劳动与平等权利中的双重地位。

二、女性主义的制度化

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密切相关,女权运动形成并促进了妇女研究。美国妇女运动的成就具有不断地为大学中的妇女研究制度化和社会制度中的女性主义思考而斗争的特征,它们起源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时刻和政治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英国于 20 世 60 年代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尽管美国自 19 世纪晚期以来一直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传统,但正是女权主义者把她们的斗争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斗争、反战运动与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把女性主义设定为政治议程联系在一起^[60]。威尔(Ware)在其《妇女权力》(1970)一书中强调了三大批判的结合:美国社会的反种族歧视批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批判与激进女性主义者对社会制度包括婚姻、同性恋的批判^[61]。

(一) 黑人女性主义的推动作用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反种族歧视者与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密切联系,一些是社会主义者的黑人女性主义者试图把这几方面结合起来^[62],1977 年自称是卡姆比河团体(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黑人妇女发表的“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声明”^[63]就是这种结合的证明。这份声明被认为是黑人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它赞同马克思关于经济关系的分析,同时认为必须扩充到能够解释作为黑人妇女的特殊状况;她们提出必须同时反对种族压迫、性压迫、同性恋压迫与阶级压迫,“我们在解放运动以及白人男性左翼组织周围的经历和幻灭,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制定不同于白种女人的反种族歧视政策,以及不同于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反性别歧视政策”^[64],这种观点被称作“互相连锁的压迫制度”的分析框架。从此以后,很多黑人女性主义者在这一框架下作了具体阐述: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把黑人妇女面临的困难表述为:黑人妇女感到她们不得不在两种运动中作出选择,一种是为黑人男性主要的父权利益服务的黑人解放运动,另一种是为白人妇女种族主义者的主要利益服务的妇女解放运动^[65]。胡克斯认为,既然所有这些压迫都是连接在一起,不可能单独消除哪一种压迫形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偏见,即便在理论上可以分开,实际上也是不可分



的。这些压迫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提前被铲除,不可能在与之相连的其他压迫形式被消灭之前寿终正寝^[66];柯林斯把黑人妇女所受的多重压迫阐述为妇女在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相互依存的三个方面所受的压迫,并且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比经济与政治方面更强大、更持久^[67]。

黑人女性主义对妇女受压迫及其如何结束的深入探讨,对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女性主义内部的批判力量,对于改变占主流地位的以白人为中心的女性主义理论、对于关注妇女之间的差异、形成多元化的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少数民族与工人阶级妇女的女权主义活动不仅改善着她们自身的生存环境,也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她们从本民族本阶级的立场上发出不同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呼声,成为女权主义内部的一种批判力量,赋予女权主义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妇女运动早期的各种观点在她们的质疑、挑战下不断被否定、被修改,而对不同种族、文化和阶级的妇女不同要求的日益关注,则使女权主义理论在80年代后日趋丰厚、成熟。少数民族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的实践和理论建树正在改变着‘女权主义’一词的内涵。”^[68]

(二)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局限

兰德里等通过女性主义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探讨,指出近几年美国大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不足。他们以牛顿与罗森费尔特(Newton and Rosenfelt)的论文集《女性主义和社会变革:文学与文化中的性、阶级与种族》(1985)^[69]和托丽尔·莫娃(Tori Moi)的《性/文本的政治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1985)为文本进行了分析。

在前一本书中,作者宣称出现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试图以更加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名义,建构一个包括种族、同性恋、性行为思考的唯物主义联合计划,并向这些领域互相连锁的压迫制度发起攻击。但在兰德里看来,她们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论述在许多方面不令人满意,最主要的在于她们赋予文学享有对政治的特权;如果她们真的希望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主义政治学联系起来,就不应该把

讨论限定在文学领域中^[70]。在后一本书中,作者对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理论缺点进行了批评,她反对美国对理论的拒斥,颂扬西克苏、伊里加雷和克里斯蒂娃等法国女性主义学者^[71]。但兰德里批评莫娃,说她简单地攻击理论缺乏的观点,而不是分析与那些后结构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其他女性主义者、其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之间的交叉,这绝对是一种错误。

兰德里认为必须而且有理由超越他们的观点:一方面因为与女性主义的相遇使得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传统得到极大的改变;另一方面自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取得的最重要成就是在美国大学处于边缘地带、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种观点的制度化。

(三) 女性主义的商品化

女性主义的制度化与女性主义的商品化密切相关。简单地反对女性主义的商品化是没有用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使包括妇女在内的一切都商品化了,文化发展的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兰德里根据马克思的商品理论指出了妇女与女性主义的商品化在于其均质化与统一性。美国女性主义者盖尔·卢宾(1975)和法国的伊里加雷(1985)注意到妇女作为商品对男性统治的重要性。妇女的社会价值只在于她们只能由男性进行交换,她们能被交换只是因为她们具有可比较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如何抵制妇女作为可交换的商品,伊里加雷建议,妇女反抗不是通过进入市场中,不是通过顺从交换,而是开创包括社会、性、语言和经济的新形式^[72]。女性主义的商品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兰德里着重分析了两个方面:

第一,女性主义学术的市场化。按照爱丽丝·佳丁(Alice Jardine)的观点^[73],美国学院派女性主义者按其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分为四代:第一代是在 1968 年前;第二代是在 1968—1978 年间;第三代是在 1978—1988 年间;第四代是在 1988—1998 年间。女性主义课程纳入到大学课程中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74],这使得第三代与第四代具有以下特点:她们有机会接受女性主义的专业训练;较少妇女群体、妇女

问题积极分子的实际经验;她们把女性主义或妇女研究作为其他学术领域中的一个领域,一种畅销理论或学术观点。女性主义学术的市场化以及女性主义课程在大学课程中的出现,是女性主义商品化的标志之一^[75]。

第二,贴上法国女性主义的标签。美国的学术市场推崇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尽管其他各种女性主义如心理分析的、解构的、黑人或非洲—美国的、后殖民、同性恋、新历史主义者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不时出现,所讲授的女性主义理论极有可能是法国女性主义。之所以被包装成法国女性主义理论,那里因为成为法国人,意味着理论^[76]。以西克苏(Helene Cixous)、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和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备受推崇,包括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威蒂希(Monique Wittig)在内的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相对被忽视。

三、解构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以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翻译德里达《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为标志;1985年是重要转折点,纽顿与罗森费尔特所编论文集《女性主义和社会变革:文学与文化中的性、阶级与种族》使得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广为传播;莫娃的著作《性/文本的政治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许多著名的美国女性主义评论家进行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在解决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而产生的问题中出现的。直到1985年的二十多年中,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一直在努力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希望形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但却遇到很多无法解答的问题与矛盾。兰德里认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使得唯物主义能够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更相容^[77],因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研究女性问题的方法或思潮,它与整个女性主义的转向密切^[78]相关。这里可把兰德里、麦克林关于唯

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特点概括如下:

1. 强调话语、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理解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键,在于人类活动的非经济与主观方面;物质生产、政治文化制度、活动与意识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语言是实践的意识,一种在世界中具有物质后果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语言和文化产品的生产不是作为纯粹的智力活动,而是作为“实践的意识”形式,与所有社会物质活动不可分离,其本身是物质的、生产性的活动。威廉姆斯致力于把人类主体作为文化的动因放回到唯物主义的争论中^[79]。

根据威廉姆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文化或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是:符号、表达系统、意识形态、表现和话语的生产本身是一种物质活动、具有物质的结果。产生于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话语处于物质实践中、具有物质效果,甚至还会影响经济基础结构。只有从人类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复杂活动出发,而不仅限于物质生产,才能够分析妇女的作用以及妇女受压迫的复杂性,避免经济简化论的局限。

2. 解构的影响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形而上学中心主义的批判。包括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阳具理性中心主义(phallogentrism)与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80]的批判;二是提倡解构式阅读。德里达认为,语言的含义是差异关系的产物,语言是多义的、变化的。所指(signified)包括概念,从来没有内在固定的含义;能指(signifier)如声音、比喻,在它与其他所指的区别中产生意义,处于永远被延期的状态。英国女权主义者克里斯·威顿(Chris Weedon)指出,所指总是处于话语的语境中,这个语境决定了某个能指的特定含义,也就是说,话语是在差异中产生的^[81]。三是阅读与阐释文本的策略是诉诸差异。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对于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解构可被用于克服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许多方法论的限制和实践问题^[82]。

3. 对马克思文本的批判性阅读

在解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过程中,福柯的权力和话语理论、拉康的心理学、语言学理论和德里达的差异和解构理论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后结构主义工程被看作是与唯物主义的结盟,或至少是哲学上对唯物主义的批判,那这就是德里达的工程。历史与唯物主义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相互支持的两个主要术语,它们仍然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术语。如果一个人是唯物主义者,那他就会认为德里达的工程对历史和政治学的政治思考是有效的……可把这种后现代工程的某些方面描述为是在马克思之后唯物主义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扩展,它们还指出了超越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产生困境的道路”^[83]。

对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斯皮瓦克采取了借鉴与批判、继承与超越共存的态度^[84]。贯穿于斯皮瓦克学术思想的三个研究领域是“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但是斯皮瓦克著述的力量多半来自于其反复重申的表述,即这三个领域只有通过不断关注它们的相互渗透和重新表述才能得到理解和运用”。在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斯皮瓦克的主张是:“今天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各自的立场上去认识两者之间的矛盾。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至多是不考虑妇女斗争的重要性,至坏是对妇女斗争摆出一副屈尊附就的架子……我更推崇那种在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与其历史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去探讨其‘基本真理’的工作”^[85]。斯皮瓦克主张返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进行解构的阅读,这是一种在其所有的比喻与概念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进行的批判阅读,“一个人希望通过批判简单地返回到马克思,这是一种幼稚的希望,我们希望认真地重读马克思,在女性主义内部给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形象”^[86]。

4. 关于性行为争论的实例

兰德里通过女性主义者关于性行为的争论说明解构产生的影响。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围绕着女性主义的性行为是怎样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具体围绕着淫秽色情品、虐恋(sadomasochism, s/m)、父权制、审查制度与性行为的关系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派别或两种态度:一

是赞成一性(pro-sex),一是反对一性(anti-sex):(1)前者对性持肯定态度,对各种形式的性表达,包括淫秽色情品、同性恋、虐恋,以及女性同性恋中的模拟男女角色(阳刚阴柔)关系,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态度;后者则对性持否定态度,反对淫秽色情品的制作和消费,反对性关系中的暴力及统治与服从关系等等;(2)前者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后者却持有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的看法;(3)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后者反对中性的立法程序;(4)前者接近于法理社会的个人价值,后者则接近于礼俗社会的社区价值^[87]。

“反对一性”之所以反对性行为、性实践,认为它们表达了一种父权制权力关系,如认为异性恋关系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性行为被定义为男性权力的实践;“赞成一性”反对这种观点,其一,将女性所受的压迫简化为性客体化和性压迫;其二,将性视为仅仅是男性对女性所做的事,而且对女性是反面的、危险的。性可以成为一种压迫机制,但它可以成为女性正面发展和解放的欲望、感觉和思想,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只反对性别主义,不反对性^[88]。

如何颠覆和取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赞成一性”和“反对一性”的观点,兰德里主张一种解构的阅读,因为解构能够揭露它们之间的共谋,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女性主义性行为的观念,都在探寻着怎样构成“政治上正确”的性行为;这种共谋体现在它们都有一种政治上的愿望,那就是进行正确的性政治的立法与管制,这种愿望是有问题的^[89],正如爱丽丝·佳丁指出的,“一种将自己的认识和实践基于妇女经验的女性主义只不过是另一种错误的人本主义,与它宣称所反对的父权机构是同谋共犯”^[90]。在兰德里看来,解构具有以下作用:解构实践可用来防止从它们的语境中抽离出固定的教条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对普遍接受的、凝固不变的、全局性的、自我反射的政治保持警惕,正如斯皮瓦克指出的,“解构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政治秩序”,解构只是用于实践政治中的一种工具,一种阻止确定与固定基础与总体性的批判性运动。所以兰德里指出,任何一种争论都依赖于某些前提,而又是对这些前提、对其论据,对其合法性的质疑,这可被理解为所有实践必要的理论前提与局限^[91]。

四、身份政治^[92]

身份政治是妇女差异理论的直接产物,而女性主义的差异理论又受到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在内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如果解构不可能找到一种政治秩序,如果反本质主义使得身份成为问题,那么后结构主义身份政治如何可能^[93]?

女性主义在身份政治方面的认识存在着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归纳起来,本质主义认为女性因其天然的共同特征会自然地团结在一起,归属于女权主义的政治运动;持建构主义立场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之间政治联盟的基础是女性在各种政治生活中的共鸣和集体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身份的性别本质^[94]。兰德里把关于身份政治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95]:

1. 主张研究与利用本质主义

黛安娜·法司(Diana Fuss)在其《从本质上说:女性主义、自然与差异》(1989)一书中主张,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本质主义不同于建构主义。在女性主义理论中,本质主义是对一种纯的、原初的女性气质或女性本质的追求;建构主义拒斥本质,坚持认为本质本身是一种历史构成,像“男性”与“女性”这些以前被认为自明的概念事实上是复杂的话语实践的结果^[96];另一方面,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又是相互联系的。建构主义依赖于本质主义,而不是对它的否定,本质主义中包含着建构主义。所以她希望不要拒绝本质主义,而是从解构的角度去研究它、分析各种话语实践对它的有效利用。

2. 反本质主义

丹妮斯·赖利(Denise Riley)在其《我叫那个名字吗?历史中的女性主义和“女人”范畴》(1988)一书中对本质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本质主义总想探寻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妇女普遍受压迫的状况。她提出,女性的身份是相对于男性标准的,两者都随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每个女性有着不同于其他女性的不同经验,因此普适的女性经验并不存在,“坚持追求女性权力就会在实际上堕入了男权个

人主义的怪圈”^[97]。她的建构主义的观点依赖于对话语及其物质效果的分析,“妇女”范畴因之而发生了改变,妇女不再是一个普遍化的范畴,对普遍化的妇女范畴的追求实质代表了第一世界、欧洲中心、阶级、种族与异性恋的特权,而且用于说明西方白人妇女的状况都是不合适的。

女性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批评强调女性之间的差异、妇女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与文化语境,在兰德里看来,这种观点在女性主义中并不占主流地位,而且还遭到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批评集中在认为它消解了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实践。南希·哈特索克坚持女性主义理论的立足点在于社会性别论,把女性看作一个既包含性差异,又包含种族、国家、阶级、性爱倾向差异的整体,具有女性主义的政治意义,因此,过分地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的毁灭^[98]。

3. 反建构主义的观点

坦尼亚·莫德莱斯基(Tania Modeleski)在其《没有妇女(women)的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时代的文化与批评》(1991)一书中对建构主义进行了最激烈的批评,认为解构“女人”观念就是颠覆女性主义政治,在这点上,建构主义同反对女性解放的传统保守思想如出一辙^[99]。她甚至认为,那些举着反本质主义旗帜对妇女概念的敌意和反应,是对一种父权制的和厌恶女人的恐惧症的重复^[100]。因为具有不同性行为、阶级、种族的妇女并没有从反本质主义中受益,而是从强烈抵制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使他们殖民化的努力中受益,所以她主张重振妇女范畴。在兰德里看来,莫德莱斯基的观点是对本质主义的策略利用,我们同意应该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转向表示怀疑,对女性主义不包括希望的建议表示怀疑,对把妇女和女性主义者组织起来反对父权制度及其关系的观念表示怀疑,只有我们对反女性主义者的反弹置之不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正从事着多么令人愉快的工作^[101]。

4. 身份政治以不固定性为基础

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在其“赛勃克(Cyborg)^[102]宣言:1980 年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1991)一文中,认为这个时代具有不固定性、打破界限的特征:从历史上来说,社会差异的综合

构成表明界线变得模糊了;从经济方面来说,跨国资本流动日益打破传统的国家主权的观念;从技术方面来讲,微电子革命与信息统治改变着以往的自然与人工、人类与动物的范畴区分^[103]。哈拉威对赛勃克的描述与希望,说明了她关于身份政治的观念以不固定性区别为基础。在哈拉威那里,现代主义就好像是半人半机器的赛勃克,赛勃克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希望,同时也代表了她的理想,“尽管两者都热衷于螺旋式跳舞,但我宁愿成为一个赛勃克,而不是一名女神”;“我宁愿与赛勃克上床,也不与一个体贴的男人上床”^[104]。由于人类与科技的结合,赛勃克打破了以往一些很重要的界线,生物与机器、人类与非人类、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两性、种族、体力与脑力之间的差异基本消失,这对解除男女的界线、改造父权制社会、建构新的世界观具有重要作用。哈拉威预言,以破除界线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时代是铲除男权文化的时代^[105]。

通过以上关于身份政治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的研究,兰德里提出形成新型的身份政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1)必须利用反本质主义的论据,也必须战略上利用本质主义,需要反本质主义者对本质主义二元对立的批评,同时也需要本质主义为女性主义提供政治意义的基础,正如伊里加雷指出的,既然父权社会把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类别,那么在政治上,女权主义就应该利用这个类别作为暂时策略,根据妇女的共同利益来组织为改变妇女从属状况的斗争。还有包括哈拉威在内的一些女性主义者,则注重探索在策略上用本质主义来创造特定情况下不同妇女之间暂时的政治同盟,因为她们认为,建立在特定社会的话语中的、偏离中心的、碎化的、多元的女性主体可用来作为女权主义政治的杠杆^[106]。(2)以话语与主体理论为基础,对性行为、种族、帝国主义和生态学进行批判性的综合思考。(3)身份政治以多重身份为基础。激进的、有色妇女探讨的多重身份,后结构主义者和非洲—美国理论家关于种族的反本质主义批评,男女同性恋批评研究关于性行为的历史谱系学,所有这一切因为威胁了处于具体文化境况中的关于性行为、种族、阶级以及它们的交叉与排列的假设,所以这些工作对当今理论语境中的身份范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4)帝国主义

与生态危机探讨对于身份政治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对殖民与后殖民话语的批判引发对帝国主义影响的思考,随着跨国资本运动的扩展,全球经济关系和信息技术的渗透,帝国主义从老的政治形式转化为新殖民经济关系,它跨越了国界,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公民权利、国籍与文化认同都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将要产生的全球生态危机^[107]。

注释:

[1]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Hennessy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2] 这令很多女性主义者感到愤怒,正如哈特索克指出的,“正当(我们)这些过去被剥夺言说权利的(妇女)开始要求给予我们为自己起名字的权利的时候,正当我们作为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历史的客体来参与的时候,正当我们提出所需要的社会变革以及我们对社会进步和在社会机制上合理地组织人类社会等问题的设想时,(后结构主义使这些设想)变得可疑和暧昧”。转引自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29 页。

[3]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Hennessy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序言。

[4] 黄继锋在“唯物主义女权主义”一文中指出,唯物主义女权主义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流派,但也不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流派的代名词或简单地依附于这些流派,它是西方一些女权主义者的独特话语。黄继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4 年第 3 期。

[5]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本论文集选录了自 1969 至 1996 年之间的重要文章,由序言与 33 篇文章组成,前面章节中已对本斯顿、科斯塔、詹姆斯、杨、巴雷特、沃格尔等人的论文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主要参照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Reclaiming Anticapitalist Feminism” (1997) 的论文。

[6]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第 86 页。

[7]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



第 87、88 页。

[8] 代表人物有库恩、沃尔佩、巴雷特、德尔菲等人, Annkte Kuhn and Ann Marie Wolpe,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1978); Michele Barrett: "Ideology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Gender" (1980); Christine Delphy: "For a Materialist Feminism" (1975), 收录于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9]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7.

[10]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5.

[11]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4.

[12]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4.

[13]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4.

[14]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Hennessy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5.

[15]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8.

[16] 转引自黄继锋: "唯物主义女权主义", 《国外理论动态》, 2004 年第 3 期。

[17]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8.

[18]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8.

[19]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7.

[20]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9.

[21]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14.

[22]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14.

[23]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16.

[24]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30 - 31.

[25]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32.

[26]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32.

[27]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31 - 32.

[28]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39.

[29]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41.

[30]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25.

[31]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16 - 17.

[32]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一种。按照哈丁的解释,女性主义认识论有三种形式:女性主义经验论(feminist empiricism)、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和后现代女性主义(feminist postmodernism),转引自吴小英:“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女性主义立场观是由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南希·哈特索克命名的,她认为女性主义可以借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概念,使得女性的劳动实践造就出女性主义的立场,使得女性主义能成为改变父权社会的行动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中心点是理论和行动主义的关系、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威克斯看来,女性主义的立场观是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参见柏榛:“读凯西·威克斯的‘女性主义立场观的主体’”,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70 - 71 页。

[33]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67.

[34]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67.

[35]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69 - 70.

[36]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序言

[37]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序言

[38]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91.

[39] 提高意识又称提高觉悟,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妇女对父权制在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中的作用、影响的认识,要求妇女对以往不加注意的男性统治现象敏感起来;一是要求妇女打开妇女长期压抑的无意识层次,让妇女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从属地位和受压迫处境,并分析社会、家庭怎样一步步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甘于接受这种境遇的女性。提高觉悟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中广泛采用,成为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颇具特色的活动。参见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10-111页。从提高觉悟的进程来讲它包括四条主线:第一,使妇女认识到,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通过倾听每个人的个人经历,将其编织成一幅社会生活图景,建立以个人生活经历为核心的社会分析;第二,以家庭为重点,使妇女认识到在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是如何对我们进行性别角色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又是如何内化为个体的心理结构的;第三,个人感情生活,使妇女有机会抒发感情,减轻不安心理;第四,性行为——使妇女理解性欲的形成及其意义等。转引自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40]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92.

[41]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92 - 93.

[42]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95.

[43]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100.

[44]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100.

[45]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46]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前言

[47]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序言 vii - viii

[48]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序言 viii

[49]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229.

[50] 巴雷特于 1980 年出版了《当今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一书,1988 年以《当今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的相遇》再版,其中副标题由“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改为“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的相遇”。

[51] 转引自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6 - 7.

[52]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20.

[53] 兰德里和麦克林还考察了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的其他著作,包括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的《妇女的意识,男人的世界》(1973)和《超越碎片: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产生》(1979)、库恩和沃尔佩(Annette Kuhn and AnnMarie Wolpe)主编的《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妇女和生产方式》(1978), Julia Swindells and Lisa Jardine 的《什么是左派?文化和劳工运动中的妇女》(1990)等; Sheila Rowbotham, *Woman's Consciousness, Man's Worl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Sheila Rowbotham, Lynne Segal, and Hilary Wainwright, *Beyond the Fragments: Feminism and the Making of Socialism*. London: Merlin Press, 1979

Annette Kuhn and AnnMarie Wolpe (eds),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Women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78

Julia Swindells and Lisa Jardine, *What's Left? Women in Culture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54] 兰德里、麦克林还涉及了其一些其他著作,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的《金钱、性与权力:朝向一种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83)、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 *Simans*,

Cyborgs, and Women, (1991) 等。

[55]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25.

[56]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21.

[57]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32.

[58]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33.

[59]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34.

[60]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42.

[61]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43.

[62] 这些结合的努力表现在多方面, 其中出版多部论文集:

(1) Z.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2) Cherrie Moraga and Anzaldúa (eds),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1983.

(3) Mary T. Hull, Patricia Bell Scott, and Barbara Smith (eds), *All the Women Are White, All the Blacks Are Men, but Some of Us Are Brave: Black Women's Studies*. Old Westbury, NY: The Feminist Press, 1982.

[63] 参见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362 - 372.

[64] 卡姆比河团体: 一个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宣言, Zilla R.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363.

[65] 转引自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艾晓明等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320 - 321 页。

[66]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 赵育春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 216 页。

[67] 第一,在经济方面,对黑人妇女的压迫把她们集中在“服务性行业”;第二,在政治方面,对黑人妇女的压迫拒绝给予她们所有白人男子和许多白人妇女通常享有的权利和特权,包括非常重要的平等受教育权利;第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黑人妇女的压迫把一套限制自由的“支配性形象”强加给黑人妇女,用来证明和解释白人男子以及(一定程度上)白人妇女对待黑人妇女的态度。柯林斯评价道:“从奴隶制时代的黑人保姆、无耻荡妇和下崽妇女到当前流行文化中的形象:什锦煎饼盒上满脸堆笑的杰迈玛斯大婶、无处不在的黑人妓女和每次必到的福利母亲,这些用在非裔美国妇女身上的负面的刻板形象汇集在一起,构成了压迫黑人妇女的基础。”转引自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322 页。

[68]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第 156 页。

[69] Judith Newton and Deborah Rosenfelt (eds), *Feminist 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 Sex, Class and Race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5.

[70]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47.

[71]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区别在于,后者自始注重理论建设而轻文本评论。前者初期避免涉及理论,直到 20 世纪 70 或 80 年代初,才开始涉足理论的思考;而后者则对理论情有独钟,吸收了解构了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等多种理论的精髓,并富有乌托邦或理想主义色彩;前者一向重视妇女作为读者和作者的历史经验,而后者则集中对女性与语言和写作的关系进行抽象的思辨,等等。参见刘涓:“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122 页。

[72]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52.

[73]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53.

[74] 可以 20 世纪 60—90 年代的发展过程为例:在 1969—1970 学年中,全美国高等院校开设了 17 门妇女学课程,到 1970 年 12 月便有 100 多门妇女学课程,1971 年 12 月增加到 600 多门,1973 年发展为两千多课程和 80 个妇女学中心,到 1980 年已增至两万多门课程和 350 个妇女学中心。进入 90 年代,全美国已有 600 多所高校设立妇女学中心,每年开设三万多门妇女学课程。涉及到的专业从最初



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扩展至心理学、人类学、教育学、政治学和法学。参见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95页。

[75]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53.

[76]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55.

[77]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55, 61.

[78] 20世纪80—90年代女性主义发生了三个转向,一个是逐步扬弃西方启蒙主义建立在宏大叙述基础上的认识论,一是从对社会体制与物质角度研究妇女问题转向对语言、文化和话语实践的研究,一个是从强调男女平等的理论转向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和文化中的妇女之间的差异。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9页。

[79]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序言;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80] 兰德里认为,德里达已经引入了这个概念,只是相比较前三个概念较少发挥。

[81] 可参照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82]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12.

[83]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62.

[84] 作为德里达著作的翻译者、阐释者与解构理论的倡导者,她又站在后殖民的角度批判殖民主义与文化霸权;一方面致力于从女性视角出发进行文学与文化批评,进行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同时又不断地批判女性主义的局限性。

[85] [美]佳·查·斯皮瓦克:“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1987),载于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12页。

[86]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63.

[87] 参见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第270页。

[88] 李银河:《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89]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79.

[90] 转引自玛丽·朴维(Mary Poovey):“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载于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334 页。

[91]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79

[92] 关于身份政治的论述可参照苏红军的概述。身份政治的兴起是强调妇女之间的差异理论的直接产物。身份政治指人在政治生活中的立场决定人的社会身份,它还强调人的社会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参与政治的行为。身份政治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和第一世界国家里的少数群体对阶级、种族、性别交织的压迫性的社会关系的一个回应。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界定人的社会身份的政治生活涉及种族、性别、性、宗教和健康状况等领域,身份政治是建立在人的多元的身份基础上的。女权主义在与其他社会运动结盟时,只有尊重妇女在种族、阶级、性倾向方面的差异,才能有效地团结不同的妇女群体。女性的身份不仅是由其种族和阶级出向以及性倾向决定的,而且是在其与有关维护白种人、异性性和中产阶级的霸权话语的关系中产生的。人的身份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新的身份形式在政治上将有利于抵制父权话语、种族主义和异性性对女性身份的规范,有利于女性想象美好的未来。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33—34 页。

[93]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146.

[94] 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34 页。

[95] 为便于读者的理解,可参照柏棣的论文“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载于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1—18 页。

[96]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147.

[97] 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载于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11 页。

[98] 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载于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14 页。

[99] 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载于鲍晓兰主编:《西



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14 页。

[100]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150.

[101]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151.

[102] 赛勃克一词是美国电影 Bobocop(国内译成《机械战警》)中主人公的名字。赛勃克曾经是位英勇善战的警察,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所追击的匪徒打死。警察机关将其大脑取出,移植到一个机械人体内。这个新造就的警官虽然完全按着输入的程序办事,但是他或它还保留着人类爱与憎的情感,遗留在大脑皮层内的人生经验时时闪现在荧光屏上,因此赛勃克优越于完全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同时他或它又不为爱与憎所左右,能冷静地处理事端,因而高于人类。这种多重品格使他或它战胜了所有的对手,为混乱的世事带来和谐和宁静。可参见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载于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12 页。

[103]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207.

[104]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214、215.

[105] 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载于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12 页。

[106] 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35 页。

[107]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93, 151 - 152.

第二部分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

这部分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妇女受压迫根源以及妇女解放途径时涉及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两种生产、性别分工、资本与异化、意识形态以及女性文化等问题。

Nūxíngzhuyi
De
Makesizhuyi



第六章

两种生产、分工与女性问题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女性问题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家庭等诸多领域,其核心是男女平等的问题,即女性与男性是否享有平等的尊严和价值,是否享有平等的权利、机会与责任等。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也就是说两性的差异、女性的受压迫并不是生理上的原因,而是社会地形成的。在女性主义理论看来,社会性别差异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2]:首先是从生理差异向社会差异的转变,然后是社会差异产生价值关系,价值关系产生出不平等观念。例如,女人能生孩子,那女人应该照管孩子,从而导致家务劳动的社会性别差异,这不仅表现在家庭分工中,还表现在社会分工中,女性较多从事据说是适合女性生理特点的工作。这一社会性别差异又引出一系列价值关系。在价值关系的评判中,男性的活动被认为是重要的,女性的活动被认为是次要的或附属的。问题在于:在从生理差异转变为社会差异的过程中,女性所承担的社会再生产责任起到怎样的作用?基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责任的承担,是如何产生社会性别分工的?又是如何产生男女不平等的价值关系的?这种不平等的价值关系又是如何维持与巩固的?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或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将对其中的两种生产理论与分工理论进行剖析。

一、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探讨

如何分析妇女受压迫的状况?采用怎样的理论视角?这决定了改变妇女受压迫状况的策略选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希望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理论指导,他们从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角度分析妇女受压迫状况,试图从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辩证关系中揭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的途径。在沃格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多次引证两种生产理论是为了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它确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继承了

马克思主义传统;第二,它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其他的社会主义运动家较多地论述了妇女问题;第三,它似乎把妇女所受的压迫问题置于社会一般再生产理论中讨论;第四,它强调妇女承担主要责任的社会过程的物质本质;第四,它暗示着人类生产与生存手段的生产同样重要。总之,它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讨论以下问题提供了基础,即家庭、性别劳动分工、未付酬的家务劳动、理论二元主义、妇女组织等^[3]。尽管沃格尔也指出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反映了他的理论薄弱之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妇女在社会再生产中作用的论述需要更加强大的基础;但是,可以说,两种生产理论是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借用的分析框架,是分析妇女问题的理论基石。

(一)以妇女与工作为分析框架,探讨妇女的家务劳动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通过把家务劳动置于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的关系中,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妇女地位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再生产领域的工作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与现有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再生产领域的工作中,家务劳动起了关键作用。盖尔·卢宾指出,由于通常总是女人做家务,所以人们认为正是通过劳动力再生产,妇女才被连接到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剩余价值关系中^[4]。

对妇女在再生产领域中的家务劳动的分析,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重点。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忽视了妇女的家务劳动,因此对家务劳动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对确定妇女解放策略至关重要。尽管他们都认为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资本主义是必须的,但在家务劳动的性质上他们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家务劳动只有使用价值,因为它的产品和劳务未进入市场,就被直接消费掉了,不具有交换价值,但又是交换价值生产必不可少的,这些无偿家务劳动成为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或物质根源;另一种观点认为家务劳动与生产劳动一样,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因而家庭主妇的作用也和工厂工人一样重要,家庭也成了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场所,因为妇女是工资奴隶的奴隶,对主妇的奴役保证了对她丈夫的奴役^[5]。基于此,他们提出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家务劳动工资化的主张。

尽管妇女还是从事着原来的工作,但是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家务劳动无论生产使用价值,还是生产交换价值,都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可缺少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围绕着家务劳动提出的种种策略,关注的是使人类自身生产中的家务劳动获得与物质生产同等的重视,使妇女获得与生产性工人同样的尊重。

家务劳动争论在女性主义内部也遭到反对,瓦勒莉·布赖森(Valerie Bryson)指出,从根本上说,这种争论陷入一种新经济决定论的形式的危险中。家务劳动的讨论必须从纯粹的经济分析中分离出来,需要从更广泛的背景中去理解,家务劳动的意义不能从单独的经济意义上理解。当他们强调妇女的家务劳动如此重要,而实际又不受重视的时候,他们没有去探究家务劳动边缘化的根源。一些女性主义者隐约感觉到,在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里,做着这种无价值的事情的女人是不可期望像男人那样受尊重的^[6]。

(二)以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为分析框架,关注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中的妇女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结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确定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之间的联系,探寻资本主义模式同妇女地位之间的关系。他们批评马克思、恩格斯过分强调经济决定作用,忽视了人类自身生产作用;过分强调阶级经济体系,忽视了性的阶级体系或性/社会性别体系;他们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妇女受压迫的物质根源的探讨也不满意。布赖森指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把生产与再生产看作社会的基础,但他们并没有给予生产过程的生产和再生产以相同的作用^[7]。简·弗莱克斯(Jane Flax)指出,尽管恩格斯强调了所有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直接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但他只是仅仅集中在直接生命的生产上,并把它作为理解阶级斗争和历史进程的主要途径。她对恩格斯感到不满的是,恩格斯对生命再生产的忽视^[8]。他们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性/社会性别制度、生产方

式和性/生殖的生产方式、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与性/情感生产方式等概念描述妇女所受的压迫。

1. 宏观层面的探讨:包括卢宾、米切尔、哈特曼、扬等在内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试图从生产领域与再生产的联系中揭示妇女所受的压迫。

卢宾在她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性/社会性别制度,它是与经济制度不同,不隶属于经济制度,但又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源于人类自身生产,比经济制度更重要。她根据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提出社会的性别制度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上的。在以人类再生产为主的社会中,最基本的交换形式就是交换女人,它通过婚姻这一形式来实现。她认为两个部落的男人之间交换女性比交换其他东西更具有意义,完成了赠送女人的任务,就建立了血族关系,以这种亲戚网络为基础,延伸出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政治、宗教。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她对恩格斯提出批评,当恩格斯试图从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去探究妇女的从属原因时,他抛弃了人类自身生产中的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方案。她认为,恩格斯看到了人类自身生产的作用,但是最终被他忽视了,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惯例中,甚至在恩格斯的书里,“物质生活的第二个方面”的概念总是趋向于消失在幕后,或是被合并惯常的“物质生活”概念里^[9]。

哈特曼试图从经济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关系中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她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两个方面。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既不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纯粹的父权制,两者共同起作用。历史上存在过的是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父权制封建主义社会、平均主义的狩猎采集社会、母系园艺社会和父系园艺社会等^[10]。哈特曼试图把妇女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因素综合起来,但她的理论最终建立在了两个分离的领域上:一是家庭内的领域,父权制运行的领域;一是家庭外的领域,资本主义主要运行的领域。妇女在家庭内受父权制的压迫,在家庭外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而且被压迫妇女与被压迫工作的简单相加,不足以解释工人妇女所受的压迫地位。

米切尔在解释妇女受压迫状况时,试图把对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阐述与对父权制的非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阐述结合起来,认为要改变妇女受压迫的状况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改变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结合成的四大整体结构,并从这多重结构出发分析妇女受压迫的综合原因。她批评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过于狭窄,过分依赖于简单的经济解释,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将其他三个因素全都缩减为经济因素,因此,在号召妇女进入生产领域的同时,提出‘废除家庭’这个全然抽象的口号。经济要求现在仍然是首要因素(生育、性关系及儿童的社会化);在某些特定关头,这些政策可以替代经济条件这个首要因素而产生直接作用”^[11]。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只有考虑这四大结构,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与策略。米切尔从一开始强调女性在生产、生育、儿童的社会化及性关系中受到综合压迫,到后来主张用精神分析学来分析妇女所受的压迫,强调家庭意识形态在其中的作用。所以布赖森指出,米切尔一方面宣称经济条件是至关重要的,但又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也起着关键作用。

2. 微观层面的探讨:包括贾格尔、沃格尔、乔多萝、巴雷特、哈丁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再生产领域的不同方面进行的研究。

贾格尔在其《女权主义政治学与人性》中,引证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的观点,并评论道,恩格斯试图追溯家庭的发展,但结果却是把妇女的工作看作与劳动的发展不相关。贾格尔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几乎不能用来分析公认是妇女工作领域的家庭,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集中在生产上,它把家务劳动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务劳动定义为存在于生产之外的。而家务劳动被定义为再生产,即人类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中,妇女既为现有工人劳动力的生产提供食物,又为新工人的生产直接负责养育工作,妇女的作用体现在生产与生殖中。任何社会没有消费与生殖,社会就无法生存。马克思主义尽管提供了对妇女工作的社会必要性的清晰认识,然而,“马克思主义未能考虑再生产尤其是生殖,使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理解妇女受压迫的必要的理论资源”^[12]。贾格尔

认为,要理解妇女受压迫的状况,不能不关注性活动与生育活动,她提出了生育组织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主张,妇女解放首先得使妇女获得再生产自由。

沃格尔直接把社会再生产理论作为她的理论分析框架,她从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包括社会再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出发,揭示无产阶级家庭和性别分工怎样通过再生产劳动力满足资本主义的需要。乔多萝、巴雷特、哈丁等在内的其他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更加微观的层面,从物质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继续了再生产的探讨。乔多萝探讨了母职对于男性统治、资本主义的作用;哈丁探讨了由妇女承担育儿责任的育儿模式产生了对妇女的压迫,有利于男性与资本主义;巴雷特通过性别文化生产、教育体制、劳动分工、家庭组织以及国家对于性别分工以及性别意识形态形成的影响,探讨了妇女受压迫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三)过分关注人类再生产

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作为他们理论分析的基石时,他们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忽视人类自身生产的作用。他们看到了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辩证法。沃格尔指出,一些女性主义者看到“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大的历史辩证法中的一个辩证法。这就是说,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人口再生产方式的变化”^[13]。他们认为必须分析这种辩证法,但当他们试图通过展开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辩证法来说明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时,他们把妇女受压迫的物质生产的因素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因素置于两个分离的结构中,即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阶级体系与性别体系、商品生产与性/情感生产领域。他们用这种二元观点来分析妇女解放,把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归于父权制、再生产方式与性别体系中。他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资源,强调性别分析与阶级分析相结合,主张把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但由于他们把性别分析与阶级分析局限在不同领域,注定了两者的结合是不成功的。按哈特曼的观点,在社

会主义女性主义内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具有不平等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没有阶级斗争重要,因为女性主义会造成工人阶级内部分裂;而女性主义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因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

他们偏重于一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局限于探讨女性受压迫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通过种种二元概念过分强调父权制、再生产方式与性别体系对女性的压迫作用,甚至过分强调女性受压迫的心理及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责备马克思只关注物质生产领域,忽视了人类自身生产领域。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罪恶不在于推进了物质财富的发展,而在于对工人——人的自身再生产的压抑和摧残^[14]。随着物质生产从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手段转化为整个社会生产的目的,“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5]。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過程中由于没有给予双方同等的地位,使得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努力是不成功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已抛弃了社会主义传统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16]。这些理论家固然还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已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哲学构架中最重要的原则^[17]。

二、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

(一)从现实基础出发考察妇女问题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序言中概括了宣言的核心原理,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须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8]。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

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9]。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是研究女性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指出,为了解剖市民社会,必须对资产阶级在家庭问题上的虚伪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揭示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以及对女性的总体研究中指出,女性受压迫不仅仅在于观念领域,而是一种现实;他们在揭示资产阶级思想虚伪的同时,指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是非人性的。基于妇女解放对于人类解放的重要意义的认识,马克思对傅立叶的以下论断大加赞赏:“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20]。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始批判费尔巴哈,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提出必须对家庭的世俗基础进行说明与改造,“世俗的基础使自己从自由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自从发现神圣家庭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2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研究家庭,不应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与研究,而应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与研究,“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22]。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家庭、意识形态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各阶级间存在的家庭的意识形态和家庭的实际历史经验之间的矛盾。在论及资产阶级家庭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家庭的存在必然会受不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资产阶级历史地使家庭具有资产阶级家庭的性质;在这样的

家庭中无聊和金钱是纽带……同家庭的肮脏的存在相适应的就是那种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普遍的虚伪掩盖下的神圣的家庭概念”^[23]。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通过对工人阶级、日益成长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的实际经历的考察揭示了工人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通过作为工人、作为妻子、母亲和女儿的工人阶级妇女生活的细节的实际考察,提供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妇女状况。沃格尔认为,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对于了解妇女状况作出了三大理论贡献:(1)不是离开历史抽象地讨论个人与家庭,而是从家庭中的两性关系与财产占有形式的联系中,从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阶级中对妇女所受的压迫与家庭加以说明。(2)恩格斯考虑了个人与家庭再生产的工资的决定与结构。妇女和儿童加入劳动大军迫使男性工资下降,家庭中挣工资的人数也影响了工资的水平,当家庭中所有人都参加到工作中,每个个人的工资被缩减。(3)讨论了工人阶级整体的再生产,即人口生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24]。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对家庭、妇女问题考察的现实基础,这一现实基础就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即构成社会生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生产三个方面。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条件就是在自然和社会的环境中现实的个人的生存,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必须满足社会生活三个方面的需要。首先,为了生活,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次,这些需要的满足以及必须的生产资料的创造,又进一步推动了新的需要的产生、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创造,从而使生产不断扩大,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最后,参与历史过程并对历史起着重大作用的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增殖,“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些方面并不是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是相互联系、不可缺少的几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

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5]。

(二)两种生产的形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异化状态与扬弃异化状态下的人的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特点:一方面,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6];一方面,又指出人与非人的区别在于人具有克服直接性的能力,非人生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就是“它这种生命活动”,“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类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27]。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使人类“意识取代了动物本能”,“人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28]。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物质生产是异化的,劳动这种生命运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同时,马克思指出了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的问题^[29]。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两种生产:物质生产与消费生产。在物质生产中,消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创造物质财富;在消费生产中,消费的是物质财富,生产出劳动力。两种生产互为对象,在物质生产中创造的物质供消费生产中消费;在消费生产中生产的劳动力供物质生产中消费。社会生产就是由这两种生产相互联结构成的运动,一种生产的结果,正是另一种生产的起点,“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因为没有消费的对象;没有消费也没有生产,因为有了生产的目的。“生产就是消费”。从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来说的,生产在两个方面体现着消费:一是劳动者生产出产品的过程,一是人的体力、脑力和生产资料的消费过程。由此马克思指出,“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消费就是生产”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同时又是劳动力的生产,“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创造的物人化”。这种消费包含众多的方面,其中,“吃喝是消费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实”。“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社会生产包括密不可分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

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从对社会生产总体运动过程的考察,包括从一般的、抽象的社会生产过程的考察和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生产过程的考察,揭示出社会生产是两种生产的统一体,“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存在条件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社会生产过程包括“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的过程,即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两种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一方面物质资料生产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另一方面,“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



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像它的以前所有生产过程一样,也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但是,这些物质条件同时也是个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承担者”^[30]。“这些产品的消费再生产出一定存在方式的个人自身,再生产出不仅具有直接生命力的个人,而且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可见,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个人的最终占有,再生产出处于原有关系的个人,即处在对于生产过程的原有关系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原有关系中的个人;再生产出处在他们的社会存在中的个人,因而再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社会”^[31]。人的自身再生产不仅生产出有生命力的个人,而且生产出个人的社会关系。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两种生产是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是在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配、交换、消费等关系中进行的,人类自身生产是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等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这两种生产又都包含着“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社会生产过程,都是两种生产的统一,而且两种生产都包含着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关系。

在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

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32]。恩格斯的这段话包含了以下内容:(1)历史中的决定因素是直接的生产,它本身又有两种,即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2)一定的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即劳动和家庭的发展程度的制约;(3)两种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有区别的,生产愈不发展,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4)强调了私有制和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与家庭婚姻关系的密切联系,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代以血族为基础的旧社会。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角度进行,既不能偏于物质资料生产,只描述劳动的发展史;也不能偏于人类自身生产,只揭示家庭的发展和演变。而是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同时必须把两种生产的考察置放于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具体的社会关系中。

三、两种生产的不平衡与女性问题的产生

温迪·林恩·李把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具体概括为互相关系的四个方面:(1)通过满足需要而进行的物理自我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也是劳动能力的再生产);(2)实践对象的生产;(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生产;(4)由其子孙以及为养育他们的子孙所需要的未来劳动所代表的自身生产与再生产。这些关系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而且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首先,这些关系的每种对自我、对象、他人或者未来而言都意味着必要的劳动投资——它的价值直接地或间接地来自这种劳动作为实践的实现的程度;其次,每一种劳动与其他劳动的关系既是一种概念上的关系,也是一种实践上互相依赖的关系^[33]。两大生产无论对于人类生存还是对于人类生产都是密不可分、必不可少的:

第一,两种生产的统一使人类社会相区别于动物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4]。动物只是收集现存的食物,只有人类才生产,人类社会生产行



为本身包括了两种生产。第二,两种生产互为前提、互为条件。“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他们又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35]。如果没有物质资料生产,人类社会的存在、延续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人类自身生产,没有人类的繁衍,人类绝了种,那么社会的存在、延续和发展同样是不可思议的。第三,两种生产都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延续所进行的社会生产活动,在人类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从人类历史一开始,两种生产就同时存在,而且到现在还在历史上继续起着作用。

两种生产的不平衡之所以产生,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物质的增长,私有财产的发展,公共的社会活动与家庭的私人活动相分离,公共社会活动的作用超过家庭私人活动的作用,“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36]。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不平衡,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更显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物质生产的作用超过人类自身生产的作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生产的作用的提高,男子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女性的作用在于发展和巩固男性统治的利益基点。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对社会历史的制约作用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具有变动性。恩格斯比较了史前史和成文历史,指出史前史和成文历史的根本区别,在于家庭的血族关系和物质的生产关系在其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史前史中,家庭的血缘关系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支配物质的生产,决定着社会的结构、社会制度的性质,“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在成文历史中,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的基础,不仅支配着家庭制度,而且构造了新社会结构、社会制度。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财产制度和国家的

出现,“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37]。在恩格斯看来,社会基础由家庭血缘关系转变为物质生产关系,是人类历史经历的一次彻底的变革,变革的结果是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被以地区团体为基础的新社会所取代,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国家便随之形成并日益巩固起来,父权制社会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充满了矛盾和对抗。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部落共同体这一最原始的社会生产形式的考察,说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取决于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向物质生产占支配地位的转变过程。部落共同体的形成,以血缘或地域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的联系脐带;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于人类自身生产的血缘关系,处于家庭关系和由家庭扩大而成的部落关系中;分工和交换很不发达,一切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直接消费,即使用价值,而且生产非常有限,人在这种状态下生产的东​​西不多于他直接的需要,他需要的界限也就是他生产的界限。古代在非常狭隘的规定上把人当作生产目的,“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38]。随着物质生产从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手段转化为整个社会生产的目的,人不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财富成为生产的目的。人不再成为生产的目的,人被物的力量所统治,人类自身生产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39]。

2. 人类自身生产属于家庭生产、属于私人领域

社会总生产由社会性生产和家庭生产组成。女性从事家庭生产的任务如人类自身生产、家务劳动等,男性从事社会性的物质生产。女性

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直接载体,为了人类社会的繁衍,为了新生命的哺育,女性付出了体力,付出了精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女性的家务劳动在社会总生产中也占有相当的贡献。1995 年联合国人口报告和人类发展报告分别指出,妇女完成 2/3 的工作时间,但只得到 1/10 的收入和拥有不到 1% 的财产;妇女服务于家务劳动照料儿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隐性贡献每年高达 11 万亿美元。尽管女性对于人类社会的繁衍是如此重要,女性的家务劳动对于社会的贡献如此之大,但由于生育及家务劳动的自然性和非商品性,使得它们被排除在社会总劳动之外。恩格斯在论及原始社会时发现,产品交换少、私有财产和阶级不平等没有得以发展的社会里,家庭的私人活动与公共的社会活动是重合的,两性之间是平等的,甚至妇女的地位相对较高;尽管也存在着两性角色的分工,但不存在赋予男性特权的性别等级制。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剩余产品的增多,公共领域的活动与私人领域的活动出现分离,生产属于公共领域的活动,而人类的繁殖等属于私人领域的活动,赋予公共领域的活动以较高的价值,私人领域的活动以较低的价值,生产活动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活动,是男性领域,繁殖活动属于私人领域的活动,是女性的领域,随着生产的重要性超过了繁殖的重要性,妇女丧失了权力、成为被统治的对象。

四、分工与性别分工

男女两性基于自然的分工如何发展为社会性别分工,又如何使女性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对于这一转化过程,我们不能仅限于对女性生理状况如体力的大小等方面考察,也不应该仅从人类性别制度的发展方面考察,而必须从当时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及经济关系入手。“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

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寻找”^[40]。

(一)资本主义的功能与男性的需要: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性别分工的探讨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性别分工对于分析妇女受压迫状况具有重要性,赋予性别分工以重要的意义。哈特曼、扬、爱森斯坦从宏观层面探讨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如何通过性别劳动分工施加了对于妇女的压迫,乔多萝、哈丁、贾格尔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物质生存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区分中,由妇女承担母职、育儿、生育责任如何构成了对妇女压迫,巴雷特侧重于工作与家庭分工以及家庭结构与家庭意识形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哈特曼提出了性别分工作具有等级制特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借助于性别分工实现了相互之间的需要。物质方面通过家庭工资形式使得男人具有支配、控制女性劳动力的权力,使得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工作中工资所得明显低于男性;这一过程伴随着意识形态实施的过程,赞赏具有客观、外向、理性、机械等接近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的男性特征,排挤或贬低具有主观、直觉、情感等的女性特征或女性价值;通过赋予交换价值对于使用价值的优先权,加强了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哈特曼通过对物质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的性别分工对于妇女所受压迫作用的讨论,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从妇女受压迫中获益;至于性别劳动分工为什么会产生,哈特曼似乎没有给予探讨。

扬甚至提出把性别分工作为分析妇女受压迫与妇女解放的核心概念,因为在她看来,性别分工概念比阶级概念重要,阶级概念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同样受压迫的现象,阶级是一个社会性别盲点的概念;性别分析概念比阶级概念具体,因而能够提供一种不仅把性关系看作生产关系的主要方面,而且也是这种关系结构的重要方面的方法,还可以说明妇女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从属地位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有利于说明妇女的整体地位,包括妇女在家庭和在工作场所的地位、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角色及在生产中的角色。扬

认为性别分工理论能更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女性的首要职责是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男性的首要职责是从事政治、经济活动,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与家庭领域出现分离,男性成为主要劳动力进入公共场所,而女性却被边缘化作为二等劳动力赶回家庭,成为劳动后备军。总之,扬认为由于性别劳动分工,女性被边缘化了。但是扬也没有深入地研究性别劳动分工是怎样产生的问题。

爱森斯坦聚焦于性别劳动分工中的男女不同角色问题,通过女性承担家庭责任、男性承担经济责任的分工达成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需要。由于社会、资本家、男性工人都能从这种分工中受益,这样的分工使现存社会得以永久化。在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的自身生产、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工作与家庭的区分中,乔多萝、哈丁与贾格尔等人通过对私人领域中的母职、育儿以及生育的探讨揭示了妇女受压迫地位的根源。巴雷特不仅强调性别劳动分工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并强调性别劳动分工的意识形态的灌输过程;不仅分析家庭内部的分工,还分析了工作中的分工给妇女地位带来的影响。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思想时,持有的是批判的态度,批判之一在于分工是自然的主张,以及由这一主张导致的结论,“也许,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以两性为基础的分工是对男性或父系统治的默认”^[41]?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回顾马克思关于分工的思想。

(二)从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转变

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地方谈到最初的性别劳动分工是自然的,不带有任何强制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最早的分工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才产生分工,而且分工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为基础的,“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和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42],“最初的分工是男女

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4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次明确提出,最初的分工之一发生在家庭中,“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在农民家庭中,“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44]。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以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生活为例,说明人类最初的分工是为了生儿育女,在两性间自然产生的,男人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也就是说,在早期的自然分工中,男女是平等的,甚至妇女占统治地位。

但是自然分工如何发展为社会分工? 又是如何导致女性的不平等地位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考察了家庭形式从群婚制到一夫一妻制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了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转变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妇女地位的衰落、男性统治的确立。在相当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蒙昧阶段,妇女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甚至达到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地步,“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妇女之所以能有这种地位,是因为:(1)婚姻建立在自由开放的基础上,人们的性关系是杂婚制的,排除了确认父亲的任何可能性,只能依母系来计算。绝大多数妇女或所有的妇女都从属于某一个相同的氏族,而男人则来自不同的氏族,这种母系血统制度和母权制使得妇女还拥有政治与社会权力。(2)财产公共所有,没有剩余财富,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包括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这种共产制家庭经济是原始时代妇女统治的物质基础,“在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全体或大多数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庭经济是原始时代到处通行的妇女统治的物质基础”^[45]。(3)妇女统治是建立在妇女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生产中心的位置上的。恩格斯以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生活为例,说明人类最初的分工是为了生儿育女、在两性间自然产生



的,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在这些领域内他们拥有相同的权力,而且妇女似乎拥有较男人更多的权力。恩格斯甚至推测最初的对偶婚社会不仅是母系社会,而且是母权社会,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都握有大权,不管妇女在过去有过什么样的地位,都得益于她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生产中心里的位置。

当财富增多,两性间的分工出现新的意义,“随着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这时男人知道了如何繁殖更多的家畜,其结果远远超出部落对牛乳和肉类的需要,这样男人和妇女的权利相对开始变化。一旦地产、禽畜及奴隶等财富归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打击^[46]。此时,婚姻体现为一夫多妻制和纳妾配对,妇女处于男性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47]。随着男性在生产领域中越来越重要,女性的劳动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随着畜群和其他剩余财产的出现,男子劳动的价值和意义提高了;随着他们财产的增加,地位也提高了。财产的私有需要按照男系计算世系和父系继承权,而女性的家务劳动则成为男子的私人劳动。这种分工显然是不平等的。而且随着男性在生产领域生产的剩余产品的增多,男子的社会地位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下降。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48]。

(三)分工形成不平等的阶级关系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人类最初的分工是自然产生的分工,如男女性别的分工,因体力和天赋差别而产生的分工等,这种最初的分工是分工的萌芽状态,完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带有任何强制性。真正的社会分工,是随着文明产生的分工,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而产生的。第一次真正的社会分工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以及随之而出现的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

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历史直至现在”^[49]。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带来了无论社会还是个人的进步,同时分工也是一种异化,导致的是物的力量和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

分工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它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50];分工和交换使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逐渐突破了各种原始局限性,使人类历史发展为全世界的历史;分工也带来了个人的进步,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世界范围的普遍交往的条件下,个人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全面发展。

然而,随着分工与交换的发展,生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不断加强,造成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51]。这种对人来说的异己力量,成为与人对立的力量,驱使着人,这种物的力量对人的统治是通过私有制强加于劳动者的,是对劳动者个人的创造性活动的限制。在这种分工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活动范围,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是这样的人。在这种分工下,由于个人活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失去了个人活动创造性的可能,人的发展只能是片面的,人的活动不再是自主活动,而是自主活动的否定,成为单纯地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分工使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发展为阶级关系。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

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所以必然形成不同的阶级,“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52]。分工不仅使人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发展为阶级关系,而且使阶级关系变成人以外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必须服从的异己力量。

(四)分工对妇女的影响

以分工给人类带来双重影响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探讨了分工对妇女事业的影响,这又是在对市民社会与家庭的考察与批判的框架下进行的。

米切尔曾经批评马克思对家庭的分析把妇女问题淹没了^[53],的确,至少从表面上,马克思对家庭的关注超过了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颠倒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指出家庭作为政治国家的天然基础,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的人为基础,构成为国家的必要条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异化形式的扬弃。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女性在现代社会的一般状况是非人性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中以翔实的材料说明了资本主义条件对工人阶级妇女、工人阶级家庭的影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必须对家庭的世俗基础进行说明与改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一次提出必须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与研究家庭。所有这些都表明,马克思不是一般地为了批判的需要提到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而是把它们当作人实现的社会形式,“如果在考察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存在的社会形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的本质的客体化,那么家庭等等就是主体内部所固有的本质。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所共有的”^[54]。

力和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伴随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三次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以及一次有决定意义的分工,即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分工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析,是为了揭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最早的所有制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家庭中的奴隶制,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分工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家庭中的对立是最早的对立,包含着以后一切对立的萌芽,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后来,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话又进行了补充,“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55]。分工导致的阶级对立中包括男性对女性的奴役。

恩格斯通过对与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同步的家庭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考察,进一步揭示了女性地位衰落、男性统治确立的过程。根据摩尔根描述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人类历史的三大阶段的划分,恩格斯考察了群婚家庭向对偶婚家庭然后向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过渡,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最终形成来看,所有制的变化起了关键作用:(1)一夫一妻制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不是性别制度,“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专偶婚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



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56]。(2)一夫一妻制是为了以父系或父权进行男性统治。恩格斯指出,“一夫一妻制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是生育确凿无疑地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生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57]。一夫一妻制婚姻是建立在对妻子的公开或隐蔽的家庭奴役之上的。(3)使得家庭中的自然分工成了社会地位、财产所有权分化的基础。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家务劳动的私人化和对家务劳动的轻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奴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上,而现代社会乃是以个体家庭为分子所构成的一个集体。”男性在物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男性的社会作用与社会地位得到充分肯定,成为家庭的实际统治者。女性在家中被贬低、被奴役。(4)要求妻子对丈夫绝对忠诚。于是,形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即用双重标准进行要求,对于妇女来说,乱交是道德低下的标志,而男人们通过通奸继续着群婚制的性实践,这就是说,父权制社会并不要求男人必须对婚姻忠诚。以父系和父权形式实行的男性统治,纯粹是有产者男人和无产者女人间阶级分工的结果。恩格斯评论道:“一夫一妻制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一夫一妻制家庭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与个人性爱没有共同之处,是经济需求和权力统治的结果。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形成,不仅是史前史过渡到成文历史的标志,而且是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母权制的被推翻,是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58]。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却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

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59]。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丈夫通过他的经济权力实施统治:“他是资产阶级,而妻子是无产阶级”。从人类一夫一妻制始,就充满了男性和女性的对抗,主要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统治。

注释:

[1] 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年,第 309 页。

[2] 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载于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2 页。

[3]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M].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31-32

[4] 王政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27 页。

[5] 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2:238.

[6] 转引自(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108 页。

[7] 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2:76.

[8] [美]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53 页。

[9]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30 页。

[10]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M].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213-214

[11]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72 页。

[12]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M].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74.

[13] 沃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 235



文摘》,1987年第5期。

[14]孙承叔:“是一种生产,还是四种生产——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86页。

[16]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7.

[17]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载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20]马克思:《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9—25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9页。

[24]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46.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80页。

[2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

[2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5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页。

[2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8—17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3][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陈文庆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2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6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7—618页。

[41][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陈文庆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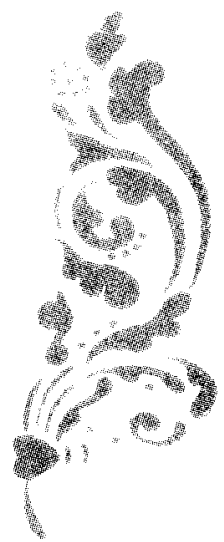
-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页。
-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 [44]《资本论》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0、95页。
-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52页。
-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页。
-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0、86页。
- [52]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03页。
- [53]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第12页。
- [54]转引自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5页。
-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63页。
-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63页。
-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第七章

资本、异化与意识形态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约翰·麦克因斯在《男性的终结》中指出,现代社会发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和交换的发展,使得包括人们的能力也变成了他们的财产;一是启蒙运动及理性化进程;一是人们应该是互相平等的个体。这三种发展相辅相成,并一起描绘出了被韦伯称为“解魅”和“理性化”的过程^[1]。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表面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女性事实上却与男性不平等,其原因何在?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劳动市场自由和平等交换的表象下,掩盖着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统治造成人的物化与客体化,造成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从个人层面上理性对感性的压制。理性原则通过政治平等、自由市场和法律契约等成为资本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两者的珠联璧合使得人的感性生命分离出去,造成当代人的命运,也造成妇女的普遍命运。所以,在不挑战资本统治的前提下,女性解放的事业不可能有很大进展。

一、资本统治与妇女地位的边缘化

I. 梅扎罗斯在《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一书中,引述了18世纪早期匈牙利的一则故事“K. 克莱蒙”,它通过克莱蒙夫人的悲惨的命运讲述了资本统治遵循的规则及其对人类的命运及妇女的普遍命运产生的影响^[2]:

她的丈夫和其他11个石匠由于受到了“钱财的诱惑”,签约去建造德瓦高耸的堡垒,但是,他们失败了,因为

他们中午前所建造的,到第二天就会倒塌;

他们傍晚前所建造的,到第二天就会倒塌。

为了补救他们的失败,他们制定了一项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妻子将被烧死,她的灰烬将被掺进石灰中,以便能产生强有力的泥浆,从而使他们能够建造起高耸的堡垒。

如人们所预料到的,克莱蒙夫人是第一个坐着四匹枣红马拉着的马车去德瓦的人。在半路上,她的车夫乞求她回去,说他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她的小儿子掉进了庭院中心的井里死了。克莱蒙夫人对他说:



“继续吧,车夫,马车不是你的,马不是你的,快马加鞭吧!”

于是车夫沉默不语。当他们到达德瓦时,石匠克莱蒙从远处认出了他们,他祈求上帝用闪电来击打他们前面的道路,以便马在受到惊吓后能掉转车头;如果这一招不成功的话,就击断四匹马的马腿,以便他们不能来到他和其他石匠的身边。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失败了。克莱蒙夫人来了,12个石匠用安慰性的话语告诉了她无法逃避的悲惨命运。她称他们是“十二杀手”,当然也包括她的丈夫。她坚持,他们应该在她返回后再烧死她,这样,她就可以向她的女同胞和可爱的小儿子说句告别话。

在她回家的路上,他们烧死了她,用她的灰烬做成了强有力的泥浆,这样,他们成功地建造了德瓦高耸的堡垒,并因此而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城堡竣工后,家庭的主人、石匠克莱蒙回到了家里,他的儿子问他的妈妈为什么没有回来。谎言败露之后,父亲最终把真相告诉了儿子。绝望中的儿子走到了城堡的顶部,大喊了三声:

“妈妈,亲爱的妈妈,再给我说句话吧!”

他的妈妈回答道:

“我不能给你说话!石墙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身上。

我在墙内,被埋在这些沉重的石头中。”

那时,她的心破碎了,大地由于感动裂开了一道缝隙,男孩掉进去,也被埋在了里面。

在把“社会泥浆”当做“妇女普遍命运”的过程中,由于其本性和辅助性的功能,泥浆注定要被塞进砖和石头之间。如何从这一悲惨动人的民间故事中吸取教训?如何避免妇女的社会泥浆的普遍命运及孩子的悲惨命运?梅扎罗斯评论道,在资本统治下,就石匠克莱蒙先生扮演的角色而言,资本的人格化根本不会关注这一教训,因为在这一制度下,不管他多么爱他的妻子,克莱蒙必须遵守所有常规的或明文规定的规则的基础,即必须遵守被“财富”欲望所驱动的终极规律^[3]。

(一) 资本统治:抹杀一切个性

积累起来的劳动加以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工人生产的资本越多,支配他的劳动的权力越增加,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越增加。资本使社会劳动表现为抽象劳动,成为支配具体的、活劳动的根据。资本的本质在于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统治地位。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与具有交换价值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是没有异化劳动的产品,后者是异化劳动的产品。使用价值是为了消费而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且使用者一般就是生产者,如烹饪、纺织一类的家务劳动所制作的物品都具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是指为交换而生产的物品,当一件物品被用来交换时,它的内在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此时,它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内在的质的价值上,而是体现在一个交换物、一件商品的抽象性方面,“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不同在于,“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4]。抽象的交换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成了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它几乎抽掉了一切质的差别,成为一种量的关系,使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因而抹杀了一切个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及货币与个性的对立关系。货币是对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货币是一切事物的普遍混淆和替换,因而是颠倒了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5]。由于货币的特性是能够购买一切东西或占有一切对象,所以对人来说,我是什么以及我能够做什么,便从根本上与我的个性无关,而取决于我是否是货币持有者,取决于我所持有的货币的数量和力量,“货币的数量越来越成为它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本质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身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数量的本质”。于是,以货币为基础的需求便是有效的需求,是作为现实的对象在我之外为我而存在的观念;而仅只以我的需要、情欲、愿望等等为基础的需求则是无效的需求,因而对于我是非现实的、空洞的。如果说人的感觉、情欲等等是“对本质(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那

么,货币的特性和力量就是对于这种肯定的普遍混淆与颠倒。货币具有两方面相辅相成的特征^[6]:首先,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它使我获得我本身所没有的东西,把想象的、愿望的存在转化为感性的实在的存在;其次,货币又是人的创造力的真正障碍,它使我的神力化为乌有,把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把我所具有的东西变作虚假的、非现实的东西。因为货币作为最出类拔萃的对象,作为最抽象最普遍的商品,因而也作为最典型的人类能力的异化物,在世俗生活中扮演着和宗教生活中的神相同的角色;正像我的货币把我的一切能力变成它的反面一样,我的无货币把我的一切能力也变成它的反面。所以在货币抽掉了一切质的差别时,它同时也夺去了物品人性化的特征,把它变成了庸俗的物品。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特征,即交换价值的统治及个性的独立而颠倒的发展。“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地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7]。在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中,生产的主要目的是创造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生产仅仅是生产交换价值并使它获得增殖的一种手段。交换价值占统治地位,普遍交换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它表现为三种形式:交换者的相互关系对货币或交换的依赖,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对机器体系的依赖。这三种形式中最根本的一条是资本、交换价值对劳动的统治地位,即物化劳动对人的统治,“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因为这个形式和以前的一切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只

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8]。

人受这种物的力量的统治、支配，这种物的力量成为独立于人之外的不受人驾驭的力量。个人只有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能得到表现和确证；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转化为货币，个人才能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个人能够具有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就连“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历史存在。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它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也就是说，“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9]。马克思甚至认为就处于资本关系的奴役下而言，资本家与工人是一样的，“但是，劳动过程本身只表现为价值增值过程的手段，正像产品的使用价值只表现为产品的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完全一样。因此，资本的自行增值——剩余价值的创造——是资本家的决定性、占统治地位的和包罗一切的目的；资本家活动的绝对欲望和内容，实际上只是货币贮藏者的合理化了的欲望和目的——这是非常贫乏和抽象的内容，它从另一方面使资本家完全同工人一样地处于资本关系的奴役下，尽管是在另一方面，在对立的一极上”^[10]。

人不再是生产的目的，人的发展片面化，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11]。如果资本主义有所谓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12]。由于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

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



依赖为前提,交换价值使得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形成互相和全面的依赖关系,它是抹杀一切个性、特征的一般的東西。“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征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東西”^[13]。

(二) 女性劳动的边缘化

在恩格斯看来,妇女的家务劳动经历了从具有占统治地位的意义变得失去意义的过程。在不存在私有制的情况下,女人的家务劳动和男性的社会生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都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随着交换剩余产品成为可能,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得以发展,逐渐取代了以使用为目的的家庭生产。妇女不再为社会工作,而是为家庭工作。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生产几乎全是在家庭以外进行的社会性的、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它迫使人们依靠交换性生产。

在交换价值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女性的家务劳动只具有使用价值,不具有交换价值,因而得不到认可;资本主义需要把妇女限制在家庭中,因为工人阶级的生存与再生产是而且永远是资本再生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妇女的无偿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所不可缺少的。马克思在讲到工人受资本统治的时候,在页注中写道:“资本为了自行增殖,是如何地掠夺那种为消费所必需的家务劳动”^[14]。

机器的采用使得妇女能够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同时也使妇女成为资本统治的对象:一方面,机器降低了体力的重要性,为雇佣者雇佣只需付低工资的妇女和儿童提供了可能,“就机器使肌肉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15]另一方面,机器大工业吸收妇女参与到社会生产中的同时,也为资本统治对妇女的剥削提供了条件:(1)妇女劳动成为廉价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劳动力价值讨论中指出,对一个家庭来讲,要挣得足够家庭开支所需要的工资,整个工人阶级,包括妇女和低龄儿童,都不得不加入公共劳动大军。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

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竞争加剧,工资降低。随着机器的使用,非熟练工人代替了熟练工人,女工代替男工,童工代替成年工,因而使劳动力价值贬值,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因为使用机器,工厂使用三个儿童和一个妇女代替了一个男人。马克思提出,“难道先前一个男工的工资不是应该足够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吗?”由于工资或最低工资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最低工资额,也和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千百万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16]。马克思在《资本论》注中引用一段话说明已婚妇女因为必须养家活口,她们的恭顺美德却成为她们被奴役的理由,“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由于男工劳动被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代替,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17]。

(2) 妇女成为劳动后备军。即每当新的工厂开业需要新工人时,常常是妇女去满足这种需要,而在经济萧条时,又可使工人的工资和斗争性保持低水平。在战时或新的生产领域需要时被吸引进来,而当不需要时,妇女被抛回家庭中。女工为了获得生活必需的费用,通常不敢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成为资本家乐于雇佣的对象。这种预备军的存在减弱了男性劳动力讨价还价的能力,成为资本家压低男工的一张王牌。这使得所有工人的工资和斗争性保持低水平,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愈发达,男人也就愈受到女人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不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18]。

资本统治在使妇女与儿童成为劳动力的同时,对妇女与儿童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机器大工业吸收妇



女和儿童参与社会生产中,使得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造成了体力、道德等多方面的影响,他们的身体、精神甚至智力都遭到摧残。马克思愤怒地指责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造成了人为的智力的荒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通过对各生产领域中的作为集工人、妻子、母亲、女儿于一身的工人阶级妇女生活细节的考察,揭示了机器大工业对妇女产生的体力及道德上的影响。由于她们担心失去工资或被解雇,她们必须工作到生孩子的最后一刻,“女工们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间还要在工厂里工作,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如果早停止工作,那她们就得担忧她们的位置会被别人占去而自己会被解雇;此外,她们在这一段时间也拿不到工资了。女工们头天傍晚还在做工,第二天早上就生孩子,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在工厂里,在机器旁边生下孩子,也一点不稀罕”^[19]。不仅对妇女产生体力上的影响,恩格斯还指出,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地聚集在一间狭小的工作室里,他们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近,没有受过任何智育和德育的人们挤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这一切对妇女的性格发展是不会有有什么好影响的。这些情形无论对妇女还是对小孩子都会产生最严重的败坏道德的后果。恩格斯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家庭生活对工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一切不是机器的发明,而是资本主义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被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20]

二、异化对于妇女的影响

(一) 异化劳动:自我的感性生命被分离出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国民经济学二律背反的根源在于:劳动者(活劳动的承担者、主体)理应取得他所创造的一切;同时私有财产(死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却统治、支配、摆布和决定劳动者。理应是一切的实际上是无,能动的创造者成为被支配

者,死的掌握并摆布活的。这是因为它作为前提的劳动不是本真的劳动,而是颠倒的、虚假形式的劳动即异化劳动^[21]。异化劳动代替本真劳动其后果如何?这是马克思要回答的问题。

劳动是人的内在本质。通过劳动,人类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成为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在实践中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做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做类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自我确证”。通过把自然占有为劳动的物质条件的劳动,类生命能够成为人的生命,“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使自己二重化,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2]。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本身对劳动者说来变成了某种外在的东西,不是对人的生命的肯定,而是对人的生命的否定,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劳动者的活动不是他的自我活动。劳动被体验为一种自我的丧失,导致非人化状态,“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3]。

首先,工人与决定其存在特征的生命活动相异化。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24]。工人生命中生命活动这一最本质的东西也被异化了。其次,工人的劳动生产的对象对他来说是异己的。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工人所创造的对象,即他的劳动的产品不再是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不再代表劳动者的创造性,而

是代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奴役关系。再次,结果,“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一是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二是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无产阶级为了得到劳动对象和生存资料,必须作为一个劳动者以及作为一个“肉体的主体”而存在,“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25]。最后,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由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26]。

异化劳动使得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发生异化。“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7]。造成人的生存本身的客体化和物化,人生存的感性世界的丰富性被对物的抽象态度所占有,造成人的感性生命被分离出去。

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分析指向一个有价值的关于家庭结构的批判。这个批判的中心目的表明,通常与家庭相联系的观念——诸如天然的感情、父母之爱、浪漫的爱情等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之内并为了资本主义经济而被创造出来的、拿来交易、出售和消费的神话^[28]。由于人类的生命活动被异化,一切人类组织都不可能在异化范围之外,包括家庭、婚姻、人的身份、人的尊严。资本统治使得家庭作为纯粹的经济单位,使婚姻成为卖淫,使家庭关系成为纯粹的金钱关系,不再以

互相爱护为中介,而是以对工资的需求为中介,“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9]。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总之,资本主义把人性化的世界和符合人性的社会关系毁灭了。

马克思、恩格斯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论及了家庭、婚姻及两性关系的未来。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家庭不是一种自然的关系,说它是一种天然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化所要求的对压迫的辩护的需要。资产者的家庭将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灭,所以消灭的不是家庭感情本身,而是资产者的可悲的被扭曲了的家庭。马克思质问道:“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们承认这种罪状。”废除资本统治,使得家庭成为情感的组织、使得婚姻及两性关系成为纯粹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对家庭、婚姻的谴责是以他们对资产阶级家庭与无产阶级的家庭的区分以及对未来家庭的展望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存在的理由只是为资本再生产劳动力。婚姻与家庭的功能在于两方面:首先,作为一种微观的资本主义事业,它的目的是生产劳动和劳动者;其次,是作为消费者的主要孵化期^[3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施蒂纳的“神圣的家庭概念”,马克思提出家庭具有阶级性的特点,资产阶级家庭具有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以无聊和金钱为纽带,而在无产阶级那里是以现实的关系为基础的家庭情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和财产之间的关系,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资本上面的,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因而,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令人作呕;而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共同之处了。但是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家庭是充分发展的形式,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只要私有财产与占有关系占统治地位,类关系、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交易的对象。造成的结果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本体论的——因为一个家庭成员本来可以将她的或他的首要忠诚和作为一个



人的身份献给亲情关系的维持,而现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忠诚仅仅是由于工资^[31]。

(二) 异化的性别化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成为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的理论资源之一。许多人都承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布赖森认为异化概念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它提供了潜在的女性主义视角;女性主义者艾伦·伍德(Allen Wood)在其《卡尔·马克思》中指出,“如果我们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或自身没有价值;或者,只有借助于我们自己或自身处境的幻想,才能维持意义和自我的感觉,那我们就是被异化了”^[32];贾格尔认为异化这一概念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系统化地研究当代妇女状况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将异化概念作为她的理论分析的核心。

1. 家务劳动是异化劳动?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围绕家务劳动问题,对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是生产使用价值的还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展开了讨论,他们还从家务劳动与异化的关系角度进行了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家务劳动是异化劳动。

齐拉·爱森斯坦指出,任何预先指定给某一特定群体的工作都是异化的,因为它们不是人们自由选择的工作,而且按照社会的性别分工,妇女得到的只是没有创造性的孤立的工作。爱森斯坦甚至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双重负担可能隐含着激进的未来。因为家庭主妇一方面接受了性别角色分工的思想,但她们同时又受到美国平权意识的影响,这两种思想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发生碰撞。“女权主义者要求揭示这样一个真相,即资本主义的父权社会在不动摇其自身的情况下无法兑现它的‘自由主义’平等诺言,甚至不能给予妇女平等的权利”^[33]。科斯塔认为家务劳动的异化在于其重复性、琐碎性与孤立性。她在1972年的《妇女和公社的瓦解》一文中指出,妇女被困在家庭之中及她对男人的依附都是异化的因素。同家务劳动相比,工厂的

劳动潜在的异化的程度较小;真正的家务劳动是异化的,因为它是琐碎的、重复的、孤立的。安·弗尔曼认为相比较异化对男人的影响而言,异化对妇女更加不利,“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样能在工商业的社会生活领域生存,因此他能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达自己。但是对女人来说,她的活动余地仅限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把男人对象化,它表现为异化形式。但异化对妇女的生活和意识的影响则表现为更具压迫性的形式。男人通过与女人的关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关系”^[34]。在弗尔曼看来,妇女的异化在于她们体验的不是自我,而是“他者”,她的一切行为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赞赏与肯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正因为家务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因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没有被异化的空间,因而可以成为人类未来的基础。

琼·贝思克·埃尔西坦在其《公共的男人/私己的女人》一书中,批评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的看法。她提出,家庭并非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来的、以牺牲女人为代价来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相反,家庭是人类尚能得到一些爱、安全和舒适的唯一处所,是人类还可以基于别的、而不是金钱要素来做决定的唯一地方^[35]。她列举了家庭体制的种种好处:第一,家庭可以为避免国家极权的单一性提供最好的保护,可以避免接受国家在社会化机制中提供的同一套价值观,因为在她看来,个人组成的家庭多多少少具有个人特性。第二,她特别强调在家庭中形成的小孩与大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认为如果这种关系被剥夺,就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沃格尔在1973年的《世界家庭》中提出,由于家务劳动创造的是使用价值,那么相对而言它是非异化的劳动。她强调,非异化的家务劳动可以使人们隐约地看到一个由非异化的劳动组建起来的未来社会图景:“因为它基本上是有用的劳动,它使人联想到一个未来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劳动基本上都是有用的。”因此,家庭妇女“能够接近一种由非异化的生产活动构成的生活”^[36]。艾丽·扎拉斯基(Eli Zaretsky)在

1976年的《资本主义、家庭和个人生活》中进一步讨论了非异化的空间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现代社会特有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极大的分离。随着工业的兴盛,资本主义使社会化的物质生产和主要由家庭妇女完成的私人劳动相分离,结果,工作和生活被分开了,形成了两个领域,即充满异化劳动的外部世界与个人的情感世界,个人的情感世界唯有在家庭中才能存在。家庭的这种职能赋予妻子和母亲们新的责任,即维护私人关系情感和心里的王国。她认为对妇女而言,由于工作和生活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彼此重叠的;因而妇女的家务劳动本质上是非异化的,而且便于保留人的价值,而公共领域的异化劳动不可能做到这点。社会中“个人情感”和“经济生产”的分裂同两性的分工不可分割,妇女掌管着情感生活,而男人则为生存奋斗着^[37]。

对于家务劳动是异化还是非异化的争论,多诺万总结道,某些方面是异化的,另一些方面则不是异化的。从家庭主妇女可以比工人更自主地控制自己的时间来说是非异化的;但又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了异化:第一,家务是规定的、雷同的、琐碎的;第二,家庭主妇被隔绝在政治管理领域之外;第三,家庭主妇在经济上的依附性^[38]。

2. 异化是居于性别之间的体验

贾格尔对异化概念进行了延伸,并提出必须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异化概念。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参与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才可以被认为是真正被异化的;对异化概念的这种理解使得我们认为,不挣工资的妇女是未被异化的,而挣工资的妇女则是像挣工资的男性工人一样是被异化的。她指出,现代社会的妇女在她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异化的,不仅不赚工资的妇女也同样经历异化,而且,挣工资的女人所体验的异化不同于挣工资的男人,异化是居于性别之间的体验^[39]。

贾格尔强调,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采取了妇女与所有事物、所有人、特别是与她们自己疏离这种异化形式。贾格尔详细阐述了妇女作为性客体、作为母亲、育儿、作为妻子以及文化生

产的异化,甚至认为女性气质也是一种异化。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消灭女性异化是消灭女性受压迫的必要条件。的确,贾格尔描绘的妇女生活中的这种种异化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她也分析了这现象背后的原因似乎是劳动分工。她主张资本主义与父权制这两种权力体系的一体性,并在三个关节点上通过制度化把劳动者划分为:在生育上,男性控制着人口再生产的选择与女性的情感劳动;在市场交换的商品生产上,男性控制着比人口再生产更具有历史重要性的生产过程;在日常用品的生产中,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多的不同种类的经济工作,但总体上获得的是低得多的报酬^[40]。在这种分层中,男性控制了女性从事的人口再生产的工作、情感劳动及经济工作等,女性成为被压迫者。也就是说妇女被排斥在劳动市场的边缘,这正是妇女异化经验的根源。

三、理性意识形态

资本统治及其造成的女性劳动的边缘化、女性全面的异化还通过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得以加强。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劳埃德在1993年出版的《理性人》一书中,从哲学层面探讨了女性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根源在于理性至上,具体包括:男子比妇女更有理性;理性是根据男人的生活和经验来定义的;理性在观念上证明了男性统治的合理性。对理性的强调以对非理性的排挤和贬低为前提,所谓理性人是性别化的,它指的是男性的理性而不包括女性。当理性人被颂扬时,哲学家们不是在谈论人类的理想化的东西,而是在谈论男人们的理想^[41]。

(一) 理性化等于男性化

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中的理性男性化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42]和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关于理念与型相的区分中,明显的是前者优越于后者,前者与男性相连,后者与女性相连。尽管他强调,自然赋予人的一切权利,男人可以追求,女人也可以追求;但在对各种权利的追求中,他仍认为男人比女人优越。如他在感谢众神赐给他的八种幸福中,



第一种幸福是众神让他生为自由人,而不是生为奴隶;第二种幸福就是让他生为男人,而不是生为女人,他为自己生为男人而不是女人感到幸福。尽管柏拉图认为理想国中的社会分工安排有等级差别,而这种分工只不过是不同禀赋的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的自然区分,但柏拉图还是赋予男性比女性的优势。他指出,对于人类各种事业的能力,恐怕无不是男胜于女,虽然在许多事物上,许多女人的确比许多男人更为擅长,但是总的看来是男强女弱。他还指出,女人男人可以有同样的才能适宜于担任国家保卫者的职务,分别只在于女人弱些男人强些罢了^[43]。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与质料、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欲望、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二元区分中,前者是男性具有的,后者是女性具有的。在最基本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中,男性具有理性而成为完整的人,女人和奴隶被视为理性不健全者、有缺陷的人。尽管他也认为理性和感性共同造就了身心健康的个人,但他的理性概念一直是性别化的,理性化的男人和感性化的女人,是前者支配和控制后者,就天赋说来夫唱妇随是合乎自然的,雌强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反常的事例。还说,男女间的关系自然地存在着高低的分别,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原则在一切人类之间是普遍适用的^[44]。亚里士多德还从生物学的角度加以论证,在《论动物生成》中,他以形式高于质料的理论为基础论证了雄性比雌性优越,尽管雄性和雌性在再生产中都有贡献,缺一不可,但对于生成之物来说,作为运动本原的雄性比作为质料的雌性更优越,更加神圣,雄性是主动者和运动者,而雌性则是被动者和被运动者^[45]。亚里士多德从政治学和生物学角度论证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公共的工作场所逐渐从家庭的私人领域中分离出来,为公共领域统治私人领域提供了历史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牛顿创立的机械论世界观为理性统治非理性提供了科学基础,这种自然观把宇宙中的公众世界与自然界分开,宇宙的一部分被理性统治着,另一部分即它的次要领域统摄着非理性的一切,如情感、人的个性、女人等。这样,男性被赋予较高的价值,女性则被认为生理上有缺陷的、富于感情而缺乏理性与逻辑思维的能力,被赋予较低的价值。理

性统率着一切,他有权把理性强加给缺乏理性的创造物包括女性。

近代哲学家一方面主张平等的天赋人权,另一方面将妇女列为二等公民。女性主义哲学家安·弗格森把女权主义定义为产生于妇女批判虚伪的男性思想的运动。这种虚伪表现在这些男性思想家在提倡平等、人权,反对国家、教会或经济机构的压迫的同时,将妇女列为二等公民,不给她们同男性一样的权利。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女权辩护》中对卢梭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卢梭认为男孩和女孩要达到“理性深邃的男人”和“感情丰富的女人”^[46]这样的目标,这一设计就是要让女性服务于男性、服从于男性,其目标就是使妇女所受的教育,应该永远与男人有关系,使男人感到高兴,对我们男人有用,使我们爱她们、尊重她们;在我们幼年时期教育我们,在我们壮年时期关怀我们,劝诫和安慰我们,使我们生活舒服愉快,所有这些永远是女人的责任,也是她们从幼小时候就应该受到的教育^[47]。哲学家洛克在其《政府论》中主张天赋人权,但他所说的人并非指整体意义上的人类,而是特指人类中的男性。由于公民的基本资格必须是有理性,而且只有公民才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女性缺乏理性,因而不具有公民的资格,不适于参与公共事务,因此被排除在自由、平等的个体之外。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中也蕴涵了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关于理性与情感、心智与身体、心灵与自然、公共与私人的区分中,笛卡尔认为前者与男性相连,并被赋予较高价值,后者与女性相连。这种二元等级区分的模式蕴涵着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预设了以性别隐喻为基础的父权制文化的男性统治模式^[48]。黑格尔通过绝对知识实现了概念对对象的统治与支配,在这一过程中,黑格尔遗漏了包括性别差异在内的一些重要的东西,表现在黑格尔在向着绝对精神的运动中排除了女人^[49]。有批评家指出,这种排除既体现在实际行动和社会形式中,也体现在语言中。女人的职责就在于对血肉之躯的关照,属于家庭礼仪的范围;男人自己属于行动、科学、政治、哲学这些公共领域;甚至语言,这普遍化的中介,对女人来说,也是异质的和迟钝的^[50]。

霍克海默将西方哲学史中的这种现象作了如下概括:“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坚持认为,妇女不是完全成熟和有责任感的

存在……男人是完美的存在,女人则是受挫的男人,低劣的男人”^[51]。后现代女性主义也作出了如下的批评: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到康德,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52]。西方学者劳埃德认为,正是理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导致性别不平等,她明确提出“理性是男性的”观点,她追踪了渊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性至上原则。大量的西方哲学尤其是理性主义思想都要求人们“超越”所谓的女性的经验王国。

劳埃德通过亚里士多德说明男人对男性经验的理解如何形成作为哲学推理范式的二分法的,这样的二分法有形式与质料、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欲望、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等的区分。尽管每一存在物都是形式与质料的统一,但活动的形式支配被动的、死的质料;灵魂的理性部分对其非理性部分有权威性;理性和欲望分别是男人的特性与在女性中占优势的特性;理论知识追求真理,实践知识产生行为或制造事物。这样,由于理性被推崇为男性的最高要素,妇女的从属和劣等地位便成为一个“自然”的事实:男人具有理性能力而成为完整的人,女人则缺乏理性能力而成为有缺陷的人^[53]。劳埃德还通过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说明西方哲学中的二分法的普遍性,即二分法所导致的等级制。在这种二分法中,理性与情感、心智与身体、心灵与自然、公共的与私人的区分中,前者与男性相连,被赋予较高价值,后者与女性相连。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二元模式是建立在关于男性/女性的隐喻之上,而这些二元模式反过来又支持和强化了性别的两分法及关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假定,并为世界的统治逻辑提供了合理依据,因为两分法总是暗示着等级制,等级制又导致了控制欲望的产生。这种二元模式蕴涵着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预设了以性别隐喻为基础的父权制文化的男性统治模式^[54]。

整个西方哲学充斥着对女性的排斥,在福莱克斯看来这种排斥集中体现了哲学的“男性化”,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哲学的男性化有着不同的内容表现形式,但按照格里姆肖,它们可能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否认人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性和相互作用性,强调人的分离性和孤立性;第二,强调自由意志的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第三,精神与

肉体、理性与激情以及理性与感性的分离与对立；第四，掌握、支配、控制肉体、激情或感性的主题；以及对失去控制的恐惧；第五，惧怕女性和任何与她们有关的事物，包括性、自然和肉体；第六，贬低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东西，要求不要依赖它们。通过精神/理性/男性与身体/感性/女性等的二元区分，确认前者优越于后者，前者具有对后者的统治地位^[55]。

（二）女性主义的批判

对于男性统治的理性哲学基础，女性主义展开了自己的批判与建构，按其主张及策略的不同，可作出如下区分^[56]：

第一，自由女性主义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传统的理性概念可以继续维持，但是必须把它开放以包括承认女人的理性能力，把理性范围从男性扩大到女性，简称“理性扩大说”。“理性扩大说”强调女人和男人在本体论上是完全相同的，只要女人具有与男人相同的理性，就能达到与男性的平等，但这样的平等只能是一种无视差异的平等。

第二，激进女性主义或文化女性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启蒙时期理性/非理性之二分法，并分别为男性与女性具有。面对强大的男性理性，必须纠正对女性特性的误解，强化女性非理性方面的特性，以与男性的理性相对抗，可称为“对抗说”。

第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摒弃启蒙思想中理性/非理性的对立以及性别区分，重新建立有别于传统的知识论，简称“重建说”。“重建说”解构了女性共有的立场，既然已经没有共同的立场，如何谈“女性”的解放？

“对抗说”基于对女性特点的重新评价，强调女性特点的优越，格里姆肖认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对“抽象”的批判以及相信女性思维更受具体场合的影响，较少地受抽象规则的制约，也就是说更“具体”；第二，强调同情、养育和关怀等价值观，女性被认为更看重而且更普遍地体现了这些价值；第三，对认为选择和意志是道德中心的观念以及把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提出批判，从而强调具体情境的需要，在关注它的过程中发现这些需要并作出适当回应^[57]。基于女性特点的重



新评价产生了对女性的思维、认识、道德、文化等的重新评价,这样的评价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劳埃德的理性批判试图张扬女性特征,以颠覆男性统治。劳埃德揭示了西方哲学史上理性概念的缺陷,希望建立无性别的理性。她认为应采取更为尊重情境的方法来处理理性,尤其要考虑妇女的经验和体验,关注人们的需要、人的社会关系,从正面分析女性经验,因为在她看来,这种经验能够为构造更具代表性的人类知识提供源泉。当然她并不主张建立女性的理性,而是主张推翻二元结构,建造一个包含两性特质的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劳埃德一面批判理性,一面还在理性的框架下希望重建没有性别隐喻的理性概念;劳埃德意欲摧毁二元模式,试图通过区分得到训练的心灵与未经训练的心灵来论证理性的特殊性。

在男权统治下,重建女性文化、女性价值与无性别的理性的可能性与意义在哪里?从政治策略上讲,女性主义者有必要界定女性的特殊性,有必要去肯定女性的特性、优越性,用她们的差异性来摧毁、颠覆和解构现有秩序。在伊里加雷看来,女人理论并不是要告诉人们女人是什么,而是要去暴露父权制的基础。而且为了达到最终目标,必须经历也许与目标相反的中间阶段,这使人想起马克思讲过的“异化的克服与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辩证法的分析,这是一条解放的必经之路。

但在这里可能遇到以下困惑:

困惑一:正如黑人女性主义者胡克斯指出的,如何区分改良与革命的进程?如何使改良转化为革命?女性主义的革命种子或真意识,何以在父权文化的土壤里萌芽生长?^[58]

困惑二:尽管伊里加雷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父权制的形而上学框架”的深刻性有相当的认识,但在界定女性特征时如何不陷入必须摆脱的父权制的形而上学构架呢?她还是缺乏信心,因为作为女人来说话,还不足以深刻地动摇传统西方哲学的基础,更不要说改变了。

困惑三:当女性主义用女性特征对抗男性化的时候,实际可能造成怎样的结果呢?由于长期以来男性一方太强势了,完全排除了女性声音的存在,谈不到两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当你强调女性特征优越

性的时候,处于强势的一方可以不用理睬你。这样女性可能会永远处于一个远离历史、远离公共领域的世界,不仅维护甚至加强了已有的性别歧视。格里姆肖明确提出了她的担心:一是二元观点奠定了隔在这两个范畴之间的独立的、不可妥协的距离。女性标准只不过是男性标准的一个附件,它不可能被男性标准接受或容纳,只能被控制,在这样的状态中,相互作用和妥协都是不可能的。二是接受“女性伦理”这个范畴时,我们是否可能无心地维护了性别歧视呢^[59]?

如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呢?美国学者安乐哲提出,要根本解决性别歧视,必须改变二元统治结构,不改变二元统治结构,最好的无性别歧视社会将是简化主义的,即促进女性加入荣誉男性行列,自律、独立、自决的同时,牺牲人性的差异。女性解放必须进行哲学革命,从而形成无性别歧视社会。他指出,以渗透传统中的二元论为基础的性别歧视牢固地扎根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要想从根本上实质性解决这一问题,没有激进的哲学革命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社会、政治、宗教事业仍然提倡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无性别歧视社会不可能出现^[60]。为了无性别歧视社会的出现,一方面,必须揭示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中隐藏的男性化倾向,论证女性化特点在伦理上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还应该将这种讨论深入到存在论和认识论中去,挖掘其中的价值导向及可能的意义。

无论是哲学的预设还是哲学的基础,在貌似普遍主义的客观公正中具有强烈的男性至上和父权制特征,表现为西方哲学中的理性至上。对此,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对策是:一是借用理性,以此为前提来争取女性解放,但结果又可能导致无视性别差异的女性男性化倾向;一是对抗理性,强调女性特征,但结果又可能使女性更加边缘化,从而偏离女性解放的目标。如何从女性与理性的两难困境中走出来?在伊里加雷看来,必须暴露那些所谓的普遍性和理性的高超研究中即在哲学中的父权制的基础,必须通过研究理性的感情基础,深刻地动摇构成哲学的概念。尽管这样的讨论不是什么政治性的或策略性的,不足以动摇哲学的父权制的基础,但它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认识问题的新视角,它是出于一种伦理性的关系,渴求能恰当表现及传达人类的知识与经验^[61]。



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无论劳埃德,还是当代女性主义者,他们对作为人类一半的女性的知识与经验的展示,不仅是对当下男性统治合法性的冲击,更主要的是对人类知识与经验的全面的展示,这样的展示会对人类的认识乃至人类的生存提供意义。

(三) 意识形态对资本统治的支持

马克斯·霍克海默提出的“专制的人格”是指经过恰当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工人具有有益于资本主义的特征。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从不同方面论述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通过性别差异的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实施了对妇女的压迫。哈特曼论证了不仅通过家庭工资体系、通过控制妇女劳动力,还从意识形态层面强化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伙伴关系,一方面,男性价值、男性特征被认为与资本主义相符合,女性价值与女性特征遭到贬低;另一方面,赋予交换价值相对于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王国即妇女的领域,及与此相关的特性,如情感、母性等)的优先权。乔多萝和哈丁分别从母职与育儿的角度,探讨了性别差异的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以及男性统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巴雷特通过教育体制、性别劳动分工、家庭甚至国家对于妇女受压迫影响的探讨,揭示了妇女受压迫不仅存在于经济、物质层面,还存在于精神与文化层面,受文化唯物主义的影响,巴雷特突出了意识形态对于妇女受压迫的建构与再生产作用,这一过程是通过学校、教育等途径建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过程。

约翰·麦克因斯在其《男性的终结》中论述了必须终结作为意识形态的男性气质。首先,他指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人们使用这种意识形态可以帮助自己想象那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男女之间基于性别的差异的存在。这种想象有助于个体去理解一个据说男女之间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社会,它可以为个体提供一些重要的心理防卫,以抵御对现代性的恐惧;其次,男性气质是在一个已经承认了男女平等的世界上男性优势最后的意识形态防御。由于科层制与市场的非人格化、理性化的发展,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地位均等的社会,因为不考虑人,因而也鼓励人们不考虑性别,这客观上

形成了性别地位的均等、性别的平等化。现代性一方面促进了性别平等,同时使男人和女人受市场的抽象规则的束缚。所以在现代社会,以父权制时代产生的劳动的性别分工的物质与意识形态的遗产,与瓦解这种遗产、创造性别平等秩序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力量结合在了一起,这种迅疾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矛盾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创造了性别这种崇拜的意识形态;最后,男女平等必须终结男性气质。当代社会男女之间的社会差异,包括他们相关的权力、地位、资源并非其自然差异的社会表达,而是父权制秩序与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相冲突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遗产。麦克因斯试图揭示现代性中包含的矛盾以及现代契约中所包含的悖论,他提出男女真正的平等必须是现有的劳动性别分工及支持它的意识形态的瓦解^[62]。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他希望看到男性气质的终结。

马克思尽管没有直接论及意识形态对女性地位的影响,但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揭示了理性原则的种种表现及其对人类生存的影响,这些恰恰是资本统治下女性解放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资本统治与抽象的理性原则使得人的感性生命仅仅被用来增加抽象的物质财富,不可避免地降格为动物式的存在。同感性生命相脱离的理性,一旦作为原则贯彻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去,便成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歪曲和破坏,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了追逐资本这种现代类型的社会统治权的无限欲望^[6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政治平等的观念、自由市场的观念和法律平等的观念等意识形态来保证的。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要把这种统治扩展到其他生活领域中去,包括要在思想领域中进行统治。资产阶级通过种种平等的神话,使人们意识到现实中的不平等不是公正制度的产物,而是自然天赋的产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平等主义是其优点之一,它决不应该被舍弃。人们从小就被教导:人人都有平等机会,摆在眼前的不平等不是公正的制度的产物,而是自然天赋高低的产物”^[64]。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具有历史特征的特殊的社會生产,揭示了资本主义追求价值一般的非自



然的特征。交换价值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再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颠倒地表现出来,“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从而交换价值不是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规定性,而是表现为它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作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换句话说,劳动的社会性质,不是被当做产品的社会属性来反映的,而是被当做“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当做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来反映的”^[65]。把交换价值的生产理解为自然的因而也是唯一的和一般的社会生产,把交换价值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式理解为自然的因而也是唯一的和一般的社会关系,从而使得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社会生产的自然的永恒形式。马克思指出,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

恩格斯通过对契约平等的法律的思考,揭示了法律只不过是理想化的“法律规则”的名义保护既定的秩序,法律所提供的平等只是一种虚假的平等。“诚然,我们的法学家认为,立法的进步使妇女愈来愈失去申诉不平的任何根据。现代各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越来越承认,第一,为了使婚姻有效,它必须是一种双方自然缔结的契约;第二,在结婚同居期间,双方在相互关系上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这两种要求都能彻底实现,那么妇女就有了她们所能希望的一切了。这种纯法律的论据,同激进的共和派资产者用来击退和安抚无产者的论据完全一致。劳动契约据说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而只要法律在字面上规定双方平等,这个契约就自是自愿缔结。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此方或彼方没有明白表示放弃,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放弃掉,这又是与法律无关。”^[66]真正女性的解放不可能通过法律上的形式平等而得到。

对于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由平等等概念,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统治阶级为自己编造出的诸如此类的幻想^[67]。所以,在现

代社会既定的秩序框架中,即使妇女在法律上可以享有较高的地位,享有契约规定的平等,女性解放不可能有特殊的空间,因此,“妇女的增权”不是意味着所有人的增权,就是意味着虚假的增权^[68]。资本统治与意识形态的统治相互作用使得女性解放满足于机会均等的获得、把女性解放的努力放在反对机会的不均等的斗争上;而恰恰是在机会均等的实践中,根据联合国报告揭示,在当今的世界中,至少70%的穷人都是女性,而且联合国预计未来10年内可能会达到75%,这意味着在世界穷人中,女性和男性所占的比例是3:1。

注释:

[1] 约翰·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黄菡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2] [英]I. 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9-280页。

[3] [英]I. 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0页。

[4] 《资本论》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50页。

[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6] 吴晓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9页。

[9] 转引自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6、41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3页。

[14] 《资本论》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33页。

[15] 《资本论》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3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2、343页。

[17] 《资本论》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41-442页。

-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280页。
- [1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9页。
- [20]《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1页。
- [21]吴晓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2、265页。
- [2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58页。
- [2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 [2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56页。
- [2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 [2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 [28][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陈文庆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50页。
-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 [30][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陈文庆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88页。
- [31][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陈文庆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51页。
- [32]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 [33]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 [34]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
- [35]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5页。
- [36]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 [37]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 [38]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 [39]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308.
- [40]转引自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4-85页。

[41] 费多益:“理性与女性——劳埃德思想述评”,《哲学动态》,2001年第11期。

[42] 人们对于柏拉图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贾格尔就认为柏拉图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中少数几个向妇女的从属地位进行挑战,并断言妇女的潜力与男人一样,完全是人类的。参见 Alison Jaggar:“转向 21 世纪的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载于邱仁宗主编:《女性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31 页。生态女性主义者苏珊·格里芬在其《妇女与自然》中,从哲学上追寻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二元等级区分,在表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区分中,前一个世界高于后一个世界,正是柏拉图的二元对立等级制支撑着西方社会的这一观点:妇女是比男人低贱的人。转引自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379 页。

[43]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第 187 页。

[4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第 36、15 页。

[45] 转引自朱易安等:《女性与社会性别》,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73 页。

[46]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18 页。

[47] 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王蓁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第 101 页。

[48] 费多益:“理性与女性——劳埃德思想述评”,《哲学动态》,2001 年第 11 期。

[49] 艾莉森·利·布朗:《黑格尔》,彭俊平译,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98 页。

[50] 艾莉森·利·布朗:《黑格尔》,彭俊平译,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98 页。

[51] 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4 年,第 239 页。

[52] 转引自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年,第 180 页。

[53] 费多益:“理性与女性——劳埃德思想述评”,《哲学动态》,2001 年第 11 期。

[54] 费多益:“理性与女性——劳埃德思想述评”,《哲学动态》,2001 年第 11 期。

[55] 转引自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61 页。

[56] 转引自文洁华:《美学与性别冲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28 页。

[57] 转引自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161页。

[58]文洁华:《美学与性别冲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59]转引自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5-167页。

[60]转引自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61]文洁华:《美学与性别冲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62]约翰·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黄蓂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3、4、15、221页。

[63]王德峰:《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5-266页。

[64]转引自[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

[65]《资本论》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0、89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71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68][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第八章

女性解放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直到近代,女性解放才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因为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政治条件及思想、理论等社会条件。哲学家罗素曾说过,近代以来,妇女获得政治权利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民主理论的直接影响,这种理论使得人们对于妇女的需求,找不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答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门自谋生路,她们不再依赖父亲或丈夫的恩惠来获得舒适的日常生活^[1]。但是天赋人权使得人人应该具有的权利,对于男性无需争取的权利,对于女性来说却是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才获得的。从理论上说,获得了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后,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的各项事务,但仅仅有权利的保障对女性解放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今对女性解放的关注已不仅仅停留在女性的政治解放层面,而已经深入到女性的社会解放层面;不仅仅把女性解放看做对女性问题的解决,而是把对女性问题的解决看成是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其他问题的一部分。只有女性的社会解放才能为人类所面临的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条件。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因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2]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把这一思想具体表述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3]。

一、女性解放历程

(一) 西方女性解放的目标诉求

在西方,女权运动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追求法律方面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如选举权、教育权、就业权、财产权等,这些对于男性无需争取的权利,对于女性,却是经过了许多年的努力才获得的。如果从沃斯通克拉夫特 1792 年的《女权辩护》算起,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女性才

相继在不同的国家获得选举权。1894年,新西兰成为妇女争得选举权的第一个国家;1906年和1913年,芬兰和挪威妇女分别获得了选举权。英国妇女的选举权是分两步获得的:1918年,30岁以上妇女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妇女才最终获得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美国妇女直到1920年才获得选举权,这一权利被载入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各州不得因性别而拒绝给予或剥夺妇女的选举权”。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却是美国妇女奋斗了将近70年的结果。其他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妇女在此后的几年中才相继获得了选举权。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遇到重重阻力,保守的男性甚至用医学观点来反对妇女获得选举权^[4]。在受教育权方面,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北美等地区女子教育才获得较快的发展,女学生在校生活占总人数的25%~30%。到1900年,美国80%的学院、大学以及专科学校都接受了女性。女性就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增加,以英国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职业女性人数由1901年的84万多人增加到1914年的200多万人,1916年达到230万人,1918年达到340万人。

女权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随着左派民权运动和学生反战运动的渐渐消退,女权运动的诉求开始发生变化。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在父权制社会中争得平等的权利不能使女性获得解放,甚至会使女性解放误入歧途;她们转而强调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社会性别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女性具有与男性不同的经历、自我意识,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提出了“转变话语”和“重估女性”的理论策略。20世纪70年代以后,激进女性主义从生理学上提出“女性是优越的”口号^[5]。她们肯定女性的本质,赞美女性的特征,呼吁整个社会和男性重新评价和接受女性特征,诸如被动性、乐于照料别人的抚育性、富于感情、对他人的依赖等。在她们看来,被动性可以避免人与人的暴力冲突;抚育性可以使人乐于去照料儿童、穷人和受伤害的人;对男性理性的崇拜会毁掉这个星球,反之,女性的重情感和重直觉则可以避开对生命毫无感觉的理性;依赖性对于地球的幸存也是绝对必需的,男女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是绝对重要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应该得到重新评价。所以有学者提出,以往被忽视的女性的这些独特经

历,恰恰可能成为女性文化的源泉。“我们没有看到妇女和她们的活动,是因为我们一直沿用着不适合妇女的历史问题。要纠正这种状况,照亮那些历史中黑暗的领域,我们必须考虑在男女共处的一般文化中存在着妇女文化的可能性,进行以妇女为中心的研究。”^[6]

中国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运动具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它也是在全球女权运动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不断壮大的,但它不是女权主义的结果,而是社会革命的直接产物。从历史起点上讲,中国妇女解放具有如下特点^[7]:(1)从时间上看,发生在19世纪末而不是18世纪。女权主义思潮和女权运动在西方国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和影响,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潜在前提和背景。(2)女权主义最早直接影响一部分男人而不是女人,因此是中国男人而不是女人最早呼吁解放妇女的。(3)“解放妇女”的意识是民族觉醒的产物,也是民族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妇女权利要求始终让位于民族解放斗争,独立的女权运动在中国从来未成气候。(4)男人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始作俑者和主力军。在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女性解放的男性倡导者在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影响下,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如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就用了不少篇幅来阐述妇女问题。他说:“男尊女卑”与“天赋人权”是完全相悖的,“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授天权一也”。“以公理言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以实效征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从胡适对李汝珍的女性解放思想相当高的评价中,足见他对女性解放的重视,他说: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地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作公平的讨论。直至19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大胆地提出,虚心地讨论,审慎地建议。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占有一个很光荣的位置:这是我对于《镜花缘》的预言^[8]。

中国女性解放在不同时期也提出不同的目标。20世纪末21世纪 273

初,提出女子参政权、兴女子实业、争取女子社会权利,如放足、剪发、入学与婚姻自由等要求,旨在从身体上解放妇女,从思想上武装妇女。妇女明显处在“被启蒙”、“被解放”的境地。在中国革命时期,由于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当时的关注点是女劳动者与女雇农的权益,如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确定当时的具体斗争目标为: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农妇利益的具体要求,如承继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妇女、保护女雇农的劳动等^[9]。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与西方的女权运动不同,它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框架下进行的,与西方女性主义以个人为核心的“女性主体觉醒不同,中国妇女的觉醒总是伴随着民族的觉醒,民族群体意识超越性别主体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主动向已经足够发达的男性中心社会要求权利不同,在中国,妇女的运动总是伴随着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10]。

女性解放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诉求、具有不同的特点,这都是由社会发展所能提供的前提条件决定的,“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有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人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1]。

(二) 女性主义社会平等观的困境

从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女性主义的目标追求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在改变女性不平等的地位上,她们基本主张通过社会变革达到女性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甚至生理等领域内与男性的平等权利,把追求社会平等作为她们的目标。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女性在很多领域向与男性的社会平等迈出了重要的步伐,这也是女性解放所必经的阶段。桑德拉·哈丁在其文章“女性主义:改革或革命”中提出,她赞同改革,并把它当做革命中的一个阶段:改革者的头脑中可以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它就像是一幅新社会的图画。改革将一点一点地填满这个画面。有的改革相对来说没什么困难(如同工同酬),其他的

要做到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每份工作同等机会)。但无论困难是大是小,对于每种变化社会中总会有一个先例——在某个地方,并且所需要的变革只是那些将产生在人们期待的新社会的画面之中的。于是在长期的一系列少量的改变之后,每件事都会逐渐改变从而使速度变得完全不同,在这种变化模式下,一系列的改革可能会形成革命^[12]。但女性追求社会平等的改革能否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取决于怎么改革以及朝哪个方向改革。

在女权运动中,女性解放曾被视为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与男性竞争,享受与男性一样的自由、平等,获得与男性一样的政治权利或民主权利,从而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机会。为此她们一开始向法律制度中的不平等挑战,认为女性解放就是要消除法律或习俗中的妨碍女性成功的种种强制,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律规定的平等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可能导致对女性的歧视。如对男女都适用的法律规定,由于男女的生理差异,明显造成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例如,1976年美国吉尔伯特诉通用电器公司一案中,吉尔伯特控告通用电器公司性别歧视,因为该公司的伤残福利条例规定,不管男女(假如男人会怀孕的话),由于怀孕分娩导致无工作能力不属于医疗保险的范围。又如,禁止消防队员(适用于男女消防队员)在等待火警时哺乳的规定,这两种情况都平等地适用于男女,但明显对女性不利。

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工作获得经济上的平等,摆脱对男性的经济依赖,结果又如何呢?由于性别分工导致女性被陷于家庭中的地位,使得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通常她们的工作资历比男子低,工作经验比男子少,就职的工作往往是辅助性的、操作性的、报酬较低的工作,而且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她们难以找到工作,又极易失业。女性试图通过经济上的平等获得自我实现,但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女性必须承担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女性并没有从经济上获得解放。

可见,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追求与男性的社会平等,结果不是消灭而是保护了男女不平等,而且强调和巩固了男性态度和现有法律。但是承认或强调女性的性别差别的平等又有可能是对女性的限制,使女

性失去与男性相同的待遇。例如限制妇女工作时间,禁止妇女夜间工作,禁止妇女从事如开矿之类的危险行业,这些劳动保护法也许改善了妇女的健康和安全,保证妇女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家庭生活上,但它也将妇女从某些行业中排斥出去,如那些需要超时的工作,那些必须从夜班做起的工作。由于它造成了允许妇女从事的行业中的劳动力过剩,它也成为降低妇女工资的一个因素。

无视性别差异的平等会使两性实际上变得不平等,而承认性别差异的平等又可能导致现实的危险。有些女性主义者提出,既然在现有的认知、存在、价值是男性中心的前提下,女性无法做到与男性的真正平等,那么她们索性就以妇女中心对抗男性中心,重视与发展女性的价值、存在、认知方式,并以此来看待女性的差异,即把这些差异不是作为女性弱点的证据,而是看成女性力量的源泉。如对妇女的孕产能力,一般把它看成丧失能力,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包括孕产等在内的女性的特殊经历会产生女性特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如南希·哈特索克指出,从女性的特殊的生理特点出发,会使她们“反对任何二元论,重视具体的日常生活,具有对他人和自然世界的各种联系和延续的感觉。如果说意识是由物质生活构成的,那就应看到妇女以相互关系来界定的存在、向界限挑战的身体体验及转化物质和人类的活动必定会产生不同于二元论的世界观”^[13]。卡罗·吉利根从心理学角度通过对男女道德发展的研究揭示,与抽象思考和理性原则的男性不同,女性以不同于男性的视角去观察和体验生活,发展出一种对人类经验的独特的价值观。

在现有社会结构中通过追求与男性的社会平等来改变女性地位的努力是女性解放必不可少的,黑人女性主义者胡克斯把它看做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它代表了抵抗,是被压迫者的人性的声明;但它不是革命,没有形成进一步的革命发展,并由此使女权运动陷入困境。什么是平等?与哪个阶层的男性平等?女性主义在平等问题上是否有共同的观点?很显然,考虑到妇女是处于不同种族、民族和阶级中的,她们的平等要求不大可能一致。如在20世纪初法国女性主义者召开的一次关于是否要给女佣每周一个休息日的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每

家都雇有女佣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最后以压倒的优势决定取消给予休息日的提案。所以女性主义常常被其他阶层、种族的妇女斥责为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追求自身利益的反映。追求与男性的社会平等的目标不可能使各民族、种族和阶层的妇女团结起来,追求的平等到底与哪个阶层的男性平等,下层的、贫穷的女性或黑人女性深知自己群体中的男性都不可能具有白人女性具有的那些特权,她们也就不会把与男性的社会平等看做解放的目标。而对女性个体来说,追求成功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像个男人,失去女性的特征,或者担当传统的女性角色,强化女性的传统特征,女性必须在这两者之中作出自己的选择。

对于女性解放来说,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法律权利是必须的:第一,强调妇女受压迫的普遍性,并论证所有文化背景中的妇女比男性的权利少,可以团结妇女,启发妇女觉悟。女权主义史学家斯考特在20世纪90年代回顾女权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时承认,为达到女性主义的政治目的,女性主义的历史成了一部削减女性之间差异的历史。这些差异(即阶级、种族、族裔、政治、宗教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差异)被缩减成一个妇女的共同身份(往往与父权制相对立而言,父权制即男性统治的制度)^[14]。第二,在等级社会中,当一个群体的权利从制度层面遭到压制时,对于平等的追求可以动员该群体成员起来废除等级、结束压迫,团结起来反对非正义和统治。如早期的女性主义者通过呼吁要求从经济、社会、教育机会等方面向女性开放。因此,在女性处于底层的世界中,女权主义还不能抛弃平等的口号。

但女性解放不能够满足于这些权利的获得,因为,第一,以男性为平等的标准并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男女平等的目标假定了男性是人类的标准,因而它也赞同了男性统治意识形态中最根本的信条。于是作为人们平常认识中的男女平等目标,可以被认为是公开帮助维持了现状,而不是改造了现状。因此,与男人平等的要求非但没有表达女权主义的精髓,反而可以被看成是否定了女权主义最激进、最独特的意向^[15]。黑人女性主义者胡克斯就批评这种社会平等观强化了现有的男性态度和标准,把争取与男性的社会平等作为女权主义的目标强化了现有的男性态度和法律。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常常可能在结果上保证



了而不是消灭了男女不平等。第二,造成女性的两难困境。要想成功必须成为男人,而获得像男人一样的成功,又必须失去女性的一些特质。“由于人们习惯将现存的、也就是男人的文化当做唯一可能的文化,就产生了这样的两难困境:女人要么放弃创造性的文化成就,要么放弃自身”,“这似乎要求女人在保持自己特性和从事一种创造性文化成就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16]。

女性主义的社会平等观之所以会陷入困境,是由于以下原因:

1. 脱离具体的阶级、种族、民族、年龄,抽象地谈论妇女范畴。无论是早期的平等派还是差异派都强调了妇女受压迫的普遍性,没有考虑到女性之间阶级、种族和国家归属的差异。女性的社会存在是由种种因素决定的,包括阶级、种族、族裔、年龄、教育等客观因素,仅仅考虑性别因素显然是不够的,或把性别因素放在最重要位置也是不合适的。

2. 强调妇女利益的普遍性。女性内部的阶级、种族、宗教、文化等差异使得女性很难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统一行动,她们不可能具有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比如第一世界妇女与第三世界妇女关心的问题显然是不同的,当第一世界妇女对性别和生育问题给予过多关注时,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比较关注经济和政治问题。在联合国召开的三次国际性的妇女大会(即1975年墨西哥城首次妇女大会、1980年哥本哈根的中期大会、1985年肯尼亚内罗毕的终期大会)上,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由于关注点不同而导致激烈的冲突。第一世界妇女认为,大会通常由政治问题占据中心地位,所谓妇女问题被排斥到一边,美国代表团团长评价说,内罗毕大会是“一次(政治和意识形态)虚伪的纵欲狂欢”^[17]。而第三世界妇女指责第一世界妇女妄自尊大、自以为无所不晓,却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压迫。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女性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以美国20世纪70年代妇女运动遇到的问题为例,当时尽管各阶层妇女都支持男女就业机会均等、同工同酬的法案,但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妇女认为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同。作为运动主体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更关注的是如何进入传统男性把持的领域,比如,她们要求取消法学院、医学院原有招收女学生的定额等;广大女工(包括受雇于这些白人家庭的女佣)所关心的则是最低工资的界定法,

以及保障社会福利的基本法等；而黑人妇女更多的是关注种族问题在社会各层面的反映。

3. 离开种族压迫、阶级压迫解决性别压迫。许多第三世界妇女确信,把性别歧视从政治、经济和种族问题中分离出来,这是精英们的策略;它也同样是一种工具,它混淆了世界上大多数妇女为之斗争的真正问题,如在1979年纽约召开的一次国际女性主义会议上,一位美国黑人女诗人这么说:“如果美国白人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没有必要研究我们之间的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我们所受的压迫的不同,那么又如何对待以下事实呢——在你们参加有关女性主义理论会议时,帮助你们打扫卫生、照料孩子的妇女,往往是家境贫穷者和有色人种”^[18]。社会性别、种族和文化及其结构和制度是不可分离的,由性别、种族、阶级构成的多重压迫制度实际上是无法分开的。黑人女性主义者胡克斯指出,所有形式的压迫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它们都受到类似的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支持,因此一种剥削体系不可能在其他压迫体系依然保持完整的情况下被消除。

从女性政治解放的历程中可以看出,早期的女权运动要求男女平等,女性要求分有父权制社会和思想的价值尺度;随后,女性根本拒绝父权制的价值尺度,因为这些尺度本身包含着性别歧视。女性主义要推翻男性建立在其性别优势基础上的生命观、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必须在女性的身体原则上重建世界观、生命观、政治秩序和价值观^[19]。可见,女性主义已经从女性解放的政治层面深入到女性解放的社会层面,从把女性作为人的要求进展到要求把女性作为女人,要求的是人的存在与性别存在的统一。女性主义的目标已越出了早期女性主义所追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权利平等或机会平等,尽管它们仍然是女性主义所关注的核心。它还是一种对女性及性别进行全方位认识的思想,其目的不单纯是为了提高女性自身的权力,也是为了更好地使人权或民权得到广泛的贯彻和实施,使两性关系、婚姻、家庭、人类和社会制度健康协调地发展。这当然离不开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及对当今制度进行深刻地认识和批判^[20]。



二、政治解放：女性解放的前提和界限

(一) 政治解放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尽管女性问题早就存在,但女性解放议题只是在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获得发展,政治民主和个人权利的观念得以深入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马克思反对“异化世界”与“本真世界”的抽象对立,反对对异化世界的抽象否定,这一点不仅使马克思诉诸过程的理解——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是同一个过程,而且使马克思有可能对异化劳动的历史意义作出充分的估计^[21]。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指证了资本文明的一面。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开头就提出:“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22]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把对现代世界的否定和实证的肯定联系了起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文明面表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它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物质条件。“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物质要素”;“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

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23]。

第二,它给人类带来了自由平等的观念。“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到发展了的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古代世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生产的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它产生了具有完全相反的和主要是地方性内容的自由和平等。”^[24]

资本的文明面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女性解放提供了政治、经济及法律方面平等的条件:

第一,资产阶级反封建提出的自由、人权、平等的口号为女性获得一系列政治法律权利提供了条件。资产阶级出于反封建的需要,以天赋人权说为武器,争取自由、人权、平等,倡导人人平等,虽然并无意真正解放女性,但为女性的解放创造了政治环境。从历史上来看,只是在近代,女性解放才能要求获得作为人所具有的权利。在西方女权运动史中,1791年法国女作家奥林珀·德·古杰(Olympe de Gouges)写了《妇女的权力》的小册子;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完成了《为女权辩护》;1848年,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发表了逐字逐句模仿美国《独立宣言》的《观点宣言》;1869年穆勒发表《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些文献以天赋人权说为武器,明确提出了女性应当在法律上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女性应该有选举权、受教育权、财产权、就业权等。罗素认为男女平等所要求的权利完全根据于她们作为人的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据有利于民主的一般论点^[25]。

妇女政治及法律权利的获得为女性的真正解放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平等的法律权利对女性的意义,他认为工人与妇女之间有相似之处,这两个群体要获得真正的社会平等必须具有法律的平等,“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



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26]。他在1885年的一封信中指出:“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为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同时保护的合法化又是必须的,“劳动妇女,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需要特别的保护,使之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我承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的年代里,我关心下一代人的健康更甚于关心两性在形式上的绝对平等”^[27]。这里恩格斯提出了法律平等是真正的社会平等的前提。

第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妇女参与物质生产提供了物质前提,对女性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得到真正解放,因为只有大工业才为女性创造走出家门的机会。随着机器的普遍采用,原先依靠的男女体力差异不再起作用了,为妇女参与物质生产提供了前提。科学技术在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行业的运用,大大促进了工业、农业、商业等部门的发展,这些都为妇女参与社会的物质生产提供众多的机会。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在狩猎和农耕时代是谈不上女性解放的,因为女性是无法在这样的社会经济中担当主要角色的;只有信息产业和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社会,才能为妇女大规模就业和在工作中施展才干提供可能。他还指出,假如典型的产业工人是男性,那么典型的信息工人则属于女性,妇女和颂扬脑力胜于体力的信息社会是一对天生的伙伴。哪里信息社会繁荣发达,哪里的妇女就投入劳动行列之中。无论什么地方开展信息革命,妇女就汇集成一支劳动的大军^[28]。充分发达的信息社会将会为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获得高额利润,也尽可能地多用女工。于是大批妇女随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发展走出家庭,被卷入到社会物质生产中来,这对于妇女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首先,使女性获得了经济独立。劳动组织方面的变化给妇女带来了一个更广阔的工作领域,对已婚妇女来说,是一个更加独立的经济处

境,以及两性之间更加紧密的社会关系。因为女性就业将大大有助于妇女从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经济依赖,提供了男性对婚姻的控制。恩格斯尤其强调经济独立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在恩格斯看来,既然一夫一妻制与私有财产紧密相连,那么妻子要摆脱丈夫的压迫,必须首先经济上独立于男人;又由于“男子在婚姻上的支配权只是他的经济支配的简单的后果,它本身将随着后者的消灭而消灭”。所以,恩格斯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全体妇女参加公共生产部门,从事物质生产,消除女性对男子经济上的依赖,“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恩格斯通过对无产阶级妇女与资产阶级妇女的状况的对比,继续说明妇女参与工作的意义。无产阶级妇女参与生产,使她们在经济上独立于工人阶级男性;而资产阶级妇女因为经济上不能独立,资产阶级妇女所受的压迫多于工人阶级妇女。因为工人阶级妇女进入了劳动市场中,使她们在经济上独立于工人阶级男性;而资产阶级妇女不能独立于资产阶级。“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残余已失去了任何基础。”^[29]无产阶级妇女的这种经济上的平等造成了无产者家庭夫妻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平等,而且这种平等提供了真正“性爱的基础”。

其次,女性参与社会生产中,为女性的自主发展打开了社会空间。妇女参与生产实践过程,带来的远远不只是生存条件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形成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不仅改造着外部世界,而且是主体内在世界的再生产。“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换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30]。妇女参与大工业生产可以摆脱人的社会关系的狭隘性,形成人的丰富的社会关系,形成多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这是女性获得解放的源泉。对于女性参与工业生产的意义,马克思给予了高



度评价：“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31]。

对于女性解放来说，政治解放是必须的，但是单纯的政治解放对于妇女来说是非常不彻底的解放。尽管这些平等的权利使女性获得了作为人的生存的权利，但它没有肯定女人做女人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女性只有认同父权制文化，按照男性生存方式塑造自己，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做人的权利。所以可以说，女性的政治解放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女性解放，是以男性的说话方式来谈女性问题。对于女性来说，只能获得男性让渡的部分权利。由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是按照男性的生存方式发展的，从而在人的生存方式、心理结构、价值取向上更加适合男性的发展，这实质上是强化了男权中心主义^[32]。所以，对于女性解放来说，政治解放是远远不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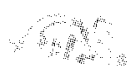
（二）女性解放必须超越政治解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梅扎罗斯指出，尽管女性解放事业在19世纪和20世纪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妇女可以参政议政、针对妇女的一些歧视性立法也废除了；但是这些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结构性不平等的物质权力关系，犹如社会民主和劳工运动丝毫没有把劳动从资本统治中解放出来一样。在没有挑战各种形式的资本统治的前提下，女性解放的历史事业不可能取得进展^[33]，因为在资本统治下，女性平等只能是象征性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资本主义的文明面为女性解放提供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条件的同时，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消极面。资本统治使得抽象的交换价值统治一切，由于交换价值只是一种量的关系，抽掉

了一切质的差别,因而抹杀了一切个性,资本统治所导致的是人的生存本身客体化和物化,人生存的感性世界的丰富性被对物的抽象的态度所占有;这种物的生产的片面化使得自由平等原则成为男性的特权。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谈女性解放,是以片面的物的生产为标准,以男性为标准,它只能以忽视一切差别的平等为结果,不可能在肯定女性的生存价值的基础上谈女性解放。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并不是真正人的解放,政治解放忽视人们之间的差异,无视差异的平等权利实际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马克思认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德国,“犹太人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没有得到政治解放”。所以犹太人的解放首先是政治解放。但是政治解放不是人的真正解放。现代国家以宣布一般人权确证了自己的起源,但是一般人权并不使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而只是给人以宗教自由;不是使人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而是给人以财产自由。个人把自己异化的要素如财产、宗教等的无限制的运动看做是自己的自由,这无疑是完全的奴隶制和非人性。哪怕最发达的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取消了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宣布了出生、社会等级、教育、职业等为非政治差别,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但社会上却存在真正的不平等,对所有人的形式平等掩盖了国家以此为基础的真正的不平等,因为这一国家仍然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它不仅没有解决作为其基础的市民社会内部私人利益的分裂和对立,相反,“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34]。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触犯作为大厦基础的市民社会,只有把政治解放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改造,即废除私有制,才转变为人类解放。这必须要求社会有一个变革,“一般的革命……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35]。从这种观点看,重要的不仅是平等的权利,而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的变



革,来消除妇女的屈从地位。

在《〈黑格尔法哲学〉导言》中,马克思谈到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没有政治解放就不可能有人类解放,但是政治解放不是人的真正的解放,不可能有人的真正的自由,所以认为政治解放能够自动达到人类解放,那只是一种空想。马克思在评判德国革命状况时指出,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而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是乌托邦的空想。人类解放是要解放整个人类,因此,人类解放必须成为政治解放的前提,没有人类解放,政治解放是不彻底的,甚至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解放。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阶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36],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真正体现者和承担者。对于女性解放来说,真正的女性解放必须是人类解放。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社会从私有财产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所有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37]。马克思区分了共产主义与纯政治性质革命的解放,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彻底的社会性质的人类解放,是人的社会解放,是人类的解放。这种解放不是建立在与异化世界抽象对立的基础上的,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

的真正占有,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丰富成果的。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视个人之间的差别的平等权利实际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的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因为人们各不相同,强调权利的平等会导致不平等。平等在于以劳动的同一尺度来计量,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就是不平等的权利;因为人们是各不相同的,强调权利的平等会导致不平等。所以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根据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女性政治解放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前提,离开了这一前提,女性的解放只能是乌托邦,但不以人类解放为指导的纯粹的女性政治解放也不可能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女性的社会解放与政治解放并不是抽象的对立,因为作为通过社会变革才能实现的女性的社会解放必须以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为基础,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8]。

三、女性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

(一) 女性文化与女性价值

1. 西美尔的女性文化论

女性运动的目标是什么?女性主义的真实意义何在?这是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自始至终必须回答的问题。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相比,西美尔在100多年前的观点无论在理论的深度还是在理论的洞察力方面都毫不逊色,他关于女性文化的论述将给我们的研究以重大的启示。

如果从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年《女权辩护》算起,女权运动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从近代开始,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的兴起为女性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女性相继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很多领域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在很多方面,女性仍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所以对于女性解放来说,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是要改变女性不平等的地位,仅仅依靠权利的获得是远远不够的。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不仅仅是争取权利的问题,而是有着更深



层次的社会原因,女性主义不应只成为保障妇女权利的处方,它的视野应广阔得多。

性别或女性视角是当代女性主义的共识,但对于女性视角的意义何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补充说,即认为女性视角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补充。杜芳琴认为,女性视角补充了一个人们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新角度,至少可以弥补以往人类认识上的缺失,从而使人类认识系统臻至完备^[39]。一种是独立说,即认为女性视角可能是一种更有意义的视角,更多的女性主义者从认识论、道德甚至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女性视角的独一无二及其意义。

西美尔在文化哲学的基础上,从女性精神与文化形式的关系角度对现代文化进行了反思,对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深层原因以及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对女性文化运动对于女性甚至对于人类的意义进行了阐发。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西美尔研究一直没有受到相当的重视,只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美尔复兴”,西美尔的女性研究思想才得到关注和研究^[40]。

西美尔明确提出,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真正原因是在文化的客观化过程中,女性面临着文化困境。西美尔首先对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进行了区分与探讨。客观文化是指人类为了获得自由并实现自己的目的,创造的科学、艺术、宗教、法律与习俗等文化形式,并通过语言、法律、习俗、艺术、职业、宗教、家具、服饰等文化的物质形式来体现,这些形式在其内在的客观意义上超越了个体,都是已有的文化活动及其未来规范的客观化结果。主观文化可以称为对灵魂财富的分享,个体以偶然的、不固定的方式共享了其中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对整体库存量没有影响^[41]。个体灵魂可以通过接受文化的某些形式教化自己,而这些文化形式本身并不依赖个体灵魂,尽管它们是个体灵魂在表达与使用自身时创造出来的。人类创造了文化,试图让文化服务于人类自身,以此完善自己,但客观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变得既脱离它的产生原因,又脱离了它的目的,成为外在于人的客观的文化价值观念。个人在他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只能接受该文化价值观念的教育,同时又受到它的制约的影响,导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然而对于个体来说,似乎又从来

没有创造过这个世界。形成个人和客观文化价值关系之间的、根深蒂固的二元性^[42]。

尽管男性和女性都受着文化的制约,但是现有的客观文化具有男性的特征。人类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没有性别的,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文化,历史上从未实现一种不问男女的人类文化的美妙想法。艺术、科学、贸易、国家和宗教等是男性创造的,具有男性的特征,在维持和不断更新中需要男性力量,需要依赖男人的能量、感觉和理智。结果形成文化价值的男性标准。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规范或价值标准也不是中立的、消除性别对立的,而是具有男性特征。文化的客观化的过程形成了两性差别中的历史范式是男性占优势。西美尔通过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例子来说明历史中的两性关系。在主奴关系中,主人不必时时想着自己主人的地位,而奴隶绝对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男性的主人地位用不着时时强调,女性却难以忘记自己的性别,她不会失去自己的感觉:我是女人。结果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女人将某些判断、制度、追求和利益作为完全男性的甚至男性特有的东西时,男人却将这些只是简单地当做完全客观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男性的支配地位使男性的本质表现获得的心理优势发展成了一种所谓逻辑优势,并且通过转化成法律的形式获得了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因而对所有男女都有规范的效果与意义,为男性的本质表现揭示了客观的、对所有不论男女的个体都同样有效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客观文化的男性特征、男性标准及其支配地位对评判、衡量女性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后果。西美尔从法律、劳动分工及传统的女性特征角度加以说明。女人之所以经常反对法律规范,不是说女人反对法律,而是意味着对男性权利的疏远,因为法律基于男人的需要,代表着男人的利益,男人拥有法律规定的权利,所以才觉得它是法律。现有的劳动分工是从男性的体力、需要等出发的,是适合于男性的。所谓传统的女性特征也是男性从有利于自身出发对女性提出的期望与要求,它不是以女性自我为中心、从女性的要求出发的,而是以男人为取向的、令男人喜欢的、为男人服务的、补充男人的。

结果,让女性从事客观化的男性职业会造成女性力量的表现受到



阻碍,女人最深邃的本质力量根本无法表达,女人身上文化劳动的创造性无从表现^[43]。由于男性特征只适合于评价男人式的成功,当用它来衡量女性特征时,女性特征会变得一无是处,弱小、无能;当用它来衡量一个有成就的女人时,就会认为这个人简直像男人,没有女人的温柔、贤惠、体贴等,结果形成要么成为一个女人,要么选择事业,在这两者之间必须二者择一。西美尔指出,在习惯于把男性的文化当做唯一的文化的前提下,女人面临两难困境,女人要么放弃创造性的文化成就,要么放弃自身,即要求女人在保持自己的特性和从事创造性文化成就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44]。

尽管女性不满于这样的状况,但在以男性标准为绝对标准的前提下,女性是不可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规范来加以评判的,因为女性灵魂最内在的生命与客观文化相抵触。所以形象地说,在男性充当两性之间的精神法院时,女性的任何上诉都不可能成功。但有没有可能从女性本质中产生一种文化活动,与迄今为止的从男性本质中产生的文化活动不同,甚至可能还优越呢?

在西美尔看来,女性文化的生长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取决于职业重新分工,或对现有的职业进行重新评价。打破现代的适合于男性不利于女性的分工,让女人能够做出一些男人做不到的事情。西美尔认为,在医学领域、艺术领域及家务领域有这个可能。女性医生因为对病人有切肤之感,能够很好地对病人进行诊断与处置。艺术领域中也有可能产生一种客观意义上的女性文化成就。西美尔甚至认为从女性的天性中自发成长起来的家务这一职业也具有极高的文化意义,但是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剥夺了家务的文化形态的实质。

另一方面,必须重新认清女性品质,以此为基础建立女性文化,从而将为人类个体灵魂拥有的财富增添女性素质,使文化的主体在品质方面与至今的不同。

西美尔比较了男性与女性的性别特性。男性与女性是人类生活中的基本相对性,其中相对一方的意义和价值由对方来决定,而且相互交替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绝对;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生活中,其中一方

凸现出来,在整个关系中占据了优势,具有绝对的意义,形成了人类两性基本关系中的历史范式。这一方就是男性,男性成为绝对,这种绝对不仅仅意味着男性,还意味着客观性、以二元为代价赢得的超越所有主观性和对立性的规范性、权威性。对男人来说,文化形式历史地表现为男性的,绝对的东西是作为超越性别的客观物出现的,如语言、法律、习俗、艺术、职业、宗教等人类客观文化,并形成了男性性别特性的绝对性。男性追求的不是生命整体,而是生命的载体;不是灵魂本身,而是灵魂的功能;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的方式。

作为对比,西美尔指出,女人比男人更接近存在。从人的纯粹性而言,女人比男人更是人,女人生活在存在与女人存在最深刻的同一性中,生活于自在地规定的性别特性的绝对性中。女性性别特性的绝对性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绝对不仅仅意味着女性,而是仿佛在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前,以实质的、静止的完整性承担着人的类特性的统一体^[45]。女人能够保持着存在的统一体,生活在未被分裂的自然原初根据中,直接生活在源泉中,相比较男人,女人更是从自己本身的根据中活出来的。正因为女人是存在于一种未被分裂的统一体中,女性原则超出了相对性(指其本质规定性来自与另一方的关系)的立场,具有自足性的特征,即不需要借助于同异性的关系。女人在自己的存在中比男人更坚定、更完整、更协调;女人在处理与事物的关系时,并没有抛弃女性借助一种与事物更直接、更本能、某种程度上也更天真的接触,并没有抛弃与事物的统一性所维持的存在。事物的产生、活动和彼此对立造成的不安以及生活本身的不安,较少触及女性存在的实质性基础,较少波及女人自身。这样事物本身的原因,生活、自然和世界隐蔽和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成为女性自己的根本依据。

为了说明女性本质的完整性、统一性,西美尔还通过把女性本质与艺术品和人的灵魂相类比说明,仿佛女人超越了一切可把握的具体事物,同事物的根据和整体有一种关系。在整个文化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对女人的粗暴对待和诗意的美化,并不是出于对任何个别的特性或个别行动的诅咒或祝福,而是源于一个统一的动机。西美尔指出,人们在一个特别的近处——在与存在的同一性关系中感觉到一种存在物,它

深刻地驻留在自己尚未分化的存在中,现在人们将此称为自然的原初根据。就男性的本质而言,这种统一体被二元化的、分化的生活方式和考验吸收了,但在女性本质身上,仍然作为人们可以感觉到的实体继续存在。

女性的绝对性在于其完整性、统一性;源于女性的母性特征,女性从包含在自身中的母性这种原初意义出发,才成为这种承担了关系感觉中的男性和女性的绝对女性。人沉入自己的存在越深,就越能让这种存在以明确的方式体现在自己身上,离生命、离世界统一体也就越近,就越能将其完整地表现在自身身上^[46]。在西美尔看来,这一形而上学论断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以某种预感、感觉和思辨的形式出现并贯穿在整个精神史中。

正是由于女性的绝对性的这些特点,它给女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空间。既然女性品质更富有灵魂的财富,那当然比男性品质好,如果真正由最好的来支配,那文化领导权应该交给女性品质,这是一种夷平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获得一种真正合乎自然规律的等级安排,一种新的贵族统治——真正由最好的来支配。正是在此意义上,西美尔认为女性文化运动对我们的将来或许比工人问题本身产生更深刻的影响^[47]。

正是在这里,西美尔提出了解脱文化困境的办法,那就是不是要向男人看齐,不是要达到由男人创造和积累的客体文化由女人来完成,也不是在创造客体文化方面增加女性化的作用或增加一些女性的特征,而是要通过女性文化运动建立一种与女性本质相适应的女性文化。但在经过长期的历史压制后,如何建立以女性的绝对性为基础的女性文化?西美尔提出必须经历与此根本相反的方向,即经过既定的、历史的、男性文化的阶段,要分享男人的教育、经验和权利,以此赢得特有的工作能力的基础、材料和技术,从而获得女人精神或经济上的独立。在女人相对于男人保持了如此长期的差别之后,女人的教养和权利必须经历某种外在相同的阶段,然后才能超越这种外在的相同,达到一种综合的理想——一种借助女性生产性的细微差别来丰富自身的客观文化^[48]。

如何建立女性文化?西美尔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因为社会主义并未解放妇女,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是男性文化,它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女性文化产生的自由空间,妇女在其中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困境。西美尔也不赞成用革命的方式,他主张用改良的方式如保护性立法、工人保险、失业补偿和最低工资限制等来保护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对此有人评论说,西美尔所谓的文化困境仅仅是西方而且是部分中产阶级妇女面临的文化困境,西美尔主要对中产阶级妇女的地位感兴趣,他在政治上主要赞同自由中产阶级德国妇女运动^[49]。

尽管西美尔关于女性特征的完整性、统一性的论述没有得到证实,西美尔关于女性文化运动的途径及意义也是含混和悲观的,但是西美尔关于女性文化的基础及意义的探讨给我们当今的女性问题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建立女性文化不仅是女性本身的要求,也是客观文化可以从现代女性运动中获得真正收益。这不是为了确定的个别人,而是为所有女人开拓更高的生存阶段;同时也不仅仅为了所有女性,而是为了人类生存困境的解决。西美尔指出,只要谁牵挂的不只是具体的人,而是人类;不只是事物的收益,而是事物本身;不只是行为和痛苦的不安波动,而是其形式的永恒意义,谁就会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期待得到女性运动最终的重要意义。

2. 马尔库塞:解放爱欲,倡导女性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具有男性的特征,即“资本主义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是男性的,即有利可图的生产率,过分的自信、效率和竞争”,资本主义的这种价值观遵循现实原则或叫行动规则。在现实原则下,文明社会压抑了爱欲、压抑了本能,结果人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材料、物质的存在,它自身没有自己支配自己运动的规则;这种僵化的情况也影响了本能,使本能遭受压抑和歪曲”^[50],从而使人陷于无限的痛苦之中。这种现实原则是通过“虚假的需求”来实现的。“虚假的需求”指那些为了某些特殊社会利益从外部强加于个人的需求,表现为“强迫性消费”,这是



晚期资本主义最必需的控制装置之一,人们在种种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中进行着高消费,一再唤起新的需要使人们去购买最近的商品,并使他们相信他们在实际上需要这些商品,相信这些商品将满足他们的需要,结果是把人们完全交给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并在这方面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是它的需要^[51]。

如何改变这一现实原则对我们的统治?马尔库塞提出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相对抗。快乐原则是遵循爱欲的原则。爱欲是指区别于性欲的人的机体追求快乐的普遍属性。所以他提出人的解放就是解放爱欲,摆脱异化劳动,恢复人的本性,“人正是在他的满足中,特别是在他的爱欲满足中,才成了一种高级存在物,才有了较高的存在价值”^[52]。如何解放爱欲?他得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必须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明确地否定侵略行径,约束资本主义强制性的需求和价值观。而且马尔库塞强调了在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女性具有的特殊作用,“女性的品质是容纳性、敏感、反对暴力、温和等等,这些特性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品质的对立物,是统治和剥削的对立面。在心理的底层,它们从属于爱神的领地,它们表达的是生命的本能力量,是对死亡本能和毁灭源的反抗”^[53]。与生命本能或爱欲相联系的女性特征表达了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价值观和行为,并对主导着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的行为准则具有颠覆性。女性特征之所以有这样的作用,马尔库塞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女性传统的再生产劳动使得她们同肉欲、爱欲保持着更多的联系,更接近快乐的源泉,“妇女同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关系使她们享有特权,即对本能的喜悦的记忆。这种特权反过来培养了……对父权制这种压抑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文明的……批判意识”,并认为爱欲的物质基础和认识来源于女人照料他人的社会行为^[54]。其次,妇女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世界相分离,这就使得她们有可能不被行为原则弄得过于残忍,有可能更多地保持自己的感性,也就是说比男性更人性化。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一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一个女性社会。

基于此,马尔库塞提出了要使女性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主义的目标:一方面,女性主义必须要求平等。女性必须要求与男人相同的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方面的权利。女人若要拥有自己的工作并在工作获得成功,就必须具有和男人一样的竞争意识和积极进取的特点。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不应仅仅要求平等,而必须“以颠覆既定的等级需求——颠覆既定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为女性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新社会的到来作好准备”^[55]。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压抑爱欲的社会,必须解放爱欲,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从价值观层面对资本主义的男性特征进行了批判,揭示了其对人的统治、压抑产生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他提供了解放爱欲的途径,并认为女性价值在解放爱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但他对女性价值的分析是建立在女性的生理差异基础上的,他的解放爱欲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他对女性价值意义的倡导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抽象否定的基础上的,因而他的解放、倡导女性价值只能成为缺乏现实基础的空谈。

3. 女性主义者:高扬女性文化

女性主义者认为,尽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女性生活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但她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是一致的:第一,女人承受着政治压迫,总的来说,女人在社会中缺乏足够的政治权力;第二,几乎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期,女人都被局限在家庭之中从事着照料他人的劳动;第三,在历史上,女人的经济职能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产品而不是生产交换价值的产品;第四,女人大都会经历完全不同于男人的意义重大的事件如月经、生育及哺乳等生理事件;第五,从全球范围看,女人曾经是而且将继续是男性暴力的牺牲品——强奸、性骚扰、肉体的侮辱^[56]。女性的这些共同特征成为女性主义者高扬女性文化的前提与基础。

一种主张以女性的母性特征为基础论证女性特征的意义。她们将女性的母性特征及女性具有的情感、直觉等特点视为新社会的道德基础,“我们为女性文化自豪,它包含着情感、直觉、爱情、人际关系等”;“只有维护长期以来受到压抑和嘲笑的女性原则,真正人性化的社会才会出现”;“我们同所有种族、阶级乃至全世界的妇女一样,女性文化

就是第四世界”；这必须以社会变革作为基础，“毁灭当前的社会，在女权主义原则之上创建一个新社会，那么，男人就被强迫生活在一个条件完全不同于当今社会的、充满人性的新社会中。若要实现这一目标，女人必须坚持女权主义，以作为社会变革的基础”^[57]。吉尔曼把女性特质与人类进步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她指出，女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狩猎者、思想者、教育者、管理者、立法者，她们具有关怀、爱、保护这一类的特征，这些品质来源于母性，是从母亲角色培养出来的。她认为，一个以男性的自私、竞争和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必将被一个以女性的集体主义及为所有人的利益的协调合作的社会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所取代^[58]。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伊里加雷提出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变成女人”的问题，呼吁母性的回归。她认为，作为一个女性，要求平等是对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的错误表达，妇女之所以受到剥削，是因为性差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通过性差异这一途径。

一种主张以女性的生理体验及心理发展为基础，提出构建女性的认识和伦理。哈特索克认为，女性的包括生育经历与烹调之类的生理体验，使得女性能够建立一种关系和延续过程的本体论，这是一种不同于并高于男性的二元论的世界观，女性能够“反对任何二元论，重视具体的日常生活，具有对他人和自然世界的各种联系和延续的感觉。如果说意识是由物质生活构成的，那就应看到妇女的以相互关系来界定的存在、向界限挑战的身体体验以及转化物质和人类的活动必定会产生不同于二元论的世界观”^[59]。哈特索克认为，妇女在履行抚育孩子的角色时，可以认识到社会现实中不为男性所知的方面。吉利根从男女不同的思考方式出发提出关怀伦理学。吉利根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男女道德的不同发展，认为与注重抽象思考和倾向原则的男性不同，女性以不同于男性的视角去观察和体验生活，她们更注重获取知识和价值观的方式的背景和联系，在作出道德决定时，她们是关怀的考虑而不是公正的考虑，因而发展出一种对人类经验的独特的价值观，关怀伦理是对具有男性特点的公正伦理的补充而不是代替。

一种主张通过文化变革实现女性解放。黑人女性主义者胡克斯认为女性解放是产生新人的过程，因此解放就像婴儿的诞生，是痛苦的。

出现的人是一个新人,他只有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为所有人的博爱所代替时才能存在,或者换句话说,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产生于把这个新人带到世界上的阵痛之中;这个新人不再是压迫者,也不再是被压迫者,而是处于实现自由过程中的一个人^[60]。胡克斯认为,在现有社会结构中,通过追求与男性的平等来改变女性地位的努力是女性解放必不可少的,但它只是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因为它代表了抵抗,是被压迫者的人性的声明;但它不是革命,没有形成进一步的革命发展。因此女性主义必须是结束性别压迫的斗争,它不是仅使某一群体、某一种族或者阶层的妇女获益,它不是使妇女享有男性所有的特权。它有能力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61]。女性主义应对女性及性别进行全方位认识,其目的不单纯是为了提高女性自身的权力,也是为了更好地使人权或民权得到广泛的贯彻和实施,使两性关系、婚姻、家庭、人类和社会制度健康协调地发展,这当然离不开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及对当今制度进行深刻地认识和批判。为此,有必要进行一场消除统治思想的斗争,这种统治思想充斥着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同时还要对社会进行重组,以使人类的自我发展能够压倒帝国主义、经济扩张和物质欲望。所以必须进行文化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文化变革上:消灭二元论、消除统治制度”^[62]。这难免带有空想的色彩。

女性主义者从生理差异出发强调了女性价值的独特性,揭示了女性独特经历的意义。他们不仅仅把女性纳入各式各样的主流男权哲学话语,而且论证女性的认知、存在和价值方式是一个被男性理论家忽视的领域。这些论证不免有将女性的认知、存在和价值方式浪漫化的倾向,而且还可能导致对女性传统角色的强调,强化女性应是温柔的、贤惠的、取悦于丈夫、专心侍候丈夫的传统特征,可能使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性别差异固定化或更加扩大。

(二) 感性活动与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劳动与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相对,是对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否定,是人的感性生命的客体化和物化,是



对人的感性生命的排斥,因此消除异化劳动就是要恢复人的感性生命,使人的活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人的感性活动,重新肯定和占有丰富的感性生命。

1. 费尔巴哈的高卢-日耳曼原则对于马克思的影响

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费尔巴哈的高卢-日耳曼原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体现在诸如《德法年鉴》这个杂志的名称上、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这个著名的表述中^[63]。这一影响体现在他对现实的人的理解和规定中,即关于人的哲学中。尽管费尔巴哈还具有旧唯物主义所具有的缺点,但“费尔巴哈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把人完全看成机械的东西。虽然他也认为人和自然同样是客观的实在,但是他用作出发点的哲学基础,乃是真实的感性的人,因此费尔巴哈把他的全部哲学叫做人的哲学”^[64]。

在费尔巴哈那里,现实的人就是感性的人,他不仅有理智,还有爱、激情、崇拜等;不仅具有纯粹思维的器官,而且还具有充分感受的器官;他不仅是头脑的原则、理智的原则,而且是心的原则、情感的原则。真正与生活和人同一的哲学家,不仅应当具有德国人的血统(头脑、男性的原则),而且应当具有法国人的血统(心情、女性的原则),是热烈的激情和深刻的思想的统一,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高卢-日耳曼公式:只有在直观与思维结合、法国感觉论唯物主义的热情与德国形而上学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因此,现实的人反对理智与心情的分裂,因为他正是二者的统一^[65]。现实的人拒绝任何思辨的抽象,现实的人同自我意识构成对立,因为后者执著于纯粹思维,并否认任何有别于理智的人的本质力量,否认任何有别于活动的苦痛,有别于知识的感觉和欲望,有别于头脑和心灵。费尔巴哈试图以感性的人来对抗黑格尔纯粹思维的专制主义,以感性的整体性同黑格尔的纯粹历史性相抗衡。

但是费尔巴哈具有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具有的缺点,即把主体仅仅理解为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结果费尔巴哈实质地取消了活动的原则,“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

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66]。结果，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一谈到某种比人们之间的纯粹的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67]。费尔巴哈所谈到的人是抽象的人，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不是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他停留在抽象的人上，而且除了理想化的爱与友情之外，他根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尽管费尔巴哈一再强调感性、现实，但由于他没有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所以，在他那里，高卢-日耳曼原则成了一个完全掏空的原则外壳^[68]。恩格斯分析了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之所以毫无结果，是“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走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69]。所以，马克思的任务就是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

2. 以主体的感性活动为基础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人是由环境所形成，环境必须被人性地形成”的主张。“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



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70]。那么,人性的环境是怎样的?如何形成人性的环境?

在马克思那里,感性以感性活动为基础,主体的活动就是感性的活动,这一强调具有两方面的作用^[71]:第一,把事物、现实和感性放到感性的活动中去理解,从而要求把我们周围的对象世界,即现存的感性世界理解为对于主体不断生成和变化着的东西,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第二,把主体的活动首先理解为感性的、客观的活动,从而在现实的基础上把主体或人的存在理解为体现各种矛盾和关系之总体的发展过程或历史过程。

由于现实的主体被理解为感性的,所以它才以感性的世界作为对象。感性、现实性就是感性对象性,“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亦即现实的,这就等于说,它是感觉之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亦即在自身之外有着感性的对象,有着自己的感性之对象。是感性的,也就等于说,是受动的。”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72]。

由于现实的主体是能动的活动,所以它才依照活动方式来了解和占有世界,从而才形成了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它是人的感性活动的非常深刻的基础,“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的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就没有了”^[73]。

由于现实的主体是感性的活动,所以它才真正要求实际地改变现存的、感性的对象世界,从而切近或通向“存在的真理”或真正的社会状态(亦即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把异化或忘在状态看做是人的偶然迷误,而是看做存在的天命和存在的历史的意义^[74]。现存的世界是异化的世界,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活

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也是人的实现和现实,它是对人的生命的否定、对人的创造力的否定,因此必须扬弃这种异化。由于异化的世界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即经济的异化;另一方面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的异化——宗教、法、道德、艺术等的异化,所以扬弃异化也包括两个方面,即在扬弃现实生活异化的同时,也要扬弃意识领域中的异化。扬弃异化的意义在于,“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75]。

真正的“社会”才是对“存在的真理”的通达,才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这就是异化扬弃后的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之状态^[76],意味着恢复人的真正创造性,恢复合乎人的本性,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是对人的本质、人的生命、人的对象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77]。

一方面,从对象方面来说,人的感性活动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即对象成为他本身。正像对象世界是通过劳动而对主体的生成一样,主体的感觉也是通过劳动而对对象世界的生成。“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78];另一方面,从主体方面来说,是形成“人的感觉”和“感觉的人类性”,即创造出“与人的本质和自然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从而形成人的感性的丰富性、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



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79]

最终历史拥有的主体和客体成了个体化的,并且不仅仅是个体化了的人,而且真正排除了“神”。“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80]。通过“他的”将自身确证为价值——体现在他创造的对象之中——的中心,“神”的存在的理由正如国家的存在的理由一样消逝了^[81],从而是对人的生命的真正的肯定。

3. 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分工和交换还不发达,生产几乎自给自足,每个共同体的成员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作为一个产品的完整的生产者,在共同体中单个人与其他人共同从事多种或一种活动的各个方面,他的活动还未分割,人的劳动活动浑然一体的特征需要人有多方面的才能,因而产生了人的能力的全面性。由于使用价值生产占了统治地位,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还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绝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因此劳动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或为共同体的劳动,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在比较古代和现代的财富观时指出,“从古代的观点看来,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在现代社会,生产表现为目的,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82]。马克思据此认为稚气的古代世界比较崇高,认为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生产目的为了直接消费,即为了使用价值,这一切决定了其生产非常有限,人在这种状态下生产的东西不多于他直接的需要。他需要的界限也就是他生产的界限。生产限于各个孤立地点,极少超出共同体的狭隘界限,交往受到很大限

制,不可能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这是因为他还没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相对立。古代人的发展形式是崇高的,但人的发展内容是原始的和贫乏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不充分的、不自由的。

社会分工使每一个个体出现了个人独立,因为分工,社会各种活动由不同的人来承担,每个个体不只属于单一的共同体,而且同时属于若干不同的群体,这表明个人是独立的,个人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人身也不依附于他人。而且由于货币交换成为人们之间进行联系的唯一纽带,它打破了人的依赖关系纽带、血统和教育的差别,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联系超越地域、血缘、发展方向和语言等旧有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也建立起来了,发展了个人之间普遍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一切自然形成的关系或纽带都荡然无存了,出现了独立的个人。随着交换价值占统治地位,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人受这种物的力量的统治、支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只有以货币为中介的普遍联系,才使人和社会的充分发展成为可能,“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83]。这种依赖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

交换价值创造了普遍的社会联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体系,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没有交换价值创造这样的条件,要消除交换价值,只能是空想,是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84]。资本主义社会打破了生产力原有的狭隘限制,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充分的物质条件,“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在这一基础的条件下)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



致。一旦达到这点,进一步的发展就再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新的基础上开始”^[85]。

人的全面发展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特别以资本主义生产作为自身的客观前提与基础,这种“现有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可区分为不同的含义^[86]:(1)资产阶级社会,(2)“物质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作为这两者的统一是最发达的、完成了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是这种关系的最高支配权,是“经济必然性”的绝对统治。当代人类生活就是要从经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而现在,“我们从犹太人中看到了一般性的现代反社会的因素”;因此,“从做生意和金钱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87]。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超出交换价值的限制,只有当人类生存的目的超出了交换价值,而时代也提供了这种可能的时候,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的的新社会形态就会到来。“一旦交换价值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限制,而物质生产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的发展关系,那么这全部及其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88]“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89]

从经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就是要取消或扬弃资产阶级社会中“物质的社会关系”的绝对支配权,并不是取消“物质生活关系”本身,而是要废除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形式,消除外在的支配与统治,使“物质的生活关系”直接成为自由自觉的生活关系。恩格斯指出过,“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到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

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90]。

人的全面发展就在于发展人的社会性和个性,突破原有的人群的狭隘的有机的联系,就在于发展出人们的新的历史的需要,使人超出原有的自然生存的需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包括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个人的自由发展看做是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和人类美好的理想,一方面个人在社会中拥有平等、独立、自由的个性,另一方面,个人也与他人发生自由的交换,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及所需要的条件。“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发展的必经阶段,“个人对资本、货币、商品或物的依赖,是个人获得独立性并进而获得体能、智能、技能等全面发展的必经环节,人的物化或异化同时也是人的对象化的自我实现和自身发展”。同时人的全面发展又必须超越这个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包含着资本主义文化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求人的独立性、差异性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另一方面,人的独立性依赖于无差别的资本和货币,一切个人价值只有转化为无差别的一般劳动、转化为一般商品等价物即货币才能实现和交换”^[91],这种矛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概念,表达了在资本统治下的社会中的个人无法逃避的资本化、商品化或物化的命运。

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于这种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从而形成生活方式、生活风格 and 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从女性解放的角度,它包括以下内容:

(1)个体劳动能力的发展。马克思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

类特性”^[92]。正是通过劳动或感性活动,人与动物相区别开来,才产生人的世界,才有自然界向人的生成,才形成人周围的感性世界。通过劳动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劳动产品,从而使人的存在与人的能力得到确证与发展。因为人之为人的属性是劳动的产物,整个世界历史也是通过劳动而自我产生的历史,所以,只有通过劳动才能理解人的生存与发展。“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93]。劳动能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人获得发展的根本途径,劳动给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和展示自己的机会与场所。妇女以及全人类只有通过形成人的全面的、劳动的综合能力,才能实现自己的彻底解放。

(2)个体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包括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历史的、现存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和关系。随着生产的发展摆脱了人类初期的狭隘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条件和关系才得以形成,才成为人的社会特性的发展的前提,人的社会特性的充分发展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生成相一致^[94]，“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95]。“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中。”^[96]人的全面性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的充分丰富与全面占有,妇女只有广泛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活动,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才能突破个体活动的局限性,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与生存空间。

(3)个体需求的多样性。需要是人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根据。为了实现人的本质,必须满足个体的需要。现代社会的普遍交换造成了个人需要的普遍性与丰富性,个体的需求是全面的、综合的和多样的。人的全面发展包含满足多样性的需求,是人作为人的需求成为需求而得到满足。只有满足女性自身的需求,而不是把男性的需求作为标准,只有女性获得需求多样性的满足,而不是单一需求模式的满足,才可能有女性的解放。

(4)个性的发展。现代社会的普遍交换造成了个人的需要、才能等的普遍性,个人关系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使得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与有着多方面享受的人生产出来,这一切,使得人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个体差异包括性别之间的差异为每个个体提供充分发展的自由空间,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动力源泉。弗洛姆针对以下流传的看法——马克思没有看到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对人的精神需要既不重视,也不了解,马克思的“理想人物”是那种吃得好、穿得好然而“没有灵魂的人”——他认为,马克思的目标是要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恢复完整的人性,“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97]。个性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对于女性解放来说,只有当女性具有不再被要求成为某种人格时,从而使自己的体能、智能、技能等人的自身属性获得自由发展的时候,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5)获得自由时间。马克思把自由时间的占有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马克思把人的必要的生理活动以外的时间划分为三个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在这一时间之内,人基本上处于自身自然再生产的状况;在剩余劳动时间中,人开始超出自然再生产的范围,但还局限于把自身作为物质生产者进行再生产的界限内;在这两种时间状态中,人们还限于满足自然存在的直接需要。只有在自由时间内,人才能真正超出上述必需和外在目的限制,把自身的发展作为目的,使自身超出自然主体和生产主体,成为社会主体。只有自由时间才是人类真正自由的形式。马克思指出,对自由时间的运用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98]。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时间被异化为剩余劳动时间,人的自由时间被侵吞,人的能力的发展的可能性被剥夺。未来社会将使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只有这样才能给所有的人腾

出时间,从而使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那时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99]未来社会将为个人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个人能力得以充分发展的时间,也是人的个性发展的空间。对于女性解放来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展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家务劳动自动化成为可能,从而大大减轻了女性的家务负担,减少了家务劳动时间,这为女性参与社会生产中去提供了条件,有利于提高女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对于女性的真正解放来说,自由支配时间是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正是在终结交换价值、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下论及家庭、婚姻和两性关系的未来。恩格斯指出,将来的两性关系将是性爱的关系和爱情的关系。“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如此而已。”^[100]恩格斯还描绘了一幅无产者家庭的图画,“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也才可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专偶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推动力了。况且,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权,只是为了有产者和为了他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它是要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缘故,它对于工人对他的妻子的关系是没有任何效力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101]。在这样的关系中,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随着资本消失,妇女当生产工具看待的地位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卖淫都要消失。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

理》中论及共产主义家庭中的两性关系将成为个人的私事。

女性解放不是要使女性变成男性,也不是让女性去束缚男性。哲学家罗素曾说过,“妇女想要的是一个能给予两性自由的制度,而不是一个让女性去束缚男性的制度,尽管过去被束缚的从来只是女人”^[102]。女性的真正解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是统治还是平等的关系,决定人类由自然行为向人类行为转变的程度,人的本质转变为自然本性的程度,以及人的自然性转变为人之为人的程度,从这种关系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教养程度,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当把妇女当做共同淫乐的牺牲品来对待时,也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当把男女之间的关系看做人與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规定。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103]。在这样的关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男人与女人处于一种自然、和谐、平等的关系中。这是一种建立在各自的感性的自然规定基础上的平等,因而是男女的真正平等。

注释:

[1] 罗素:《婚姻革命》,东方出版中心 1988 年,第 56 页。

[2] 马克思:《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9-250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586 页。

[4] 如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立法者宣称:“如果给妇女选举权,你就得在每个县建立疯人院,在每座城镇建立离婚法庭。女人太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不能介入政治。”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75 页。

[5] 最激进的要数杰梅茵·格里尔,她在其《女太监》中提出的女性的优越源于其荷尔蒙成分和生育的能力。男性从胎儿起,就有一连串的弱点,被称为伴性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只有 Y 染色体中才有的基因。这些弱点导致毛发过度症、角质斑块、色盲等症状;此外还有大约 30 种机能失调现象可以在雄性物种身上找到,但很少能因同样理由在雌性身上发现。有足够证据表明,女性从体质上比男

性强壮,寿命更长。在每个年龄组中,男性死亡人数都多于女性,尽管男性胎儿数目要比女性胎儿数目多10%到30%。男性身上那种极端的发生变异的倾向表现在所产生的天才、疯子和傻子的百分比要高于女性,而女性与之相比更为正常。杰梅茵·格里尔:《女太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页。

[6]转引自刘军:“‘妇女研究’领域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7]李小江:《解读女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8]转引自魏国英主编:《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2-163页。

[9]转引自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3页。

[10]李小江:《解读女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72页。

[12]转引自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

[13]王政等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204页。

[14]王政等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65页。

[15]王政等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206页。

[16]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51页。

[17]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6-327页。

[18]王政等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67页。

[19][德]E. M. 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俊译,三联书店1995年,序言。

[20]张立平:“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述评”,《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21]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3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7、108-10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77-488页。

[25]罗素:《婚姻革命》,靳建国译,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57页。

-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2页。
- [28]约翰·奈斯比特等:《90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何茂春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215、236页。
-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70页。
-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4页。
- [31]《资本论》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7页。
- [32]何萍:“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与妇女解放的观念变革”,《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 [33](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1、266页。
-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27页。
-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87-489页。
-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5页。
- [3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63页。
- [3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 [39]杜芳琴编:《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页。
- [40]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首次出版了西美尔关于妇女的著作《妇女、性和爱情》,由Guy Oakes翻译,该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西美尔文化理论中的妇女问题”,是译者对西美尔妇女思想的分析与研究;第二部分包括西美尔的《女性文化》、《性别问题中的绝对与相对》、《调情》、《论爱》等四篇论文(参见李银河编:《西方性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其中前三篇论文已收编在刘小枫编的《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中。
- [41]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41、140页。
- [42][美]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11、219页。
- [43]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 [44]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51页。
- [45]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



196-197 页。

[46]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 2000 年,第 191 页。

[47]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 2000 年,第 153、141 页。

[48]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 2000 年,第 153 页。

[49] 转引自李银河编:《西方性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163 页。

[50] 转引自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126-127 页。

[51] 转引自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127 页。

[52] 转引自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137 页。

[53]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136 页。

[54]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274 页。

[55]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135 页。

[56]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237-238 页。

[57]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200-201、198 页。

[58]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117 页。

[59] 王政等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204 页。

[60] 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49 页。

[61] 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 页。

[62] 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189 页。

[63] 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6-77页。

[64] 转引自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65] 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6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6页。

[68] 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0-241页。

[70] 马克思:《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6-167页。

[71] 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

[7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74] 王德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之思中相遇——论历史唯物主义的
存在论境域”,载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第203页。

[7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76] 王德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之思中相遇——论历史唯物主义的
存在论境域”,载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第205页。

[7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85、85-86页。

[7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87页。

[7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8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81] [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陈文庆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87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6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8页。

[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6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页。

[86] 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8- 313



259 页。

[87]转引自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7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

[9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7-758页。

[91]高清海等:“哲学的终结与人类生存”,《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

[9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9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94]陈学明:“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当代人的生活取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6页。

[97]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载于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9、320、321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6页。

[9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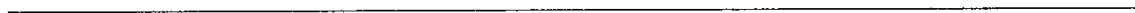
[10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页。

[102]罗素:《婚姻革命》,靳建国译,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4页。

[10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结 语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女权运动的产物和女性主义的一个流派,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几个阶段,伴随着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全球化发展的进程,其研究主题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追求目标来说,不再限于早期女性主义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权利平等或机会平等的追求,而是深入到制度层面(包括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认识与批判,具体是通过对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学校教育制度与婚姻家庭制度的批判展开的^[1]。巴雷特在其《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中,从性别的文化生产、教育制度、劳动分工、家庭与国家等方面,全方位地探讨了妇女受压迫的综合根源,并提出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妇女解放;对于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妇女解放的问题,她作出了如下的回答:“就像我们无法想象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妇女解放,我们也无法想象其平等、自由和尊严的原则因为性别不公正而削弱的社会主义”^[2]。

第二,从研究对象来说,经历了从强调妇女的共性到强调妇女的差异性的转变。早期的女性主义为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必须把女性作为一个与男性相对的性别,把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可是女性之间因年龄、阶级、民族、种族、性倾向不同而具有差异,如何认识与处理妇女之间的差异是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政治的生命力之所在。爱森斯坦着重探讨了妇女在什么意义上构成“性阶级”的问题,那就在于妇女意识到作为妇女受着压迫。贾格尔探讨了在什么意义上构成妇女立场的问题,妇女立场并不意味着妇女具有相同的看法,而是认识到妇女被社会关系组织排除在外。兰德里、麦克林探讨了妇女之间的差异使得身份政治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质主义认为女性因其天然的共同特征会自然地团结在一起,归属于女权主义的政治运动;建构主义认为,女性之间政治联盟的基础是女性在各种政治生活中的共鸣和集体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身份的性别本质^[3]。兰德里、麦克林超越了身份政治上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主张女性主义的身份政治必须以女性的多重身份为基础,必须利

用反本质主义的论据,需要反本质主义者对本质主义二元对立的批评;也必须战略上利用本质主义,需要本质主义为女性主义提供政治意义的基础,必须结合性行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与生态危机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第三,从研究问题来说,强调妇女受压迫问题不仅仅是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而且是与阶级问题、种族歧视、生态问题等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埃尔利希看来,性别不平等与阶级、种族等问题源于现有社会的强制性与等级制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所有制度化不平等的根源。兰德里、麦克林以全球化为背景,把性别歧视问题置放于种族歧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危机中进行讨论。总之,他们的种种探讨表明妇女受压迫无论从其产生还是从其解决来说都与其他问题密不可分。

第四,从研究内容来说,不仅包括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层面的探讨,还包括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层面的探讨。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从妇女与生产的关系出发探讨了妇女的家务劳动、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低下的地位对于妇女受压迫状况的影响。米切尔系统地论述了妇女在生产、生育、性与儿童的社会化四个结构中的地位构成了妇女受压迫的状况,米切尔不仅强调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方面,更强调意识形态方面。巴雷特关于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性别文化生产与家庭意识形态的分析为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意识形态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亨尼西主张把妇女问题的讨论置于意识形态、文化实践、知识生产中,探寻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关系,从种族、阶级、性别、性行为等差异中理解妇女的话语构成,及其与剥削性的社会安排与再生产之间的共谋关系,但她又主张把话语理解为意识形态,并把意识形态批判作为新妇女、新历史的基础;她试图建立唯物主义话语理论,但她探讨的结果似乎离她的目标越来越远,正如巴雷特批评的那样,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理论、精神分析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权力和话语理论“使实践经典的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越来越困难”,这种倾向具有的危险性如希拉·吉弗瑞斯(Sheila Jeffreys)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把语言提到突出的地位上,使语言变成了现实,文化批评家变成

了政治活动家,受家庭暴力迫害的家庭主妇反而在权力的蜘蛛网中消失了”^[4]。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权利与制度、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物质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与妇女解放途径的理论探讨,揭示了当今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存在,这对于改善社会科学对性别不平等的忽视、提高人们对于性别不平等问题关注无疑是有益的。“当代社会理论尽管始终想对人类社会做出一般性的陈述,但却忽略了人类社会中一桩最一般、最普遍的事实,即普遍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和不平等问题。社会科学的任务就在于专门研究人类差异和不平等这类问题,但是却一直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或者也可能是参与了隐藏这一事实的共谋”^[5]。扬就认为,哈特曼对于妇女受压迫综合状况的探讨,使得人们不敢再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受压迫的情况不存在,或是一种附带现象,或正在消失;她们的理论探讨不仅对于改善女性状况、改变女性命运,而且对现有理论知识系统的质疑、挑战与反思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地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6]。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把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其理论分析框架。在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源,又是备受批评的对象^[7]。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比较复杂,有的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本斯通、莫顿、科斯特、詹姆斯、沃格尔等,运用马克思的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生产与再生产等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构成了对妇女的压迫;有的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经济等概念与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结合起来,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米切尔、哈特曼、扬、巴雷特等试图把妇女受压迫同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结合起来,或者从物质基础方面探讨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或者以马克思主义物质基础为前提,补充意识形态、心理学或文化方面的思考;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给予极大关注,又试图修正马克



思主义理论,如波伏娃、盖尔·卢宾等。他们从不同方面、通过不同具体问题的探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布赖森把它总结如下:第一,性别平等问题不能通过抽象的原则来解释,而必须放在历史环境中;第二,反对妇女解放不仅是不公正的结果,而且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与经济需要;第三,妇女解放必须以充分的经济平等为前提,妇女达到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一个源泉;第四,妇女解放的条件必须在现有的社会中得到发展;第五,为性别平等的斗争与经济阶级斗争密不可分;第六,家务劳动和孩子养育必须在社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8]。

他们的理论探究给我们展现了马克思在当代的影响以及马克思的认识与批判的洞见,这里可借用温迪·林恩·李的概括,“第一,它着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重要而持久的方面;第二,它在某些方面有助于消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代政治分析和经济分析中已经不再有用的观点;第三,不管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被应用到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时显得有多么遥远,看看这些论题是如何能够被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劳动及其后果的批判,是很有教益的”^[9]。

尽管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可能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歪曲甚至否定,但不管持有怎样的态度:第一,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血缘联系。正像罗伯特·戈尔曼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确实走过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道路,但是仍然存在着几个基本的“血缘”特征。任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发源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都从马克思那里获取了灵感,因为马克思确实确实激发了不同倾向的马克思流派^[10]。第二,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工具的过程中,多多少少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别化”^[11]改造的倾向,劳动分工、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商品化等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全部被女权主义理论“性别化”,而生育权以及生育权的被剥夺、不付报酬的家务劳动、充分的儿童看护以及可比较的价值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和政治斗争的对象^[12]。但是我们不

应因此而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采取简单的拒斥或否定的态度,而应该探寻“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马克思被误解了”^[13]。

注释:

[1] 这一问题不仅女性主义者关注,当今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给予相当的关注。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其《男性统治》一书中揭示了学校、教会、家庭与国家在男性统治的超历史稳定的维持中所起的作用,“这些等级结构在不同学校或不同学院之间,学科之间,专业之间,也就是说在存在方式和看待事物、看待自身的方式之间,在表现才能和倾向的方式之间,总之,表现一切有助于不仅造就社会命运还要造就自身形象隐秘性的东西的方式之间,全都具有性别的含义……国家通过一个公共父权制度的规定、认可和加强私人父系制度的规定和禁止,公共父系制度存在于所有负责管理和调节家庭单位的日常生活机制中……道德秩序以男人对女人、成人对孩子的优先权,和将道德等同于力量、勇气和对身体(即诱惑和欲望之所)的支配为基础。现代国家将男性中心观念的基本原则纳入家庭权利,尤其是纳入确定公民身份的规定中。”(法)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第119-121页。

[2] Michele Barrett: *Women's Oppression Today—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259. 波伏娃看到了社会主义对于妇女解放的潜力:第一,它所承诺的经济地位的平等是妇女获得社会地位平等的手段;第二,它不会把女性限制在家庭的范围内,而是促使她们参与社会生产;第三,它不会使女性仅仅承担孩子的看护的角色。“一个男女平等的世界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那正是苏维埃革命所许诺的世界:女人由于受到和男人完全一样的培养和教育,将会同工同酬。性爱自由将会得到习俗的承认,但性行为将不会被看做是应当付酬的‘服务’;女人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谋生;婚姻将建立在配偶可以随意解除婚约的基础上;母性义务将自愿承担,这就是说避孕和堕胎将得到认可,另一方面也是说,所有母亲及其子女,不论是婚内的还是婚外的,都将会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产假将由国家付给工资,国家将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孩子脱离父母,而是意味着将不会把他们完全交给父母。”当然随着波伏娃对苏维埃世界的失望,她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转引自萨莉·J. 肖尔茨:《波伏娃》,龚晓京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112页;参见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48-149页。

[3] 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34页。

[4]转引自苏红军:“成熟的困惑:评20世纪末期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上的三个重要转变”,载于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5][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

[6]刘禾:“女性主义与当代学术成果”,《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13日。

[7]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是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常引用的著作,也正是这部著作引起很多批评与疑问,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恩格斯的一些论断缺乏论据,比如认为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家庭模式,认为前阶级社会中男女是平等的,女性甚至是男性的统治者,等等;第二,没有讨论性别劳动分工的起源,把性别劳动分工当做自然而然的,没有回答为什么男女分别对不同领域的不同工作负责;第三,尽管恩格斯反对双重道德标准的伪善,但他又认为男人的性需要多于女性,而且没有讨论强奸、家庭暴力问题,对无产阶级的婚姻持过于浪漫的看法;第四,尽管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两种生产,但他们没有给予生产过程的生产和再生产以相同的作用,甚至认为忽视了包括生殖等在内的再生产。参见 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 An Introduc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2. 72 - 75.

[8] 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2, 82 - 83.

[9][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陈文庆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3页。

[10]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导言。

[11]“性别化”是借用于安东尼奥·克拉里的“世界新秩序中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可能性”中的一个概念,它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工具的过程中,把阶级、分工、异化、价值、人类自身生产等概念从性别视角进行了有利于他们的改造。

[12]安东尼奥·克拉里:“世界新秩序中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可能性”,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13][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陈文庆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2页。

参考文献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1. Margaret Benst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1969),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17 – 32.
- Ester Boserup,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0.
-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1972),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40 – 53.
2. Z.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 Z. Eisenstein (1979a), "Develop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Z.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5 – 40.
- Z. Eisenstein (1979b), "Some Notes on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Z.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41 – 55.
- Nancy Chodorow,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Z.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83 – 106.
- Heidi Hartmann (1979a),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Kyung Kim (ed): *Feminist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206 – 221.
- Heidi Hartmann (1980b),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Z.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206 – 247.
- Iris Young (1980a), "Socialist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Dual Systems Theory" (1980),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

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Iris Young (1981b),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43 – 69

3. Michele Barrett, *Women's Oppression Today—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Villiers Publications Ltd, Ingestre Road, London, 1980.

4.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Sandra Harding,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35 – 163.

Carol Ehrlich,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an It Be Saved?" Lydia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09 – 131.

5.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83.

6. Alison M.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he Harvester Press, New Jersey, 1983.

7. Judith Newton and Deborah Rosenfelt (eds), *Feminist 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 Sex, Class and Race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5.

8. Michele Barrett,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 The Marxist/Feminist Encounter*, London: Verso, 1988.

9. 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2.

326 10.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s*, Blackwell

- Cambridge MA and Oxford, 1993.
11. Rosemary Henness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Introduction: Reclaiming Anti-capitalist Feminism",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1 – 14.
 12.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 *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Routledge, New York, 1997.
 13. 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Kyung Kim (ed), *Feminist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New York, 2003.
 14. 《资本论》第1卷上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15.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妇女》, 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8. 马克思:《神圣家族》,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19.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21.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22. 柏拉图:《理想国》, 郭斌和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2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黄勇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
 2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重庆出版社 1988 年。
 25. [英]罗素:《婚姻革命》, 靳建国译, 东方出版中心 1988 年。
 26. [美]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27. [美]刘易斯·A. 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 石人译,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90 年。

28. 吴晓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29. 吴晓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3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31. [德]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葛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
32.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
33.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
34.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35. [德]E. M. 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俊译,三联书店 1995 年。
36. [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王蓁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37. [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38. 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 1、2 卷,北京出版社 1996 年。
39.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
40.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年。
41. 金一虹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42. 王政等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
43.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44.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
45.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
- 328 46.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程锡麟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

- 1999 年。
47. 李银河:《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
48. 李小江:《解读女人》,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49. 王维等著:《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50.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刘小枫编,学林出版社 2000 年。
51.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0 年。
52. 魏国英主编:《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53.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54. 王德峰:《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55. [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56. [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57.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58. 王逢振等编译:《性别政治》,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59.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60. 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61.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62. 李银河编:《西方性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63. [英]约翰·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黄菡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64. [美]萨莉·J. 肖尔茨:《波伏娃》,龚晓京译,中华书局 2002 年。
65. [美]温迪·林恩·李:《马克思》,陈文庆译,中华书局 2002 年。
66. [美]艾莉森·利·布朗:《黑格尔》,彭俊平译,中华书局 2002 年。

67. 王恩铭:《20 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68.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 2002 年。
69. [加]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70. [美]J. K. 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71. [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72. [英]I. 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下册,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73.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年。
74. 朱易安等:《女性与社会性别》,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75.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76. [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渠东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4 年。
77. 邱仁宗主编:《女性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78. 仝华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79. 文洁华:《美学与性别冲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80.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81. [英]伊丽莎白·赖特:《拉康与后女性主义》,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82. [美]詹妮特·A. 克莱尼编:《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与应用》,李燕译校,东方出版社 2006 年。
83. 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 330 84. 米兰达·弗里克、珍妮弗·霍恩斯比主编:《女性主义哲学》,三联

- 书店 2006 年。
85. 李小江:《女人读书——女性/性别研究代表作导读》,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 凯琳·萨克斯:“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1974),载于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1-20 页。
- 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1975),载于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21-81 页。
- 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和性别分工”(1979),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46-75 页。
86. 哈特曼等:“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女权主义者的评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0)。
- 哈特曼:“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不幸婚姻:朝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1981),(美)詹妮特·A. 克莱妮编:《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与应用》,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第 573-588 页。
- 扬:“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理论的批判”(1981),载于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76-105 页。
87. 巴雷特:“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理论概念的分析”(1982),《国外社会科学》,1983 年第 3 期。
88. 沃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理论”(1983),《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 年第 5 期。
- [美]佳·查·斯皮瓦克:“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1987),载于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303-331 页。
- 南希·弗雷泽 琳达·尼科尔森:“非哲学的社会批判——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1988),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126-150 页。
- 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1988),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151-175 页。
- 贾格尔:“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1990),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



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191 - 214 页。

布赖森：“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引论”（1992），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1 - 7 页。

贾格尔：“妇女解放的政治哲学”（1994），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281 - 300 页。

安·弗格森：“女权主义哲学及其未来”（1996），王政等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397 - 422 页。

89. 罗斯玛丽·海纳西：“概念的设定”（2000），钟雪萍主编：《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第 25 - 57 页。

90. 贾格尔等：“女权主义理论概览”，《国外社会学》，1989 年第 1 期。

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1 - 18 页。

苏红军：“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19 - 54 页。

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1 - 18 页。

刘涓：“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第 95 - 140 页。

91. 何萍：“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与妇女解放的观念变革”，《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 年第 5 期。

玛丽·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载于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332 - 346 页。

92. 王宁：“解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探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 年第 1 期。

93. 李小江：“妇女研究的缘起、发展与现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 年第 4 期。

94. 张立平：“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述评”，《美国研究》，1999 年第 2 期。

332 95. 刘军：“‘妇女领域’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9 年第 2 期。

96. 王德峰:“论异化劳动学说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意义”,《复旦学报》哲社版 1999 年第 5 期。
97. 吴晓明:“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载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98. 王德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之思中相遇——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境域”,载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99. 李小江:“50 年,我们走到了哪里——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史回顾”,《浙江学刊》2000 年第 1 期。
100. 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载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01. 陈学明:“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当代人的生活取向”,《复旦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2 期。
102. 吴晓明:“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学术月刊》(沪)2001 年第 9 期。
103. 王德峰:“马克思意识概念和生产概念的存在论探源”,《复旦学报》(哲社版)2001 年第 6 期。
104. 吴晓明、陈立新:“澄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根基”,《学术月刊》2001 年第 9 期。
105. 费多益:“理性与女性——劳埃德思想述评”,《哲学动态》2001 年第 11 期。
106. 孙承叔:“哲学主题历史转换的内在本质”,《东南学术》2002 年第 4 期。
107. 刘禾:“女性主义与当代学术成果”,《中华读书报》,2002 年 11 月 13 日。
108. 吴晓明:“主题、基点与路径:阐说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江海学刊》2003 年第 1 期。
109. 吴小英:“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



110. 陈炳辉：“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 年第 2 期。
 111. 高清海等：“哲学的终结与人类生存”，《江海学刊》2003 年第 5 期。
 112. 揭艾花：“权利、能力与自由发展——一种对妇女解放实践历史的解读”，《浙江学刊》2003 年第 5 期。
 113. 李小江：“重理‘宗师’遗产”，《读书》2003 年第 8 期。
 114. 黄继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4 年第 3 期。
 115. 贝特尔·奥尔曼：“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十个新流派”，
<http://www.culstudied.com>
 116. 段忠桥：“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
- 苏红军：“成熟的困惑：评 20 世纪末期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上的三个重要转变”，载于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3 - 39 页。
- 柏棣：“读凯西·威克斯的《女性主义立场观的主体》”，苏红军等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70 - 78 页。
117. 陈学明：“西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特批判”，《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 年第 1 期。

进一步研究文献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一、中文论文

1. C. 弗鲁埃尔·洛班：“对母权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评价”，《世界民族》1980年第4期。
2. 莫晓源：“对家务劳动的再认识”，《社会》1983年第2期。
3. M. 菲斯克：“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4. 朱迪思·牛顿，德博拉·罗森菲尔特：“唯物主义女权主义批评引论（续）”，《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5. 朱迪思·牛顿，德博拉·罗森菲尔特：“唯物主义女权主义批评引论”，《南都学坛》1991年第1期。
6. 苟文均：“女性解放的尺度和出路”，《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1期。
7. 季明：“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2期。
8. 黄育馥：“西方女权主义的主要理论流派”，《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9. 黄启梁：“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深化妇女理论研究”，《妇女研究论丛》1992年第1期。
10. 陈一筠：“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派别”，《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1. 刘梦：“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述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12. 王谨：“新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4期。
13. 沃野：“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14. 李银河：“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哲学研究》1996年第1期。
15. 邵继红：“新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年第2期。
16. 王跃华，张国胜：“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17. 戴雪红:“唯物史观与妇女解放理论的思考”,《求实》1997 年第 3 期。
18. 杜洁:“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妇女研究论丛》1997 年第 4 期。
19. 刘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98 年第 1 期。
20. 黄继锋:“评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责难”,《理论前沿》1998 年第 22 期。
21. 戴雪红:“后现代主义时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1 期。
22. 王春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异同”,《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
23. 李小林:“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初探”,《妇女研究论丛》1999 年第 4 期。
24. 戴雪红:“性别与阶级——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诠释女性解放的两种角度”,《妇女研究论丛》1999 年第 4 期。
25. 周敏,李萍:“从《家庭、私人制和国家的起源》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大连大学学报》1999 年第 5 期。
26. 戴雪红:“重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述评”《浙江学刊》,1999 年第 6 期。
27. 刘军:“20 世纪 20 至 70 年代初加拿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运动概述”,《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1 期。
28. 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
29. 吴小京:“女性主义社会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0 年第 2 期。
30. 许鸿翔,周敏:“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吸收与借鉴”,《大连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
31. 石勇:“马克思主义与女权批评的关系”,《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32. 戴雪红:“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变革还是继续?”,《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 年第 4 期。
33. 李小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成和逻辑延伸”,《妇女研究论丛》2000 年第 5 期。
34. 荣维毅:“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6 期。
35. 甘德洛奈:“女性问题社会学研究:恩格斯的遗产”,《国外理论动态》2000 年第 10 期。
36. 杜洁:“论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1 期。
37. 李霞:“传统女性主义的局限与后现代主义超越”,《江汉论坛》2001 年第 2 期。
38. 艾华,李银河:“关于女性主义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4 期。
39. 戴雪红:“父权制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女权主义的理论透视”,《妇女研究论丛》2001 年第 6 期。
40. 孟鑫,贺晓光:“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女权主义主要流派的影响”,《高校理论战线》2001 年第 8 期。
41. 王向贤:“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流变及发展”,《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3 期。
42. 沃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学术研究》2002 年第 4 期。
43. 王宏维:“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解读模式”,《学术研究》2002 年第 4 期。
44. 叶苗:“略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江西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
45. 戴雪红:“失去目标的女权主义运动——‘平等与差异的二难困境’初探”,《妇女研究论丛》2002 年第 5 期。
46. 郭正红:“从国外女权社会主义思潮透析现代女性”,《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6 期。
47. 庄渝霞:“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交锋 试论后现代女权主义的

- 解构”,《江西社会科学》2002 年第 7 期。
48. 李小林:“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妇女研究论丛》2003 年和第 1 期。
49. 秦美珠,高雅珍:“女权主义社会平等观的困境与出路”,《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
50. 荣维毅:“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关系探讨”,《妇女研究论丛》2003 年第 4 期。
51. 刘莉,王宏维:“重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回应麦金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批评’”,《妇女研究论丛》2003 年第 1 期。
52. 贾格尔:“全球化对妇女‘Good’吗?”<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2003 年 4 月 7 日。
53. 杨晓宁:“社会性别概念与女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社会性别概念的产生”,《大连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54. 郜继红:“马克思主义经典妇女理论在创新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 年第 6 期。
55. 潘迎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思想述评”,《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56. 赵小华:“女性主体性: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种新解读”,《妇女研究论丛》2004 年第 4 期。
57. 徐雅芬,董建辉:“女性主义与权力——政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
58. 赵凯:“反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者立场——资本主义的终结——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评介”,《妇女研究论丛》2004 年第 5 期。
59. 刘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诠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
60. 蒋欣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求索》2004 年第 8 期。
61. 李培林:“性别研究与‘中国经验’”,《中国妇女报》2004 年 10 月 19 日。

62. 刘晓芳:“从西方女权社会主义思潮看现代女性的发展”,《学术交流》2004 年第 11 期。
63. 刘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当前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终结——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权主义批判》”,《妇女研究论丛》2005 年第 1 期。
64. 罗蔚,赵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伦理批判:唯物史观的视角”,《文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65. 严泽胜:“朱迪·巴特勒:欲望、身体、性别表演”,《国外理论动态》2004 年第 4 期。
66. 王宏维:“论哈丁及其(强客观性)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认识论语境分析”,《华南师大学报》2004 年第 6 期。
67. 李小江,白元淡:“阶级、性别与民族国家”,《读书》2004 年第 10 期。
68. 戴雪红:“女性解放的哲学思考——性异化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消解”,《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5 年第 3 期。
69. 秦美珠:“历史的误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理论”,《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70. 何平,吴风:“‘超级女声’与性别政治——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0 期。
71. 何萍:“中国女性主义问题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纪念恩格斯逝世 110 周年而作”,《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 年第 6 期。
72. [美]特雷萨·L. 艾伯特著:《让女性主义回到唯物主义》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 年第 10 期。
73. [美]马沙·E. 希门尼斯著:《马克思的方法论与女性主义》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 年第 10 期。
74. 谢风华,尹玲娟:“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现代化”,《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 年第 3 期。
75. 王森:“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及其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甘肃理论学刊》2006 年第 5 期。
76. 朱晓映:“后现代视野中女性主义的嬗变”,《妇女研究论丛》2006 年第 5 期。



77. 姚红星：“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新女性主义”，《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 年第 7 期。
78. 王宏维：“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性别视域中的演进与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 8 期。
79. 祝小丁：“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的理论影响”，《南方论刊》2006 年第 11 期。
80. 章立明：“后现代女权主义视野下的性别分工与妇女解放”，《甘肃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81. 王宏维：“赛博格女性主义”，<http://www.southcn.com/nflr/shgc/200604260184.htm>。
82. 李慧英：“社会性别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脉络”，《中国女性文化》第 6 辑。

二、英文著作

1. Evelyn Reed, *Problems of Women's Liberatio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69.
2. Celestine Ware, *Woman Power: The Movement for Women's Liberation*, New York: Tower Publications, 1970.
3. 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0.
4. Emma Goldman,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Other Essays on Feminism*. Albion, CA: Times Change Press, 1970.
5.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6. Dorothy Ballan, *Feminism and Marxism*. New York: World View Publishers, 1971.
7. Linda Jenness (ed.). *Femin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2.

8. Ann Oakey, *Sex, Gender and Society*, London: Temple Smith, 1972.
9. Rowbotham, Sheila: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1972.
10. Evelyn Reed, *Is Biology Woman's Destiny?*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2.
11. Rowbotham, Sheila, *Woman's Consciousness, Man's World*, Henmondsworth: Penguin, 1973.
12. Charnie Guettel, *Marxism and Feminism*, Toronto: Women's Press, 1974.
13. Hilda Scott, *Does Socialism Liberate Wome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4.
14. Barbara Garson, *All the Livelong Day: The Meaning and Demeaning of Routine Wor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5.
15. Evelyn Reed, *Woman's Evolution: From Matriarchal Clan to Patriarchal Family*.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5.
16. Jack Goody,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mestic Dom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7.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18.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9. Eli Zaretsky,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London: Pluto, 1976.
20. Christine Delphy, *The Main Enemy: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Women's Research and Resources Publication, London, 1977.
21. Ann Foreman, *Femininity as Alienation: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Marxism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22.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3. Nancy Chodorow,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4. Gloria Martin, *Socialism Feminism: The First Decade, 1966 – 1976*. Seattle: Freedom Socialist Publications, 1978.
25. Elisabeth 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26. Alison M. Jaggar and Paula Rothenberg Struhl, eds. , *Feminist Frameworks: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Account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and Men*,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78.
27. Annette Kuhn and Ann Marie Wolpe, eds. ,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Women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28. L. Clark and Lange, L. *The Sexism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Women and Reproduction from Plato to Nietzsche*,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9.
29. S. Firestone , *The Dialectic of Sex*,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79.
30. Susan Moller Okin, *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31. Sheila Rowbotham, Lynne Segal and Hilary Waiwright, *Beyond the Fragments: Feminism and the Making of Socialism*, London, Merlin, 1979.
32. Colin Sumne, *Reading Ideologi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Ideology and Law*, London, 1979.
33. Beverly Lindsa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f Third World Women: The Impact of Race, Sex and Class*, New York: Praeger, 1980.
34. Ellen Malos, ed. *The Politics of Housework*.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80.
35. Raymond Williams,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London: Verso, 1980.
- 344 36. Bonnie Fox (ed) , *Hidden in the Household: Women's Domestic Labour*

- under Capitalism*. Toronto: Women's Educational Press, 1980.
37. Stanley Aronowitz, *The Crisi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las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Marxist Theory*, New York: Praeger, 1981.
 38. Jane Flax, *Do Feminists Need Marxism?* New York: Longman, 1981.
 39. Jean Bethke Elshtain,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40. B. hooks, *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41. M O'berien,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42. M. Stacey and Price, M. *Women, Power an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Tavistock, 1981.
 43.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44. David M Gordon,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45. Michael Ryan, *Marxism and Deconstruciton: A Critical Articul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46. Alex Callinicos, *Is There A Future for Marxism?* London: Macmillan, 1982.
 47. A .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London: Women's Press, 1982.
 48. Sanda Harding and Merrill B. Hintikka eds.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prdrecjt: Reidel, 1983.
 49.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New York: J. F. Bergen, 1984.
 50. Christine Delphy,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London: Hutchinson, 1984.
 51. H. Eisenste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London: Llen&Unwin, 1984.
 52. Z. Eisenstein, *Feminism and Sexual Eq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

view Press, 1984.

53. G. Llord, *The Man of Reason: "Male" and "Female" in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Methuen, 1984.
54. D. Spender, *Feminist Theorists. Three Centuries of Women's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London: Women's Press, 1985.
55. Nancy Hartsodk, *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Longman, Repr.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5.
56. Toril Moil: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5.
57. Roberta Hamilton and Michele Barrett ed. *The Politics of Diversity: Feminism,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6.
58. Linda Nicholson, *Gender and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59. Sylvia Walby, *Patriarchy at Work: Patriarchal and Capitalist Relations in Employ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6.
60. T. Cliff, *Class Struggle and Women's Liberation*, London: Bookmarks, 1987.
61. T. Moil (ed), *French Feminist Thought. A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62. Seyla Benhabib and Drucilla Cornell, *Feminism as Critique: On the Politics of Gen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63. Anne Phillips (ed), *Femin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64. M. Stanworth (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Oxford: Polity Press, 1987.
65. E. Kennedy and S. Mendus (eds), *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Kant to Nietzsche*,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7.
- 346 66. Chris Weedon,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 - Structuralist Theory*, Ox-

- ford, Blackwell, 1987.
67. Janet Sayers, Mary Evans, and Nanneke Redclift. *Angels Revisited: New Feminist Essays*.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7.
68. Denise Riley, *Am I That Name: Feminsi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 i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88.
69. Elizabeth V. Spelman, *Inessential Woman: Problems of Exclusion in Feminist Thought*. Boston: Beacon Press, 1988.
70. M. Buckley, *Women and Ide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71. Diana Fuss,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72. Alison M. Jaggar, Susan R. Bordo (eds), *Gender/Body/Knowledge*,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73. C. A. Mackinno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1989.
74. L. German, *Sex, Class and Socialism*, London: Bookmarks, 1989.
75. S Ruddick, *Maternal Thinking: 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 London: Women's Press, 1989.
76.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1990.
77. Patricia Hil Collinsl,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Boston: Unwin Hyman, 1990.
78. A. Davis. *Women, Culture and Politics*: London: Women's Press, 1990.
79. H. V. Hanson and I. J. Phillipson (ed): *Women, Clas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A Socialist Feminist Reade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0. bell hooks,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81. T. Lovell (ed), *British Feminist Thought. A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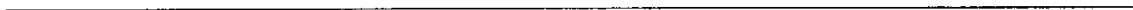
82. L. J.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83. Susan Moller Okin,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84. Sylvia Walby. *Theorizing Patriarchy*, Oxford: Blackwell, 1990.
85. Tania Modleski, *Feminism Without Women: Culture and Criticism in a "Postfeminism" Ag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1.
86. M. L. Shanley and C. Pateman (eds) ;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1.
87.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eds) ,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88. Michele Barrett and Anne Phillips eds, *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9. Margaret L. Anderson and Patricia Hill Collins (eds.) , *Race, Class and Gender: An Anthology*.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90. Christine Delphy and Diana Leonard, *Familiar Exploitation: A New Analysi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eties*,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992.
91. J. Chapman, *Politics, Femi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of Gender*,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92. Genevieve Lloyd, *The Man of Reason: "Male" and "Female" in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1993.
93. Tani E. Barlow, Dunham and London ed. ,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94. Bat - Ami Bar On. Albany (ed) : *Modern Engendering: Critical Feminist Readings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NY: SUNY Press, 1994.
95. Kathleen Lennon and Margaret Whitford, eds. *Knowing the Difference: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Epistem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

- ledge, 1994.
96. Naomi Schor and Elizabeth Weed, ed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97. D Bubeck, *Care, Gender, and Jus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98. Lise Vogel, *Women's Question: Essays for a Materialist Feminism*, Routledge, New York, 1995.
99. Ann Garry and Marilyn Pearsall, eds. *Women, Knowledge, and Reality*.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00.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eds. *Marxism Beyond Marx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01. Ann Brooks, *Postfeminisms: Feminism, 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Forms*,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1997.
102. Penelope Deutscher, *Yielding Gender: Feminism, Deconstruction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1997.
103. M. L. Shanley and U. Narayan(eds.),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Theory: Feminist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104. Nancy Hartsock,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Revisited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United Kingdom: Westview Press, 1998.
105. M. Zimmerman, Upper Saddle River (ed): *Environment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Second Edition, 1998.
106. Sarah Gamble ed. , *Feminism and Post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07. Misha Kavka and Elisabeth Bronfen eds. , *Feminist Consequences: Theory for the New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8. Kriemild Saunders ed. , *Feminist Post-development Thought: Rethinking Modernity, Post-colonialism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London: Zed Books, 2002.
109. Chandra T. Monhanty, *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后 记



Nüxingzhuyi
De
Makesizhuyi



开始接触女性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末,阅读波伏娃的《第二性》与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带给我的是思想与心灵的震撼;2001年重回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的博士学位,才开始把它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并把研究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2004年6月以《马克思的女性解放思想——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通过,并于2006年获上海市首届妇女/性别/婚姻家庭研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这次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的子课题是在原博士论文基础上的充实、修改与深化。本书的写作使我有机会系统地梳理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观点,使我更加深入地思考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主义分析的有效性问题。由于研究能力与研究资料的限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于日后的进一步研究与完善。

这本书的完成得益于很多人,我要感谢他们:正是复旦宽松自由的氛围、浓厚的学术风气以及老师们执著的学术热情的熏陶使我开始对学术产生兴趣;复旦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的集体指导使我受益匪浅,从开题报告、预答辩到正式答辩,老师们的肯定与鼓励、建议与启发给我提供了思路、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这里要感谢孙承叔教授、吴晓明教授、余源培教授、王德峰教授、金顺尧教授与郑召利博士;在复旦的三年中,导师孙承叔教授的宽容、信任与鼓励,无论学业还是生活方面的指导与关心,都是我不能忘怀的;这里要特别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俞吾金教授,是他的信任使我有机会参与这个课题,是他的鼓励使我最终没有放弃这次机会,是他在学术规范、提纲修改与具体内容展开方面的谆谆教导使我最终得以完成这部书稿。

我还要感谢朋友张乐天教授的多次悉心指导,感谢好友高雅珍副教授的关心与支持,感谢我的学生龙燕为进一步研究文献中的中文部分所做的基础工作,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张雄副教授,始终受益于他的学术热情与近乎苛刻的要求,直接得益于他在香港多次为我收集的英文资料。



本书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 15 部(篇)论著的研究介绍基本来自英文原著,并参考了相关的翻译资料,还借鉴了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由于本课题可以说是探索性的,又由于学识、能力有限,谬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2007 年 4 月 2 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

作者 = 秦美珠著

页数 = 3 5 4

S S 号 = 1 1 9 9 5 8 4
8

出版日期 = 2 0 0 8 年 0
4 月第 1 版

前言
目录
正文